

[美] 乔·奥·赫茨勒 著

商务印书馆

# 乌托邦思想史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大 厦 东 侧

79332

120000-5



\*200128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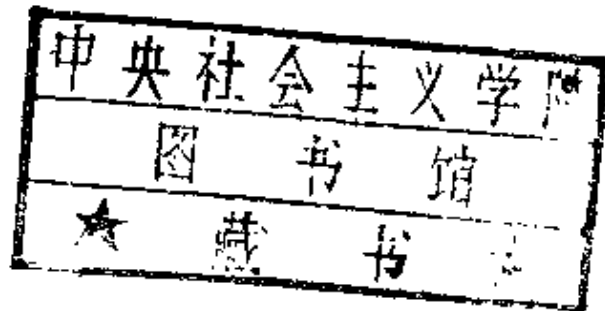
# 乌托邦思想史

[美]乔·奥·赫茨勒 著

张兆麟 等译

南 木 校

DH08/21



商务印书馆

1990年·北京

样

THE HISTORY OF UTOPIAN THOUGHT

by

Joyce Oramel Hertzler, Ph.D.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1965

据纽约库珀广场出版社1965年版译出

WUTUOBANG SIXIANG SHI

乌托邦思想史

〔美〕乔·奥·赫茨勒 著

张兆麟 等译 南木 校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782-8/D·55

---

1999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29千

印数 0-3 600 册

印张 9 3/4

定价：3.50 元

# 目 录

前 言	2
第一章 绪论	3
<b>第一篇 社会乌托邦：对历史的回顾</b>	
第二章 伦理—宗教性的乌托邦思想家和他们的 乌托邦思想	8
一、乌托邦思想家的先驱 先知者们	8
(1) 导言	8
(2) 阿莫斯	9
(3) 霍齐亚	15
(4) 艾赛亚	20
(5) 杰里迈亚	29
(6) 伊齐基尔	35
(7) 艾赛亚第二	13
(8) 对先知者的小结	47
二、启示录者	51
三、天国和耶稣的乌托邦思想	66
四、奥古斯丁和他的《上帝城》	84
五、萨沃纳罗拉的佛罗伦萨神权政治	95
第三章 柏拉图的《理想国》	99
第四章 早期现代乌托邦	119
一、早期现代乌托邦思想家以前发生的情况	119
二、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	124

三、弗朗西斯·培根《新大西岛》中的乌托邦思想 .....	142
四、康帕内拉和他的《太阳城》 .....	150
五、哈林顿的《大洋国》 .....	161
六、对早期近代乌托邦思想家的小结 .....	173
第五章 空想社会主义者 .....	177
一、绪言 .....	177
二、摩莱里 .....	181
三、巴贝夫 .....	184
四、圣西门 .....	187
五、傅立叶 .....	192
六、卡贝 .....	199
七、勃朗 .....	202
八、欧文 .....	207
九、结论 .....	215
第六章 现代社会的理想——拟乌托邦 .....	219
一、贝拉米的《回顾》 .....	221
二、赫茨卡的《自由之乡》 .....	229
三、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 .....	237

## 第二篇 社会乌托邦：分析与评论

第七章 乌托邦思想家及乌托邦 .....	248
第八章 乌托邦思想和各种思想与理想所起的作用 .....	258
第九章 乌托邦思想对文明的贡献 .....	269
第十章 乌托邦思想家观点的局限性 .....	289
编后记 .....	303

“啊，爱神！你能否和我同命运女神一道运筹  
去掌握这可悲事物的全部结构，  
我们能不能把它粉碎——然后  
将它改造得更接近于所求？”

菲茨杰拉德的《奥马尔·卡  
亚姆》第九十九首四行诗

## 前 言

本书包括两类相互关联而又截然不同的社会学研究工作。它研究社会思想史。这一领域只是近年来才受到认真的广泛重视，本书拟对具有代表性的乌托邦思想作一次历史的抽样剖析。但是，本书也对社会理想主义进行研究，即对那些往往出自出类拔萃人物的社会思想和理想，就其根源、选择与效验等方面加以研究，特别强调它们与社会进步的关系。

我所寄希望于本书好的一面在于，就我所知，这是第一部对各种社会乌托邦进行无偏见的、系统的探讨的书。因此，错误与不足之处是难免的，欢迎批评与指正。

我愿对我的朋友和同事们所提供的各种协助，对我的妻子在核对注释和准备草稿方面所给予的辛勤帮助，表示感谢。但是，首先要对我的老师和同事罗斯教授在撰写本书期间经常惠予的鼓励、指点和恳切批评，表示我的感激之忱。

赫茨勒

1922年9月4日于威斯康星大学

## 第一章 绪论

目前，在文明世界史中，社会动乱和不满到处可见，人们正在分析社会现象、探索其发生的原因、并谋求解决这些令人十分困惑的复杂问题的办法。然而，人类并非第一次碰到这类问题。自有史以来，人们不时遇到同样不稳定的情况。因为，各种习俗与制度日趋陈腐乃是本性使然，而同有关的生活方面无涉。因此，有识之士、社会贤达与各个时期的先知者们，便倾其才智，以制订出改进的办法。

在有关社会思想的著述中，有许多涉及所谓社会乌托邦的，其内容全部谈的是以上概述的问题，但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所忽视和嘲笑。“乌托邦”这个词源出于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爵士在一本书中构想的并着力加以描述的那个理想社会国家。该书以对话的形式用拉丁文于1515—1516年写成，在鲁文由弗罗本出版。后来译成各种文字流传于整个欧洲。这部书有个显著的特点，使得乌托邦这个名称成为种种想象中理想社会的通用名词。其显著特点是：莫尔刻画出一个完美无缺但也许是无法实现的社会。这是一个存在于某个乌有之乡的社会。它完全没有缺点，没有浪费现象，也没有我们这个时代那种混乱状况。人们生活在完全协调、充满幸福和美满的世界之中。

似乎从来没有人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些乌托邦著述，就连学者们对之也不甚重视<sup>①</sup>。文学史将此视为怪诞作品或视之为属于政

---

<sup>①</sup> “人们将各种乌托邦视为文学珍品，并不是由于它们对当时的政治难题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是由于作者的名声。”见史密士著，《哈林顿及其大洋国》，第12页。



治学或治国术之类的东西而不屑一顾。政治学则认为乌托邦过于虚幻，也不科学，因而不大予以注意。宗教和神学界对其中少数问题研讨过，但乌托邦思想的大部分严格说来与宗教无干。于是，最后只好留待对人类有广泛兴趣的社会学从近代社会理想主义的角度，对乌托邦加以考察和评价了。

我们发现，这些乌托邦著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作了精辟的分析，对未来的美好社会作了明晰而生动的预测，并向人们指出了促使社会进步的方法和原则。这些方法和原则往往被后世所采用，以推动社会的前进。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方法和原则有许多是幼稚而无用的。但是，它们的确唤起了一种精神，提出了一些建议。对此，当今具有社会思想的进化论者以及怀有哲理思想的历史学家都是不能忽视的。

本书第一篇的目的在于，对某些较有代表性的著名社会乌托邦思想进行分析，考察其社会背景，概述其独有的特点；但大部分的篇幅则用来对那些促成这种完善社会的机构与原则加以细致的研究。乌托邦的基础是乌托邦主义精神，即认为社会是可以改进的，而且是可以改造过来以实现一种合理的理想的。我们主张就这种理想自其萌发时起作历史性的追述。由于我们在这些乌托邦思想中发现了这种最有意义的首要思想，所以我们就称之为“乌托邦思想”。其含义是：依靠某种思想或理想本身或使之体现在一定的社会改革机构中以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从最早时期的希伯来先知者们起就表达过这种多少带有自觉性的理想，提出这种重建社会的种种方法。我们将在本书中讨论由于所受的教养、所持的观点与所抱的目的都大不相同的人所提出的种种理论以及实现其理想国家的方法。

在本书的第二篇中，我们将对这些乌托邦、它们的作者、他们的乌托邦思想和理论的作用加以评价和分析。这项研究计划还要

对其在人类进步方面所做的贡献及其我们所能觉察到的效验之明显影响作一次考察。当然，也有必要分析其不足之处。最后，还要讨论一下进化观念的影响和随之而产生的历史理论对乌托邦思想的影响和对乌托邦类型方面所引起的种种变化。

整个说来，本书主要是探讨各种社会思想与理想——产生这些思想和理想的环境和事件的影响，构想出这些思想的种种类型人物，以及它们之所以得以存在的因素及其变成现实的能力。



# 第一篇

## 社会乌托邦：对历史的回顾

## 第二章 伦理—宗教性的乌托邦 思想家和他们的乌托邦思想

### 一、乌托邦思想家的先驱—— 先知者们

#### (1) 导言

有这样一种共同的印象，即认为柏拉图是我们著述中记载的第一个描绘完美无缺的未来世界的人，他的《理想国》乃是第一个乌托邦或理想共和国。这是由于我们将所谓著述限制在过于狭隘的范围的缘故。倘若把阅读范围放宽一些，注意寻找各种乌托邦思想因素，那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希腊之前几个世纪时，在另一个民族和另一种著述中，有一些人提出过不少的乌托邦思想。这些人作为社会评论家和社会设计师，如果不是高于柏拉图的话，至少也可以和他相媲美。我们指的是希伯来先知者<sup>①</sup>。他们都是具有显著个性和独创精神的人。他们才华盖世，能审时度势，提出重建社会的路线，并勾画出一幅完美的未来图景。我们在下一节中将加以研究。

由于我们所面对的范围实际上是广阔无垠的，我们只得集中研究所谓“有著述”的先知者。他们约在纪元前 8 世纪中叶就组成由提哥亚地区牧羊人阿莫斯创始的那个令人惊叹的运动。在他身后即希伯来人在巴比伦的放逐时期前后的三个世纪，一直有一批先知者继续不断地推行这一运动。基于下述理由，我们将专门加以

---

<sup>①</sup> 先知者时期主要始于纪元前 11 世纪的塞缪尔，一直延续到纪元前 4 世纪，往后就不知不觉地转入启示录者时期。

讨论：第一，就广义的一般方面而言，他们都是独具特色的先知者；第二，由于他们是属于“有著述”的，就是说他们把思想留在著作中。他们的乌托邦思想比一些口传的先知者的思想可靠得多，后者在写成文字之前，是通过口头代代相传的，因而失去了许多原有的特点。第三，他们最清楚地表现了乌托邦思想的发展情况。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救世主”国家的发展，并表现出我们称之为乌托邦思想的学说。

但是，我们也必须限制我们研讨的范围。因此，我们决定只对这批人中六位最重要的先知者的著作加以探讨，他们是阿莫斯、霍齐亚、艾赛亚、杰里迈亚、伊齐基尔和艾赛亚第二。他们是被称为预言之灯塔的人<sup>①</sup>。

既然这主要是对社会学的研究，我们将不涉及神学与经典注释方面有争议的问题，也不涉及某些早已引起激烈论争之处。然而，我们将同意接受那些在圣经学者中意见几乎完全一致的关于时间和某些段落作者应是谁的解释。我们最关心的是：促使这些先知者发表言论的当时社会条件；在那么早的历史时期就有人认为有必要重建社会这一事实，设想出用以实现没有弊端理想社会的方法和具有建设性的想像力以至于能预见到这个理想国家可能是什么样子并把他们的见解记述下来的人。至于这些人是人们所熟悉的人还是无名之辈却是无关紧要。

我们将对上述六位先知者的研讨作出结论，简单地总结一下他们在社会学方面的重要意义，从而希望牢固地确立他们作为乌托邦思想家的先驱的地位。

## (2) 阿莫斯

在这些先知者当中，居首位的就是阿莫斯。他是一个性情粗

<sup>①</sup> 见努森所著同上书，纽约1914年版。

犷、气宇轩昂的人，因而使我们深为敬仰。阿莫斯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奇特而令人难以理解的人物之一。他是人类新一代进化过程中涌现的先锋<sup>①</sup>。就是他给予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那种希望精神以推动力。这是一种以完美的未来国家为中心并含有最真纯的乌托邦思想因素的运动。

阿莫斯生活和发表言论的时期约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那是以色列王耶罗波姆二世在位时期，他长期的英明统治使国家显得和平昌盛<sup>②</sup>。这是在以色列又一次渡过多次艰难困苦时期之后，再次上升到强有力地位的时期。它的最大的敌人大马士革王国业已处于决定性的败北地位，不能对以色列构成威胁；邻国则都已臣服。这时，耶罗波姆二世所统治的国家，从哈马斯直到死海，其版图之辽阔和鼎盛景象是自大卫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以色列是尼罗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国内各种事务似乎都一如既往，显得壮观而富丽堂皇，处处都表现出奢侈与富足的气派。象牙营造的宫室，山岩建成的房舍，城堡与要塞，马匹和战车，权力与浮华，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当时的繁荣昌盛的景象<sup>③</sup>。公元前760年在贝瑟尔欢度秋节。按照当时的风尚，纵饮狂欢乃是顺理成章之事。罕见的豪华气派成了节日的特点，供奉了数不清的祭品。人们觉得一切都很美满。

可是，节日的狂欢突然中断，狂欢的人们从自满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因为提哥亚的牧人和无花果树的整修人阿莫斯，这个其貌不扬、出身卑微但具有惊人灵感的人来到了他们中间。他斥责这帮狂欢者并预言他们很快就要遭到覆灭的命运。

我们不免自问，阿莫斯有资格说这些话吗？我们的回答是：

---

① 康尼尔，《以色列的先知者们》，芝加哥，1899年版，第46页。

② 史密士，《旧约史》，纽约1916年版，第177—184页。

③ 阿莫斯 6:4—6。

有。他是一个天性严峻的人。此外，他习惯于死海边的犹太山中那种严峻的景色。因此，牧人的孤寂生活和粗犷的环境便大大加深了他那严峻的性格。他有足够的时间去苦思冥想，审时度势，并考虑到种种后果。同时，由于他所从事的职业，他到过许多地方，见多识广，同许多人接触过。正是由于看得清，看得深，他才作出了结论，得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从事物的浮华表面下，他那双敏锐的眼睛看到了腐朽的迹象和无可避免的衰败征兆。他看到人们狂妄自傲。这个国家所引为自豪的整个辉煌结论，在阿莫斯看来，只不过是座摇摇欲坠的大厦而已，它是注定要倾覆的。他们所处的时代是虚假膜拜的时代，是人民在社会上得不到公正待遇的时代。形式取代了精神，压迫窒息了正义。

在古代以色列，人们礼拜上帝总是始终带有欢庆的性质。这被认为是热爱上帝的一种表现。可是，到了阿莫斯的时代，对上帝的礼拜已蜕化为恣意妄为的狂欢了。宴乐和喧嚣的狂饮已成为节日的特点。在各地庙堂里，滥醉如泥的现象和下流行为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可是和阿莫斯同时代的人却认为这是礼拜上帝的适宜做法<sup>①</sup>。当时的精神迷住了他们的心窍。但那些先知者尤其是阿莫斯却认识到，这乃是过去异教的残余，主要是迦南派异教的残余。对阿莫斯来说，这种祭祀活动非但是与礼拜不相干的东西，甚至是很可鄙的，是罪上加罪<sup>②</sup>。圣殿变成了妓院。因此阿莫斯大声抗议，反对在贝瑟尔举行的节日仪式。他具有真正的社会眼光，对歪曲宗教仪式的行径提出抗议，因为政治团体的全部生活是同这些仪式息息相关的。

“我恨，我鄙视你们的节日。在你们庄严的聚会上我不嗅不闻。”

---

① 康尼尔，《以色列的先知者们》，第 38 页。

② 阿莫斯 4:4。



尽管你们向我献上燔祭和肉祭，我却不想接受；也不要看你们用肥畜献上的圣安祭。

不要让我听到你们的歌声，因为我不要听你们弹琴。

以色列王室啊！你们在旷野四十年，不是一直将祭物和供品献给我么？

但现在却扛着你们的摩洛和春（摩洛与春代表异端邪说——译者）的帐幕作为你们的偶像，认它们作你们的神星”<sup>①</sup>。

对于人们如此重视的物质繁荣，这位先知却只看到由繁荣带来的种种弊端。他认为物质繁荣是表面现象，它建立在牺牲多数人的辛勤劳动上，供少数人的享受；结果使社会不公正现象猖獗起来。一方面，明显可见的是，对人民横加剥夺，<sup>②</sup>穷人受骗，被迫购进劣质谷物，价格极其高昂<sup>③</sup>，分量又不足。法院腐败，贿赂盛行。<sup>④</sup>由于贪财，公正从根本上受到毒害。佃户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只对地主有利<sup>⑤</sup>。到处可以看到无耻的压迫行径。

另一方面，穷奢极欲已成为富有阶级生活的特点。富人住在豪华的宅邸里，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躺在铺着绸缎座垫的象牙睡椅上，吃着山珍海味，喝着上等美酒。他们浑身抹上昂贵的油膏<sup>⑥</sup>。正如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中常见的情况一样，他称之为贝山母牛(Kine of Bashan)那样的妖冶妇女，比起男人来，甚至于更加奢侈贪婪<sup>⑦</sup>。这伙人全都狂妄自大，浸沉在无耻的奢侈淫逸生活之中。生活普遍腐败，在这样一种时期总会流行的种种弊端

---

① 阿莫斯 5:21—26。

② 同上书 4:1; 5:12。

③ 同上书 5:11; 8:4—7。

④ 同上书 2:6。

⑤ 同上书 3:12。

⑥ 同上书 6:4—6。

⑦ 同上书 4:1。

也极其显著。这种腐朽之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腐朽，而腐朽的国家则意味着腐朽的个人、普遍的不平等和不公正。

正是这种可悲的社会腐朽现象激怒了阿莫斯，使他作出预言。他以愤懑的激情发出的要旨是：一个建立在社会不公正之上的社会是不能持久的；作为一个国家它是注定要垮台的并且是无可挽救的。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由于领导人的懒惰放荡，正处于崩溃之中，它很快就要在亚述人<sup>①</sup>的致命打击下在实体上和政治上趋于崩溃。一个压制自己穷苦百姓、怂恿贪婪、窒息良知、拒绝忠告并将上帝置于脑后的国家，是不可能有的下场的。但阿莫斯并没有象我们今天那样，以社会力量起作用的说法来解释以色列的覆亡之不可避免的道理。按照当时希伯来人的意识，耶和华是主宰一切的神祇。这一思想使得阿莫斯把行将降临的灾难说成是神的惩罚。他抓住了这一伟大真理，即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才是对耶和华效忠。他以异乎寻常而往往是惊人的诚挚态度告诫人们：

“但愿公平如大河奔流，  
使正义如江河滚滚。”<sup>②</sup>

但阿莫斯预言的乌托邦思想表现在何处呢？在于他所告诫的社会方面。象其他先知者一样，阿莫斯所谴责的罪恶乃是社会性的罪恶：伤害邻人，尤其是无依无靠的邻人。耶和华并不要献祭，只要人与人之间的正当关系。阿莫斯所知道的也是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是：全能的上帝所提的是在道德方面的要求。目的是：在社会上要行为公正，人与人之间要公平相待。阿莫斯期望一

---

<sup>①</sup> 纪元前721年即阿莫斯作出预言后不满三十年，亚述人对以色列的围攻宣告结束并开始他们的流亡生活。

<sup>②</sup> 阿莫斯5：24。

个新世界的出现。在这个世界里，以作出贡献而不以讲究形式为理想目标。这是一个在其中可以开创社会正义新时代的世界<sup>①</sup>。

但是，对社会要进行怎样的改造，才能使这样一个社会国家实现呢？他的预言并没有提出“打倒富人、贵族、资产阶级。”而是“只要找到上帝，你们就可以生活。”<sup>②</sup>“为善不要为恶，你们就可以生活。”“让正义象永不停息的河流，滚滚向前。”<sup>③</sup>

阿莫斯所热切期求的理想乃是秩序井然的社会。这个社会充满了公正与公平相待的气氛。这个完美的新社会要在社会关系上对个人和国家进行全面的改造才能实现。而这又必须重新塑造社会伦理道德，加强人们固有的是非感和正义感。这只有当人们越来越坚定地信仰耶和華，遵循他的教导，从而使他们的生活与之相一致，才有可能实现。要实现新社会，旧社会就得改变态度，重新树立集体道德，唤醒灵性，恢复对耶和華存在的信念，并坚信耶和華控制宇宙是有一定的道德目的的。

在对人民作了雷电般的强烈谴责之后，在对他们描述了难逃的劫数之后，阿莫斯在最后一章<sup>④</sup>中简述了狂风暴雨过后风光明媚的图景。这就是对幸福安宁的未来乌托邦投以短暂的一瞥。<sup>⑤</sup>

在行将降临的浩劫中，占这个国家的多数的罪人将遭到灭顶之灾，只有少数人留下来<sup>⑥</sup>，好比经过筛选留在打谷场上的好谷

---

① 谈到阿莫斯在这一时期的教诲时，叙述在上述著作中写道，“我们可以将阿莫斯看成是在历史长河中力图把宗教从迷信、形式主义、自私、专横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人。他曾力图将宗教视为人类心灵追求正义、真理、自由和社会进步而进行的不间断斗争。”

② 阿莫斯 5:16。

③ 同上书，5:14 和 5:24。

④ 同上书 9:11—15。

⑤ 许多评论家都认为阿莫斯的最后一段可能是由后人增补的，为的是在社会特别困难时期加上必要的希望因素。但这实际上并不影响我们总的陈述方法。

⑥ 阿莫斯 9:9。“我会把以色列和别的国家一起筛一遍，就象在筛子里筛选苜蓿一样。但不会让不好的谷粒留下来。”

子。至于一些好谷子的最后出路问题则只能在重新树立受到损害的大卫王室权威中找到答案。这个王室尽管因受倾覆以色列的侵略力量的打击而遭到削弱，但经受住了考验，汇集了所有的逃亡者，并恢复了先前的气质、光辉和威力。在那个重建起来的国家里，拥有丰富的物质福利，这便是溢满着牛奶和蜂蜜的土地上的自然产物<sup>①</sup>——由人民永世分享的福利。

但阿莫斯所描述的恢复后的以色列并不是阿莫斯在世时的腐朽的以色列。尽管阿莫斯对之并没有明说过，但却含蓄地认为这个以色列是值得在以色列古老的乡土上予以重建的。这乃是一个免于违法乱纪的、净化了的、理想的未来以色列——一个失而复得的天堂。

### (3) 霍齐亚

霍齐亚预言著作撰于公元前738-735年，约在阿莫斯诞生后二十五年<sup>②</sup>。在霍齐亚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把阿莫斯所提示的乌托邦思想发挥得更充分了，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表述。有些人说他是农民，他遗著中的大量农业比喻、类比和引喻似乎证实了这一说法。但有人认为他是个教士的可能性较大。我们立即可以看到他对教士的职责抱有很高的责任感。正如人们自然而然地期望于一个教士那样，他还对他本民族的历史有着丰富的知识<sup>③</sup>。此外，他通晓成文法及其要求，后者显然是要发挥教士在法律事务上对人民进行教育的特殊作用<sup>④</sup>。因此说他原是个教士并无不当，只是由于他所属教会的衰落，才不得不承担起先知者的工作<sup>⑤</sup>。

① 同上书，9:13,14。

② 康尼尔所著同上书第53页。

③ 霍齐亚，9:10,10:9,11:1,12:8,13:1。

④ 同上书，4:6,8:1,12。

⑤ 奴森著同上书第97页。

阿莫斯与霍齐亚两人出身不同是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的许多显著差别之一。阿莫斯是个严峻的道德家，耶和華的可畏和威严性的宣讲人，他立足于裁判他的人民，宣告他们有罪，并对预言正义终将得到伸张一事几乎情不自禁地感到兴高采烈。他的耶和華基本上是刑事法官，使人不寒而栗，但并不是爱。“耶和華就是公道。”但霍齐亚却感情丰富，富于同情和怜爱之心，对他来说“耶和華就是爱的化身。”他的心是颀为悲痛所折磨而深受激动的心。霍齐亚在裁判人民这一点上其严峻程度并不稍逊，但他这样做是因为他不仅以否定或威胁人民为心满意足。对他说来，耶和華是个充满怜悯之心、慈悲为怀的人，因而不能置他所爱的人民于不顾。他要改造他们，使他们进步，教育他们，使他们能和他站在一起。在阿莫斯看来，伦理因素应主导一切，而在霍齐亚看来，宗教因素应占优先地位。<sup>①</sup>霍齐亚主要是宗教仪式的批判者。他特别强调指出当时宗教界的腐败情况，包括偶像崇拜。他并不那么强调人民生活中特有的伦理方面。他以超然的态度来看待当时的各种活动，在这一点上霍齐亚比阿莫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一个人只有当他具有道德上的洞察力和纯洁的动机，才能这样去体察生活。

考察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表明以色列正迅速走上阿莫斯预言的覆灭之路，他所猛烈抨击的弊端变得更加猖獗、更加严重了。霍齐亚的时代不及阿莫斯的时代那么繁荣昌盛，因而为非作歹的形式也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处于无政府状态和面临崩溃的时代。国家在政治上正濒于破产。国王既是杀人犯，又是篡权者；人互不信任；当时的外交差不多就是玩弄阴谋诡计<sup>②</sup>。东方各民族一向都有声色之癖，这时变得越来越无耻了。抢劫、谋杀、通奸之风盛行<sup>③</sup>。

① 康厄尔所著，同上书，第 47-48 页。

② 霍齐亚 8:4; 13:10ff; 7:11; 6:13。

③ 同上书 4:2; 6:9, 30; 7:1, 4; 9:10; 10:11-4。

造成这种广泛不道德行为的原因，主要在于教士和严重堕落的宗教界。原因是双重的。霍齐亚比阿莫斯看得更清楚，指出得更为明确。第一，教士们极其卑鄙而又虚伪。还有一些伪善的先知者跟他们勾结在一起<sup>①</sup>。他们并非严守中立，而是明目张胆地干坏事。在宗教领导人冷淡无情、麻木不仁、墨守成规的情况下，怎样能防止一个国家免于衰亡呢？教士们不教育和指导人民；人民因无知而终于走向毁灭<sup>②</sup>。当时甚至有人指责教士们操纵各种事务，从中谋取私利，指责他们怂恿人们犯罪，以便对之横加惩罚，勒取罚金<sup>③</sup>。霍齐亚在遗著中毫不犹豫地指控教士犯了行凶罪<sup>④</sup>。其次，礼拜与宗教活动从根基上受到了腐蚀。历代相传的礼拜活动变成了对异教的彻底信奉，从而形成吞蚀以色列生命的真正毒瘤。那时的礼拜活动具有信奉迦南教的色彩。因此，对耶和华的礼拜已蜕变成对沉迷于声色之好的异教的礼拜。这些腐朽的宗教形式是通过阿哈布国王同耶兹贝尔的联姻而引进到这个国家来的。耶兹贝尔是泰尔的篡权者艾斯巴尔的女儿，艾斯巴尔本人曾当过阿斯塔特的教士<sup>⑤</sup>。这样，从外面引进的阿什拉和阿什托雷斯这两个粗野形象，便为以公开放纵欲为基础的崇拜铺平了道路。霍齐亚在书中不断斥责的“通奸”和“卖淫”，不仅是对偶像崇拜的比喻，而且是如实地描述了为那种偶像崇拜所腐蚀的生活<sup>⑥</sup>。因此，每当公众参加的节日活动，纵情狂欢便受到宗教的庇护。高山上的圣坛就是罪恶的场所。在那里卖淫是司空见惯的事<sup>⑦</sup>。为

① 霍齐亚 5:2。

② 教士们最主要的职责之一乃是向人民解释与宣讲法律。见《旧约圣经·申命记 33:10；利未记 10:1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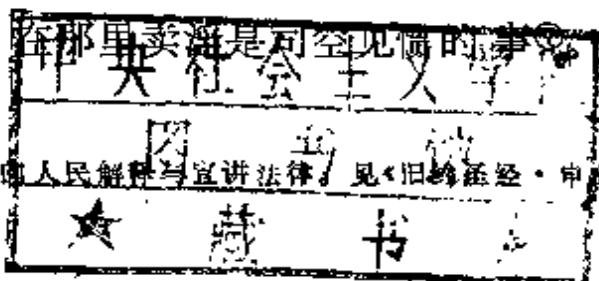
③ 霍齐亚 4:6；8,9；6:8。

④ 同上书 6:9。

⑤ 法那尔著《小先知者》，纽约1890年版，第79、80页。

⑥ 同上书，第30页。

⑦ 霍齐亚 4:13。



此，霍齐亚对教士们和带有迦南色彩的宗教加以斥责。阿莫斯则谴责富人和贵族的不公正和压迫人的行为。

阿莫斯认为，把社会机构腐朽、确已处于摇摇欲坠的情况告诉人民，这乃是他的使命；因为人们正沉醉于沾沾自喜、心满意足的境地，欢庆着国家的繁荣昌盛。而霍齐亚则必须唤醒一个破烂不堪、多灾多难、腐朽透顶的社会，使之回到忠于宗教的道路上来，以此作为使这个国家的政治社会获得拯救的唯一希望<sup>①</sup>。

他把自己的不幸的婚姻和以色列作了类比。他同戈美尔结了婚。开始时婚姻是纯洁的，可是后来她变成一个一文不值的放荡女人，从而破坏了他们的婚姻生活。霍齐亚一想起这件事就理解到耶和华对以色列的心情。他本人对戈美尔的复杂而又痛苦的心情就类似于耶和华的感情。他对她的罪恶深恶痛绝，对她的不忠怒火中烧。但是，他还怀有比这两种更为强烈的感情，那就是对她自作自受而深陷痛苦的悲惨处境表现出体谅的心情。而这也就是耶和华对他的人民所怀感情的反映<sup>②</sup>。以色列的不忠也就是一个妻子的不忠；她把她的感情交给了另一人。此人就是巴尔。和戈美尔一样，作为一个国家的以色列也犯了错误。霍齐亚说，耶和华指控他的人民，认为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忠贞可言，没有人知道耶和华；这个国家除了不守信义、杀人、盗窃和通奸之外，什么也没有<sup>③</sup>。因此，这个民族只得任其灭亡。“因为，恶有恶报。”<sup>④</sup>但耶和华在作出这一裁决时并没有掺杂个人的恩怨。他想借此机会引导这些愚昧无知的心灵作自我反省和自我认识。

霍齐亚在书中的许多章节里阐述了他的托乌邦思想和乌托邦。他的乌托邦思想以上帝之爱的原则为中心，目的在于阐明这

① 苏亚斯，《圣经中的社会制度与理想》，纽约 1915 年版，第 226 页。

② 切恩，《霍齐亚》一文，载《剑桥圣经》，第 21 页。

③ 霍齐亚 4:1, 2。

④ 同上书 8:17。

种爱的道德特性。而这与据说在异教中，神与崇拜者之间存在的那种完全非道德性的与半物质性的结合是截然相反的<sup>①</sup>。由于耶和華慈愛无边，他将和那些在社会上、政治上和宗教上墮落的人民一同经受苦难与沉沦，直到他们脱离歧途，让耶和華以他的愛来扶助他们。只有当他们采取这种顺从的态度，他们才能希望过持久的、有益的生活。耶和華要求真純不二的愛，忠诚的心，而不是祭祀。他愛了解自己的人，而不是燔祭<sup>②</sup>。只有当人们使他们自己符合这个标准，他们才会达到完美的境界。当人民在苦难中走向耶和華，公开地向他承认他们的罪孽，有了悔过之后，他才会赦免他们，他们也就成为他的臣民，于是他便成为他们的救世主<sup>③</sup>。霍齊亞在他的整个著作中所阐明的教义，其中心思想是：慈祥的父愛是耶和華的主要特性；唯有这种愛才是社会在赎罪中可以用来重建国家的巨大力量。但这一著作谈的不只是耶和華对以色列的愛；因为按照他的精神，我们可以认为他还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愛，并把这种愛视为社会这个有机体基本的重建力量。

霍齊亞描述的烏托邦，我们只偶然得以窥见其一二<sup>④</sup>。烏托邦是这位先知者的上帝之愛教义的自然产物，也是他的预言的组成部分。看来他曾用这些烏托邦思想的片言只语诱导人民去顺从耶和華。这是继圣约之后，人民恢复了名誉、精神上经过净化呈现出的一幅画面。这是一次新的结合。正直与公道、仁慈与怜悯、愛情与忠诚是这个新时代的福音。弓与劍将束之高阁，以往长期折磨以色列的战争将告结束，大地将奉献丰硕的果实。正直与愛好和平的人民和耶和華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享受着丰盛的物质财富，这

---

① 切愿，同上书第 29 页。

② 霍齊亞 6:6。

③ 同上书 2:21—23, 5:15, 6:1—3, 14:4。

④ 关于烏托邦的章节见霍齊亞 1:10, 11, 2:14—23, 3:1—5, 14:1—3。



便是未来的情景。

#### (4) 艾赛亚(或译以赛亚)

在我们所讨论的先知者社会背景和乌托邦思想中，艾赛亚列居第三位。他的活动时期从纪元前 740 年左右到 700 年。艾赛亚与其前辈阿莫斯和霍齐亚相比，在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和阿莫斯一样，他也是犹太人。但阿莫斯出身低微，是个牧人自然人，沼泽地、山区和旷野的居民，通过严峻的生活经历锻炼自学成材的。霍齐亚的家在北国以色列。毫无疑问，他是个教士。而艾赛亚却是一位贵族、朝臣。按某些记载，他还是皇族出身。我们的依据是：他似乎很容易接近国王与朝廷<sup>①</sup>。他是首都的居民。他不像阿莫斯那样未受过教育，而是个学者，精通过去的文艺，参与赫齐卡亚执政时期似曾有过的文化与学术复兴运动<sup>②</sup>。艾赛亚和他的前辈不同，他并不回避当时的政治生活。阿莫斯的活动时间似极短暂。他出生后，发表过一些意见，写过一些文章，便默默无闻地死去。霍齐亚与掌握国家命脉的势力似无联系。可是，艾赛亚却当了几乎半个世纪的议员、顾问和谏议大臣，对当时的政治深感兴趣并起过重大作用。象古代的先知者一样<sup>③</sup>，他起到实际政治家的作用。他留心观察统治者的种种阴谋诡计，力求揭穿他们的秘密计划，斥责他们恶毒而背信弃义的政策，并设法使他们在情况严重的关头按应遵循的方针前进<sup>④</sup>。他具有博得人们尊重的坚强性格；由于他身居社会高层和长期的政治生涯，对当时的政治与宗教问题都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

① 艾赛亚 7:3 对开页；8:2；22:15 对开页。

② 赛斯著《艾赛亚的生平与时代》，伦敦 1890 年版，第 14 页。

③ 塞缪尔与其后继人。

④ 布腾威色著《以色列的先知者们》纽约 1913 年版，第 254 页。

艾赛亚满怀希望地实现了他那心地纯朴政治家的崇高理想，这种理想正是四个世纪以后雅典的一个爱国志士德莫斯特尼斯加以阐述的思想：“在事态萌芽时明察秋毫，事先觉察到各种运动及其趋势并向人民作相应的说明；对任何一个国家都难免产生的弊端作斗争，如拖拉作风，因循守旧，愚昧无知，派性猜忌；向公众宣传团结友爱以及按时向国家提供急需品的责任”<sup>①</sup>。

但他们之间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在独创精神上，艾赛亚可与阿莫斯和霍齐亚并驾齐驱。正如阿莫斯是第一个把完美生活与完美国家和道德规范等同起来的人那样，也正如霍齐亚是第一个把这些问题基本上看作是爱的问题的人那样，艾赛亚也就成了第一个制订出伟大有关信念的理论的人，并以此作为实现其理想的条件。

他对当时社会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其强烈程度并不亚于阿莫斯与霍齐亚：

“啊，有罪的民族，罪孽深重的百姓，

行恶的种籽，腐败的儿女。”<sup>②</sup>

“从脚板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好的，尽是创伤，化脓的疮疤。”<sup>③</sup>

“忠贞的城邦何以变为娼妓；

它往昔充满了公平；

正义居于其中；

而今却只有杀人凶犯。

你的银子变成了渣滓，你的酒用水掺和；

你的皇族居心悖逆，与盗贼为伍；

---

<sup>①</sup> 见《论皇冠》第246段，第318页——引自德赖弗所著《艾赛亚的生平与时代》，第107页。

<sup>②</sup> 艾赛亚1:4。

<sup>③</sup> 同上书1:6。

人人喜爱贿赂，追求酬金；  
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  
也送不到他们的面前。”<sup>①</sup>

人民离开了耶和华。艾赛亚对他们提出抗议：“我养育儿女，将他们拉扯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还认识主人，驴子也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懵然无知，我的人民无情无义。”<sup>②</sup>

正如霍齐亚所说，耶和华对于人们空洞和缺乏诚意的礼拜特别感到不快。他们真正信仰的并不是耶和华，而是金银财宝、祭服、祭香和其他华而不实的祭品。“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对我有什么好处呢？你们献的公绵羊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欢。”<sup>③</sup>“你们不要再献虚有其表的供品。我憎恶香火。”他们的宗教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宗教仪式，一种口头上的礼拜。<sup>④</sup>

象阿莫斯一样，艾赛亚也谴责统治者和上层阶级，认为他们要对这个国家可悲的暴政、冷酷无情与堕落的邪恶行径负最大的责任。当权者忘记了他们的责任。除了自我享受之外，什么也不管。他们不管别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受到残酷的或不公正的待遇。所有仿效上层阶级的各阶层的人都染上贪婪、傲慢和放荡不羁的习气。“耶和华奋起裁决这个民族；耶和华要审判他臣民中的长老与官吏并说：吃尽葡萄园里果实的就是你们这帮人；从穷苦人家夺取来的脏物都在你们家中。耶和华即万人之主说：你们为什么要压制我的臣民？压榨穷苦人？”<sup>⑤</sup>妇女们狂妄自大，喜欢卖弄风骚，浮

① 艾赛亚 1:21—23。

② 同上书 1:2—3。

③ 同上书 1:11, 13。

④ 同上书 29:13—14。

⑤ 同上书 3:13—16。

华而又奢侈淫逸<sup>①</sup>。教士和先知者饮宴无度，因而“思想错误，神智不清”<sup>②</sup>。他们给庙堂抹黑，把它搞得污秽不堪。

普通老百姓由于受这些事例的影响，也变得麻木不仁，腐化堕落。他们让这种腐朽的影响大量渗进宗教并“对目睹者说：‘要闭目不视’；对预言者说，‘不要对我们讲真话，要向我们讲谎话。不要走正道，要走歪道。不要再向我们提以色列的圣者来麻烦我们’。”<sup>③</sup>就这样，他不断以一个真正社会改革者的敏锐洞察力和明确的动机，指出他们的弱点。德赖弗在下述段落中令人信服地总结了艾赛亚这方面的活动：“作为一个改革家，艾赛亚力求纠正一切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弊端。他一生为自己树立的目标是：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纯洁法制，改革宗教，反对言行不一，纠正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他的书向我们展示出，他为了达到改革的目的所怀有的坚定性和不妥协的认真态度。任何阶层的人都逃不了他的指责：在犹大极受欢迎的占卜者和其他大师；有钱有势的人物，这些人玩忽职守；受政府重视或对社会有影响的舆论界头面人物，不信教、目光短浅的政客，这帮人不管怎么说是知道如何以甜言蜜语提出种种观点的；某个有权势的大臣，他提出的政策旨在危害国家；两次使他清楚地对以色列的未来感到最深沉忧虑的、举止轻浮而又毫无头脑的妇女；沉湎于冷漠无情和形式主义的群众；还有国王本人，不论他是固执任性与不诚实的阿哈兹，还是不注意倾听外国当权者意图的赫齐卡亚。所有这些各阶层的人都一一受到他大胆的斥责。”<sup>④</sup>这一段话极其全面地表达了艾赛亚同当时的主要倾向——迷信与私生活的不道德行为以及对公众的不忠诚行为——作毕生斗争的过程。

① 艾赛亚 3:16--26。

② 同上书 28:7--10。

③ 同上书 30:10--11。

④ 德赖弗，《艾赛亚的生平与时代》，第 108、109 页。

和阿莫斯一样，艾赛亚认为受到审判是不可避免的。他看到局势毫无希望，人民不能从他的言论中得到好处，因此他知道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整个国家极端腐朽，麻木不仁，精神上茫然不知作真正的忏悔。对一切警告都无动于衷，对别人教导他们走正路的一切企图都付之一笑，不顾各种警告与惩处依然在继续犯罪，这样的民族只有走上毁灭的道路而不可能生存下去。一次看得见的、具体的、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审判一定要降临到这个民族的头上<sup>①</sup>。凡是绝大部分已经腐朽了的东西必须切除掉。这个民族必须加以净化，渣滓必须清除<sup>②</sup>。由于犯有罪行，这个民族将通过肉体上受苦受难而受到惩罚。等待他们的命运是贫困、囚禁和死亡。

象霍齐亚一样，艾赛亚并没有把审判看成是目的，而是把它看作真正获得拯救的开端。可实现的方式却全然是他自己的设想。他认为并非所有的人都应受到惩处，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好人，可以有资格在这个完美的、合乎道义的国家，在人世间的天国中生活。但这些人只是“为数极少的遗民，”<sup>③</sup>未来以色列赖以繁荣昌盛的“神圣种子”。唯有他们可以在人世上幸存下去，不受阻碍地自由发展，并最终组成这个国家。以色列要经过清洗，但不是毁灭。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艾赛亚对重建社会或乌托邦的理论。这个理论与阿莫斯和霍齐亚的理论相比，有着相当程度的差异。这是一个靠信仰得救的有效的积极方案，它集中表现在他所说的：“你们若无信仰，定然不能持久。”<sup>④</sup> 我们可以补充一句话“你们若有信仰，完美的生活就在眼前。”艾赛亚认为，只有克制行动，相信耶和华，只有放弃为自己辩护、放弃自我膨胀而完全信任耶和华，人民才有希望获得完美的未来的生活。他用以制订这个原则并可

① 这事真的就发生于公元前 722 年，以色列为亚西利亚所征服。

② 艾赛亚 1:25。

③ 同上书 1:9, 10:20—22。

④ 同上书 7:9。

能用以作为小标题加在他书中序言前的经典诗句是：“你们得到拯救，在于忏悔、安息。你们得到力量，在于平静、虔诚。”<sup>①</sup>他在另一段文章中指出，依靠信仰，依靠宣讲正直的思想，罪孽便可消除，罪恶便可赦免<sup>②</sup>。

这一原则也可适用于一个国家的物质力量和政治保障方面。在这方面他主张相信耶和華，反对搞政治阴谋。他的这种主张在许多方面也就是所有有著述传世的先知者的观点，不过艾赛亚把这一主张发展得比别人更加明确罢了。因为他是明确提出下述观点的第一人：就一个国家而言，相信耶和華就意味着争取建立一个公正的政府，一个治理完善的国家，一个符合上帝神圣准则的国家，一个完全不介入错综复杂的联盟、不承担不幸义务的国家。可是，他是从纯粹伦理的角度来界定这种神圣的含义的。这个民族和国家，只有当其遵守基本的伦理教义时才是神圣的。只有做到这一步，“公理才得以施行，正义才能成为准绳。”<sup>③</sup>此外，人民必须放弃他们趾高气扬的傲慢态度，承认耶和華的崇高地位和耶和華的无上权威<sup>④</sup>。

艾赛亚比任何人都更强调并坚持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坚忍不拔，取得进步，臻于完善的地步，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借助于物质力量或风靡一时的经济需求的理论，而是依靠纯粹伦理的与精神的力量。当这种精神力量不占上风时，国家与个人的生活便注定要受到损耗并导致毁灭。当这种力量处于优势时，这个国家和民族便会进步，获得无限光明和幸福。耶和華将指引并关注他的臣民。

艾赛亚还揭示出一个较现实的、更为美满的、属于未来的世俗

---

① 艾赛亚 30:15;7:4;8:12 对开页;28:16 对开页。

② 同上书 6:3—8。

③ 同上书 28:17。

④ 同上书 2:10—12。

国家。不妨说，将天国看作为上帝的善良臣民最后归宿地，这对我们虽然习以为常，但对于先知者说来却是陌生的。他们认为天国只是耶和华的住所。此外，相信未来的生活、未来的奖惩等等，在先知者的言论中也从未提到过<sup>①</sup>。因此，这一完美的国家是在人世上的，因此，要使人民臻于完善并不在于把人民迁移到耶和华的居住地，而是使耶和华来到人间，生活在人民之中。艾赛亚所想象的乃是这样一种理想化的城邦，一个从未想到过的更美妙的乌托邦。

这是个由一位正直的国王治理的城邦。他将要改造那些贵族和皇室成员，使他们成为真正的贵族，成为人民的保护者和支持者<sup>②</sup>。他将是杰西的后裔，因而是属于大卫族的国王。他生来就具有实际统治者的一切才能，有力量和智慧，有和别人商讨问题的精神、敏捷的理解力和高度成熟的宗教感。他将是一位正直忠诚的统治者，保护并提携弱者，打击邪恶的压迫者<sup>③</sup>。人们称他为“神奇的参议者，爱好和平的君主。”<sup>④</sup>人类再也不会遭受苦难与折磨：“那时盲人将重见光明，聋子将不再充耳不闻。那时瘸子将能跳跃，哑巴将会歌唱。”<sup>⑤</sup> 普遍老百姓在道德和智慧上会有进步。眼下处于痴呆状态的人将学会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总之，人们将学会正确审时度事，用恰当的名称称呼一切事物。搞邪门歪道的事就不会再有了。

整个自然界将是平静的，呈现出一片繁茂景象。荒野和僻地会有人开垦出来，“沙漠将欢呼，像玫瑰一样怒放。”<sup>⑥</sup>甚至那些畸

① 见戴维森《旧约预言》，爱丁堡1912年版，第310页；劳谢巴什，《基督教与社会危机》，纽约，1913年版，第17页。

② 艾赛亚 32:1。

③ 同上书 11:1—5。

④ 同上书 9:6。

⑤ 同上书 35:5—6。

⑥ 同上书 35:1。

二

岖不平的牧地也可以使之适于放牧。“干裂的土地将变成池塘，干渴的田野将水如泉涌。”<sup>①</sup>

动物界将获得新生。“豺狼将与羊羔同居，豹与山羊同卧。小狮与牛犊、肥畜同群；它们都只由一个小孩带领。牛将与熊同食，牛犊将与小熊同眠。狮子将和牛一样吃草。吃奶的孩子可以在虺蛇的洞口玩耍。断奶的婴儿可以把手放在毒蛇穴上。在我的圣山上，不会有伤人害物的事。”<sup>②</sup>所有凶猛的野兽都会变得温顺。狮子和毒蛇将成为孩子们的游侣。

这将是普遍和平的日子。各国“都将刀剑铸成犁头，把枪制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也不再学打仗。”<sup>③</sup>

这将是美妙的时光：一切都是幸福的，令人心满意足。耶和華所贖救的臣民“将返回他们的家园，歌唱来到天国。无尽的欢乐将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将得到欢欣和快乐；忧愁和叹息将消失得无影无踪”。<sup>④</sup>这是个田园般的国度，其光荣将由这次灾难中幸存的“残存者”来继承。

我们只有在艾赛亚的书中才真正了解到第一个真正适宜的、按救世主方式统治的概念。从前的先知者不提这个概念，尽管在很早以前曾在以色列流行过这种想法。<sup>⑤</sup>有著述传世的先知者把这一传统材料中的异教因素删去，并赋以鲜明的伦理色彩。即使如此，也很少作明确的表述。阿莫斯曾在一处提到过这一概念，<sup>⑥</sup>即谈到大卫圣幕的事，而那只是对大卫王室提过一下而已。在亚述时代，特别是在艾赛亚和他的同时代人弥迦的预言中，这一理论

① 艾赛亚 35:7。

② 同上书 11:6—9。

③ 同上书 2:4。

④ 同上书 35:10。

⑤ 奴德逊所提著作 156 页。

⑥ 阿莫斯 9:11。



才得到深刻的发挥。这种理论或许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它是在一个极其险恶的时期问世的。由于亚述从东面加紧入侵，王朝有遭到覆灭的威胁，而支持这个王朝的有识之士不愿让覆灭的思想在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我们在艾赛亚的著述中看到了伊曼纽尔、圣母之子、全能的上帝、和平的君主和永生之父等思想<sup>①</sup>，并在弥迦的言论中看到伯利恒以法他的思想<sup>②</sup>。这些就是关于赞美救世主的第一批预言。其主旨就是希望在适当的时候，上帝将在以色列并在全世界创立一个具有较高水平的社会和道德的新秩序。这个国家的国王是属于后世的，即属于尘世上的天国终于达到完善的时期<sup>③</sup>，因为天国仍然屹立于尘世，尽管可以肯定地说那是一个理想化的人世间。格莱兹布鲁克告诉我们<sup>④</sup>：“艾赛亚设想的远景并不远大……；他所寻求的国王不过是一个弱小国家的国王。”但这种对未来的想法却乃是一种伟大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这种由若干年代宗教经验培养出来的思想，后来以一种更加伟大而又崇高的形式体现出来。正如格莱兹布鲁克进一步指出的那样<sup>⑤</sup>：“按照这一发展，犹太民族把艾赛亚的话看成是超出其视野的预言是正确的，而基督教教会把艾赛亚本来打算给予他那一时代君主的各种称号，却授予了七个世纪之后在伯利恒的大卫的另一个儿子。”

毫无疑问，这种救世主式希望的突出特点之一，在于它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因为它表明这种希望是要在未来的某一时期才得以实现的。这样一种理想主义往往富于诗意，并产生出一幅幅物产丰富和大自然完美无缺的图景。但它所表达的主要特点乃是道

---

① 艾赛亚 9:16。

② 弥迦 5:2。

③ 戴维逊《旧约预言》，爱丁堡，1912年版，第310页。

④ 格莱兹布鲁克著《艾赛亚书之研究》，牛津1910年版，第92页。

⑤ 同上书92页。

德上的理想主义。人们要摆脱邪恶,不仅要在物质上,而且在道德上也要做到这一点。不道德的事往后将不会再发生,而在目前却极其有害,妨碍我们去为改善社会作出努力。将来,人民既不是无道德观念的,也不是道德败坏的,而是作为更大的人类整体的各个部分,具有深刻的责任感。因此普遍和平的理想就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艾赛亚的救世主式的理想在过去和现在究竟对人们有什么样的乌托邦式影响,这就很难说。但影响不小也是毫无疑问的。它在把思想贯注于我们目前所走的道路和动机与那些在田园般图景中所显示的道路和动机之间的差别这一点上,肯定是产生了影响。因为这样一种对比往往可以促使人们去仿效好的方面。此外,强调这一希望也使得人们为了实现天国的伦理要求而变得十分突出,使得这一要求成为众所周知,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实际上要求人们去实行或认可。何况,救世主时代属于未来,因而是理想性的,在提高一个民族的信仰和希望方面是个重大因素。它使人们胸中怀有一个目标——其特点是在各方面是完美无缺的,这只会使人们的目光向前看、向上看,并提供出一个通过它对眼前事物加以更正确评价的准则。

### (5) 杰里迈亚

在各先知者身上寻找乌托邦思想因素时,我们发现,杰里迈亚的这方面因素非常纯洁,非常卓著,比他的先辈高出一筹,因而我们可以把他列为先知者之首,这样做是适当的、公允的。但在考虑他在这些方面的活动以前,我们必须确认他个人的特点和他作为他那时代代表的地位。

杰里迈亚性情温和,富于情感,同严峻无情的阿莫斯形成鲜明的对比。阿莫斯对他同胞的落后情况与错误行为感到极大愤慨,而

杰里迈亚则为之抑郁感伤。在思想感情上，他比较接近类似霍齐亚。他们俩人都性情温和并富于同情心，都非常虔诚。在浏览了杰里迈亚的言论之后，很容易看出，他曾深受霍齐亚的影响。他也许甚至将霍齐亚奉为楷模<sup>①</sup>。

杰里迈亚和艾赛亚也不一样。他除了能体贴别人，生性脆弱，胆小而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而艾赛亚却坚强自恃，能应付任何紧急情况。在智力、文艺和构思威力上，他也不及艾赛亚。他的突出特性是感情深厚，能深入洞察人情世故，强烈的同情心，善于理解并掌握伟大的精神真理。

杰里迈亚由于惯于作深入的自我揭露，使我们有可能了解他的情况，颇有把握地评论他的一生。他于纪元前 650 年出生于耶路撒冷的一个叫亚那托的村庄<sup>②</sup>。他出身于教士家庭，<sup>③</sup>是出自摩西的大卫高僧阿比阿塔的后裔，给人们的印象是他的生活环境并不贫困。当然，杰里迈亚很早就通晓有关以色列人的传说，受过重视历史上最具自豪感和最热爱事迹的熏陶。他还受过良好的教育，因而我们从他的著述中引用的古籍文献和以色列历史看到这一点及其接受的社会传统。他的预言活动始于纪元前 626 年迄于 586 年。按照犹太传说，他曾于纪元前 586 年在埃及遭到暴民用石块袭击。当时，他的同胞有一部分人为了避免犹太的入侵和预料中尼布查德尼查的迫害曾逃到埃及<sup>④</sup>。

杰里迈亚当时处于国内外极不安定的时代。杰里迈亚开始当教士时，爆发了北部蛮族即塞西亚人的入侵。正如匈奴人后来席卷世界的另一部分一样，他们席卷了整个以色列。这次入侵在亚述帝国造成大片废墟，这无疑也是造成这个帝国覆亡的间接原因。这

① 康尼尔，《以色列的先知者》，第 91、92 页。

② 杰里迈亚 1:1。

③ 康尼尔，《以色列的先知者》，第 92 页。

④ 同上书，第 107 页。

个帝国于公元前 606 年，在米堤斯人和迦勒底人联合入侵下，与涅维同时陷落。与此同时，埃及军队在法老-尼科的指挥下，力图为自己取得亚述帝国中他所垂涎的部分，这一部分恰好是叙利亚。公元前 605 年，尼布查德尼查与尼科的军队交锋，将尼科的军队彻底打垮了。这便使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归新巴比伦帝国统辖。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公元前 538 年巴比伦沦陷时为止。作为缓冲小国的犹太，由于这些划时代的世界性演变，当然也遭到惨重的损失。

然而，国内局势也很混乱。那时，世界上的霸主经常更迭，于是各国的国王也随着更换。乔西亚的统治由于他在麦吉多阵亡而宣告结束。在麦吉多，和他联合的叙利亚军曾力图阻止尼科东进。他的幼子耶和哈兹由人民拥为国王，但在三个月之后被俘。乔西亚的长子耶和基姆继位，作为尼科的藩属。几经易手之后，他终于成为尼布查德尼查的属国。公元前 597 年人民起义，但在巴比伦，军队还未来到之前耶和基姆就死了，由他的儿子耶和钦继位。耶和钦在位只有短短的三个月就被迫向尼布查德尼查投降。与他同时被俘解往巴比伦的，还有许多王公大臣和教士。这种热爱独立的精神，在新国王泽德基治下再次表现出来。这就导致另一次起义。最后，耶路撒冷于公元前 586 年失陷，并被夷为平地。<sup>①</sup>

社会、道德和宗教事务同样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也许比可悲的政治局势更糟。自阿莫斯在第八世纪发表令人吃惊的言论以来，人民逐步堕落下去，对他们周围的邪恶现象采取了冷漠的态度。他们比他们的父辈更坏<sup>②</sup>。他们犯罪不是不自觉的，而是有意识的。杰里迈亚没有象阿莫斯那样对当时的弊端多作评论，但他的确提

---

① 详情参见史密斯著，《旧约史》，第 275—300 页；史密斯，《以色列的宗教》，第 163—169 页。

② 杰里迈亚 16:12。

及许多人犯下的罪过。其中有虚荣<sup>①</sup>、冷酷无情<sup>②</sup>、贪婪<sup>③</sup>、说谎与谩骂<sup>④</sup>、欺骗<sup>⑤</sup>、通奸、淫乱。无耻的放荡行为<sup>⑥</sup>、不忠与欺骗之风盛行<sup>⑦</sup>，以及谋杀等等<sup>⑧</sup>。社会上存在着肆无忌惮的放荡不羁现象和前所未有的趋于邪恶的倾向。在宗教方面情况令人绝望，使得这位先知者象霍齐亚一样，深为悲恸，但他也作了严厉的抨击。无视宗教的现象遍及全国<sup>⑨</sup>。人民为假先知者所苦。这些伪先知者对真正的先知者进行诬蔑，用他们那套伪善观点和狡猾手段把国家引向歧途。他们说谎并与人通奸<sup>⑩</sup>。教士们全都腐败不堪，给人们作邪神占卜；到处流行野蛮的异教风尚<sup>⑪</sup>，甚至重新将婴儿作为祭品<sup>⑫</sup>。人民湮没在毫无生气的繁文缛节之中，伴之以轻松的温和主义，结果便造成极端的腐败现象。诚然，这乃是多事之秋，需要一个“杰里迈亚运动”。人们将被刀剑、饥荒与瘟疫所毁灭<sup>⑬</sup>。

杰里迈亚和他的前辈一样，认为人民注定要遭受苦难。这灾难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所有的先知者在作出对将来抱有希望的预言时会持有这同一种看法呢？巴顿威塞提出了一个我们可以置信的理由：“他们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他们的布道是对聋子说话，因为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与人民之间在宗教观点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分歧。他们明确表示了他们的

① 杰里迈亚 2:5。

② 同上书 5:28。

③ 同上书 22:17。

④ 同上书 9:3,23:10,29:23。

⑤ 同上书 5:27,8:15,9:5—6。

⑥ 同上书 5:7,8:12,9:2,13:27,23:10,29:23。

⑦ 同上书 23:13。

⑧ 同上书 7:5—9,22:17。

⑨ 同上书 11:10,13,22:9。

⑩ 同上书 2:8,5:13,30:31,14:14,23:9—16,25—27,29:8。

⑪ 13:27,19:4。

⑫ 7:31,19:5。

⑬ 同上书 22:6—8,29:17—18。

信仰，即只有推翻整个宗教-社会结构，才能使人民认清幻想和迷信的害处<sup>①</sup>。先知者们之所以竭力说明如何可以避免灭亡，只是为了推进他们相信上帝召唤他们去实现的最终目的，而不是因为他们希望他们的告诫可能受到同时代人的重视”。<sup>②</sup>因此，杰里迈亚感到无法使人民立刻就能得救。只有在长期的流亡生活中经受苦难之后，他们最后才会清除掉他们的错误与腐化行径<sup>③</sup>。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杰里迈亚最伟大的贡献。他的贡献不仅在预言方面，而且在对宗教的发展方面也是伟大的，这指的是他的乌托邦思想。诚然，杰里迈亚谈到未来的理想国家。对此，我们将简略地加以论述。但要求我们加以密切关注的乃是这一新的方面，即他以预言的形式提出了我们称之为伦理-宗教性质的乌托邦思想。杰里迈亚作为个人精神的代表是无与伦比的。在早期的先知者当中有一种种族团结的强烈表现。当时的宗教与伦理，首先涉及的是民族或集团的事务问题，集团的行为与道德问题，集体的责任问题。是杰里迈亚第一次使个人的心灵成为真正纯洁的宗教之基础并使个人的良知成为社会伦理之基础。是他第一次明确拟订出道德上的自由与道德上的责任这种新思想。他说：

“在那些日子里(即未来的以色列的日子)人们不会再说，  
‘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就觉得发酸。’  
但各人将为自己的罪过付出生命；  
凡是吃酸葡萄的人，  
他的牙必定会发酸。”<sup>④</sup>

① 为了证实这一点，可参见《杰里迈亚》13:23; 17:1-3。

② 伯顿威索，《以色列的先知者》，第177—178页。

③ 杰里迈亚 13:24—27。

④ 同上书 31:29—30。见31:29—34全文。重点作者自加。

正如杜姆所说，“他首次发现了人的灵魂和它对宗教的重要意义。”但是，也可以看到他发现了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思想。这并不是说他完全抛弃了民族的观点，因为他在整个施教期间，向人民布道时还是把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来看待的。但是，上述这种思想的确表明他修改了宗教的概念，使之不仅广为流传而且纯洁，且使之充满活力，更加超脱。其特点在于个人与耶和华建立起密切联系。此外，它还赋予个人以新的重要含义。这一思想大有助于廓清宗教仪式与真诚信仰之间、单纯遵从常规陋习和真正的伦理活动之间混淆不清之处。这一思想使个人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使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何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努力必须做到与耶和华的意志协调一致，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通过“净心”和正大光明地做人以追随耶和华。<sup>①</sup>正直的生活与真正的虔诚在于个人的灵魂与耶和华建立亲密的联系。杰里迈亚还采取了进一步的步骤，使个人与耶和华的联系普遍化——这是一种新察觉的使人们重新做人的方法。他把耶和华描绘成一个要把这种联系作为施予全世界各族人民的神祇，以便使全人类的精神革新成为可能。<sup>②</sup>

杰里迈亚竟然成为发表这一套理论的人，这并不是为奇。他的一生历尽艰难困苦——他面对纷争、痛苦、孤寂、诽谤、监禁和牺牲——这种困难处境会使他到人类以外去寻求友情、慰藉与希望，而这些是人类不会施予他的。因此，杰里迈亚在经受孤寂、苦难和精神上的折磨的时刻，逐渐产生出一种自觉的对耶和华的个人关系，一种比他的任何先辈在心灵上与耶和华更加密切的关系。此外，他以他的生平事迹来例证他的新思想，并以他的忠诚信仰作为崇高而又感人的范例。

① 详细事例见《杰里迈亚》4:3, 4。

② 同上书 16:19—21。

杰里迈亚的乌托邦将于以后讨论乌托邦理论时加以论述。他对未来描绘的图景当然不象艾赛亚描绘的那样尽善尽美，但却足以表明他深信有一个理想的未来社会国家，它会出现在热爱这个国家的、社会化了的人民面前。他以惊人的洞察力看到，由于个人和社会的革新这样的国家是会实现的，一旦各个人为了参加一项伟大的共同事业而群情激奋时是会形成一致行动的。届时以色列的各种残余势力将从各个角落汇集到一起，得到惊人的恢复<sup>①</sup>。他们将受大卫王室一个公正的支系的统辖<sup>②</sup>，这个王室支系将对世事作出裁决，推行正义<sup>③</sup>，而这些人则由净化了的利米人来施教<sup>④</sup>。他们将沿着河边的路径直向前走，不会失足绊倒<sup>⑤</sup>。悲伤将化为欢乐，男女老幼无不欢欣鼓舞<sup>⑥</sup>。世代的福祉将普照四方<sup>⑦</sup>；善行和繁荣将层出不穷，宫殿将重建起来，一个个社区将得到恢复<sup>⑧</sup>。公正的耶和華将关心他自己的臣民，从最卑微到最伟大的人都信奉他<sup>⑨</sup>。因此，杰里迈亚对未来和其他先知者抱同一看法，即认为耶和華将神妙地干预世事，以建立新的社会、道德和宗教秩序。

## (6) 伊齐基尔

我们所考察的先知者当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也或许就是伊齐基尔<sup>⑩</sup>。他是耶路撒冷寺院教士布齐的儿子，他青年时代无疑是在

① 杰里迈亚，23:8；30:3,8；31:8；33:15。

② 可见杰里迈亚跟艾赛亚一样，也提出大卫王这一思想，并提到救世主的时代。

③ 杰里迈亚，23:15。

④ 同上书，33:22。

⑤ 同上书，31:9。

⑥ 同上书，31:13。

⑦ 同上书，31:12。

⑧ 同上书，30:18—20。

⑨ 同上书，31:34。

⑩ 史密士谈论伊齐基尔时说，“总的说来，他是整个希伯来历史中最有影响的人物。”



寺院中接受教育的，后来自己也当了教士。他的爱好与兴趣都表明他熟悉该寺院及其授职仪式。他那别具一格的文风和描绘的人物表明，他也很了解他民族的早期历史和文学。用杰里迈亚的话说，他是那些“优秀人物”中的一员。他于公元前 597 年被尼布查德尼查送往巴比伦囚禁起来。他和他的流放难友成立了一个由长者主持的有组织的社团，在查巴尔运河旁的台尔-阿比卜。我们从古代碑文中得知那指的就是大卡巴鲁运河，从巴比伦城东流奔向尼浦尔<sup>①</sup>。公元前 593 年，他肩负起先知者的工作。这个职位他至少保持了 22 年。因此，他成为第一个被流放的先知者，他的预言也多方面受到他工作环境的影响。

伊齐基尔是以色列史中最突出的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性格严峻、坚强、不讲情面，从来不心慈手软。在这方面他酷似阿莫斯和艾赛亚，而不像霍齐亚和杰里迈亚。他在性情上也象艾赛亚，是个完全务实的人，对各种问题及时代要求的观察力非常敏锐，而且具有同样惊人而又崇高的道德热忱。他对本国的罪恶行为提出了严厉而又果敢的谴责，要求实现公正的热情异常强烈。在表白信念时，他很勇敢，几乎是武断的。他的理想主义固然很深奥，几乎耸人听闻，但从不带有诗情画意，尽管这种理想主义是以极其生动的形象和象征性手法勾勒出来的。他的理想主义气势宏伟，给人以深刻印象，并非常注意计算精确，细节无误，他的著作和别的先知者的一样，是在很大程度上把先辈的作品加以改造或发挥。他特别充实、修订并以高涨的热情提出了杰里迈亚的宗教主观主义和个人责任的理论。当这个理论涉及到乌托邦假说时，将加以讨论。

然而，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根据我们从伊齐基尔的著作了解到的情况，回过头来看一看他的社会背景。他对以色列的

---

<sup>①</sup> 肯特著，《以色列和犹太的国王与先知者》，纽约 1909 年版，第 276 页。

指责在很多方面实际上和先前的先知者的见解是一样的，虽然有时显得更加严峻。整个说来，王公、僧侣和某些人都是一帮无可救药之徒。有些人，特别是王公曾犯过不道德和压迫人民的罪行，对穷人、手无寸铁的人和虔诚的爱国者犯过不公正的罪行。贵族们“按权势的大小肆意杀人”。有些人出卖证词，指控无辜，诬为杀人犯。有些人做买卖刻意贪婪，手段苛刻，他们榨取高利，对债户极尽严厉而不公正之能事。强者欺压弱者；孤儿与寡妇遭到凌辱；孝道荡然无存；骇人听闻的不道德行为，淫乱之风，两性间的丑恶行径和谋杀事件公然泛滥成灾<sup>①</sup>。

偶像崇拜与其他异教徒的恶行玷污了人们真诚的礼拜。他们啖食带血的肉，无视安息日的禁例。他们用仪式和道德上的恶行褻渎圣殿，把外来的神祇供于高位<sup>②</sup>。假先知者像豺狼一样，东奔西窜，欺骗人民，用掩盖可怕的社会实情的手法把他们引入歧途<sup>③</sup>。我们还可以继续说下去，但这已足以说明种种事物的可悲景况了。

但伊齐基尔和其他先知者有一点却大不相同。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他并没有对当时偏爱仪式的作风大事攻击。他把冒犯礼仪的行为和违反道德上的行为相提并论<sup>④</sup>。他在他的著作中用很大的篇幅详细阐明宗教的表面现象。伊齐基尔在这里遵循了由《申命记》作者所开创的发展路线。《申命记》的作者认为，为了增进真正宗教的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全部排斥祭祀崇拜，而是使之道德化，并使之成为表达宗教真谛的媒介。努森在评论这一点时，发表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讲话。他的讲话指出仪式在宗教

---

① 伊齐基尔 9:9, 11:6, 22。

② 同上书 8:1—14, 8:1—18, 16:1—45。

③ 同上书 13:1—7。

④ 同上书 22。

中所处的必要地位。他说<sup>①</sup>：“仪式本身并不是真正宗教的必要组成部分。相反，它常带有很多物质的和非精神的东西。据此，应当记住，宗教中确有许多不必要的东西，但是为了使宗教在世界上起到作用，这些不必要的东西便成为必要的了。这些不必要的东西各个时代都有所不同，但存在于每个时代。一个具有真正宗教政治才能的人却能识到这一点，并使之成为宗教文化的有效手段。”伊齐基尔便具有这种力量和洞察力。他利用仪式作为宣传道德观念的核心，希望以此在国家处于危急之际用来稳住人心。

和其他先知们一样，伊齐基尔根据上述社会情况，预言他的民族注定要灭亡<sup>②</sup>。但是，伊齐基尔所作关于灭亡的预言是在不同于其他预言中的情况下讲的，因为他的听众业已流亡国外，盼望及早返回家园。这就使他们不太愿意听到耶路撒冷行将陷落的预言。

我们记得，按照新誓约<sup>③</sup>的说法，耶和华在人民心中写下了他的戒律，从而在他们的心中唤起一股矢志与信服的热情，于是声称耶和华业已和杰里迈亚以及每一个人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这样，他就创立了一种真正的伦理-宗教个人主义的基础，并宣布了个人报应的戒律。但是杰里迈亚只稍稍提了一下这个问题，而伊齐基尔却使之成为他著作的主要特点<sup>④</sup>。他甚至走得更远。犹太人在放逐以前不可能将个人与家庭和国家分别开来考虑，他的灵魂一直被认为是家庭和国家的财产。可是伊齐基尔说，个人的灵魂是一个其本身就具有绝对价值的单位<sup>⑤</sup>。不能大整批地谴责许多人，也不能整批地拯救许多人，因为每个人都应由他本人来审判。

---

① 伊齐基尔，第 203 页。

② 同上书 7:2—4; 30:7。

③ 根据撒迦利亚 2:18—22，这是耶和华和人民订立的新誓约。它不同于耶和华与摩西订的誓约。

④ 伊齐基尔 3:16—21; 14:12—20; 18:1—32; 33:1—20。

⑤ 伊齐基尔，18:4。

倘若要使社会达到完善的境界,那将不会整个地实现,而是必须分别对待每一个人。他还进一步指出,个人本身必须有意地祈求这种变化,他的性格必须经历一番彻底的改造。此外,他接着说,每个人都有内在的力量去改变自己的性格,因而他本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sup>①</sup>。伊齐基尔在这里第一次向我们阐明我们所知道的新生这个思想,有必要完全革新的思想。我们对这问题的研究表明,这种新生的思想是从个人责任这个思想演变的过程中产生的。

伊齐基尔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在经历了彻底改造之后个人的福祉一点也不受自己过去历史和父辈功过的影响<sup>②</sup>。他可以摔掉把他和以往捆在一起的枷锁,过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生活而重新做人。“儿子不必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必担当儿子的罪孽。”<sup>③</sup>他自己的正直行为可使他免于承受行将降临到那些有罪的人或有罪的国家头上的劫数。由于他自己可以做到举止公正,他就有了道德上的自由,他的命运就是他自己意志塑造的结果;他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他自己灵魂的征服者。因此,以社会团体与国家作为宗教和道德单元的情况便不复存在了;其人民也就变成自觉自愿的有道德的人。每个人都我行我素,完全不受他人的影响。他只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制订出自我拯救或自我灭亡的办法来。他的外在行为同他的内在性格是和谐一致的。

现在有必要停下来,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谈一两点意见。后人对个人这一概念的研究表明:伊齐基尔的个人责任论未免过于僵硬也过于严峻。个人能否革新,在一定程度上总要受他自己以往的历史以及他先辈的物质和社会传统观念的左右。每个人的个性与

---

① 伊齐基尔,18:21—32,33:10—20。

② 同上书 14:12—20,18:20—28。

③ 同上书 18:20。

处境总有一些因素不受他自己志愿的制约。因此，除非我们的确了解他的身体、心理与精神上的实情，是无从对个人作出正确而公允的判断的。其次，按照伊齐基尔的看法，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的外在祸福正确地反映了他的本性，也反映了他在耶和華面前的实际情况。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会在两大本通俗犹太手册《诗篇》和《箴言》中继续起绊脚石的作用。这两本书都反映了伊齐基尔的理论。它认为不幸与苦难无可争辩地是罪孽的证据。因此，虽然一个人看上去似乎是正直的，但由于他现在受到某种痛苦，自然表明他隐藏的邪恶终于暴露了出来，并使他得到应有的报应。这种不恰当的论点后来在《约伯与教士》中受到质疑，继而遭到摒弃。<sup>①</sup>

人们也许会问，“按照伊齐基尔的想法，所要采取的乌托邦思想路线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对此伊齐基尔作了扼要的说明，他说：“倘若恶人背弃他犯过的一切罪恶，遵守我的一切戒律，奉公守法，他就肯定会有活路，不会死亡。”<sup>②</sup>这种说法非常空泛，可以包括所有宗教的、道德的和法律的各方面行为。伊齐基尔正想把这一切都包括进去，甚至要求更多一些，因为他认为人们必须具有新的感情和新的思想。一切违法行为，一切人与人之间不公平的现象，一切触犯法规的行径都会由公正的上帝处以受人世间的苦难与不幸的惩罚。为了不做这类事情并在伦理和精神上革心洗面，人们就要按耶和華的意志过理想的生活。

但是，这些经过再生而变得完美无瑕的个人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理想世界之中呢？这就把我们带进了伊齐基尔的乌托邦或神圣之邦——一个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国家。可是在讨论这个

---

<sup>①</sup> 查尔斯：《末世学，希伯来、犹太和基督教的想法》，伦敦1913年版，第64对开页。还可参见约伯19：25—27。

<sup>②</sup> 伊齐基尔18：21。

问题之前，我们必须简略地谈一谈我们从他的著述中所看到的某些救世主因素。我们在第 34 和第 37 章看到伊齐基尔预言未来救世主式国家的概念。这个国家大体上与以前各先知者所预言的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这是一个使以色列和犹太<sup>①</sup>光荣地恢复到先前状态的国家。它再次受到祝福，土地肥沃，物产丰富<sup>②</sup>。人民将清除一切可憎的事物和罪行，人人都洋溢着幸福、安全与快乐的气氛<sup>③</sup>。他们将永远受到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照顾<sup>④</sup>。耶和华说：“我的圣殿也将与他们同在。我愿做他们的上帝。他们将是我的臣民。”<sup>⑤</sup>

我们可以把第 38 和 39 章视为前几章的补遗。这两章提出了对救世主时代的新看法，这乃是上述其他书籍中不曾涉及的问题。以色列在它恢复了的故土上栖息了一段时期之后，就会受到在戈格领导下的梅戈格国各族人民的攻击。入侵的军队在以色列的崇山中遭到可怕的屠杀而被彻底击溃。在埋葬了戈格和他的部属、清除了瓦砾之后，便迎来了最后的普遍和平。这种全世界国家进攻以色列的想法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这是传统的未来学的一部分<sup>⑥</sup>，但伊齐基尔乃是第一个将外族入侵日期定在救世主时代来临之后遥远未来的人。伊齐基尔这一想法对我们即将谈到的启示录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 40 与 48 章是对伊齐基尔的未来天国即新耶路撒冷加以描述的著名章节。他在其中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恢复后的以色列的精细画面。这时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政治共和国，而

---

① 伊齐基尔 37:15—28。

② 同上书 36:1—15。

③ 同上书 37:23。

④ 同上书 34:24; 37:24, 25。

⑤ 同上书 37:27。

⑥ 同上书 38:18。

是一个教会组织或国家。礼拜者组成的社团、它们的教士以及他们做礼拜用的物品和器械都生动地置于显著地位；还着力描述了建筑物与行政管理的细节。这些都是后来中世纪时代乌托邦具有的特点。寺院及其礼拜仪式在书中占有突出地位。它详细说明了寺院的规模、方位和周围环境。祭祀的方法和地点也作了细致的描述。对教士的身份、选拔、职责及管理等方面都提供了精确的材料。还制订了一些规则以确保仪式的纯洁性、细致仪式的正确做法以及“适当庆祝”各种节日、季节和安息日。事实上，这个神圣之邦为了确保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民都能有正式的神圣感和预定的纯洁性，提供了一切必要的东西。在这个国家里还保留着某些古老的社会信念。这个国家由一位不属大卫族的国王来治理，他不是个暴君<sup>①</sup>。贵族将不再滥用暴力和营私舞弊，而推行公道与正直的政治，取消苛捐杂税，办事也绝对公平合理<sup>②</sup>。土地将在全民中进行平均分配，外乡人与本地人享有同等待遇<sup>③</sup>。然而，老一輩先知者曾十分强调的关于要求取消不公道、压迫与道德败坏等行为，在本书中却含糊其词。书中基本上要求做到的是神圣性；而所谓神圣性主要是指仪式的正确性和注意仪式的细节。这样，这个理想的国家便完全一心从事上教堂去做礼拜了。

在这样一个神权政治的国家里，我们看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因素存在，尽管不曾明说。这就是宗教团契精神<sup>④</sup>。伊齐基尔是第一个注意到在一切伟大的事业中团结与合作是多么重要的人。因此，他认为他的使命之一乃是教育国人应象社团的成员那样生活在

---

① 伊齐基尔 46:18。

② 同上书 45:9—12。

③ 同上书 47:22—23。

④ 这一精神贯穿于 37:22—27与40—48 各章。作同样解释的有科尼尔：《以色列的先知者》，第 120 页和鲍德温：《以色列对近代文明的贡献》，波士顿，1913 年版，第 64、65 页。

一起。

在伊齐基尔着手制订他那神权政治国家的细节以前，希伯来国家已不复存在。随着它的消亡，思想重点已从强调伟大国家和人类利益转向对宗教所持态度上。因此，由于伊齐基尔知道他这一代人决不会看到耶路撒冷，他便着手忙于为国人拟订一种最终将会到来的、经过重新组合的、完美国家的新体制。他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只住着那些净化了的和新生的男女。这些人由于受过上帝训诫的教育并熟悉上帝的戒律，所以适于在这个上帝的世界里生活。因此他称之为“耶和华所在地。”<sup>①</sup>

### (7) 艾赛亚第二(或译以赛亚第二)

艾赛亚第二是我们单独加以讨论的最后一位先知者。他在许多方面都处于这一预言周纪的顶峰。艾赛亚第二是个未经明确界定的流放期与流放期后的先知者。他发表预言的时期约在公元前540年，此后并延续了一个时期，可能甚至延续到以色列人获得解放的时期。他的预言可以在《艾赛亚》一书第40到66章中找到，因此号称艾赛亚第二或多伊特罗-艾赛亚。当今的学者差不多都一致认为，这些章节是由同一作者在流放时期撰写的。<sup>②</sup>甚至有人把这些章节分为由两个人写的著作。第40-55章是一位作者在流放结束时写的著作，第56-66章则是另一作者在流放后立即写成的著作。这是他们根据上下文推论出来的。但这未必就意味着有不同的作者，尽管上下文矛盾处表明，我们看到的著作是为了不同目的在不同情况下写成的。我们将把这两部份作为同一位作者在不同时期的著作加以讨论，将第56-66章看作是同一位作者囚禁于巴

① 伊齐基尔 48:36。

② 持同样观点的著名学者有：卡农切恩，见《评论》；见德莱弗：《艾赛亚的生平和时代》；戴维森：《旧约预言》；史密斯：《解说人论艾赛亚的圣经》；科尼尔：《以色列的先知者》。



比伦归来后在耶路撒冷居住时写的著作。

我们对这位作者的生平毫无所知，因为他既没有在他的著作上署名，也没有给书题名或题字，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象别的先知者那样向我们提供有关他个人生活的详细记要。此外，他的著作尤其缺乏地方色彩，因此我们不想在这方面给种种令人分神的臆说再增添麻烦，而将集中主要精力以阐明他的全面复国的思想并表述他的永恒共和国。

艾赛亚第二认识到，人民在他们的国家遭受屈辱、情绪低沉的情况下，需要的是给与安慰与鼓励而不是斥责，因此他在书中便以这样的话开其篇<sup>①</sup>。但这并不是说他就置他们的罪恶与缺点于不顾了。作为人民，他们远非完美无缺。他们一再被提醒：他们的苦难与不幸乃是他们自己犯的罪过所造成的<sup>②</sup>。他们自有生以来就行为不轨<sup>③</sup>，视而不见，听而不闻<sup>④</sup>。不诚恳、顽固不化、偶像崇拜，这些都是他们的过错<sup>⑤</sup>。但艾赛亚第二和其他先知者不同，他没有向同胞发出注定要灭亡的预言，也没有发出敌人入侵或被摧毁的威胁，没有关于残存者的说法。当然这是由于艾赛亚第二施教的环境有了改变。他的人民已经在流放中经历了早期先知者所预告的苦行。他发出预言的目的倒是旨在唤起人们不要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使动摇分子坚定信心，对持怀疑态度的人进行规劝，并毫不含糊地宣告对人民进行大规模的拯救并使之复苏的日子即将到来。以色列要从巴比伦手中拯救出来，它的后裔也要从他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各地集合起来。他们要通过荒原回到耶路撒冷，在那

---

① 艾赛亚 40:1,2。

② 同上书 42:24—25; 43:27; 50:1。

③ 同上书 48:8。

④ 同上书 42:18—20。

⑤ 同上书 48:1—5。

里建立起一个空前繁荣的世界王国——新耶路撒冷<sup>①</sup>。然后，艾赛亚第二补充了另一个没有听说过、至少在他以前的先知者没有提过的说法。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将是一个永恒的、欢乐持久的、没有尽头的世界<sup>②</sup>。把暂时的和永久的加以明确区分，这还是第一次。此外，还有另一种说法，即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好处和特权将由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共享，由所有的民族和国家共享<sup>③</sup>。它包括所有的人，不象先前的先知者所说的那样，只由上帝的选民受用。由于增加了这两种因素，艾赛亚第二便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不是把未来的希望加以局限并由少数人独占，不是使之限于暂时的和转瞬即逝的，而是使之无所不包而又具有永恒性——这真是对这个民族的乌托邦著述作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

他对这个新的理想国家所描写的情景同他的先辈，特别是艾赛亚所构思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当我们想起其结构的性质和所处时代时，这个国家就显得神圣，具有无比新的光辉。这个国家的另一特点是，艾赛亚第二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未提到将要统治这个国家的大卫王朝未来救世主；他经常提到的仅为耶和华和在尘世上的选民<sup>④</sup>。于是，我们看到在救世主式国王统治下的半政治性国家第一次转变为真正神圣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民乃是彻底受到了感化的。在这个理想的国家里不会再发生暴乱与遭到毁灭。全境将确保和平与安宁<sup>⑤</sup>。河流与泉水将川流不息，荒地有如伊甸乐园，沙漠变成花园<sup>⑥</sup>。地上将长出冷杉而不是荆棘；长出

---

① 艾赛亚 40:3, 4, 17—20, 49:5, 6, 19—21, 54:11, 12, 55:12, 13。

② 同上书 45:17, 51:11。

③ 同上书 42:6, 43:9, 56:1—3, 66:18。

④ 见科尼尔(Cornill, C.H.)著,《以色列的先知们》(Prophets of Israel) 135页,可对症。

⑤ 艾赛亚 53:17。

⑥ 同上书 41:18, 19; 43:19, 51:3。

番石榴而不是蒺藜<sup>①</sup>。悲哀的日子就此告终，再不会有死亡。幸福的人们将获得永生<sup>②</sup>。劳动将得到应有的报酬<sup>③</sup>。动物间将和平共处。就象《艾赛亚》书中所说，“豺狼将与羊羔同餐，狮子将与牛一样吃草，蛇将以尘土作为美食”。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上到处不伤人、不害物。”<sup>④</sup>所有的居民都是正直无欺的，永远占有土地，就象由耶和华亲手培植的树枝一样在土地上繁殖起来。他们的成长为耶和华增添了一分荣光。天堂与尘世都会得到重新改造<sup>⑤</sup>。耶和华说：“众生都会在我的面前礼拜。”<sup>⑥</sup>

艾赛亚第二的乌托邦思想在主要的细节上与其他的先知者并无任何区别，但在规模与实际应用上，它却带有普遍性，倘一旦付诸实现则具有永久性。外部的恢复——他描述得非常独特、非常壮观——完全取决于人们内心的赎罪。他认为每个人必须改变各自的观点，自我清洗一切不公正与腐朽的东西，自觉接受杰里迈亚和伊齐基尔描绘得多么伟大的耶和华的教导。“让恶人改弦更张，不正直的人摒弃原有的念头，让他归顺耶和华，耶和华就会怜恤他，让他归顺我们的上帝，上帝就会多加赦免。”<sup>⑦</sup>但是，这种个人与耶和华的主要的然而可喜的关系，这种将一个人从邪恶的世界中拯救出来并将他安置在一个公正的世界上的做法，对所有的人都是一视同仁的。这乃是艾赛亚第二的特点。<sup>⑧</sup>再者，这种遍施拯救的做法具有永恒性。耶和华说，“我的正义永世长存，我的拯救千秋万代”<sup>⑨</sup>。赎了罪的人将永远过正直的生活。分析到最后，

① 艾赛亚 55:13。

② 同上书 60:20。

③ 同上书 65:23。

④ 同上书 65:25。

⑤ 同上书 65:17, 66:22。

⑥ 同上书 66:23。

⑦ 同上书 55:7 并参阅 58:1, 2。

⑧ 同上书 49:6。

⑨ 同上书 51:6, 8。

这要取决于可能永存的上帝的恩赐与怜悯，<sup>①</sup>那绝无仅有的上帝<sup>②</sup>是普天之下的人所共知的。这样，我们就登上预言性乌托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顶峰。

我们也许会自问，“异教徒和所有其他各族人民怎样才能认识和过这种完美的生活呢？以前的先知者都认为，这种生活一向只有希伯莱人才能享受<sup>③</sup>。”这就是《艾赛亚第二》一书中提出的为社会学家特别感兴趣的另一新因素。为人们服务，这就是他描述的耶和华向各民族发出的最高号召。在尔后几段话中，这位先知谈到“耶和华的仆人”。毫无疑问，他指的是理想化和人格化的以色列。他把这个仆人视为他在人类中选中的代表和人类的见证。<sup>④</sup>为了使以色列更好地充当仆人，为了使它更适合于服务而不是坐享其成，它一直在危难中受磨炼。正是这个受过多番考验的民族将照管和拯救所有别的民族<sup>⑤</sup>。

这位先知就以这种方式表达了一种利他主义思想——一种照管别人、作为兄弟的看护人的思想——这乃是在任何乌托邦式设想所绝对必需的概念。

据此，艾赛亚第二达到了尔后先知者不可能超越的高度，而这只在公元一世纪才被一位建立起比我们所知的更好的社会的人所超越，此人利用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无价遗产为基础建起了他的辉煌大厦。

### (8) 对先知者的小结

希伯莱的先知者与所有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有着共同的命运。

① 艾赛亚40:3,5—17,22,23,28;48:12,55:8,9;57:15。

② 同上书43:10,11;44:6;45:5,22。

③ 同上书45:23。

④ 同上书41:8—14;还可参阅史密斯著《以色列的宗教》，第257页；鲍德温：《以色列对现代的贡献》，第79对开页。

⑤ 同上书49:5,6。

他们在一瞬间看到了生活中较大的社会和宗教目标，看到了经历革新的人类伟大伦理-宗教方面的景象，看到了一项建设性方案，因而他们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他们让希望取代悔恨，以进步而不是以保守主义作为他们的口号。他们试图把这些看法和精神灌输给他们的人民。但人民却深深沉湎于过时的世界之中。这世界虽已接近尾声却仍然闪烁着更夺目的光辉。它使人民更加迷惑，神魂颠倒，使他们不愿为实现耶和華将主宰的、公正而正直的、田园般的未来而奋斗。

我们决不可认为这些先知们都是一些不可救药的、不实际的神秘主义者，或是一些渴望某种未来世界的幻想家，因为他们人人都与他们的时代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对具有令人困惑的社会、政治、国家与国际问题的周围世界十分关切。他们认为，理想的社会终将出现。不论他们要宣扬的真理是什么，他们从来不以抽象的形式加以表述，而是以他们那个时代人民的条件，他们生活上的基本问题，当时的道德与政治情况，威胁他们的危险，以及他们对当时明显的社会力量的态度等作为基础的。这些先知者的目的在于影响人们，因此他们是把这些人作为他们所处时代的成员来对待的。先知者的主要目的与他们自己时代的需求紧密相关；但在他们完成了这项工作之后，他们的重要性并不因此而丧失殆尽，因为他们所确认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有幸是能够在广泛得多的范围内加以应用的。

这些先知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主要是那些与旧道德秩序的崩溃有关的问题——它要求人们经受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崩溃的考验。这可能是由于某些异教民族的入侵、某一国家的扩张政策、某一政府或宗教制度的崩溃或在吸收外来思想的同时，传统的道德开始沦丧所造成的。这种社会结构的解体导致数不清的弊端，我们在考查先知者时已分别予以叙述了。这些先知者要人民清除

的就是这些明显的道德弊病。因此，他们的预言主要是伦理性的，带有明确的正义色彩。但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方面，乃是他们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使他们对公理与正义的最终胜利抱有持久的坚定不移的信念。而这种信念的核心则是伦理、社会、政治与文化的重建。

他们要予以重建的方面，随着希伯莱的历史进程而有所变动。这就再一次表明，他们使自己的教导适应时代的要求。当国家处于稳定时期，先知者便把他们的人民看成是巨人，这个人犯了罪就必须作为一个人予以重建。他们使用的语录表明了这种有机的和共同的社会生活。可是，当以色列这个国家为外国的入侵搞得支离破碎，当人民遭到流放或被迫逃到异乡乞求庇护时，重建的重点也就变了。于是这些先知者就开始致力于个人生活，强调改变个人的性格，强调个人的责任。当我们阅读艾赛亚第二的著作时，又再一次看到了新的强调方面。书中所强调的不是某个国家或民族，也不是任何国家或民族的个人，而是变得注意一般性问题了，将重点扩展到一切民族中的每个人。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个重点，它与上述变化同时发生，但或许并非偶然与之相关。早期的先知者对人民的要求是属于伦理性的，他们要求人们自觉地走正直的道路，不要沾染社会上的腐朽作风。随着时间的推移，先知们就不那么强调这一点了，而是开始坚持宗教仪式的正确性和礼拜的正式性。诚然，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给与人民某种具体的东西，在国家民族处于危亡时以此作为他们宗教与民族的希望的中心。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武断地肯定这一看法。

然而，不论重点如何，这些先知者的目的是一个，即要使人民具备居住在以伦理与社会观念设想出来的未来理想国家之中的资格。这个理想国家随着预言的进展，逐渐把希望寄托在救世主身上<sup>①</sup>

<sup>①</sup> 然而，艾赛亚第二并未提到这一点。见前。

——寄希望于救世主或未来的拯救者，靠他来实现未来时代的光辉景象。为了准备居住在这个完美的国度里，人民必须经历一种演变的过程，经受一次变革。这种变革主要是属于道德性质的。一旦人民同耶和華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这一变革就可以实现。一旦人民采纳了这种神权政治的法规并自觉按照耶和華的要求过公正、正义和神圣的生活，便可建立起这种关系。这就意味着最初人们将通过集体的然后是个别的努力获得这些品质，从而达到非常高的乌托邦境界。当然，这种乌托邦思想随着重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时而放在这一点，时而放在另一点上，但总的原则有如上述。

先知者这种乌托邦思想的要点在于，它不仅要求建立正常的人类关系，而且要求建立超人类、超尘世、神权政治的关系。它意味着要改变人类的性格而根据不同的先知者的意见，还要由人类集团集体地或个别地承认神即耶和華的存在。所谓新生的个人乃是他们本人和耶和華共同努力的产物。因此，变革不仅是伦理性的，而且是伦理-宗教性的。

迄今还未特别着重说明的另一件事，就是这些先知者认为新生的过程是自然而然的产生并且是可以实现的，他们期望这个民族在克服了当时所处的困难处境之后，最终可以回归到这个完善的、理想化了的救世主式国家怀抱之中。这是一种带概括性的总概念，适于用以维系当时的人心。这个概念本身或许就可以激励人们走上正路。

继先知者时期之后的约若干世纪中，我们发现在希伯莱的著作中发生了一场变化。它表现为所谓的启示录著作。尽管这些著作在细节上有千差万别，但在主要一点上是一致的。这些著作由于对上述先知者所预言的那种任何自然发展与恢复故国等思想感到失望，便转而寄希望于通过奇迹以达到解救的目的。他们认为，不论

是靠超自然的救世主的作用,还是靠耶和華的直接行动,旧的秩序和现存人种必将遭到毁灭,而新的以色列王国将在一个刷新了的世界里建立起来。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对之作扼要的论述。

## 二、启示录者

对社会乌托邦的研究如果不提启示录者的著作就不全面,因为在这些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有轮廓鲜明的社会乌托邦,尽管这种乌托邦带有明显的幼稚性和超验的特点。一般的看法认为,启示录者<sup>①</sup>是一批几乎完全默默无闻的犹太人和基督教作家,他们的著作出现在纪元前 210 年到纪元 1300 年,其中大部分著作于上述这段时间的前四个世纪问世。这有助于填补犹太人在先知者的教导和接受基督教义之间那一段历史空白<sup>②</sup>。启示录著作主要带有预示性和神奇色彩,在谈到未来世界时非常矫揉造作,极不寻常,纯属道听途说,但却具有象征性并富于想象力。

有某些因素使启示录者对未来抱有特殊的看法,也在相当程度上造成启示录者独有的特点。首先,启示录最多产的时期乃是犹太人遭受挫折和失陷的时期。他们经历了安泰奥克斯九世的迫害,后来又经历独立的马克比斯的犹太王国反对罗马的起义失败,继而是耶路撒冷的毁灭和犹太人社会在政治上不复单独存在。这是

---

① 天启性著述并不限于出身犹太人和基督教作者之手。凯斯在所著《约翰的启示》一文中写道,这样的著作可在其他民族的神话、哲学著作中见到,即使在它们未与犹太和基督教文化接触前也是如此。他例举了《奥德赛》第十一章,弗吉尔对库米恩·西比尔的描述、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中第十章《厄尔的幻想》、西塞罗叙述西皮奥的梦境、弗吉尔的《伊尼爱德》第六章描述伊尼斯作阴间之行时所得的启示。见对开页 100。

② 各种天启录文献中最重要的部分载于《圣经》与《伪经》:丹尼尔伪书、伊谱克伪书、五十年节书、所罗门赞美诗、摩西的设想、十二子证言、艾赛亚升天书、埃兹拉伪书(即第二埃斯德拉斯)、彼德伪书、亚伯拉罕伪书、巴鲁克伪书、西比林神谕、约翰之启示。这些著述的大部分将在本章论及。



苦难重重的时代，是由巨大的政治、社会和宗教动乱造成的。人民为不幸事件所压倒，陷入困惑的深渊。因此，虔诚的预言家在此苦难时期便以启示录给予信徒作为鼓舞人心的原始材料。启示录是适应时代需要之作。

此外，在以前的流放时期，以色列人曾深受巴比伦征服者当中流行的种种神话、符号和其它丰富多彩的画像的影响。同时，他们是具有高度宗教性并与一般市民的生活现实相脱离的散乱民族。这就形成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宗教想象的惊人发展。流放生活激起对未来的巨大希望。关于这一说法的证据可见杰里迈亚、伊齐基尔、撒迦里亚和哈巴谷等人的著作。犹太人从流放中返回家园之后，还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促使他们研究表达美的思想。此外，根据犹太法，文艺是表现美的唯一形式（音乐除外），这就容易引发犹太人的艺术冲动。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一种绚丽多彩的文艺。它充满了各种象征性图案、优美的画像、预言性歌谣以及宗教信仰的成分，构成了属于未来世界的独特的综合图样<sup>①</sup>。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这些对未来世界的描述，其主要目的乃是为了慰藉幸存者，激励他们信仰耶和華。启示录者，为正直的人描绘出一幅胜利在望的图景，以作为对他们忍受目前困难的报偿。启示录还对把要相信耶和華的正义性同他的臣民在世间受难<sup>②</sup>相衔接所引起人们的困惑不解提出答案，也给人民带来关于救世主、救世主王国、复活、宇宙的起源、犯罪的原因等种种思想观点。

启示录著作的其他特点可以通过与预言相比较看出来。首先，启示录者的著作是半碑文性的。他窃取某个古代先知者即诸

<sup>①</sup> 以上所提各种问题可参见罗成布虚：《基督教与社会危机》，第35、112页；施德温：《以色列对现代的贡献》，第58页；谢勒·马修斯：《启示文学》，纽约1907年版；《黑斯廷辞典》第39页，艺术部分。

<sup>②</sup> 查尔斯载于《伪经文》的文章，见《黑斯廷杂记》，第1卷。

如伊诺克或丹尼尔这些死后长期享有盛誉的人的名义，装成是他们的代言人。先知者却不然，他坚持他自己的特点。第二，启示录者善于模仿，他只不过是将过去留传下来的概念拿来加以改头换面，重新润色而已。而先知者是有创造性的。他是个开拓者，探索新的领域，创造新的观念。第三，启示录者所关注的主要是属于来世的事。他的目光完全射向未来。以某种传统思想或幻想的经验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为基础，他运用幻想和学究般的推测，描绘出未来的奇人奇事，对现实情况极其缺乏洞察力而以听其自行衰败为满足。然而，先知者则脚踏实地，同他周围的势力打交道，并指出某种倾向的行为必然要导致的结果，第四，启示录者理想的未来只能以可怕的骚乱、灾难或某种神奇般的解脱为序幕。理想世界行将降临的标志并不在于现实世界与之相似，而在于与之不相似之处。整个说来，先知者的乌托邦乃是历史和某些伦理活动等一般政治经历的产物<sup>①</sup>。先知者和启示录者只是在主要的宗旨方面才有相似之处。

在这些用笔名发表的著作中，首先要数丹尼尔的启示录。这本书被公认为启示录的本源和范例，也是希伯来经典中具有代表性的启示录。其他著作大都见之于伪经。学者们一致认为，这部书系于公元前166年问世，正值马克比厄斯领导的犹太人起义方兴未艾之际。出版这部书无疑是为了在对安泰奥克斯·伊皮弗尼兹进行迫害期间激励虔诚的犹太人耐心坚持下去。安泰奥克斯当时企图根除犹太教并强迫犹太人皈依希腊教。这一时期确实是从预言向启示录的过渡时期。自这时起一直延续了几个世纪，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连串的启示录问世。每种启示录的特点，都以悲观的眼光看待现实，而寄希望于神奇地建立起一个未来的世界。就是这

<sup>①</sup> 持有部份相同观点的有：努森：《预言的灯塔》，第50对开页，马修斯、谢勒著。同上书第39页；史密斯《以色列的宗教》，第204对开页。

样一些著作后来在安抚、鼓励和引导这个国家方面尽量起到先知者所起的作用。

作者是用丹尼尔这个名字撰写这部书的。丹尼尔是伊齐基尔著作中提到的一位流放时期的先知。他为人非常正直，非常明智。他与诺亚和乔布属于同一阶级。他的虔诚使他能在上帝面前为那些没出息的同时代人说情。那些流放的犹太人了解这位丹尼尔<sup>①</sup>。他以虔诚、公正和明智而著称。随着时间的流逝，围绕着他的名字汇集了许多表现这些品质的故事，而本书的作者又把这些材料重新予以加工。作者通过丹尼尔的口表达自己的信念，将关于丹尼尔的故事与历史的实际情况揉合在一起以证实他的故事的真实性。

这位无名的作者对他自己所说的真理深信不疑。他所运用的历史背景，对他说来不过是用以表明他的信仰与虔诚的框架而已。尽管他不说预言是自己写的，可是这位启示录作者所作的预言却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他用常年积累下来的关于犹太人的神话<sup>②</sup>表明，犹太人由于对耶和华绝对忠诚而优于其他的民族。他借助于一些说梦的故事<sup>③</sup>，认为犹太人由于与耶和华的特殊关系，在星相术上比巴比伦人自己的星相家马基高明。丹尼尔和他的朋友们生活在一个典型放荡不羁的、信奉异教的统治者的朝廷，并且掌握了很大的权力。可是，由于他们虔诚的信仰和纯洁的道德观，抵制了一切诱惑而不曾堕落下去。他们也没有变得不忠于他们的犹太教。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他所间接强调的要过一种完美无缺的生活的说法。从炽热的熔炉中把那三个人解救出来并在狮穴中保护丹尼尔——这是一种甚至使信奉异教的诸王对以色列的神祇的独特之处不得不叹服的情景——确是一种为追求由古先知者所理想

---

① 伊齐基尔，14:14—20, 28:13。

② 见史密斯，《以色列的宗教》，第300页。

③ 丹尼尔 2:4。

化生活所发出的号召。做正直的人，相信耶和華，一丝不苟地遵从希伯萊戒律的训令，这就是达于完善的境界。可以肯定，丹尼尔的作者一向鼓励他的同胞过这种生活，尽管他们并不意识到他所采取的方法。我们在这里有了一个用榜样和实例进行教育的好样板。试想一下，《丹尼尔书》中的这些故事是怎样到今天仍然经常用来达到同一目的的，我们也看到这位古代作者是怎样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任务的。

对预言家来说，这种乌托邦思想最终会使得人们生活在一个理想的世俗共和国即王国之中。但在启示录中却并非如此。启示录中的乌托邦不过是耶和華进行奇迹般的干预的结果，而信徒们的职责乃是消极等待这种由上帝命定的世俗事务和权力的崩溃。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引用了一种形象<sup>①</sup>和四头野兽的图象<sup>②</sup>作为说明。这些图象说明了许多国家及其国王的消逝，他们被耶和華的巨掌一个接一个地扫出了政治舞台。这些形象是用黄金、白银、青铜和泥土制作的。这些金属被解释为代表巴比伦、麦多-波斯、希腊和罗马等信奉异教的世界大帝国。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崛起，运用武力、暴力和残酷手段推翻并摧毁了各自的前朝，把眼泪、苦难和悲凉撒满全球，而结果只好让别人从他们手中依次夺走他们还没有到手的统治世界的权力。作者从历史的长河中眼看着帝国的更迭，直到一块火石——耶和華的训示——从山上滚落下来，吞没了人世间的一切<sup>③</sup>，而石头本身却化为永恒的天国。因之，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历史将以邪恶得势而告终。以色列则将由超自然力量之助而得救，并光荣地生活下去，永久行使其统治权<sup>④</sup>。这乃是犹太启示录一个具有持久特征的观点。

---

① 丹尼尔 2:31—47。

② 同上书 7。

③ 同上书 2:35,45。

④ 同上书 7:14。

必须简要地讨论一下丹尼尔作者描述的未来国家的一些显著特点,这个王国是建立在人间的,因为“所有的民族、国家和语言”都在它的治理下<sup>①</sup>。它将是以色列的永恒的世界帝国。那里没有救世主,也没有提到世俗的统治者;只有具有天使般性格的“古人<sup>②</sup>”拥有统治权。包括整个以色列在内,复兴将发生在普遍崩溃之时。在这次崩溃中,有些人将享有永恒的幸福,有些人将蒙受永世的羞惭和蔑视<sup>③</sup>。前者由于他们模范的一生而享有无上幸福<sup>④</sup>。

在伪经的犹太启示录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就是伊诺克的启示录。这部书是在公元前170-64年之间由一批信奉正教的犹太人撰写的文集。毫无疑问,这部书也是由上述马克比厄斯时代动乱时期有过不愉快经历的正直人士撰写的。正如在《丹尼尔书》描述的那样,一位古代名人被利用来作为书中指定的真理宣讲人。这一次他们挑选了洪水来到前的族长伊诺克作为适合的宗教教义宣讲人;因为,按传说,他曾经侍从于耶和华左右,故而有很多机会学习神明的智慧、了解关于天使的世界、自然界的力量和作用、未来的审判和达到完满境界的奥秘。

这本书和我们往后要讨论的书一样,充满了对天使的论述<sup>⑤</sup>,加以描述和命名。这本书还充满了对恶魔<sup>⑥</sup>、罪恶的根源<sup>⑦</sup>以及与我们主旨无关的其他一些问题的论述。然而,我们必须考察一下某些已讨论过的问题。有一个作者驳斥了伊齐基尔的论点,即认为一个人在人世的生活情况与他的品行好坏相当<sup>⑧</sup>。这位作

---

① 丹尼尔 7:27。

② 同上书 7:13。

③ 同上书 12:2,3。

④ 对乌托邦特点的论述,见查尔斯所写《来世学》一文。

⑤ 伊诺克(查尔斯版) 20:1-8,40;81:5;87:2-3;88:1;90:22,23。

⑥ 同上书 6;15:3,8-11;16:1;19;54:6;69:2-3;86;99:7;106:13-14。

⑦ 第6-36章的全部。

⑧ 同上书 第91-104章。

者看到，坏人往往活着时享受幸福，死时也光荣，正直的人反而过着贫困的生活，并且在黑暗与苦难中死去。然而，正直的人却受到作者的鼓励，要他们持乐观态度，因为来世将取得新的平衡。坏人会得到应有的报应，他们将“下到阴间……，身带镣铐，坠入黑暗与烈火之中，那里有严峻的审判等待他们”，他们的灵魂将受到审判，万劫不复<sup>①</sup>。那些经受疾病折磨和蒙受耻辱的人，那些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人，在适当的时候“将象天上的日月星辰一样闪闪发光”，“天堂的大门将向他们敞开。”他们“将成为天国众圣的伴侣。”<sup>②</sup>

当然，这种学说必须以复兴与未来生活的理论为基础。正是在与讨论复兴和与未来生活的问题上我们才看清乌托邦的因素。正如在《丹尼尔书》所见，有些可以从写作的精神而不是从表面词句看出来。对作者来说，死后的生活乃是世俗生活的有机发展。只有以色列的正直的死者才能升入并参与未来的王国<sup>③</sup>。救世主将与他们同在，所有正直的人都会变得和上帝一样<sup>④</sup>。正如上文所述，坏人和有罪的人将永远遭到蔑视和斥责。这便是通过古老的道路，即通过精神正直的途径获得的完美的生活。正如伊诺克所说，没有比畏惧耶和华<sup>⑤</sup>并自觉遵守那些表示这种畏惧之心的要求的人更为可敬而伟大的了。

然而，作者在第94章关于告诫正直的人的谈话中，说了十分明确的话：

“勿走邪路，也勿走向死亡之路，  
勿走近它们，免遭毁灭，  
而是要为自己寻觅和选择正直的路，要经过仔细挑选的生活，

---

① 伊诺克 103:7,8。

② 同上书 103:9; 104:2—6。

③ 同上书 90:33。

④ 同上书 90:38。

⑤ 同上书 66:2—3。

走和平之路，  
这样，你就会生活得幸福。”<sup>①</sup>

继而有六章专门描述了多种罪恶，它们乃是使人们不能享有伴随上帝的罪恶。

在撰写过程中，结合伊诺克的启示录，天国这个概念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在第6—36章中，我们看到一种与旧约中先知者相似的类型，即具有高度审美感的特点。天国将以耶路撒冷作为中心，以辉煌壮丽的形式建立在净化了的尘世上。正直的人们将过着大家族的生活，每人将养育子女上千人。国土上物产丰富，充满了幸福；葡萄和橄榄树上果实累累。所有人的子女都将成为正直的人。上帝将降临人间和世人同在。

在第83到90章，作者或作者们已经有了进步，超越了上述思想幼稚和审美的范围，变得更加精神化了<sup>②</sup>。然而，在第91到104章才达到高潮。在这些章节中他们完全摈弃了在当今世界上建立永恒的王国的希望。信徒们将从罪恶与物欲包围的环境中全部被解救出来，并被置于精神境界之中，那是一种远离罪恶、诱惑和诅咒的境界；后者诱使人们并将他们永远陷于不满和痛苦之中。正直的人们在精神上将愉快地生活，成为天堂众圣的同伴并与耶和华同在。这里的重点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强调救世主式的王国，而在于正直的人的未来精神生活，第一次在犹太著述中将天堂明确表述为正直人的精神归宿。

对那些次要的启示录我们将作简短叙述如后。《伊诺克的奥秘》撰写于公元前70年。它之所以得名，在于特别要表明给伊诺克以启示的上帝之奥秘。它充满了先知者被带入天堂各处所看到的加于罪人的种种刑罚和奖赏给正派人的宏大而多样的福祉。最

---

① 伊诺克 94:3—4。

② 精神性的证据在第90章中尤为明显。

后一部分是带有伦理性质的训诫，重点在于强调公正和友爱、耐心忍受和坚持，以及所有人信奉上帝方面的忠诚。这些守则将由未来的审判加以贯彻执行，未来的审判将迎来一个未来的世界，而凡在这个世界中的遵循教导者必将享有幸福的永生。<sup>①</sup>这些思想和上述前基督教时期伊诺克启示录的那些思想是大不相同的。

公元前 4 年到公元 10 年撰写的摩西假说，反对把以色列的利益分别纳入各政治渠道，而鼓励忠孝思想，期待上帝代表正直的人来亲自干预。这一假说倡导人们采取坚忍态度，甚至牺牲和遁世，它相信上帝在天堂上会为正直的人们亲自辩护。这个天国在尘世遭到神奇般的毁灭之后就会出现<sup>②</sup>。

埃兹拉的启示录是由于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被毁灭以及在那次可怕的灾难中犹太教得以幸免的情况下产生的。这次事件使得许多犹太人回避犹太宗教中关于国家和法律方面的问题，《埃兹拉纪》的作者就是其中之一。全书贯穿着高水平的宗教感情和自我反省。书中某处提到有四百年的太平盛世。在这个时期的末尾，救世主本身和所有其他的人一道亡故。这是为了强调随之而来的新创世，即天堂般的耶路撒冷。它以范围广泛得多的概念完全取代了对国家寄予的希望<sup>③</sup>。

《巴鲁克书》是在巴比伦国王尼布甲雷撒第一次摧毁耶路撒冷之后不久，由杰里迈亚的抄写员巴鲁克记录下他所感受到的事情。但显而易见的是，真正的作者或作者们（因身分不明）实际上生活在罗马时代，而写这部书的目的则在于鼓舞公元一世纪后期遭难的犹太人。凯斯在谈到这部书时说：“这部书的宗旨和所有的启示录是一样的。即使罪人可得势于一时，还是要劝告正直的人坚持

① 凯斯：《约翰的启示》，芝加哥 1919 年版，第 38 页；波特：《启示录作者的旨意》，伦敦 1905 年版，第 333 页。

② 凯斯：《约翰的启示》，第 86—87 页；波特著同上书第 330 页。

③ 波特同上书，第 334—339 页。



他们对上帝的忠诚，相信上帝会及时自动地来援助他们，赐予他们光荣的奖赏，并对他们的敌人加以严惩。<sup>①</sup>”

彼得启示录是一部基督教时代不符合教规的启示录，它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因为在这部书里第一次详细地描述了天堂和地狱。波特认为，由于这部著作的影响，在基督教早期和中世纪时期<sup>②</sup>，这个题目已成为启示录所探讨问题中占主导地位的课题<sup>③</sup>。彼得被领去观看天堂——光荣的圣者的住处，那里一切景象都是辉煌壮丽的；与此相对照，还生动描述了受惩罚的地区。

写于公元一世纪末或二世纪初的亚伯拉罕启示录，描述了亚伯拉罕访问天堂各处的情景。其中有一场审判。接着便是一大群人受惩罚，并对预先定好的忠实信徒加以奖励。

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再费功夫去专门研讨各种只有次要意义的启示录这种令人气闷的工作吧，而让我们只简略地谈一下某些启示录比较突出的特点，接着就讨论最突出的启示录——《约翰启示录》。

有位作者在谈到启示录者的伦理观时说：“在较为典型的启示录中，并未作任何道德上的告诫”。<sup>④</sup>如果作者的意思是说，典型的启示录并没有针对象我们在先知者著作中所看到的那些弊端与缺点作强烈的抨击，那他就说对了。然而，在几乎所有的启示录中，却有大量的道德告诫和箴言。这些告诫和箴言主要是伦理性的，植根于以上帝本质上是公正为基础的伦理学说。这就向本性善良和具有高尚情操的人作出了保证：正义终将会取得胜利。持怀疑态度的人可以回想一下丹尼尔强烈的伦理精神，或者参阅一下《伊诺克书》第 94 到 105 章。这些章节几乎全是最纯洁的伦理箴言，可

---

① 同上书，第 92 页。

② 同上书，第 352 页。

③ 汤普森著《启示录》，《国际标准圣经百科全书》第 163 页。

与任何先知者的伦理与箴言或与《五十章节的第二十一章》和《十二主教遗言》中第十三章相媲美。这些著作不仅载有大量的伦理教义，也并不那么大肆斥责。它们比旧约里的许多教义还超尘出世。

启示录者的救世主王国的想法比先知者的想法更为崇高。先知者所希望实现的中心思想，是一个主要因道德上的转变而在人间得以恢复的光辉王国。而另一方面，启示录者却看得透澈，超越了任何这样一种在人间实现救世主王国的想法，而寄希望于对生活条件的彻底改造。启示录者不寄希望于耶和华的正义与光荣在人间得以完全实现，而是期待这一理想在天国最终得以完全实现。因此，这种思想业已变得超越现世而神圣化了。

由于旧启示录对基督教的影响，它便具有另一方面的重要性。我们发现在一些启示录中，主要是《五十年节书》和《伊诺克启示录》提到过一千年——一千年的救世主时代。在此期间，这个国家的成员将生活在幸福之中，不受邪恶势力的影响。这样一个时刻到底将在什么时间来临却不清楚。但一般说来，这一千年时期就紧挨着最后审判发生之前，在这以后将要建立起一个永恒的天国。例如在《伊诺克书》的第91到93章<sup>①</sup>中以七天为一周，每天长达一千年。据说，从创世纪到最后审判日就要经历六千年。往后是一千年的“安息日”时间，接着是第八天，这第八天是无限的。在《约翰启示录》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想法，只是带有某些新的特色而已。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即将加以讨论。谢勒·马修斯认为，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巴比伦或者波斯<sup>②</sup>。

从研究犹太教过渡到研究公元第一世纪基督教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伟大的基督教启示录——《约翰启示录》。这部书据认为

① 查尔斯版。

② 见《赫斯廷一卷本圣经辞典》中“一千年”一文，618页。

是在公元 81 年到公元 96 年间撰写的。必须指出，我们以前研究过的启示录同这部启示录之间存在着许多显著的差别。这部启示录既未用匿名，也未用假名，而是在启示录的一些地方真实可靠地用了该书作者一个叫约翰的名字。最近的证据表明，此人可能是耶稣的使徒约翰或是长老约翰<sup>①</sup>。因此，该书并不自称是由过去某位伟大的先知或宗教领袖写的，而是出自同时代人中某一位有这种思想的人的手笔。第二，此人并不象他的先辈那样，仅只将旧启示录所载幻想加以改编或解释，而是一位自觉的先知——一种新型的先知者中的一员，他们是在耶稣进行宗教活动之后公元一世纪问世的。我们切不可以为这部启示录本身同一般类型的启示录有什么重大差别，因为它具有许多与同类启示录相同的特点。象其它启示录一样，这部书是在作者及其周围的人，感到他们的真正宗教受到恶劣环境和异教统治力量的暴行双重威胁下写的。这部书充满了神秘的象征主义，这一特征在同一类启示录著作中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无疑是汲取了这类启示录的内容的。在这部书中，象征主义被用来描述同时代人物和真实历史事件，并赋予作者所处时代以非常明确的含义。书中一再提到“野兽”（一般认为是指罗马）和角以及龙。在第四章而且又在第二十一章载有运用得非常精确的大量比喻，其独创性和难以解释性可与所有其他启示录者的著作相媲美。这一点可从圣经学者们对各种不同解释缺乏一致意见得到证明。书中还有从未提到过的新因素，可以说是新的基督教精神。

约翰的目的和别的启示录派一样，在于预示上帝和正义终将推翻一切邪恶势力，取得最后胜利。这里，邪恶势力指的是罗马帝国。书中并描述了上帝的追随者将享有的救世主赐予的福祉。这里，象以往那样，享有福祉是我们主要关注之点。在约翰的乌托邦

<sup>①</sup> 见谢勒·马修斯著：《启示》一文，载同上《黑斯廷一卷本宗教词典》第 799 页。

以前也有一千年的太平盛世，但他对太平盛世的说法和其他启示录者的说法有所不同，他引出了一位新人物，那就是基督。魔鬼被制服之后，殉道者也唯有殉道者（即那些为基督行事而被杀害或被用别的办法杀害的人们）在第一次复活中苏醒过来，以耶路撒冷为王国的中心，亲自作为上帝和基督的牧师在人世间生活并统治了一千年<sup>①</sup>。约翰的太平盛世和伊诺克的一样，最终将建立起一个永恒的天国。不过，约翰在此期间还加上一个第二次复活和第二次审判。所有的死者每个人都将根据上帝书中所载情况受到审判。凡在《一生的记录》一书中找不到名字的人都要投入火海，有名字的人则成为上帝的臣民，同上帝生活在一起<sup>②</sup>。

这个赎过罪的以色列土地是一座圣城，也就是新耶路撒冷，一个严格的精神社会<sup>③</sup>。它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几乎没有一件东西是人世间享有的。诚然，这座城市是用伟大辉煌的词句描写的，城基用各种宝石点缀着，城门是用珍珠镶饰的，街道铺满纯金。整个城市闪烁着上帝荣耀的光辉。生命之树每月都结上果实，再也没有死亡、苦难、黑暗或可诅咒的事物。但是，除此之外，整个气氛是宗教性的、精神性的。“上帝的圣幕与人同在。”<sup>④</sup>因此，他们无须建造人间的庙宇，因为他们将与上帝和耶稣亲密相处。使约翰的乌托邦与其先辈的乌托邦处于不同水平的就是这种耶稣基督精神。按照这种精神，“有血有肉的人是不能继承天国的”，因此上天的福祉具有明显的精神特性。它是由唯一的上帝所治理的救世主王国。上帝就是约翰所构想的真正救世主。

约翰的乌托邦思想的要旨，单纯是使他的同胞在上帝面前准备好一个永恒的精神住所。因此，他强调与物质相反的、精神压倒

① 《启示录》，第 20:1—6。

② 同上书 20:12—15。

③ 同上书，21:1—27；22:1—8。

④ 同上书 21:3。

一切的价值观。“那些能克服所有阻止他随意汲取生命之泉的障碍的人将继承一切。‘同时，我将是他的上帝，他将是我的儿子。’唯有那些可怕的、不信奉上帝的、可憎的、杀人的、卖淫的、行邪术的、崇拜偶像的和一切撒谎的人，他们只有生活在燃烧着硫磺的火湖里的份儿。”<sup>①</sup>要求就是不仅要过正直的生活，而且还要清除享受一切物质利益的想法。必须一心向着上帝，努力模拟他的理想。因此，这一启示录涉及的不仅是神秘的和超验的宗教因素，而且涉及到生活方面的问题，但并不涉及宗教道德和实际应用问题。

总之，就《约翰启示录》的未来世界的整个轮廓、它的历史哲学及其来世学说而言，固然可以说它与犹太启示录非常吻合，但各种变革尽管与耶稣一致，却比人们所期望的相去甚远。

这样，我们便已经把具有宗教性质的乌托邦思想从阿莫斯时期追溯到基督教时代的约翰。前一时期的重点主要是伦理性的，而后一时期则为了实现其理想，对个人的要求便无限增多，而且更加难以实现，变得几乎完全是精神方面的了。

但是，我们应如何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评价启示录者呢？他们显然不及先知者高明。固然他们怀有强烈的宗教热忱和笃实的学识，但他们是幼稚的、幻想联翩、矫揉造作、不真实又极其感情用事，从社会观点来看几乎毫无裨益。他们的幻想和各种形象只对无知者才有吸引力，因为只有无知的人才热衷于狂想和神秘的事物。他们还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缺乏一贯性。他们头脑里充满了天使与魔鬼，怪诞而又无益。他们无助于填补“眼前的实际情况”与“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之间的鸿沟。他们不象那些严肃社会改革家先知者那样，坚定地立足于实地，撒下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实用价值的生活理想和原则的种子。他们似乎也无视生活的规律。作为

---

① 《启示录》21:6—8。

道德上的促进因素，他们实际上等于零。<sup>①</sup>

这些启示录全然是为了他们各自的时代的人写的，很少也不象先知者或柏拉图的教导那样，对当时的问题作出说明。如果有人想通过启示录受到启发的话，那是徒劳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勉强赞同其中所提伦理上与精神上的因素而已。它们完全缺乏涌现于阿莫斯或艾赛亚著作中的那种促进思想和行动的因素。

这些启示录提出了所预期达到的目的，却无意列举达到目的的方法，只提到至高无上的上帝进行灾难性或奇迹般的干预。启示录者似乎没有意识到，由于人们建设性的努力，人类可能走向发展的道路，世事也会向前推进。他们只寄希望于即将到来的审判和上帝选民的美好未来。启示录只谈“目的”而不谈“方法”，因而是软弱无力的表现。

但是，应该承认，在启示录中可以找到具有普遍影响的东西，一种新的历史哲学。他们将人类历史视为统一体的伟大思想。这个统一体是按照合理计划从事活动的，必然导致一种有价值的结局。只有人才是无足轻重的。一切都听从上帝的统一安排，听从上帝的计划，听从上帝所希望的结局。因此，对社会建设者所作的种种努力并不产生任何影响。眼下罪恶丛生乃是出于神的旨意，罪恶的结局也安排好了。善良的人除了等待全能的上帝采取下一行动之外是无所作为的。

启示录者的优点在于他们对新时代的由衷信仰。他们对未来抱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希望。这是一种在绝望中相信上帝最终会将一切变好的希望，一种抑制不住的信念，即相信上帝不会完全让他

---

<sup>①</sup> 波特的同上书第64页上写道，“他们宣称要向人们揭示天国和未来的时代，事实上并未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接受他们对天堂的说法，对上帝宝座的说法，也不能接受他们对天使、天使的名称和职责的说法。也不能将这种说法视为对某种隐藏的现实 的揭示。它们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对上帝的忠诚所作形象化的和富于幻想或象征性的描绘，说明一种精神境界而已。”

的选民在和异教世界文化的斗争中灭亡。但是，这种希望的落空便会使人们陷于绝望。

最后，由于幼稚和缺乏力量，启示录者未能象先知者那样使他们对后代产生影响。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他们对现代生活可以说实际上毫无影响。另一方面，先知者大胆而又高超的宣言却仍然在许多讲台上回荡。他们的理想主义已经体现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之中。

### 三、天国和耶稣的乌托邦思想

我们在论述约翰启示录时曾多少揭示出基督教对乌托邦思想的影响，但只不过涉及到可以称之为耶稣真正教义的某些变体。现在我们有责任把这些东西改正过来，还耶稣思想的本来面目。此外，由于耶稣的教义对后世思想和事件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我们应当将耶稣的早期情况即耶稣在公元一世纪担任牧师职务期间的言行加以简述。

耶稣原籍拿撒勒，是个农民。人们往往说他是“木匠的儿子”，其实他本人就是个木匠。这是他父亲按照东方人的习惯传授给他的手艺。我们对他的父亲知道得不多，可能是由于他死得早的缘故。我们对他的母亲只略知一二。她似乎是一位典型的妇女和母亲，除了个性坚强和智力非凡外，还热爱她所信奉的宗教和她的几个孩子。她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她唱的赞美诗<sup>①</sup>表明她曾熟读圣诗并具有突出的表达能力。耶稣本人没有受过杰里迈亚、艾赛亚、或耶稣的继承人保罗所受过的那种学术上的熏陶。他也没有从自己的家庭关系、从官方或从社会地位中得到什么好处。他也不倚靠这些东西。正如亨利·沃德·比彻所说，“外界环境只能培

<sup>①</sup> 《路加福音》，1:46—55。

育出庸才，伟大的天才是由内在力量得到充分发挥而产生的。”耶稣的天才就是这样一种伟大的天才。他确实是个富于灵感的天才，从他的身上发出了人类所孕育的最崇高而又实际可行的思想光辉。

正如他的先辈那样，耶稣是“黑暗时代”的产物——那时人民处于罗马帝国的铁腕统治之下，还处于自己的畸形、腐朽而骗人的宗教统治之下。这个国家让罗马征服者捆住了手脚。罗马人通过有史以来人类从未有过的税收制度从他们身上榨取每一分钱，就连17、18世纪的法国也难以企及。秋收一结束，收税人除向中央政府交纳一定的金额之外，“就想尽一切办法向农民勒索”。农民住在简陋的小茅舍中。他们想尽办法在经历几个世纪搜刮、战乱和丧尽天良的罗马兵团蹂躏过的贫瘠土地上，辛勤劳动，以求糊口。在那些年代里，“人们不知平等权利为何物；在罗马有半数的人是奴隶。他们在奴隶主的折磨下苟延残喘，在罗马只有上层人士才能受教育；而在上层人士中所谓教育也只限于讲演术和体育；做丈夫的可以象辞退佣人一样把妻子打发走；法律往往用作压迫人的工具；征税乃是掠夺的一种形式，而自由则是为非作歹的另一种形式”<sup>①</sup>，人民麻木不仁，生活在绝望之中。

宗教领袖们并没有作什么实际工作来驱散这种绝望的气氛。他们自己分裂成三种敌对的思想派别，人们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启示或鼓励。由大多数牧师组成的、采取否定与怀疑态度的撒都该人<sup>\*</sup>，实际上沿用当时的宗教仪式，却公开声明不信仰其教义。戒行派教徒，是这个时代的禁欲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正走向没有希望的错误方向，因此他们绝望地逃避现世。虚伪的法利赛

---

<sup>①</sup> 艾博特，《基督教与社会问题》，波士顿，1876年版，第16页。

<sup>\*</sup>指基督时代犹太教中以僧侣、贵族为主的派别中人，只承认摩西五书之成文法而不承认传统的律法与复活、来世等教义。——译者。



派教徒知道,除了遵从表面的法规外,没有通向正义之路。这是一种不需要和道德上越轨行为作斗争,也无须教导人民要遵循正当路线生活的教义,只要拘泥形式就足够了。就是在这种压迫与衰败的背景下耶稣降临了,因此他所提出的是一种崭新而较好社会秩序的理想,这是一种解除贵族对国家和僧侣对教会的统治的秩序。

耶稣的观点既符合社会学也富于革命性。他关心老百姓也关心他们之间的关系,而对神学、宗教仪式和教规则兴味索然。他提出了由犹太民族继承的一种社会和伦理首批训诫,但他从不提出教义、教规或神祇。他认为应建立教堂,但他几乎没有制订出有关教堂组织的训示或条律。他同一切降低人格的行为、把社会分成相互敌对阶级和宗派进行斗争。他力图培植那些能使人们自己认识自己的思想,使人们了解到按照神的旨意安排并能过纯洁、崇高、有益于生活的社会秩序。由于怀着这种精神,他希望世界上的社会价值标准能发生巨大的逆转。不仅学者,富人,贵族,极少数的上层人士,不仅是受上帝垂青的小国中成员即犹太人,而是全人类——富人和穷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法利赛人和收税人——都应置于平等地位,受到教育,经过改造,享有参政权,成为富有者。<sup>①</sup>“首要人物可能落居末座,而最落后的人可能成为最先进人物”。<sup>②</sup>“你们当中最伟大的人物将成为你们的仆人”。<sup>③</sup>他看到凡是在人们中受到吹捧的人,在上帝面前则是可憎的人。<sup>④</sup>因此,由人们装饰起来、闪闪发光的東西,在他眼里并无吸引力。他教导说财富寓于品德而不在于富有。<sup>⑤</sup>这种具有革命性

① 《马太福音》,9:10—13。

② 《马可福音》,10:31。

③ 《马太福音》20:26,23:11。

④ 《路加福音》16:16。

⑤ 同上书 12:16—21。

的言论也贯穿在耶稣登山训众的福音之中<sup>①</sup>。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往后那些在世上未受过祝福的人将受到祝福。

他将他的革命观点以无比的神圣感和空前的彻底性赋予当时的宗教领袖和当权者的身上。我们引证已故劳升布什教授<sup>②</sup>的话说：“他称宗教领袖为伪善者、在诡辩术中摸索的盲目领路人。他们随时随地教导人们分辨是非，却无视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他们的虔诚并非虔诚；他们的律法都是不适当的；他们损害了那些他们想要使之改变信仰的人。<sup>③</sup>连收税人和妓女也比他们真挚、虔诚<sup>④</sup>。如果我们还记得，宗教仍然是犹太国的基础，宗教界的当权者乃是社会的支柱的话，我们就会认识到他的斥责多么具有革命性……。同样，他的思想也从精神上受制于现存的政权中解放出来。他称他自己所臣服的君主赫罗德为‘那只狐狸’”<sup>⑤</sup>。“你们知道，非犹太人有君王对他们行使统治权，有大臣对他们行使权力。但是在你们之间可不要这样。”<sup>⑥</sup>耶稣既不是神学者，也不是教士，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改革家，而是为许多人所确认的那样，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真正的人。他的教导不带诗情画意，也非比喻或幻念，而是坦率地阐明真相，一针见血的话。他知道他讲的是什么。

耶稣的教义是我们以上谈论过的那些学说的派生物或者不如说是它们的续篇。实际上，圣经和其它性质类似的著作如启示录等书一样，本身都经历一种独有的演变过程。但是耶稣的教义却也是对前人学说的修正和改进。他使这些学说变得明确而实际可

---

① 《马太福音》5:1—12。

② 《基督教与社会危机》，第88页。

③ 《马太福音》23。

④ 同上书 21:23—32。

⑤ 《路加福音》，13:32。

⑥ 《马太福音》20:25—26。

行，清除了它们狭隘的小集团特点，从而使它们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

从理论上说，犹太教提供了一项完善的社会和个人重建的计划。其中耶和华在拯救人民方面扮演了强有力的角色。它的救世主式的国家似乎可以解救苦难重重的社会与政治缺陷。可是这两方面都是不真实的、不可捉摸的、抽象的。倘若有任何外国民族希望实现大多数先知者和启示录者的乌托邦思想，他们就得摒弃他们原有的政治上的特点，并把他们自己和以色列融为一体，这是因为这种乌托邦思想具有高度的民族特性。但是，要采取这一步显然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象在小亚细亚那个种族情绪高涨的地方。先知者的乌托邦思想并不能取代政治活动，而是加强了政治活动。此外，按照先知者所提，将道德观与耶和华等同起来的想法，对非犹太教徒可以说毫无意义。非犹太教徒们对这个陌生的民族意识十分强烈的部族的上帝是不感兴趣的。还有，先知者的乌托邦思想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申命记改革以后和伊齐基尔的以仪式为重点的刺激下，已变得十分刻板，还涉及其他复杂而又独特的犹太教观念和一些附带情况，这就不仅使得一般人不愿参加，甚至使得一些犹太人也难全心全意地接受。最后，启示录者的神秘而带有灾难性的看法吸引不了多少人，尤其是那些想象能力较差又无远见的民族。在他们看来，这种观点是怪诞不羁而不可信的。

耶稣的贡献在于把这些抽象的、有局限性的概念和模糊的原则变成具体的、可实现的事实和实际可行的做法。他为我们提供了一项可行而又普遍适用的社会与个人自行赎罪的方案，并据以作为他自己崇高而影响巨大的一生的行为准则。在耶稣的教导中我们找到了乌托邦思想的顶峰。从他那个时代以来，在长达 19 个世纪的时间里还不曾再发现过较之更高的高峰。

耶稣的乌托邦思想，其目的在于实现一种明确的理想——天

国。这种乌托邦与先知者和启示录者的不同。先知者构想出一个世俗的王国，这个王国洋溢着耶和華的精神，是由理想的大卫王治理、由以色列的选民居住的政治组织。它是一个在征服了他们的世俗敌人之后，由这个王国的选民统治的世界。对某些人说来，启示录者的未来国家是个世俗国家。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个超自然的共和国。但无论它是哪一种性质的国家，它乃是出于神对世俗事务的干预，历经奇迹与灾难而创建的。这些政府的色彩由救世主式统治下的严格政治组织到耶和華统治的国家。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居民都是经过挑选、遵守耶和華旨意的人。但对耶稣来说，王国不应由外在的力量、社会团体或启示录者的梦想来建立，而应由人类个人逐步圣洁化来实现。当人们的个人利益、目的和理想的实现和神的旨意一致时，我们就会拥有天国。当个人内在神圣化得以实现时，它立刻就会成为外在的社会秩序。把个人内心的生活与社会秩序分离开实无可能，因为它们总是不可避免地要相互影响的。

耶稣不能容忍肤浅的、纯属幻想的计划，而充分尊重人类生活的发展规律。他希望能有一个逐步建成的、新生的社会，希望不仅每一个人都能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sup>①</sup>而且希望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受到祝福的、纯洁的社会。当所有生活上的障碍<sup>②</sup>都得到消除时，当所有的人都加入到兄弟般友爱和相互合作的完善和谐境界中时，当各界人士都和上帝一致时，那种完美的社会就会实现。因此，天国可视为一种发展过程，一种社会和精神上逐渐进步的过程。这个过程始于人们的心中 and 生活中，直到上帝的精神渗透到一切社会制度和生活中以前是不会中止的。它既是一种主观精神状态又是一种客观社会秩序。它是个主观和客观的成长过

① “象你的天父那样，你也应该是完美无缺的”。见《马太福音》，5：48。

② 同上书 13：41。

程,是一种发展过程,一种逐渐展现的生活原则。这不是一个由卑鄙的而是由高尚的动机来治理的王国。这个王国的治理不依靠惩罚性的威胁或地狱的火焰,不靠暴力或恐怖,也不靠希望得到眼前或日后的自私报偿,不靠对欢乐或名誉的欲望,而是靠活跃于人们心中的上帝精神,靠众人对什么是至善的共同理解和对正义与真理的热爱。这就是说,在这个王国里到处都没有战争,没有压迫,没有不公正的劳务,没有不断的纷争、仇恨和剥削。

这个天国既存在于当今也存在于未来。它之所以存在于当今<sup>①</sup>,是因为他看见上帝的法则正树立在人们的生活之中。<sup>②</sup>酒店老板和妓女,这些为人们视为罪孽最深重的人,他们也正在进入这个王国<sup>③</sup>。上帝的法则即使在现在也在取代着邪恶的势力<sup>④</sup>。我们现在看见的情况仅仅是一些微小的端倪。现在人们正在一个一个地走向正义和兄弟般的友爱,而邪恶则正在慢慢地被消除。但是这个王国将来会以其完整的面貌和威力降临到人间。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个人接受和促进其实现的要求的热切程度。尽管我们有一些办法用以估计其实现的可能时间<sup>⑤</sup>,但具体时间却谁也不知道,就连耶稣本人也说不准。但这王国却安静地、几乎不受人注意地在继续而确定不移地成长着。这一点已在三个寓言中肯定了下来<sup>⑥</sup>。上帝的追随着播下的种子在缓慢地生长着,其中也有莠草,但它在生长着,而且总有一天庄稼和莠草都会被收割。这个王国尽管现在还只是小小的种子,但它会逐渐长成一棵树。现在它象暗地在发酵的面团,但不久它就会整个地膨胀起来。这个王国具有发扬光大

① 《马可福音》1:5,《马太福音》6:10,10:7,《路加》10:9。

② 《马太》,17:26,《马可福音》2:19。

③ 《马太福音》21:31,32。

④ 同上书 12:22—29。

⑤ 《马可福音》13:28—32。

⑥ 《马太福音》13:24—35。

的精神。“大地本身就能生长出东西来。先是发芽，然后长穗，最后长出饱满的谷粒。”<sup>①</sup>理想终将实现，这个王国最后将以完美而圣洁的姿态降临人间。

耶稣在论及这王国时似乎有矛盾之处。他似乎表明这一王国既是一个世俗社会又是一个天堂里的社会。他明确提出“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sup>②</sup>可是又谈到“天国”。<sup>③</sup>另一方面，他又说：“看哪，天国就在你们心中”<sup>④</sup>；他又教我们祈祷“愿你的王国降临到世上，愿你的旨意施行在世上，如同施行在天上。”<sup>⑤</sup>这里，实际上并不矛盾，正如皮博迪教授指出的：“旧日的矛盾消失了……耶稣……从上界俯视这个世界。他看到上帝的举止对人们精神上的影响，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上帝的精神在人类生活中受到欢迎，天国就在那里毫不夸张而肯定地立刻得以实现。”<sup>⑥</sup>它确实存在于这个世界，却又不属于这个世界。他属于经过改造的社会中的一个公民，置身于这个世界上的人还没有达到完善境界的环境之中。只有符合天堂条件的人才能进入天堂。

“王国”这个称号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独裁与专制。它实际上是一个所有人都享有平等权利与同等特权的共和国。这个王国的王位是神授的，而且也是由每个公民的自主选举产生的。国王的权力是绝对的，但每个公民都是自由的。国王的宝座立在他的人民的心中。王国的法律并非发自外来的武断命令，而是熔于公民的灵魂中。这是一个建立在博爱、服务和平等之上的社会，人们想不出比这更民主的原则。

---

① 《马可福音》4:26—28。

② 《约翰福音》18:36。

③ 《马太福音》7:21。

④ 《路加福音》17:21。

⑤ 《马太福音》7:21。

⑥ 皮博迪：《耶稣基督和社会问题》，纽约1900年版，第100页。

必须对这个王国的社会性<sup>①</sup>和广泛性着重加以说明。正如我们马上可以看到的那样,王国的职能主要是社会性的。当然,其他的各种关系也是属于同一性质。王国的目的在于对世界上人类的整个生活施以社会性的拯救。这个王国是受到上帝对整个人类心灵的启示,以无私地献身为他人的精神为动力,推行一种相互服务和相互帮助体制。耶稣的伟大贡献之一在于,王国具有的这种社会性方面<sup>②</sup>。他将这一点置于首位。他的王国也具有精神上的特点<sup>③</sup>,这肯定也是它的主要特点,但他从不象他的前辈那样使它精神化而使之失掉活力。他的王国绝不是一个脱离躯体的幽灵,而是一个真正可以达到的目标。耶稣也谈到离开这个王国就不能享有永生。<sup>④</sup>倘若履行了进入这王国的条件,那就保证可以获得永生。一方面包含着另一方面。“继承王国”和“继承生命”是同义语<sup>⑤</sup>,只是我们要记住:永生是对个人的至善而言,而王国则是对社会的至善而言。

在谈了这个理想以后,如何将之付诸实施呢?人的思想按照这个理想去重建社会时,在主观或客观上应起什么作用呢?我们业已看到,这个王国是具有社会性的,而乌托邦思想则具有个人的、主观的性质<sup>⑥</sup>。耶稣认识到当时的弊端,但他看到这些弊端的背后全是人,因而认为这些不是社会弊端而是个人的罪过。由于罪过是

---

① 《马太福音》6:10。

② 罗成布什:《耶稣的社会原则》第192页写道:“他提出这样一种社会理想的用意在于,有别于那些对目前的世界采取静止不动的态度的人们;有别于那些将进步与成长的可能性限于某些个人的人;有别于那些将完美的境界寄希望于来世而非现世的人”。

③ 《马太福音》4:8—10;5:3—12;11:12;《马可福音》10:23;《路加福音》17:20—21;《约翰福音》18:36。

④ 《马太福音》.8:3,8,9;25:34;《马可》9:43—47。

⑤ 人们只是在近代经历了艰辛的道路之后,才认识到拯救工作也可能具有客观性,与社会机构有关。

⑥ 《马太福音》25:15。

个人犯的,重建工作也必须针对个人。他并不是向阶级、国家或民族而是向个人发出号召,其设想是,只要每个人都秉公行事,变得有道德,重新作人,世界就会向正义和革新的方向前进。所以他的目的是教导人们个别地与上帝建立恰当的关系,学习分清哪些是罪恶的、堕落的、不道德的事物,哪些是可以导致安宁、幸福和兄弟般的,从而逐渐培育人们廉正坚强的性格,使他们能坚持他们的信念。总而言之,天国的优点或者说任何社会团体达到尽善尽美的可能性,归根结底不是靠宗教的附属物——辉煌的教堂、豪华的宗教仪式、美妙的音乐、有学识有信仰的教士;也不靠这国家的经济情况——劳资之间的和睦关系、不受贪污腐化的干扰,也不靠它的政治情况——民主制度和政府、国内外的和平环境;也不靠它国内的社会形势——福利事业,施舍工作、慈善事业、良好的减轻或改进社会弊端的机构,而是靠这个王国成员的品质。耶稣的教义把这一真理永远置于最突出的地位。

耶稣将重点放在个人上,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或者说所有的人都要做同样的贡献,取得同样的报酬。他在他的才能寓言中说,“他赋予某人以五分天资,另一人两分天资,又一人一分天资;按各人的能力分别赋予,”<sup>①</sup>而他希望取回的也是“每人按他的能力。”“他的目的是要发展每个人的最高尚、最崇高和最神妙的品质,因而,就是由无数个人综合在一起的最高尚、最崇高的品质。因为,品德乃是人生的目的,我们生活就是为了使男人成为男子汉,妇女具有女性的品德。”<sup>②</sup>

耶稣在回答法利赛人的提问时,简洁地给予了我们关于乌托邦思想的启示:“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地热爱主,你们的上帝。这是首要而伟大的戒律。第二条和此类似,即你们要象爱自己一

① 《马太福音》25:15。

② 莱曼·艾伯特著《基督教与社会问题》,第387页。



样热爱你的邻居。所有的律法和先知者都靠这两条戒律。<sup>①</sup>对上帝和对人类的爱，上帝和人类的爱，这就是耶稣的乌托邦思想的基础。由此产生的各种说法，都是这些基本原理的引申。第二条戒律实际上是耶稣对犹太人乌托邦思想的巨大贡献。他亲自说过：“我给你们一条新戒律：你们要彼此相爱，就象我爱你们一样，你们也要彼此相爱。”<sup>②</sup>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条戒律曾由先知者和启示录者一再强调，但第二条戒律则只是暗示过。而耶稣却一再加以阐明，并以这条戒律为基础提出了大量的理论。“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认识每个人的无限价值和相互之间的无尽义务……从人类的观点看来，耶稣教义的显著特征就是提高人类，指出普遍的仁爱乃是行为的最高准则。基督就是这样迥然不同于所有在上帝面前走过的人，从而成为第一个真正的博爱主义者<sup>③</sup>。但是，这两条戒律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必须一并予以接受和遵循。约翰证实了这一事实，他说：“倘若一个人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那他就是个说谎的人，因为一个不爱他所看见的兄弟的人，怎么能爱他没看见的上帝呢？爱上帝的人也应当爱他的弟兄。这就是我们从耶稣接受过来的诫律。”<sup>④</sup>我们只在爱我们的同胞并为他们服务时才能爱上帝并为上帝服务。考验我们对上帝是否忠诚，就看我们执行每周七天的金科玉律的情况<sup>⑤</sup>。只有把上帝看作是父亲，把人类看作是兄弟，我们才算领悟了整个的教义。否定一方面，就把两方面都否定了。

为了更仔细地研究耶稣的乌托邦思想，我们拟将讨论分为“对

---

① 《马太福音》22:34—40，伊利博士谈到这一段话时说道：“这是一个很突出的，同时也是甚为勇敢的对人的全部职责的总结语。”载《基督教的社会方面》，第1页。

② 《约翰福音》13:34。

③ 伊利著，《服务的社会法则》1896年版，第30页。

④ 《约翰福音》4:20—21。

⑤ 关于这一思想的阐述，见《马太福音》25:31—46中的著名段落。

上帝的义务”和“对同胞的义务”两方面，以便阐明每一方面需作出努力的一些较重要的地方。可是必须懂得，这种划分不是硬性的，因为有些义务对上帝和人类都有关系。

正如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对上帝最重要的义务就是热爱上帝。爱乃是上帝对人类表现出来的最伟大的品质，所以人们的基本义务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和尽力地爱上帝，以此作为回报<sup>①</sup>。对此，耶稣曾亲自作出榜样，“就是要让世上的人知道我爱天上的父；同时天上的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去做。”<sup>②</sup>倘若要考验一个人对接受这种乌托邦思想的情况，就看他是否毫不动摇地热爱上帝。和爱几乎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义务就是要信仰。“耶稣回答他们的问题时说道：要信仰上帝。”<sup>③</sup>有了这种绝对的信念，就什么都能做到；因为倘若这种信心足以移山倒海<sup>④</sup>，那就肯定能克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细小而无关紧要的障碍。所有忠于天国的人们必须自愿负起责任，信仰上帝、信仰天上的父并确信圣律终将付诸实现。

与信仰紧密相联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忏悔。<sup>⑤</sup>“你们要忏悔并相信福音。”犯罪不是最坏的事，但拒不忏悔则是最坏的事。因为“你们若不悔改，你们就都会同样遭到灭亡”。<sup>⑥</sup>因此，敏感的良知是非常可取的，因为它是重新做人的基本要素，可促使个人很快象他忏悔的那样重新做人。<sup>⑦</sup>

另一个按照个人和上帝的关系来考验他是否合格的方法，就

① 《马可福音》12:30，《路加福音》10:27。

② 《约翰福音》14:31。

③ 《马可福音》11:22。

④ 同上书，11:23—24。

⑤ 同上书。

⑥ 《路加福音》13:8。

⑦ 《马太福音》3:8，《路加福音》3:8，“拿出忏悔的成果吧。”也可参阅关于忏悔的：伟大经典段落，见《路加福音》15:11—32。

是看他对上帝的服从和谦恭的态度。“因为，看他们获得的结果，就可以认清他们。不是每一个叫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只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得去”。<sup>①</sup>一定不要自欺，不要到处叫喊“主啊！主啊！”而要服从神圣的旨意。只有这样的服从，才能经受住决定性的考验<sup>②</sup>。这样的服从并不单是为进入天国作准备；它是天国的要素，因为在人的个人生活中照这样实行上帝的规范，就意味着人类的正义：“你们首先要寻求天国及其正义，这些东西便会是你们的了。”<sup>③</sup>这是一种对精神价值的颂扬——不是督促人们去毫无差错地遵守某些妄自尊大的小学校长或严守教规的人所订下的一套规则，也不是鼓励人们去服从某一骄横、暴躁的君主发出的指挥——这是一种对至善的追求，力求按照神的计划去做。

人们有责任以谦恭和耐心的精神服从上帝的旨意。因此，“不管是谁，只要他能象这个小孩那样地恭顺，在天国里他也就是最伟大的。”<sup>④</sup>这是一种感觉到有需要而产生出来的谦恭意识，就象一个小孩由于要靠别人的供养而表现顺从的那样。另一次，耶稣要我们向一位酒店老板学习。他与自满的法利赛人相反，承认自己的缺点，希望得到宽恕。是的，谦恭也是我们对上帝关系中的一个基本方面。

然而，这种关系必须不带任何虚伪和欺骗的成份。耶稣嘲笑那些对宗教仪式和其他教堂规则持谨小慎微的态度，却漠不关心其精神和道德关系的人。他尤其憎恨法利赛人。他们忠诚地向宗教献出他们所有微小的东西，包括他们菜园中的薄荷、茴香和欧苜蓿，但是却将审判、仁爱 and 忠诚置诸脑后；但是这些却是律法的基础。他们将牛奶过滤以免喝下一个溺死的小虫，从而违犯律法，但

① 《马太福音》7:20—21。

② 同上书 7:24—27。

③ 同上书 6:10—34。

④ 同上书 18:4。

事实上却干尽坏事。他们擦拭盘子的外表，却让盘内装满敲诈勒索和腐化的东西。啊，这并不是什么天国，而是对地狱的诅咒<sup>①</sup>。神圣的关系必须是坦率的、忠诚的，毫无虚饰。<sup>②</sup>

此外，为了保持人与上帝的关系不受损害，人类必须摆脱拜金主义。“你们不能侍奉上帝同时又侍奉财神。”<sup>③</sup>人世间生活的操劳以及财富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会堵塞人与上帝之间纯洁的思想感情的交流，就如杂草丛生侵占了肥沃的土地和阳光一样<sup>④</sup>。人们一经攒集了世俗的财宝，这些东西就会分散人们内在思想修养的注意力，“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就在哪里。”<sup>⑤</sup>贪欲与财富都是虚幻之物；“因为人的一生并不在于他占有很多东西，”<sup>⑥</sup>而在于“信仰、希望和爱这三样东西，但其中最伟大的东西就是爱”。<sup>⑦</sup>

最崇高的兄弟间义务，象孝道一样，就是爱。“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sup>⑧</sup>人人都要彼此相爱：“你们要爱邻如己。”<sup>⑨</sup>靠我们的邻居，我们可以了解到所有需要帮助和我们有能力去帮助的人。“我们的爱不是排他和狭隘的，而是遍及四海，就象至善的撒马利坦人的爱一样”。<sup>⑩</sup>这考验在于，不但要我们爱我们的朋友，而且还要爱我们的敌人。“你们听人家说过，爱你的邻居，恨你的敌人。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爱你们的仇敌，为那些诅咒你们的人祝福，为憎恨你们的人做好事，为那些可鄙地利用和迫害你们的

---

① 《马太福音》23:23—33。

② 同上书 6:1—6, 16。

③ 同上书 6:24。

④ 同上书 13:18—32。

⑤ 同上书 6:19—34；《路加福音》12:34。

⑥ 《路加福音》12:15。

⑦ 《哥林多人书》第1卷 13:13。

⑧ 《约翰福音》15:17。

⑨ 《马可福音》12:31。

⑩ 《路加福音》10:30—35。

人祈祷。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你们若是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你们能得到什么赏赐呢？酒店老板不也就是这样吗”？<sup>①</sup>要是有人打我们的右颊，我们就连左颊也转过来让他打而不还手<sup>②</sup>。不能破坏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兄弟情谊。爱我们的同胞，要不附带任何条件，还要毫无例外，这才最能表明我们有资格进入天国。<sup>③</sup>衡量我们行为的箴言是：“你愿意人们怎样待你，你也就要怎样对待他们”。<sup>④</sup>

这种兄弟般的情谊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献身于同胞们的福利就是这种爱的表现之一。不仅要献身于和我们有同等地位的人和比我们地位高的人，还要献身于儿童<sup>⑤</sup>和被社会所抛弃的人。<sup>⑥</sup>因为，为了继承天国，“你们必须献身于我们同胞中最微贱的人。”这里耶稣向我们保证贫富之间和贵贱之间是毫无差别的。一个人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为同胞服务。“你们中间谁伟大，就让他作你们的侍从。谁当首领，就让他作你们的仆人。”<sup>⑦</sup>耶稣使得这个为他人服务的法则成为他的王国的基本律令，并极力在他的一生中付诸实行。<sup>⑧</sup>在这个由爱而不是自私所统治的王国中，最富有的人必须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sup>⑨</sup>。耶稣律法的精神并不是取消不

① 《马太福音》5：43—46；《路加》6：27—28。

② 同上书 5：38—42。

③ 《约翰福音》13：35。

④ 《马太福音》7：12。

⑤ 同上书 10：42；18：5。

⑥ 《马太福音》25：34—40。

⑦ 同上书 20：26—27；23：1—11；《马可》10：43。

⑧ 《路加福音》22：27。

⑨ “聪明才智只有将其智慧传授给无知的人，才能得到最崇高和全面的发展。美德只有用以拯救罪恶，才能臻于理想的完美境界。公职的尊严与官阶只有用以为臣民服务，才能显示其真正的尊严。社会上的最高阶层并不是那些在低下的人面前趾高气扬的人，而是那些能屈尊去扶养、提高并净化那些底层的人。财富并不能为其所有者买到最优秀的才能和最大的幸福，除非是用来为没有财富的人造福。”——豪尔顿著《教会和社会改良》纽约 1913 年版，第 113 页。

平等，而是利用优秀的才能作为服务的手段。任何地方的一切伟大事物必须以这一点为基础。不是取得而是奉献，才能使人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但是，一个人要提防浮夸虚饰之风<sup>①</sup>。

这种兄弟般的爱的表现的另一方面是自我牺牲和无私精神。“有两件衣裳的人，就分给没有的人。有东西吃的人，也要这样做”。<sup>②</sup>“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上两里。”<sup>③</sup>另有一些伟大的社会思想家也认识到同样的真理。卡尔莱说过：“严格说来，一个人只有当他放弃他所有的一切时，才能说生活开始了<sup>④</sup>。”莱基认为“一切真正伟大道德的卓越之处，其首要条件就是真正具有自我牺牲和自我放弃的精神。”<sup>⑤</sup>然而，耶稣和其他思想家都并不提倡禁欲主义，因为禁欲只是为了自我克制而自我克制。耶稣和这些思想家则相信为了他人的幸福而自觉自愿地献身。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抑制自私的思想并发扬献身的精神。

与服务相类似的思想就是谦恭精神。耶稣在这方面亲自给我们作了引人注目的具体示范。有一次，他吃完了晚饭，便拿起一条手巾亲自给他的门徒们洗脚。<sup>⑥</sup>这就表明了将自己置于为社会服务之下的无限崇高品德。是的，甚至在微贱者当中亦复如此。与此引人注目的为他人服务和谦恭榜样有关之事，我们还必须提到耶稣在批判自以为是的思想时所持的坚强态度。有一回，一些以虔诚的法学家自诩的人和法利赛人给耶稣带来一个令人可鄙又可憎的家伙，一个私通时被当场捕获的女人，并说：“这女人是在通奸时被抓获的。摩西在制订的法律中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女人

---

① 《马太福音》6:2—4。

② 《路加福音》3:11。

③ 《马太福音》5:41。

④ 托马斯·卡尔莱：《衣裳哲学》麦克米伦版，第173页。

⑤ 莱基：《欧洲道德史》，第2卷，第155页。

⑥ 《约翰福音》13:1—20。

用石头砸死。你说该把她怎么办？”过了一会儿，耶稣作了回答，这答复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无与伦比的。它不仅简单明瞭，而且含义深远、气势磅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过的，就可以首先用石头砸她。”<sup>①</sup>那些控告这女人的人受到了严厉的斥责，对自己的伪善感到羞惭，就象卑鄙的迫害者一样溜走了。

耶稣强调的另一种品德就是个人的责任感。他没有明确地阐述这一问题，却时常以间接的方式提示过。<sup>②</sup>耶稣认识到，社会上很大一部分动乱来源于个人的私欲和野心。除非能使个人深刻认识到个人要对自己的失误和行为负责，再也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安排可以保证社会的福利。甚至“人们对随便说出的一句话也要负责。”<sup>③</sup>他不相信那种宿命论，将个人的性格看作是由环境所造成的，认为这是一种靠不住的说法，而是借助于人的意志来解决个人的性格问题。社会团结（这是他制订的两大戒律的自然产物）要求人们必须认识个人责任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似乎已认识到那时以后发现的伟大规律，即认为不能将最无限小的分子挪动一英寸而不影响整个宇宙的平衡。

耶稣也以实际行动向我们宣讲并要我们树立社交精神即世界主义。他常和人们交谈，有些时候甚至置习俗礼仪于不顾。有一次门徒们外出归来，耶稣正在撒玛利亚的一个水井旁。他们惊奇地发现他正在和一个陌生的妇人交谈。<sup>④</sup>他不顾阶级的界限，常和受社会歧视的人交往。他接受税收员的宴请，甚至应邀到他们家里做客，因而招致有声望的正派人的嘲笑，讥之为酒店老板、贪食者和酒鬼的朋友。<sup>⑤</sup>他有时也和社会上的上层人士、法利赛人一道进

① 《约翰福音》8:3-9。

② 《路加福音》15:18; 18:15。

③ 《马太福音》12:36-37。

④ 《约翰福音》4:27。

⑤ 《马太福音》11:19。

餐。<sup>①</sup>耶稣祈望所有的人都能象邻居、兄弟那样一起生活，他自己并为此作出了榜样。

最后，耶稣要求每个人都要有宽恕精神。他要求予以宽恕的一些违犯事件有：人身伤害<sup>②</sup>、财产损失，<sup>③</sup>诽谤他人的品德。<sup>④</sup>“因为，倘若你们宽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会宽恕你们的过错；你们不宽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不会宽恕你们的过错。”<sup>⑤</sup>倘若我们的一个同胞对我们作了错事，我们一定不要让这件事破坏我们兄弟般的情谊。我们必须宽恕，不光是宽恕象法利赛那样的人三次，象彼得那样的人七次，而是宽恕七七四十九次。<sup>⑥</sup>假如，当我们特别忙于某些重要工作时，我们想起我们做了错事使我们的伙伴疏远了我们，我们就应当放下一切工作去恢复友谊。<sup>⑦</sup>因为，如果我们不宽恕别人，我们就会受到怀有内疚和热爱正义的上帝的责难，正如耶稣在不宽恕别人的仆人的寓言中所指出的那样。<sup>⑧</sup>但是，如果我们确是宽恕的话，我们就真正表现了爱，这种爱乃是所有律法和预言的基础。宽恕这个极为重要的精神就在于它不仅是一种对人的责任，也是一种对上帝的义务；因为，这就象保罗所说的情况：“要相互宽恕，就象上帝业已宽恕了你一样。”<sup>⑨</sup>我们宽恕的真正动机以及我们的力量，在于上帝首先宽恕了我们。最后，我们对上帝的真诚关系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完成对我们同胞应尽的义务，尤其是宽恕的义务。

---

① 《路加福音》14:1。关于对上述精神的表达，可参看《路加福音》14:21,22。

② 《马太福音》5:39。

③ 同上书5:40。

④ 同上书5:11。

⑤ 同上书6:14—16。

⑥ 同上书18:21—22。

⑦ 同上书5:23—24。

⑧ 同上书18:23—35。

⑨ 《以弗所书》4:32。



这是耶稣复兴社会亦即乌托邦思想的纲领。跟任何一种理想一样，是远非我们能真正做得到的；但是，也跟任何一种真正的理想一样，它又是一个经过我们的努力可以逐渐瞄准和接近之点。这个纲领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强调个人的品德和使之臻于完善的方法。这些方法是某些极为明确、相互交织的道德和精神上的要求；这些要求要由充满了正义、公道和博爱的人类生活和神圣的上帝生活融为一体才能最终加以实现。

这确实是一种纯真的宗教教义。因为它既不是出于一时感情上的冲动，也非神秘的心醉神迷之产物；既不是机械的举止、宗教机构和仪式，也不是教义等问题。它乃是一个关于灵魂的问题，属于精神和伦理的范畴。它的基础是以一种有如儿童般的纯朴感情来和仁慈的上帝作精神上的交往，并表现在日常的兄弟般情谊和为人服务上。它为全人类谋求幸福和平和满意的生活。它是一种持乐观主义和充满希望的学说，因为它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它着眼于人类可能做到的事，而不希望发生奇迹。它希望看到全人类都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而不是少数人的荣华富贵。作为乌托邦学说，它是无与伦比的。

#### 四、奥古斯丁和他的《上帝城》

我们一直在追踪的一系列属于伦理-宗教乌托邦思想的下一个题目，就是奥古斯丁的《上帝城》。为了完成这一部分的研究工作，我们有必要对这部划时代的著作进行简要的考察。这部著作是奥里利厄斯·奥古斯丁（公元354—430）所作。奥古斯丁生于泰加斯特。这是纽米迪亚，现属阿尔及利亚总督管辖的一个小城。这本书的作者历史上常称作圣奥古斯丁。他是基督教会后奈西亚时期拉了神甫中最伟大的一个神甫，也是现名博纳的希波里吉厄

斯主教。《上帝城》写于公元 413—426 年间。当时正处于衰落的时代的欧洲经历着艰苦的磨难，基督教也面临巨大危机，迫切要求最伟大的护教者作出极大的努力。这时奥古斯丁正值壮年时期，便挺身而出以满足时代的要求，写出了这部杰作。这部著作一直对尔后许多国王和罗马教皇以及许多帝国的统治和僧侣计划都起过重要的作用。为了了解这部书，我们首先应当考察一下当时的世界局势。

《上帝城》问世之前的时代，是政治和社会普遍处于极端混乱的时代。罗马帝国名义上是一个，实际上有两个，东方和西方的人民很快就彼此疏远起来。边远省份的居民——英国人、高卢人、西班牙人和非洲人——从未被同化过，一直处于不断的叛乱之中，实际上只不过因受复杂而具有高度适应性统治机构的控制而留在帝国版图之内。帝国边沿的半野蛮民族——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匈奴人和阿勒曼尼人、汪达尔人和摩尔人——不断给帝国施加压力，横加骚扰，劫洗边区，使人民经常处于不安和恐怖之中。然而，尽管如此，当时的罗马帝国却妄自尊大，认为帝国的不可战胜的主权并未受到削弱，而罗马这个不朽之城是安然无恙的。

宗教和知识界也处于同样的混乱状态。异教思想、基督教和犹太教都在为权力进行斗争，而以基督教占居优势。但基督教本身也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人们对基督教的热忱在当时繁荣、浮华和腐败盛行的影响下渐渐冷却下来。当时的基督教教士往往背离教义或缺乏高度的责任感。数以千计的教派都拥有自己的狂热追随者。这些人摈弃深刻的思想观点，只注重外表和诡辩，学术活动越来越变成一种例行公事了。旧的机构和宗派正在消失。新的宗派和新的思想体系正在迅速地涌现，要求人们承认并力图取得统治地位。一切都陷于混乱和纷争之中。

这种可怕的混乱局面于公元 410 年，由于哥特人阿拉里克及

其部众攻陷并劫洗罗马而宣告结束。当这一事件发生时，人们感到地裂山崩，暗无天日，因为这座曾威镇全球的强大城市陷落了。罗马人和野蛮人、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一样，内心都充满着不可言喻的恐怖和震惊；这种情绪主要是属于宗教性的。大批基督教徒开始丧失信仰，等待着世界末日的到来。异教徒把这次罗马的陷落看做是罗马人无视诸神而受到的报应。多少世纪以来，这些古罗马诸神曾捍卫着这座城市并赋予它以空前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忽视对诸神的供奉，并抬出一种软弱无力、令人羞辱的新宗教，这些神就变得不耐烦了。把这场浩劫加之于这个帝国的正是他们。人们把基督教看作是引起这场灾难的原因，使之到处受到严厉的谴责。抱有这种怨恨情绪的人，不只限于不动脑筋的群众，连有思想的人也发觉基督教义的精髓和维护国家的生存互不相容。倘若处于支配地位的宗教禁止人们反抗邪恶，那又怎能叫野蛮民族不夺走他们面前的一切呢？罗马是在古老宗教的指引下成长壮大起来，却在基督教时代灭亡了。因此人们普遍地要求恢复旧有的宗教。

这些各不相同而又严肃的反对意见不免给奥古斯丁的思想意识以强烈的冲击，于是他便试图予以回答。他最初的目的是要表明，使罗马走向灭亡的原因并不是人们抛弃了旧神，也不是基督教固有的缺点，而是野蛮民族的野心自然膨胀的结果。倘若基督教及时得以推行，就可以建成一个最好的、不容侵犯的国家。但这还不是事态的全貌。当他想到这座世俗城市的光荣业已消失时，就好象看到上帝城的光辉幻景在废墟上盘旋，“装扮成一位要出嫁的新娘，从天堂降临人间。”他把教会看成一个最充分，最理想的形象，给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安排了一个安息的场所。但是，他还进一步向我们指明他对历史的全面看法。那就是基督教本身作为重新振兴世界的力量！以及他自己对基督教的独特看法。这种观点使

他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成是个人一生的历史，看成是逐步展现的上帝旨意，并使他认为时代的各种力量都在协同推动世界走向最终实现上帝之城这一目标。正如奥赞纳姆所说，他确实竭力在创立一种历史哲学<sup>①</sup>。

奥古斯丁把他的论著分为 22 卷。其中前 5 卷对异教思想进行了批判，接下去的 5 卷则倾向哲学方面的问题；在许多其他的论题当中，对瓦尔罗和柏拉图的体系道德方面软弱无力之处作了无情的批判。在其余 12 卷也就是这一著作的第二部分中，奥古斯丁全面介绍了他自己对各种有关宗教和神学问题的看法，其中主要的是两个城市的思想——凡人城和上帝城，涉及到这两个城市的起源、历史及其命运以及如何处理“最后事物”。《上帝城》是一部涉及到一大批不同主题的不朽之作。事实上，普加拉特称这部书为《第五世纪的百科全书》。<sup>②</sup>当然，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对这座城市的讨论和建立的方法，因此我们将首先集中注意力于这部书所涉及的有关部分。

奥古斯丁把“上帝城”和“凡人城”进行了对比，借以表明它们代表完全对立的原则。一个城建在上帝之爱上，住的是追求精神生活的人。并将自我置之度外。另一个城住的是追求肉欲的人，他们以自爱为基础并藐视上帝，是邪恶的化身。<sup>③</sup>于是，每一个人不是按人就是按上帝的意愿生活着。成为这座城市或另一座城市的居民。<sup>④</sup>奥古斯丁的乌托邦思想是按上帝的旨意生活为中心的。这种生活首先在于摆脱卑劣的情欲和肉欲，在生活中奉行宗教的尤其是基督教的道德原则。<sup>⑤</sup>在告诫人们要规避下流生活

① 奥赞纳姆，《第五世纪文化史》，第 2 卷，第 160 页。

② 多德所引《上帝城》序，第 13 页。

③ 《上帝城》，马库斯·多德译本第 14 卷，第 1 章，第 28 页。

④ 同上书，第 14 卷，第 4 章。

⑤ 见对耶稣的乌托邦思想的论述，

时，他召唤人们留心使徒圣保罗的一段话，这段话正好表达了他的理想：“现在，肉欲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即通奸、私通、不洁、淫荡、偶像崇拜、巫术、仇恨、不和、好胜、激怒、争斗、煽动逆乱、异端邪说、嫉妒、谋杀、酗酒、纵情享乐，等等。这些我以前对你们说过。正如我一向对你们说的那样，干这些勾当的人不能继承王国”。<sup>①</sup> 这是一个要求人心向善的问题。因为“一个人要是遵从上帝的旨意而不是按人的意志去生活，那他就应当是个热爱上帝的人，因而也是一个痛恨邪恶的人。”<sup>②</sup> 奥古斯丁并不主张原罪之说，而是坚持相反的意见：“因为没有人生来就是邪恶的。凡是邪恶的不良行为都是由于恶行造成的。遵从上帝旨意生活的人应当彻底憎恨邪恶的人。这样，他既不会因为这人的罪过而恨他，也不会由于这个人的缘故而爱他的罪过，而是憎恨罪恶，又爱这个人。”<sup>③</sup> 于是他乐观地说：“由于罪恶为人们所诅咒，那么剩下的就只有那些应为人们所爱的人，而没有应为人们所憎恨的人了。”<sup>④</sup> 在另一段<sup>⑤</sup> 中他又说：“有一种没有邪恶甚至不可能有邪恶的本性；但不可能有毫无善良之处的本性。”那么，为了要达到完善的境界，人必须恢复到原本无罪的自然状态。所谓不完善只是由于原有的完善状态受到罪恶的影响所造成的。奥古斯丁乌托邦思想的另一要点与耶稣立下的教义有关。对此，奥古斯丁表述如下：“一个下定决心热爱上帝同时又爱邻如己的人，一个不是按照人的意志而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的人，乃是由这种称之为善意的爱所促使的。”<sup>⑥</sup> 按照他的分析，这种正确的意志或善良意志是受正确指导的爱，

---

① 《加拉太书》5：19—21。

② 《上帝城》，第14卷，第6章。

③ 同上书，第14卷，第6章。

④ 同上书，第6章。

⑤ 同上书，第19卷，第6章。

⑥ 同上书，第14卷，第7章。

而错误的意志则是受邪恶指使的爱。但他把这一点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这种善良的意志必须是向着他人的，不是由于害怕不行善而受到惩罚，也不是希望得到奖赏才去行善，而是为了热爱正义；<sup>①</sup>还必须自愿而满怀喜悦心情地献出这种爱。“因为，凡是能正确地爱别人的人，无疑会抱有正确的信仰和正确的希望；而不爱他人的人有信仰也无用。稍许的爱就是稍许的正义；伟大的爱就是伟大的正义；完善的爱就是完善的正义。”最后，在上帝城中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纽带就是上帝的爱。这正如奥古斯丁给国家下定义时所说的那样：“它是一群通情达理的人对爱的目标有共同的想法而联合在一起”。<sup>②</sup>通过对上帝抱有谦逊的爱，我们舍弃自我和肉欲并接受上帝及其律法，并借助于上帝的恩泽而团结起来，以便为上帝城的降临作好准备。这是一幅社会生活的极乐图景。在这种社会中，个人的个性通过上帝和别人的个性联结在一起。这确是道德上臻于至善的最高境界。

这种相互友爱或善良意愿的必然结果，就是人与上帝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上帝与人之间的和平是通过极有秩序的服从和信仰永恒律法而得以实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就是和睦相处。国内和平就是那些服从者有秩序地服从那些统治者。上帝城的全面和平的目的在于有秩序而和谐地享有上帝的恩泽，并在上帝的抚育下享有相互之间的爱。<sup>③</sup>这样一种和平是由普天下的善良意愿加以维护的。奥古斯丁说，“这就是一种和睦相处的秩序。就是说一个人首先不去伤害别人，其次，为他所能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做好事。”<sup>④</sup>这不过是宣布为他人服务的律法即他的乌托邦思想的另一个因素。他接着阐明，这件事为何要从家庭内部做起呢，因为自

① 《上帝城》第14卷，第10章。

② 同上书，第19卷，第24章。

③ 同上书，第19卷，第13章。

④ 同上书，第19卷，第14章。

然界的法则和社会给予家庭成员更多的机会在家里提供服务。此外，家庭乃是国家的一个单位。统治者对那些看来似乎是受指挥的人服务；但是他们必须治理国家。这并不是从热衷于权力出发，而是从他们对别人所负的职责出发；不是因为他们以拥有权威而自傲，而是因为他们热爱仁慈。

然而，最崇高的服务工作乃是遵从上帝并为上帝服务；因为只有这样，灵魂与理智才能使肉体与邪恶受到适当的制约。<sup>①</sup>他问道：倘若思想上不知道上帝为何物，并因受极腐朽的影响而堕落，又怎能恰当地驾驭肉体 and 邪恶呢？诚然，有些人在这方面能自我克制而不必靠上帝的帮助；但这些并不是美德，而是显著的德行。“赐予人幸福生活的并不是人，而是上帝。我所谈到关于人的事对上帝的权力和种种道德表现也是适用的”。<sup>②</sup>

奥古斯丁指出，不能希望在今世完全享有幸福，因为这是将来的事；但必须尽力使道德臻于完善，并谋求宽恕罪责的办法，就是说要树立正义。他的整个乌托邦思想完全以正义为中心，至于获得正义的方法，他归纳如下：“人的正义在于使他自己服从上帝，使肉体服从灵魂，并使邪恶服从理智，即使邪恶在进行反抗。理智即使不能战败邪恶，至少也要对之进行反抗。他也要恳求上帝的恩赐，使他能履行他的职责，并宽恕他的罪行，为他享有的全部幸福对上帝表示感谢。”<sup>③</sup>

最后，倘若人对上帝没有信心，别的一切事情都是徒劳无益的。奥古斯丁说，“圣经上说过：‘正直的人靠信仰生活’”，<sup>④</sup>因为我们还不能看到我们的善行，因而必须靠信仰生活。我们自己也没有

---

① 《上帝城》，第19卷，第25章。

② 同上书，第19卷，第25章。

③ 同上书，第19卷，第27章。

④ 《哈巴库》，2:4。

能力过正当的生活。但是，我们只有在对使我们确信他的帮助，而他也真的帮助了我们的上帝表示信奉和祈祷时，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sup>①</sup>奥古斯丁虽然并不漠视伦理生活和善行的必要性，可是他认为人单靠自己是十分无能为力的，他缺乏寻求自我拯救的力量，因此他特别强调靠信仰来复兴社会。他的乌托邦思想是对自己抱绝望的态度，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人们往往称奥古斯丁为神秘主义之父；在这里我们就有一个神秘主义的例证，即要求高度欢欣心情和内心的自我克制，但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奥古斯丁象耶稣和某些先知者一样，使这种复兴社会的办法靠个人的活动，借以达到使个人与上帝一致的目的，而摒弃民族的或教士的仲裁方法。可是，他赋予教会以极重要的地位，因为他认为教会就是上帝的精髓和人世复兴的福音。他称教会为“神圣化了的集会。”因此，个人必须永远与之作精神上的交流。只有通过教会——它的教义、祈祷和圣礼等——人民才能找到生活的道路。教会是扇门，通过它，人的灵魂才认识上帝。事实上，他撰写《上帝城》是为了把教会从毁灭帝国的指责中解救出来，恢复教会的威信，并说明教会是上帝用来建造上帝城的精神机构。毫无疑问，他之所以成为基督教的精神和教会的最高旗手，是由于当时强烈的反基督教倾向和其他一些外表华丽和富于狂热的教派之间竞争所致；而这些异教却正在受到易受迷惑的人的欢迎。

② 我们要问，“奥古斯丁的《上帝城》的真正含义何在？它是一种世俗的联合组织还是超尘出世呢？”我们找不到直接了当的明确说法，而是一大堆混乱的思想，可以作种种不同的解释。《上帝城》这一词在这本书任何一处的确切含义必须从它的上下文去体会。有时指的既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一个城邦；可

---

① 《上帝城》，第19卷，第4章。



是它跟这个世界的关系重大。<sup>①</sup>它确是代表一种理想的都市。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指的是一个由朝圣者继承下来的世俗都市。他们靠信仰和对上帝的虔诚，将最终成为这座天堂般城市的完美无缺的市民。<sup>②</sup>第三种含义把上述两种意思都包括在内，是战斗的教会和胜利的教会。<sup>③</sup>第四种含义是历史上出现的世俗教会。在这个教会里并不是所有成员都能取得天堂市民资格，因为有些人干了不能进天堂的事。<sup>④</sup>这一解释受到最广泛的接受，它代表了奥古斯丁的真正用意。

但是，尽管他赋予这一词语以这么多的不同意义，却未必意味着他认为“上帝城”具有许多不同的概念。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这些概念有助于构成一种相同的完整理想。奥古斯丁的旨意是要领导人们走向最后的完美境界，而他关于上帝城的不同概念明显是沿着这条路线达到最后目标的不同阶段。他首先想召唤人们注意这一事实：世上有另一个王国——“这是一座有基础的城市，它的建造者和创造者就是上帝。”它几乎具有超越一切的特点。从一开始，上帝城或者说是由上帝的正直臣民组成的社会同世俗的王国一向毗邻而居，并不声不响日益增添其光辉。这些正直的臣民，由于他们高尚的道德，他们遵循上帝所揭示的真正教义，尤其是由于他们渴望过一种共同的社会生活，<sup>⑤</sup>业经上帝的指示逐渐结成一个共同的组织，成为上帝的选民。这些上帝的选民终于胜利了，建立了基督教会。这个教会最后会普照天下，遍及世上所有的王国。

奥古斯丁主要是献身于他那个时代的教会。在他看来，当时

---

① 《上帝城》，第16卷，第11章，第19卷，第11、14章。

② 同上书，第19卷，第17、27章。

③ 同上书，第14卷，第28章。

④ 同上书，第10卷，第21、26章，第20卷，第9章，第21卷，23章。

⑤ 同上书，第19卷，第5章。

的教会组织在世界上明显地代表了上帝城。<sup>①</sup>他力图维护上帝城的存在。尽管在当今，“凡人城”或国家和“上帝城”或教会二者的性质与目的是对立的，<sup>②</sup>奥古斯丁却是第一个十分敏锐地看到无法把它们截然分开的人；因为这两座城是相互依赖的。“上帝城”缺乏力量和资源，没有国家的保护就无法确保安全，而国家如果没有正义的援助和只有在上帝城才能找到的其它道德力量，它也是无法达到它的目的的。但是，从就最终的真正意义而言，真正的国家乃是教会。<sup>③</sup>“国家……并入……教会；民间的政权就成为教会的武器，而立法者和行政长官则不过是教会的儿子，必须去实现教会的目的……帝国也就成了教会的工具和附庸。”<sup>④</sup>这样，奥古斯丁便满足了一个反复无常的时代所普遍渴求得到绝对权威的愿望。在此之前，宗教运动与政治运动是同时并存的，但是，罗马帝国之城的失陷，为这种精神上的迫切要求开辟了道路。“于是，上帝城便以其引人注目的组织制度，尤其以其宏伟的宗教会议，向人类展示出世界范围的神圣帝国的图景”。<sup>⑤</sup>这种帝国的思想在当时受到罗马人和野蛮人的欢迎；实际上，人民也想不出别的名称。因此，奥古斯丁倡导的由僧侣统治的教会，其普遍和持久性看来与罗马帝国本身相似，因而获得了人民的支持。这是因为一种世界秩序的破灭有必要树立另一种世界秩序。

但是，我们往往可以在奥古斯丁的著作中看到，他感到当时的教会只不过是真正上帝城的一个断片和序幕。奥古斯丁愿意承认，在教会之外也有许多人是上帝城中的人。此外，也包括已去世的

---

① 《上帝城》，第19卷，第21章。

② 同上书，第19卷，第13章。

③ 同上书，第20卷，第9章。

④ 罗伯逊：《Gnam Dei》，第212页。

⑤ 奥斯蒙：《思想家奥古斯丁》，纽约1906年版，第179页。

人、未出生的婴儿和众天使。<sup>①</sup>他也否认，现存的教会有与最终的光荣教会共存之意，并要他的反对者去读一读《莠草》和《提纲》等寓言。<sup>②</sup>然而，后人所信奉的教会并不是这种广义上的教会，而是一种宗教的最高权威。这一最高权威通过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和英诺森三世的努力变成了一个“凌驾于各王国和各民族之上的全能的僧侣统治机构，以便根除、破坏、摧毁、推翻并建立和树起”<sup>③</sup>中世纪巨大的神权政治体制。

至于《上帝城》对当时产生的直接影响，我们很难作出评断；但毫无疑问，在尔后的年代里它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为思想家，奥古斯丁在政治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整个中世纪的政治和宗教运动都受到他的影响。布赖斯先生曾告诉我们，神圣罗马帝国乃是建立在《上帝城》的基础之上的。<sup>④</sup>我们也知道，这部书成为查理曼大帝的心爱读物并非事出偶然。它在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从特定的社会学观点来看，这部书并不具有如此深刻的重要意义。奥古斯丁的乌托邦思想几乎没有任何创新之处。倘若将之视为集他的伦理-宗教思想家前辈之大成或修订之作，则该书便显得有几分倒退甚至陈腐之处。原由耶稣和先知者发出的明确言辞与完好的理论，有时却由于奥古斯丁词语的唠叨、涉及事物的繁杂和陈词滥调，反而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和根本力量，还由于书中神秘色彩而进一步失去了原有的光泽。奥古斯丁的神秘主义要求具有高度的激情和狂喜的情绪；这也使他的论点变得软弱无力。固然，我们不能否认奥古斯丁的著作对政治和宗教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它提出关于建立僧侣统治教会的思想。我们还必须防止

① 《上帝城》，第11卷，第7章；第20卷，第9章。

② 同上书，第20卷，第9章。

③ 罗伯逊，同上书，第222页。

④ 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纽约1904年版，第93—99页。

过高地估计了这部著作，把它作为社会理想主义的丰富泉源。这部书在这一点上很少创见，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对前人的论述作了拙劣的阐述。对此，我们不宜过分子以重视。

## 五、萨沃纳罗拉的佛罗伦萨神权政治

在所有在人世上真正试图建立神权政治的尝试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修道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1452—1498)于1494年及其后数年在佛罗伦萨所建立的神权政治了。为了探讨伦理-宗教性的乌托邦，我们有必要适当地予以简略叙述。

15世纪后半叶，在世界史上是一段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的时代，因为这是一个过渡的时代。新时代的灵魂正在力求挣脱种种旧传统和旧做法。在意大利，文化生活正从新出现的文艺复兴光辉中汲取营养。对人文科学的研究受到普遍的热情欢迎。凡想在学术上作出成绩的人都在专心研究经典著作。由于这一席卷全球的奇特不安浪潮的影响，艺术和建筑、语言和文学到处都在经受深刻的变化。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局势下，治国安邦之术和政府也难保一成不变。一切事物都处在不安的状态之中。佛罗伦萨的情况并不亚于意大利其他地方和西方世界，它也在经受分娩前的阵痛之苦。

经过一段异常光辉的统治之后，皮埃罗·德·梅迪奇和他的随从们被驱逐出佛罗伦萨，这样就结束了他在佛罗伦萨名扬遐迩的统治。梅迪奇统治佛罗伦萨时期，曾公开蔑视当时正日益壮大并不愿屈从的中等阶级。当然，这次驱逐还涉及到要抛弃梅迪奇得势时实施的所有政治原则。倘若不让这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就有必要尽可能从速产生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当时有利于建立开明的制度，因为佛罗伦萨人认为，既然他们推翻了暴君，他们就重新获

得了他们古老的自由权利。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制订一种使人们可以享受重新恢复的自由的体制。<sup>①</sup> 当时的事态具有可以立刻采取必要行动的性质。比萨及其它所属地区在佛罗伦萨处于不稳定时期，曾起来反抗他们的征服者。这座城市内部正处于危险状态之中，因为仍有许多梅迪奇的党羽在城内，随时准备抓住临时过渡政府提出使皮埃罗复辟，从而使旧制度继续存在下去。因此，一切努力都指向制订一个新宪法和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府。

正是在这个时候，萨沃纳罗拉这位最杰出的讲道人、圣马可修道院院长和佛罗伦萨最有影响的人物，带着他的神权政治设想挺身而出。在绅士团亦即当时在佛罗伦萨临时当选的当权者正在想方设法使这一共和国诞生的那几个月当中，萨沃纳罗拉曾设想在佛罗伦萨建立一种新秩序，而这一想法的魅力也使他的热情不断高涨起来。最后，日益高涨的政治形势迫使他进行干预，克服了他原先害怕因此而可能遭到误解的思想。不久，他的设想便从他所主持的大教堂向热心的群众广为传播。他谈到的就是梦想建立一种神权政治。这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基督教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不道德的行为应予禁止；社会和市民生活应受上帝训诫的管治；在这个国家里，仁慈与正义、平等与自由应成为最高指导原则；在这个国家里，私人利益应为公共利益作出牺牲。在这个国家人民的心中，上帝应成为主宰。

当时，由于他在广大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他便居于对这座城市的命运几乎是裁决者的特殊地位。他因此受到鼓舞，认为把他的伟大幻想付诸实施的时刻已经到来。佛罗伦萨成为圣城这一幻想本身使他坚信他参与国事是合乎情理的。他布道时谈的都是一些政治和宗教问题的古怪混合物，内容大多取材于先知们的著作。他赞许威尼斯宪法，以此作为圣城的模式，因为据说威尼斯宪

<sup>①</sup> 霍斯堡：《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传》，伦敦1911年版，第125页。

法是由上帝赐予威尼斯人的。他同时号召佛罗伦萨人大力取缔恶行,从街道上消除淫秽的行为,改变人们的举止,放弃奢侈的生活,不穿戴猥亵的服装、粗俗的装饰品,不追求轻浮、享受,而使自己虔诚地信仰上帝,并按上帝的旨意行事。<sup>①</sup>这一号召很快得到了响应。因为,随着政治情绪的高涨,又渗入一种奇特的宗教热情,萨沃纳罗拉便能实行许多前所未闻的惊人改革;而这些改革乃是将他的梦想变为现实的手段。当时佛罗伦萨深受沦于恶习之苦。最邪恶的习俗流行于各个阶层。这位布道者说:“你们过的是猪一般的生活。”<sup>②</sup>许多历史家验证这一指责是恰当的。萨沃纳罗拉成功地使地方长官实施清教徒式的变革。他亲自把穷人从犹太高利贷者的重利盘剥下解救出来,使人民能以适宜的和合理的利率借到钱。他期望赋予教育以较为真诚的道德和宗教特点。他尽可能用各种办法改进学校中使用的课本。他卓有成效地使新兴的一代不受轻浮举止和肉欲风习的污染。从1445年到1497年,佛罗伦萨社会生活的变化象是发生了奇迹。正如一位同时代的学者所证实的那样,“这座城市的面貌全部改观了。人们抛开华丽的服饰与珠宝;街上妇女的穿着都很朴素;从前用来购买装饰品以炫耀自己的钱,现在则用以接济穷人;戏院和酒馆空无一人,纸牌和骰子业已绝迹;教堂挤满了人;救济穷人的捐款箱装得满满的;商人和钱庄将不义之财退还原主,思想纯洁,头脑清醒和富于正义感在这个城市里蔚然成风。到处称赞圣马可修道院副院长是群众的伟大的恩人。”<sup>③</sup>此外,当时所采纳的宪法是萨沃纳罗拉所推崇的以威尼斯宪法为榜样而制订的。人们试图通过这部宪法来恢复自由政府的旧原则并重新建立正直与公正的新原则。萨沃纳罗拉极为快慰,他把周围所发生

① 麦克哈迪:《萨沃纳罗拉》,爱丁堡1901年版,第109页。

② 克劳福德所引《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纽约1903年版,第161页。

③ 同前书,第163页。

的事情看作是在人间建立天国的胜利。他认为佛罗伦萨并不是个共和国，而是个神权政治的国家。在他看来，对他所推荐和批准的宪法的不忠，就是对上帝的不忠。

但是萨沃纳罗拉的美丽构想本身就含有自我毁灭的因素。随着他的改革运动日趋严厉、苛刻，许多信仰民主政府和自由的人便丧失对他的同情。梅迪奇的追随者在这种不满情绪推动下再次出头。在亚历山大六世（当时空前腐化的天主教教皇）统治下的罗马教庭，起来镇压这一胆大妄为的改革者，因为他竟然敢于揭露和反对教廷的种种邪恶行径。但是，也许最强有力的因素还是人性本身。萨沃纳罗拉坚持的行为准则失之于寺院气息过重，未给健康的人之常情留有回旋之余地。为了取得实际效果，过份采取压制手段，过份依靠法律禁令的影响与超自然的威慑力量。他所推行的变革，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时起时伏的、强迫的，缺乏那些只能通过缓慢演进才能形成的、使人类进步建立在坚实基础和持久现实性之上的因素。不能象他所希望的那样，用强制手段使人性达到至善的境界；也不能用严峻的苦行僧的方法来改造社会。正如加尔文后来在日内瓦所发现的那样，一个强有力而又专横的人，当他掌握无上权力时，也许可以通过描绘理想的美好境界和地狱火焰的可怕情景，取得显然是勉强的同意，但决不能永远控制人民。

反对萨沃纳罗拉的力量扫除了他美丽的构想，最后将他处以火刑，让“殉道者的灵魂在火焰中消逝。”我们可以用卡莱尔的话来评价萨沃纳罗拉<sup>①</sup>：“我们要颂扬这位英雄的教士，……他在劳苦中、咒骂、矛盾中消磨了崇高的一生，为的是要把这人间变成天国。然而，人间是决不会变得很神圣的。”

---

<sup>①</sup> 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中论《教士》的一章。

### 第三章 柏拉图的《理想国》

虽然柏拉图肯定不是历史上第一个乌托邦思想家，我们却可以把他看作是哲学、政治和文艺领域的唯心主义之父；而且是一大批杰出的世俗与哲学方面天才人物的领袖。这些人通过一系列对社会进程所作预测，赋予我们以“乌托邦”这个流行的概念。这些预测有很大一部分重要因素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理想国》表达了经典哲学家的理想，是他那个时代文化的最高代表作。它写于柏拉图壮年时期，因而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佳世俗思想。与此相对应，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先知者的预见也同样是唯心性质的说法，尽管是一些具有浓厚宗教性集团的产物。正是这些最初材料来源和民族理想上的差异造成了各种性质的乌托邦。因此，我们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乌托邦得分别加以论述。此外，它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因为它们的精神与内容是迥然不同的。先知者先于柏拉图达几个世纪。我们知道柏拉图在他的多次游历中曾接触过大量的著述。但是，从《理想国》中却找不到证据证明柏拉图曾受到有关著述的影响，尽管就一般性质而言有异常相似之处。然而，这些现象一看便知是偶然的情况，<sup>①</sup>它们的来源是各不相同的。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与门徒；是他最忠实、最聪明而又最能独立思考的追随者。尽管他受到了师傅学说的影响，但他能摆

---

<sup>①</sup> 关于在学术上讨论这些相似之处请阅《圣经世界》第41卷第36页；鲍德温《伊齐基尔圣城》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然而，柏拉图毫无疑问受了希腊说教诗人赫希奥德的影响，这位诗人于纪元前七百年曾抗议过社会的不公正现象，并描述了黄金时代。



脱这种影响并创造出显然是他自己的东西。《理想国》这部著作是一部创作，完全是它的作者的作品。它以书籍形式问世的确切时间我们不得而知，但其内容柏拉图肯定与其门徒们讨论过，因为在公元前393年他的某些思想曾受到阿里斯多芬派教会主义的嘲笑。《理想国》是在希腊处于政治生活解体之际问世的。当时的流行哲学宣扬个人突出，从而给国家带来危害。这件事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灾难性结局结合在一起，便使得强有力的寡头政治党掌握了统治权，并随心所欲地使得暴行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当时思想成熟的柏拉图，经过一生对这些社会和政治情况进行密切考察之后，并在他的师傅遭到误入歧途的人不公正的处决之后，于是对所有现行政治体制以及鼓吹突出个人的一切哲学都产生了怀疑。他构想出一个从极端放纵的腐败现象和面临暴政的危险中解脱出来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体现着有道义的个人和社会化的国家基本上取得一致的原则。他把未来人类会欣然接受的理想共和国这个神话作为表达他用别的方式无法公开披露的这些思想的工具。《理想国》乃是政治学与辩证法的结合体；同时也是对至善所作的一种哲学估量，而且还是一篇论共产主义和国家的理论文章。但它最重要的主要论点乃是寻求真理。

柏拉图的国家在过去和现在都被视为一种理想或幻想，不可能在人类实现的。实际上，柏拉图本人也认为如此。他说，“这个国家存在于我们的推理之中，因为至少不象我所想象的那样存在于人世。但是，天上可能有它的模式。”<sup>①</sup>另一回有人问道，他的理想国什么时候会实现哩，他风趣地回答道：“当一个国王的儿子变成一个哲学家时候，便可能实现了。”<sup>②</sup>他指的是《理想国》中他自己的

---

① 柏拉图的《理想国》第9卷，第315页。所有引证均出自斯本所译的“人人丛书版”。

② 《法律篇》，第5卷。

著名悖论，除非国王变成哲学家或者哲学家变成国王，否则城市或人类都不免要受苦。<sup>①</sup>可是，柏拉图并不知道在他的时代的前一个世纪，一个国王的儿子——如来佛——曾是一位哲学家。<sup>②</sup>可是，柏拉图并不认为《理想国》仅仅是个幻想的游戏，也不仅仅是抽象理论的集成，一种没有任何实际目的的表达。哲学家不能超越他的时代，而只能正视它并对它的实际意义加以估价。这一点柏拉图是做到了。他的观点是他的时代的观点。他把他所看到的生活提到理想的高度，并期望从中引出进步的广宽路线。他也不认为他那一代人会朝着他指出的道路走得很远。有人问他是否有一种使市民相信某种理论的方法，他回答说：“没有可以说服这帮人的方法，但是我可以想出如何使他们的子孙后代以及全人类后世相信这种理论的方法。”<sup>③</sup>

但是，柏拉图从未有完全实现这一理想的念头。这样一种想法不可能为当时的人所接受，因为它意味着要具有不断进步的眼光，经过多少世纪一步一步地取得进展。进步的思想是现代的而不是古代的观念。在古代，人们对于古老的事物只有模糊的概念，那时还没有历史哲学，或将一个时代同另一时代相比较的方法。这种思想是在罗马帝国、基督教会为世界范围内造成划时代的社会变革与政治变革之后，在许多新的科学发明与发现、法国革命的理想主义以及过去几世纪形成的巨大物质繁荣之后，人类才第一次开始逐渐领悟的。就是通过这些事件才使人成为“各个时代与一切事物的旁观者”，因而使他能够回顾各个时代的景象，仔细考察各个时代的目的，并且向前看，借助于历史的对比以揭开一点面纱而窥视未来。

---

① 《理想国》，第 174 页。

② 加尼特：《理想国序》，第 14 页。

③ 《理想国》，第 3 卷，第 105 页。

柏拉图描述了一个建立在以他自己时代为背景的国家，自始至终是个哲学家的理想。对柏拉图来说，这个理想国采取了深为后世所期望与模仿的城邦外部形式。这种城邦特别适合这一要求。象大多数早期改良家一样，他希望通过组织一种密集的、自给自足而又孤立的社会集团，来实现社会复兴和改良。他那个时代的城邦提供了一个可据以改进的范例。这同博赞克特<sup>①</sup>和巴克<sup>②</sup>所说的民族国家不同。因为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国家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一般市民认为的一种与自己无关的东西——而是一个密切结合的小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公民很容易感到，国家不过是本人自己的放大”。<sup>③</sup>这种思想并不把国家视为一种管理众人之事和矫正缺点的团体，而是由具有道德思想、为共同的目的而联合在一起并在各自岗位上工作的无数个人所组成。

在希腊的政治生活衰败以前，希腊的国家概念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个人利益要对国家的绝对主权作出牺牲。柏拉图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这种思想。与当时具有毁灭性的趋势相反，他使国家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但是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不是受政治动机而是受道德的动机所调节的。在他看来，国家掌握着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因为它在人类福利领域内具有不可或缺的特性。人是不能自给自足的，需要相互依存。所谓人类完美无缺的想法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可能的，除非把这种道德上的团结也就是国家作为组织基础。<sup>④</sup>柏拉图采取道德家的立场所作的努力，完全可从这本著作各个部分揭示出的伦理方面看出来。他认为伦理的价值与准则可以照亮整个人生的历程。国家不是根本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其任务是提出人类理想并教育公民

① 见《国家之哲学理论》，第320页。

②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第8页。

③ 巴克，同上书，第8页。

④ 《理想国》，第2卷，第50页。

接受能使他幸福的特殊的道德准则，因而能对国家作出最大贡献。柏拉图说，“我们正在塑造一个幸福的国家，不光是挑出几个人来使他们幸福而已，而是为人类建立普遍的幸福。”<sup>①</sup>

为了在这个国家中为所有的人获得这种有道德的幸福，<sup>②</sup>每个主要职能和相应的情操要由公民中特定的阶级来代表。这是按照他们特有的能力自动选出的。国家的这些主要德行和个人的精神一样，乃是智慧、勇敢、气质修养和正义感。智慧在一个国家中显然是必要的，以便可以把它视为是明智的并得到英明劝导的。<sup>③</sup>国家也必然要打仗，并为自卫而战斗，并帮助维护和宣传明智的顾问们的意见，因此必须具有勇敢和刚毅的品质。<sup>④</sup>此外，每个国家，必须有一个有节制的和谐而协调的政府。<sup>⑤</sup>如果一个国家具备了这些，正义就会占统治地位。<sup>⑥</sup>在这个想象中的国家里，会有三个阶级：——教育和统治阶级、战士阶级或保护者以及劳动阶级。只有第一个阶级，即一批有教养的人，——肯定是一个很小的阶级——来领导并治理国家，制定法律并监督其执行。这个阶级的主要美德乃是智慧。他们以真正哲学家的洞察力，只从事于努力实现真理与全民的福祉。柏拉图相信这个国家中有教养的、精神意识最强的、最深谋远虑的人的集体智慧。为了支持这些人就要有第二个阶级，即公务员、保卫者和战士，他们的最高美德就是英勇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他们必须毫无畏惧地履行他们的职责，保持国内外的秩序。第三个阶级是由大部分人民群众组成的，他们是手工劳动者（奴隶）、农民、手工艺者和商人。他们必须以他们的辛勤劳

---

① 《理想国》，第4卷，第109页。

② 柏拉图发展国家的论述，见《理想国》，第2卷和第6卷。

③ 《理想国》，第4卷，第118—120页。

④ 同上书，第4卷，第120—122页。

⑤ 同上书，第122—124页。

⑥ 同上书，第125页。

动来供应国家的物质需要。这个阶级的美德是自我克制和绝对服从。当每个阶级各尽其职并保持适当的美德时，这个国的性质便符合正义与幸福这一理想了。因此，正义就是整个国家的社会协调和最终和谐一致，——这种和谐之所以卓有成效，乃是由于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做着他们擅长的的工作。

柏拉图把劳动人民完全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因为在他看来，这个阶级在国家中只作为一种手段而存在，无须为社会上这一部分人制定法律或关心他们的权利。但统治阶级与战士阶级之间的差别却不很明显。这两个阶级可以互相渗透，甚至有可能使最年长和最优秀的武士晋升并享有统治者的尊严和权力。实际上柏拉图只是缔造了两个阶级，即臣民与统治者。

可以看出，这实际上有利于形成有道德的贵族统治。所有个人的固执己见和自私自利的念头都必须服从于由精神和智慧的领路人所指示的共同意志与共同福祉。这些执政者只有当他们能着眼于这个理念——不是道德上的善而是形而上学的善——时，才能治理国家。这是最高的理念，一切知识的极限，一切理念的基础。只有用它作为模式，正义与其他美德才是有用的和有好处的。只有与善取得一致，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美才是真正的美。<sup>①</sup> 真理、知识、美——所有“一切”已知的事物不仅是从善得到的，而且它们的存在和本质也是由善赋予的。但善本身并不是本质，而是超越本质，在尊严和权力上都高于本质。<sup>②</sup> 科学与真理并不是善，但具有善的本质，因为善高于它们。他又说，“善这个理念，……倘若眼见的话，则可以想象为一切光明与美的源泉，它在这可见的世界中发出光芒。它的要素是太阳。在知识领域中，是这要素本身产生出真理与才智。谁要想在公众面前或在私下举止得当”，<sup>③</sup> 谁就得认

① 《理想国》，第 211—212 页。

② 同上书，第六卷，第 216 页。

③ 同上书，第 7 卷，第 233 页。

清这一点。善这个理念是构想出上帝的另一种方式，因为正如柏拉图所说，只有那些哲学天才“才能总是想得到这样一种可以发现的学问，即可以始终存在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不为时间的推移和腐蚀所改变的。”<sup>①</sup> 他们的确是跟上帝一致并酷似上帝的人。这样，国家才能得到正确的指引。

善还意味着把个人完全融化于国家之中，因为在柏拉图看来，道德的理想可以变成政治性的理想。个人可以要求据有只属于他的幸福，作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使道德上的美德变为政治上的美德。个人心灵的美德和国家的美德是一样的。<sup>②</sup> 人的心灵中认识的那一部分的美德乃是智慧或审慎。这是一种指导性的或衡量事物的美德；心灵中关于勇敢那一部分的美德乃是英勇或大无畏精神。它是智慧的伴侣，它的作用是在可畏的与不可畏的事物中持正确和合法的思想；心灵中关于食色的那一部分则是节制、适度或自我克制。它的作用乃是把心灵中最坏那一部分约束在适当的范围之内；最后，正义乃是普遍的美德。它是通过对心灵的其他机体加以调节与相互调整而造成的，形成了一种统一人格。这种把国家的美德和个人的心灵美德加以对比的做法，是由柏拉图提出的。他说，前者在同一著作中是用大字写的，而后者是用小字写的。个人不仅和国家一样具有同样的美德，他还必须融于国家这个实体之中。正义对个人来说，就是在指定的岗位上履行其职责；而国家的正义就是集公民责任感之大成。这里，柏拉图已接近以兄弟之谊为基础的伟大博爱思想，并已倾向于抬高政府的目的和公民职责的思想。他使社会道德普遍化，并确认它的存在。他强调社会的内在团结，指明全体的福利与幸福取决于每个人的福利与幸福。他借助于伦理与政治的同一性，肯定伦理的作用，

① 《理想国》，第6卷，第186页，重点是作者加的。

② 同上书，第4卷，第136页。

阐明伦理只不过是个人的政治而已。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毫无保留地说，各民族的特征不过是组成这些特征的个人特征之总和，因为整个集团的倾向决不可能是单个人的倾向。当我研究人类问题时，整体并不总是其所属各部分之总和。正如乔伊特所说，“整个民族可能比其中任何一个人都要明智；它可能受某种公共意见或情绪所推动而变得活跃起来，但是这种意见和情绪并不能对某一个人起同样的影响；整个民族也可能受某一天才领袖的启迪而做出超人的业绩。”<sup>①</sup> 国家的特征确实是大多数个人在共同行动中形成的特征。

按照柏拉图的想法，公民都不许有任何个人的利益，并要求他们按严格的意义在群众中形成一个家庭。一切具有个人特点与特殊性的事物都得销声匿迹。私人财产和家庭生活、教育和教导、等级的选择和财产所有权、艺术和科学，所有这些都必须置于国家全面、绝对的控制之下。这样，社会生活就好比是一个人的生活。这种社会生活是他那正义理想的乌托邦原型，只有通过两大体制才能加以实现。一个是共产主义制度，另一个是国家的全民教育制度。这两种制度都是实际可行的建议，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提出的，其目的在于补救柏拉图在现存国家中看到的种种弊端。他认为这两种制度都是对人们的无知和自私作出的反应，并将人们引向知识与无私。

他是想建立妇女、儿童和财产公有的社会，由国家全面控制婚姻关系。柏拉图认为，在妇女和儿童公有的社会中，他看到了对他的完美无缺的城邦最大的善。<sup>②</sup> 他把家庭视为国家的天然敌人，因为家庭把它自身和它所有的关系嵌入个人和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之间，起了隔离作用。他希望有一种普遍的兄弟情谊能取代私人

---

① 乔伊特译柏拉图的《理想国》序言，第 63 页。

② 《理想国》，第 162 页。

利益——一种摆脱了诉讼、指控和其他一切“由于金钱、儿童或各种关系而引起骚乱”的兄弟情谊——一种同甘共苦，不受“‘我的’和‘不是我的’，‘他的’和‘不是他的’”之分歧所分裂的兄弟情谊<sup>①</sup>。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最明智和最优秀人的范例，他们具有完全不同于我们的道德观念。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对这种人来说，两性关系与放荡适得其反，严格得几乎达到不可能的程度。男女之间发生两性关系不得带有感情和想入非非的因素，一切婚姻的安排都指向一个目的，即改善种族和加强国家。象动物一样要选择最好的加以繁殖，对人类也必须有所选择，使值得传代的生命遗传到未来。<sup>②</sup> 为此目的，便在特定的节日里用抽签的办法选定临时的婚配；<sup>③</sup> 但只有那些由地方行政官员认可的一对对男男女女才能为国家生育合法的后代。生育和管理生育完全是国家的事。生孩子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科学。推行抽签的办法，是为了使那些被剥夺了当父母权利的人只能怪他们自己的命运不好，而不能怪管抽签的人。婚姻在节日举行是为了使之神圣化，只有对国家最有利的才是最神圣的。<sup>④</sup> 此外，国家授予那些在战争或其他场合建立功勋的人以拥抱妇女的特权。<sup>⑤</sup> 否则，男女只能分居，享有同等的福利。为了保证后代的健壮，必须由壮年父母来生育子女。因此，只让男子在 25 至 55 之间、女子在 20 与 40 之间为国家生儿育女。<sup>⑥</sup> 这种结合所生出的孩子也属于公有；“父母不认识自己的孩子，孩子也不认识自己的双亲。”<sup>⑦</sup> 儿童都由指定的男性或女性地方长官收

---

① 《理想国》，第 5 卷，第 160 页。

② 同上书，第 155 页。

③ 同上书，第 156 页。

④ 同上书，第 155 页。

⑤ 同上书，第 157 页。

⑥ 同上书，第 158 页。

⑦ 同上书，第 154 页。



养,并置于保育室中,由保育员或护理人员精心照料。这些人受命“要守夜,并担负每一件必要的工作。”<sup>①</sup>柏拉图以斯巴达式的严峻态度,不许在国家中出现身体衰退或虚弱的现象。因此必须用秘密方法(诸如打胎或杀婴)来防止所有非正常与无监督的结合特别是那些不在规定年龄之内的男女生育子女的可能性。因为这样出生的子女是不神圣的,未经官方证明的。至于所有适于出生但生而畸形或患有疾病的儿童,则弃之荒野。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最伟大的古代哲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竟然让这种兽性的痕迹来玷污他的理想。象斯巴达人一样,他似乎忘记了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动物,忘记了精神胜于肉体。实际上,他陷入了严重自相矛盾之中,因为他实际上否定了他自己业已证明的东西,即思想和理性并不受制于个人的卑劣的欲望,而是适得其反。人种的改进并不仅在于身体健壮与良好,而且在于具有坚定的道德品质和开明的思想。因此,在两性结合中应有“真正的思想与肉体的结合”,心灵的溶合和本能的满足。对此,柏拉图却未加考虑。

柏拉图完全没有注意到的另一事实是,用成批的办法是不能成功地培育出儿童的。那样做会使所有的儿童成为弃儿。他们将失去母子之间微妙的同情心,而这种感情是“保育员”与“看护人”所不能给予的。儿童靠母爱来培育,正如吸吮母乳一样。柏拉图似乎受到他所看到和听到关于斯巴达的情况不当的影响并将之错误地用于他的理想国。正如乔伊特所说,“他大概看到斯巴达的男人和女人在外表和体力上都优于其他希腊人,并将这种优越性归因于他们与婚姻有关的法律和风俗。他认为斯巴达人并不热衷于得到卓越的后代,他们肉体上优点主要也不是由于他们的婚姻风俗的优越性,而是由于他们的自我节制与训练有素。他认为斯巴达之所以伟大,并不是由道德上的松弛所造成的,而是因有比其他希腊国

家强有力得多的政治原则。他更未注意到斯巴达并未真正培育出希腊民族的最优秀儿女。那些激发雅典的政治灵感、热爱自由的天才,使希腊闻名后世的一切业绩,在斯巴达人当中一概付之阙如。在斯巴达人当中没有瑟米斯特克利兹、伯里克利、埃斯基尼斯、索福克里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sup>①</sup>\*

然而,柏拉图所首创关于科学配偶与由国家培育儿童的问题,并非出自任何不健康或唯物主义的动机。实际情况是,共产主义的道德优点吸引着他;他并未考虑到他后来才知道的关于共产主义的弊端。<sup>②</sup>他认为共产主义能消除自私的动机,并最终导致国家的团结。推行彻底的共产主义与国家的认真努力以防止父母辨认儿童的做法,到第三代和第四代,统治者和战斗阶级的所有成员一般都只知道他们之间当时的关系,而没有人会知道他同任何另一人有什么特殊的血缘关系。这样就对国家有利,因为这有助于团结和宗旨的统一。所有成员会和整体取得密切的一致,一旦国家任何一部分发生问题,每个成员就会感到好象自己发生了问题一样。

尽管在妇女与儿童问题上他未能撤回他的主张,在两性平等的学说中却作了充分的补偿——这是一种非常先进的学说,整整超越了他的时代两千年。在这问题上他显示了惊人的独立思想。他所处的时代的希腊妇女和她的丈夫处于绝对不平等的地位。她不是家庭主妇,不出面款待丈夫的客人,而只是他的管家和他孩子的母亲,与奴隶所处地位相差无几。至于关心政治和代表公众利益的事完全是男人的事。一般人都认为妇女卑下,智力上低能。但柏拉图却认为,将妇女排除在社会活动之外并使之担负繁重家务的

---

① 《理想国》,第53页。

\* 瑟米斯特克利兹和伯里克利为雅典政治家,埃斯基尼斯和索福克里斯为雅典剧作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希腊哲学家。——译者。

②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在晚年所著《法律篇》第5章中摒弃了妇女与儿童的公有制。

做法，不仅阻碍了妇女的发展，而且使国家损失了一半成员的劳务；这样，他的思想便与众大不相同了。在他看来，女人只不过比男人稍差一点。在肌体方面，男女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男人要招亲，女人要怀孩子。他把这一情况和兽类相比。在兽类中性别与职责无关，天赋上亦无任何差异。<sup>①</sup>那么我们为什么竟然视人类当前的两性关系为正确的呢？天赋上女人和男人一样能干，只是体力稍差。因此柏拉图认为，“我的朋友，在这个城邦的全体居民中，没有特别适合于并被认为是女人的工作，也没有特别适合于并被认为是男人的工作。天分无区别地分布在两性之中：女人天生适合于做一切工作，男人也是一样。但总的说来，女人比男人稍弱而已。”<sup>②</sup>因此，男人和女人可以干同样的工作。甚至可以允许女人和男人一样治理国家，担任地方官和监护人。<sup>③</sup>但这并不只是赋予权利而不承担义务。女人应和男子一样也从事操练并参加战争。<sup>④</sup>她们应当尽量摆脱做母亲和女性的特点。她们必须摆脱家庭和孩子的束缚。倘若她们要成为真正的市民，对公众福利感兴趣的话，她们就不仅要热爱家庭而且要热爱这个伟大的社会。这样，妇女便可以提高生活水平，成为男子的伴侣，和男人一起挑重担和负责任。柏拉图没有动感情，没有为习俗或感觉所左右，而是用理智和哲学来解决这一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当居民中的半数、有时还是更为重要的半数处于奴役地位时，无论国家抑或任何公民都是不可能强大起来或达到完美的境地的。因此，他希望人人平等。<sup>⑤</sup>

这个城市的居民不得拥有金银。<sup>⑥</sup>因为他们应随时在心灵中

---

① 《理想国》，第5卷，看门狗的事例。

② 同上书，第151页。

③ 同上书，第162、167页。

④ 同上书，第165页。

⑤ 然而，当柏拉图撰写此文时并未认识到男女之间重大性质上和种类上的差别。

⑥ 同上，第3卷，第107页。

怀有诸神的金玉良言。金钱是一切邪恶和腐败的根源，<sup>①</sup>因此不要有钱。财产要归公。因为一个人有了财产，他就会变成可恶的老爷而不是他同胞的伙伴。他就会策划阴谋，同样也会被人暗算。他经常魂不守舍，唯恐他的财产遭到不测之殃。<sup>②</sup>因此任何人都不会做买卖、占有或借贷。所有的人将按情况和需要享有一切。跟后来的共产主义者不一样，柏拉图并不想把物质财富平均分配以达到平均分布物质享受，而是要求对物质财富持同样克制的态度，以达到理想的幸福。柏拉图要从生活中摒弃经济动机，摒弃一切粗俗的自我满足欲望，这样，人们才可以过理智的生活，从而激励人们希望得到较大的集体福利。他的目的在于通过理性达到社会团结。

然而，柏拉图将对人类的完善寄最大希望于教育。他的共产主义计划就是加强教育并为之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这是一种终生不断的、全盘加以考虑的并为另一种生活重新开始作好准备的教育。这是一种由两性一视同仁地参加而不受任何歧视的教育。柏拉图认为，国家的各种弊病主要来自无知，而主要的防止方法就是提供教育，因为教育可以解决所有其他的问题。因此他说，“只要有好的教育和培养，就能造就好人才；而好的人才在接受了这样的教育之后，就能造就比以前更好的人才。”<sup>③</sup>

他为公民所提供的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使受教育者将来能适于过哲学家或天才人物的理想生活的教育，只是由于实际事务而中断一个时期。这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为多数人而是为少数人办的教育。此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种教育是由少数几个城邦选民所组成的知识教育理事会负责推行的。第三等级的人根本不在这个教育计划之列。教育是为这个理想国家的统治者和武士们

---

① 《理想国》，第 107 页。——“庸俗之辈的钱财造了不少孽。”

② 同上书，第 107 页。

③ 同上书，第 113 页。

的子孙而设的，至于其他等级的人只要使他们具备过一般实际生活本领就行了。后一种教育是按规定的计划进行的，<sup>①</sup>似乎是要把所有的公民铸成同一个模式。但这是一种在和谐气氛中成长的教育，因为这种教育旨在不知不觉地教导如何克制和忍耐，使身心得到适当的发展，从出生前到两岁，要注意照料身体。从3岁到6岁接受的训练，大多是讲述神话。按照柏拉图的想法，早期教育的目的是要把真理作原则性的讲授。因此，首先教育儿童有关诸神的简单真理。然而，当时流行的神话却不合适，因为其中有许多会把儿童引入歧途，或使他们受惊，或使他们变得柔弱或沉湎于肉欲的东西。因此必须予以清除或修订。从宗教真理过渡到简单的道德真理，然后不知不觉地学习有礼貌和好风度。还要编写一些寓言以产生上述教育效果，颂扬诸神和高尚人物。从7岁到10岁要受体育训练，因为公民不仅要有智慧而且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

然而，我们不要因此而推论出体育将于十岁时结束的看法，因为这种教育要终其一生继续下去，成为这位哲学家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对身体的关注就是对哲学的帮助。<sup>②</sup>教体育不是目的，不是把学生训练成运动员，而是一种使他们更能胜任他们工作的方法。此外，男女都要参加，因为在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国家里，体力和武艺二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摔跤学校里当裸体妇女和男人摔跤时，没有人会笑，<sup>③</sup>因为“当一个男人为崇高的宗旨作体育锻炼时却去讥笑一个正在和男人摔跤的裸体妇女，那他就是一无所获，不知所云；看来他一点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笑，也不明白他笑的是什么。万古不移的金玉之言是，对公众最有利的事就是美，

---

① 有关课程表引自乌厄伯威格：《哲学史》，第1卷，第132页。

② 《理想国》，第4卷，第202页。

③ 同上书，第5卷，第147页。

对公众有害的事就是丑。”此外妇女们将“把美德当衣裳”。<sup>①</sup>除了使受教育者能适于在一生中当好战士和统治者，体育的目的是要使人们无须求助于医药。因此，医生的首要目的不是治病，而是建立一种进行锻炼的医疗制度和对饮食进行监督，使疾病不可能发生。<sup>②</sup>

从10岁到13岁起教儿童读和写。从14岁到16岁起教儿童学诗歌和音乐。让青年人读的诗必须经过合格的审核人予以检查，因为“诗人和演说家对重大事件往往议论不当。”<sup>③</sup> 史诗和戏剧诗篇，甚至如荷马和希西厄德的诗篇也应予以禁止，因为这些诗把人们的感情引向歧途，亵渎神明。允许宣讲诸神相互杀伤的诗歌故事是不妥当的，也不应当让未来的统治者与保卫者受诸神主宰吉凶之说的毒害；将死亡和地狱描绘成可怕的事物也是不可取的；讲述英雄人物和诸神争吵的故事却又偏袒可鄙的说谎者也是不妥当的。凡足以引起娇柔懒散、心胸狭窄、举止不端的音乐应予禁止，只有那些“以最美好的方式摹拟稳健勇武之士的高昂与善良情操”的音乐才可准予流传，<sup>④</sup>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人们的勇敢和坚忍不拔的精神。音乐必须具有“真正美好而优雅情调的条件。”<sup>⑤</sup> 只有摹拟善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柏拉图说了一句时至今日也值得我们借鉴的话。他说，应当对艺术加以整顿和监督。因为他看到艺术在反映生活的同时也反过来指导生活。他认为艺术除了模仿性还应有选择性。它应当选择那些最能展现生活的主流与目标的方面。巴克告诉我们，<sup>⑥</sup> “柏拉图在说这话时，想必理解其深刻含意”，“让我写一个国家的民歌，我就不管制订法律的人是谁”。他确

---

① 《理想国》，第153页。

② 同上书，第9卷，第90—98页。

③ 同上书，第76页。

④ 同上书，第85页。

⑤ 同上书，第87页。

⑥ 同上书，第133页。

实有可能进一步把这话变成，“让我为一个国家写下正确的民歌，就没有必要找人去制订它的法律了”。

要教16岁到18岁青年以数学。如前所述，柏拉图的国家最高目标是要对善这个理念——即一个抽象的原则——作深入的思考和认识。因此，教育的伟大目的在于，培养抽象思维的习惯。要培养这种习惯就得通过学习数学，如几何学与天文学，因为只有这些学科才能表明事物的关系并激发起思维的潜力，<sup>①</sup>把人们从穴居引向光明。对青年的教育是由柏拉图按逐步对“理念”有所认识的原则和在国家中从事相应的实际活动而作出规定的。因此，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上升到最高的岗位，而其余的人则注定能起次要的实际作用。为此，第一轮挑选是对抽象思维能力做首次测试。<sup>②</sup>凡科学能力较差而具有勇敢精神的人可留作战士，其他<sup>③</sup>的人则继续学习到30岁为止。他们学习比他们青年时代早期还要精确而广泛的科学，通过各科学是整体的组成部分这种相互关系来掌握它们。然后再做第二轮挑选。不那么有前途的人就被派到实际公共事务部门中去工作。其余的人从30岁到35岁就学习“以坚毅和实践的精神进行推理术，除做适当的体育锻炼之外，别的什么也不干。”<sup>④</sup>然后，让他们掌握具有权威的职位直到50岁，并“管理有关战争和其他需要年轻人的地方的行政工作，以便使他们在经验方面不致落后于别的人。”<sup>⑤</sup>此后，他们终于取得哲学最高学位，即认识到善的理念。同时，为了这个城邦，他们每人轮流担任统治者，充实国家最高职务，负责监督整个政府。但是，在他们一生中后期，大部分时间是用来作哲学的沉思，最后，“在他们以同样的方

① 《理想国》，第7卷，第245页。

② 同上书，第245页。

③ 同上书，第248页。

④ 同上书，第8卷，第251页。

⑤ 同上书，第7卷，第251页。

式教育别人并留下象他们那样的城邦监护人之后，他们便离开自己的岗位，定居于幸福之岛。”<sup>①</sup>这就是柏拉图的信男信女为达到完美的境界所遵循的道路。这就是哲学家变成真正的城邦统治者所采取的方法。

这就是全部柏拉图乌托邦思想的终极目的所在。为了尽量达到认识善这个理念，就要尽最大可能做得和上帝一样。<sup>②</sup>《理想国》的作用就是要将人们引到这一方向。但是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这种思想境界。这些人借此高举理想主义和从事哲学研究，以期在这个国家树立正义。就是靠使少数人达到至善的境界，才能使好处反映到其他人的身上。因此，对柏拉图来说，施教的目的并不在于普及知识，而在于发现和培养超人。这种思想在19世纪再次复活，并表现为卡莱尔的“英雄”、叔本华的“天才”和尼采的“超人”。<sup>③</sup>那些能力较差的人将在筛选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天赋性格，而不要要求掌管国家大事，因为在柏拉图看来，那是一种对有能力的人的报偿，而不是“天赋权利”。他从来不认为广大的劳动者有资格去经受淘汰性的教育测验，而认为他们不适宜于享受这种微妙的幸福，并肯定他们正在做他们适合做的工作，从而对支持和发展天才作出了贡献，而这些天才将使他们幸福，使社会繁荣昌盛。只要每个人都坚守岗位，个人的幸福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而至善就会在这个有组织的国家中发扬光大。

就象我们有时看到的那样，柏拉图把哲学家作为统治者的想法，指的是最优秀的行政长官不仅必须具有实践经验和学识，以及适当的行政能力，而且必须能以高瞻远瞩的眼光看清国家的形势，具有洞察事物的能力和组织能力，并具有清醒的头脑，不受下层民

① 《理想国》，第252页。

② 同上书，第10卷，第339页。

③ 杜兰特，《哲学与社会问题》纽约1917年版，第46页。



众变幻莫测的思想干扰。

柏拉图试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乃是真理的现实性和真理的威力，这也是历代先知者和使徒们所主张的。他希望他心目中的智者寻求并掌握真理，使之成为人人所共有，借以使不完善的东西变得完善，使错误变为正确。他相信真理，认为真理能把国家治理好，认为人在幼儿时代就应沉浸在真理之中，以便他们成年时有丰富的知识，明确的目的，适于过一种由真理所支配的生活。

柏拉图是以有时称作厄拉斯<sup>①</sup>显圣来结束他的著作的。在书中他提出个人意志自由和个人责任的学说。他借助于熔象征主义、神话和天文学于一炉的描述教导说，尽管上帝为人的一生作了安排，可这一生是这样安排的：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一生的目的，因此同命运交织在一起，要对他个人考验的成功或失败负责。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他应当满足于并安于适合他的并由国家指派给他的岗位；但每一个人也是“他自己一生的监护人和他所选择的目的的达成者。”<sup>②</sup>因为“美德是自由的，人可以尊重她，也可以不尊重她；因此他也就可能多有一些美德或少有一些美德。”<sup>③</sup>责任在于选择者；他不一定能得到他第一次所选定的东西，但他可以做并一定要作最后一次的选择。

柏拉图的结束语是：“因此我的劝告是，我们要坚持上天的旨意，遵循正义与美德，这是因为考虑到灵魂是不朽的，能经受住各种善与恶。因此，我们彼此要亲密相处，对待诸神也应如此。我们不仅在此时此地要这样做，而且要象在竞技场中当优胜者四处收纳奖品时那样，当我们获得我们的奖赏时也应如此。”<sup>④</sup>

① 《理想国》，第10卷，第340—348页。

② 同上书，第347页。

③ 卢斯著《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柏拉图的〈理想国〉研究》衣阿华1899年版，第291页。

④ 卢斯译《理想国》最后一章，第10卷。

我们就会听到后世对柏拉图这些学说的反响。个人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的思想，放弃家庭生活和私人财产的思想，由少数经过挑选出来的人对全民进行伦理教育的思想，都对后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种思想在中世纪僧侣统治的国家中曾部分得以实现，在这种国家里僧侣对俗人而言所处的地位正如哲学家在《理想国》中对其他阶级而言所处的地位一样。这种思想在许多方面为后来的乌托邦和共产主义设想所仿效或反映。本文将就其中某些问题予以论述。

在结束柏拉图的讨论之前，我们可能要问：“他是否根本未给我们留下实现这一理想的一线希望呢？”答曰：“否。”因为柏拉图认为，理想城邦的概念具有力量去改造和塑造目睹过这个城市的人的生活，倘若他能在思索这一城市时适当地制约自己的话。<sup>①</sup>他要求在人间努力实现这一理想，并且正如我们已经试图做的那样，他还指明：通过采取特定的制度和办法以对付由于人类个性不同所引起的缺点，便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在柏拉图看来，社会不是漫无目的、不主动、冥顽不灵的群众或无数个人的集合体，而是一个有自觉性的东西，能通过它自己有意识的行动来指导和控制自己的形式与进程。他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丑恶，以便我们奋起并改造它。因此他把哲学看作是工具，而不仅仅是用以解释社会而是要改造它。《理想国》并非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充满着希望和启示。

下面我们将柏拉图同他的先行者希伯来先知作一简要的对比。我们记得，这些先知是赞成公平与正义的，也是理想国的构思者。在这样的国家里，上述优点是大家都具有的。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的感觉敏锐和心地公正并能明辨是非。然而，除了伊齐基尔之外，他们并不曾提出任何方法来帮助实现他们所预期的

<sup>①</sup> 《理想国》，第9卷，第315页。

国家。他们主要是布道者，因此尽管他们提出了种种美好的抽象理想并提出了忠告，但单靠理想化了的人类原则是不能有多大作为的。口头的和超验的社会重建法是很少能收到什么大的成效的，单凭劝告也难以完成改革。柏拉图在这一点上要伟大得多，因为他看到了制度的作用。他认为，社会重建必须有个确定的目标，而这个目标经过仔细筹划是可以很好接近的。因此他建议设立具有特定功能的制度。<sup>①</sup>他提出的具有系统性的教育制度便是一个例证。固然，先知们也相信灌输思想的重要性，可是他们并未提出任何使人们注意这些思想的方法，也不曾设法向民众经常灌输这种思想直到这些思想成为习惯心理。我们看到，柏拉图却为此作了准备。

通过优生方案，柏拉图证明有必要为理想国家建立一个健全的体质基础。身体健康要比虚弱多病的人有大得多的可能性去享受幸福和考虑行善。玫瑰在沙漠里也可能开放，但不会开得很好。可是这种思想从未进入先知者的头脑中。他们让幻想满天飞，空谈抽象的目的，可是从不想到改革方案。由于他们是宗教人士，他们便看不到（当今的宗教人士也仅仅开始看到）这一点，既要实现宗教和道德的理想，也要有按照实际情况对待老百姓的具体方法，而不是在对待一批受了感化或正在搜索一种模糊不定的目标的人，后者只不过是心花盛开、转瞬即逝的产物。

柏拉图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把他的思想或忠告强加于人。他的做法是，直率地阐明他的原则与方法，让读者权衡其利弊，然后决定取舍。考虑到人都有好恶之心和个性等不可否认的事实，他的计划无疑具有为人们接受的大得多的可能性。柏拉图触及到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

<sup>①</sup> 我们发现其他世俗的乌托邦主义者在这方面实质上与柏拉图意见一致。

## 第四章 早期现代乌托邦

### 一、早期现代乌托邦思想家以前发生的情况

奥古斯丁的《上帝城》问世后，在一段相隔近一千年的时期里，甚至连最少量而无足轻重的乌托邦著作的影子也看不到。这一千年构成这样一个时期：尽管这个时期充满了巨大的政治动乱和朝代更迭，尽管这个时期标志着那个巨大组织等级分明的教会的兴旺发达，可并不是一个有助于产生新的不同思潮的时期，也未对社会福利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当时，人们的思想对使人类或社会趋于完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比较说来是处于静止的状态。社会在酣睡中，阶级与弊端同时并存。可是人们对这些弊端熟视无睹。民众看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缺点，但没有什么东西激励他们去表达自己的思想。不时有人期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人类能以完美的姿态出现。可是他们唯恐会开罪于沉睡的世界，因此他们没有说出他们心中所渴求的东西。

然而，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叶一系列事件发生了。这些事极大地震撼了世界，以至在五百年之后我们仍然处于这巨大变革的阵痛之中。事实上连最浅薄的观察者也必须承认那时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掀起了层层波澜，并逐步形成当今席卷全球的浪潮。

这些伟大运动中的第一个就是十字军东征(1096—1273)。虽然东征主要是宗教性质的，但由于许多别的原因却有深刻的重要性。这些行动第一次显示了当时日益不安于现状的情绪与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从那时起一直指引着条顿民族对自然的开拓和人类思想的研究上取得了空前的业绩。它们引起了日后一系列的海上

发现，它们对丰富和发展欧洲的工业作出了贡献，并发动了后来引起许多具有广泛重要性问题的力量。然而，最重要的是，它们解放了思想，激发了人的心智和想象力。崭新的国家、风尚、制度与民族，使人们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视野。

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14世纪早期问世的《马可孛罗游记》——威尼斯人马可孛罗的游历事迹的记述。他曾出游中国，到过忽必烈汗王朝的宫廷，在那里逗留了许多年。他多次受命出使，大概还担任过一个省的巡抚，为朝廷服务了一个时期。这次旅行只是与亚洲日益增长的交往的开端。这些交往给欧洲带来了许多革命性的思想与发明。然而，在这个世纪中，这部游记使人们看到世界之大，文明的广袤，远方异乡的社会方式与结构，从而空前扩大了人们的精神视野。

另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可怕的瘟疫——黑死病。这种瘟疫于1347年首先在南欧地中海沿岸出现，然后在以后两年间蔓延到北方。据权威方面估计，由于瘟疫猖獗，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这就造成大批农奴的死亡；在许多情况下还造成某些世袭家族的整个消失。劳动力缺乏，迫使工资上涨。在许多地方，农奴们发现他们实际上主宰着广阔的庄园；各地的地主（封建主）几乎都逐渐认识到他们完全依附于劳动者，而这也是劳动者第一次看到的事实。下层阶级就象刚会飞的小鸟一样，开始认识到他们也有翅膀。黑死病促进了阶级分化的进程。从那时起我们看到阶级觉悟逐渐发展起来，并出现了公认的阶级利益。新的阶级正在从封建与庄园社会及其内部关系的解体中逐渐形成，开始对社会、工业和政治条件产生影响。大家对占有土地的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裂痕看得越来越清楚。这一裂痕使我们看到了社会的不安定现象。为了减轻这一痛苦，社会改革者从此忙碌起来，并构想出一个不存在不安定和矛盾的理想社会。与此同时，整个欧洲也正

在酝酿着许多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变得极其尖锐起来。掩盖声音的毯子一旦揭开，这种不满情绪就会在愤怒的争论声中迸发出来。在我们研究托马斯·莫尔时，我们就会立即看到这些问题在英国是什么样子，因为在英国这些问题是很突出的。

在创立早期现代乌托邦的过程中，具有巨大影响的另一事件乃是奥托曼土耳其人在15世纪初期向欧洲进军日益形成的威胁。这种威胁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达到了高潮。在此事件发生以前的五百年期间，希腊学者一向从东方移居西方。这些逃亡者携带许多西方学者毫无所知的古希腊经典作家和哲学家撰写的珍贵手稿。他们还带来了文化与研究精神、求知的欲望以及在人文研究中独立工作的热忱。于是，西欧便不期而然地接触到一大批新发现的知识。这就产生了真正的新智慧，一种对扩大人类知识范围和利用人类的能力去获取新的和更大利益的热情。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处在这个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支配之下。尽管民族特性在每个国家都影响到它的表现与发展方式，但它的大致轮廓却到处在这些方面呈现出极其相似之处：巨大的文艺生产能力、渴望冒险和新奇事物的心理、思想上的动荡不安和轻率从事的态度。不论在细节上有何差异，但在把这一切应用于解决哲学和社会问题方面大致上却差别不大。这是一种带普遍性的精神。

文艺复兴的突出方面在于，它再一次号召人们把思想用于改革问题的方式上。人文主义者不再致力于诡辩和无益的争论，而是对生活问题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致力于讨论人类的精神、思想和社会福利问题。柏拉图精神在这些人当中复活了。他们对他的感激之情是巨大的。他们从阿拉伯人口中很少听到柏拉图，因为阿拉伯人是不大关心柏拉图那种诗一般对待问题的方法的。但是随着学术的复兴，柏拉图在欧洲竟成为一种力量，一种对改革派和空想

派强有力的援助。而他的杰作则成了理想共和国的样板。

由于欧洲约于1450年引进了纸和印刷术，便大大加速了这种新学识的传播。这些新发明从亚洲引进时是很粗糙的，但逐渐得到了改进。但是，当这些东西达到完善的地步时，其实际应用便在当时强调知识的推动下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去。实际上这种新发明完全改变了学者的世界。它们使学者的劳动成果成为人人都可以得到的东西。有一位作者写道，“印刷术的发明<sup>①</sup>对16世纪的影响有如蒸汽机对19世纪的影响。”<sup>②</sup>它大大有助于传播文艺复兴所培育出来的知识。

然而，这一系列事件的最深刻影响乃是15世纪最后10年期间的远征，以及下一世纪由英国和葡萄牙探险家带回有关新世界的知识。这些发现与探险揭示了新的广阔陆地与海洋，这就使得人们以前所熟悉的天地变得微不足道了。在欧洲的西面，哥伦布首次发现了比已知的世界幅员更加辽阔的大陆。在欧洲的南面，瓦斯可·达伽玛发现了非洲，这个大陆原以为不过是沿地中海的一条狭长地带，后来证实的确是面积大于欧洲三倍的大陆，而且一直延伸到南半球诸海。在同一时期，还有哥白尼的发现，他首次发现地球的真正体积及其在无限的天穹中的正确位置。这些发现所作的贡献远远超出地理学和宇宙学的范围，它们倾向于使人们认识到他们以前的观点是多么狭窄，从而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新大陆居住着前所未闻、也未想到过的人种，天穹之下有新的世界。新大陆提供了可供思考的材料，因为世界上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事物，所以有必要对思想和理论作全面的修改。但是，这种变化来得太快了，人类事业的一切方面都得根据这些新的实际情况最终作出调整。

---

① 目前我们知道这是一次引进。

② 西德尼·李，《16世纪的伟大英国人》，纽约1901年版，第18页。

上述各种因素对那个时代和当代人的综合影响如何是可以想象的，但并不是很容易表达的。人类认为一个新的宇宙业已诞生，因而要制订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排除旧时代的不够完善之处。这种新文化对思想的激发作用，这种新的社会哲学降临到一个不满的世界，加上新大陆和新天体的发现，赋予人们以人类有可能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达到完美的境界。人类以往的巨大业绩使人们确信，要取得战胜兼具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自然力量，这样一种成就是可能的，尤其是已经掌握着一项好的计划和样板。人类受到了鼓励，要在人世间创造最美好的生活。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重新热衷于基督教的情景。这指的不是复兴基督教，因为没有这种必要。而指的是人们强调基督教比较真纯的方面。这就最终导致当时的另一次巨大变革，即新教徒的宗教改革运动。正当人们开始以较为清醒的眼光看待事物时，宗教界却已为沉重的迷信、腐败和世俗事物所束缚，因而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民的反抗。这种反抗自然倾向于渲染原始基督教的各方面。因此，我们便看到一种潜在于当时各种运动的微妙精神。这种精神出自上述两种文化，可也不完全属于其中之一。这种精神反映在当时的著述中。

继这种事件发生后，乌托邦式著述再一次涌现出来并茁壮成长，这是不足为奇的。唯心主义、空想、形而上学的猜测，全充满了要求改善当时人生活于其中的腐朽文化的热忱。这些思想表现在使人类变得完善的各种方案之中，表现在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答案中，其结果便展现出一幅幅完美无缺却富于理想主义的社会幻景。把远在海外的国家描绘是在已经改革的生产、管理、教育和宗教制度下生活的人们的居住地。我们不能企求这些乌托邦是对事实经过慎重考虑的产物，也不能希望它们全都能对解除社会的苦难提供任何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因为它们是在一个动乱时期、一个过渡时期构思出来的，当时社会的动乱在人们的思想中是以



狂妄的幻想和浪漫的虚构形式反映出来的。然而，任何人只要他愿意，便可以从这些陈腐的形而上学、神学或玄妙的废品中摄取丰富的内含。

尽管这些乌托邦思想都具有想入非非的特点，但它们都试图描绘出一个解放了的国度和人民。在那里不受人人为的事物和繁琐的形式主义的束缚，也不受愚昧、迷信、腐败与人为暴政的奴役。他们在没有极端严厉或明显的法律约束中生活，却生活在合情合理的和谐和秩序井然的气氛中。这些乌托邦思想家渴望回到人类当初的原始状态。他们是一大批后来著作家的先锋。他们认为，只有剥除一切旧的繁文缛节，回到自然，才能拯救文明。他们争辩说，若要完全改变生活或使之重新具有活力，只有对世界采取合乎理性的观点才有可能。只有理智的生活才能提供这种可能性。必须摒弃刻板的教条主义、天生的信念和迷信，采取一种合乎理性的观点，其基础乃是对过去历史的社会演变和对现时的人类思想和人类生活不受束缚的发展作认真的思考。

## 二、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

在这一新的学术探讨时代中，首先和我们有关的作者就是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爵士。他在他撰写的《乌托邦》一书中展示了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国家图景。这本著作远远超过了他的同时代和后来的同类作品。这不仅在叙述得娓娓动听与大胆方面，而且在深度和科学贡献方面都是如此。因此，它便成为所有这类著作所采用的名称，并成为人所共知的话题。这部书是莫尔成年时早期的作品。它是16世纪和以后若干世纪在社会和科学发展中起过不少作用的一批著述的首篇。

托马斯·莫尔于1478年生于伦敦，1535年死于绞刑架上（此

处疑为断头台之误——译注)。他是英皇亨利八世心胸偏狭与暴政的牺牲品，他的一生乃是一种古怪的理想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的矛盾混合体。他具体地反对他自己曾抽象地予以肯定的东西。他并不认为一个具有现成社会制度的现实世界能适应理想的政治要求，何况那些制度从未臻于成熟。这位年轻的人道主义者曾经历过发现新大陆的时期，读过亚美利戈·韦斯普奇的航海记，也受过牛津大学学术气氛的熏陶。当时，科莱特、伊拉兹莫斯、伦那克和格洛申都是学生，也是他的好友。莫尔在《乌托邦》中表达了这种对未来的期待和思想自由的精神。这时的莫尔和继沃尔西之后当上大法官时的莫尔自然难以有共同之处。因为，莫尔当大法官时是决不会想到要把他年轻时设想的改革方案在他所帮助治理的国家中加以实施的。可是他在当大法官时却表现出许多他当学生时就已表现得明显的特征。因为我们知道，他在伦敦塔被斩首是由于他犯了叛逆罪，在天主教问题上他与国王意见分歧，并拒绝对最高权威作低声下气的效忠宣誓。

然而，尽管如此，在当时的伟大学者和政治家当中莫尔占有崇高的地位，这却是无可争议的。他的上述友人都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有才干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当英国和欧洲的伟大思想家云集英国首都之际，莫尔还是国王的侍从和顾问。同时代的人在他们的著述中对他的才能称颂备至<sup>①</sup>。利利<sup>②</sup>甚至说“莫尔代表了文艺复兴人物中所表现的最完美的形象。他是他那个时代的真正产儿，深刻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新的启示，吸收了它的最高的文化，欢呼这个时代丰富多彩的生活，他的整个生命为真理所浸透；这些真理不限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各个时代的。”

---

<sup>①</sup> 见西博姆：《牛津改革家：约翰·科莱特，伊拉兹莫斯和托马斯·莫尔》，伦敦1887年版，第25页。

<sup>②</sup> 《文艺复兴的典型》，纽约1901年，第309页。

然而，他的天才的最强有力证据乃是他的《乌托邦》，成书于1515—1516年，当时莫尔大约是38岁。这部著作体现了一位伟大学者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和对社会问题的深刻研究。这本著作是在不满情绪高涨而很少有人对社会问题进行认真的理论探讨时期撰就的。革命势力在政治界、知识界和宗教界起了作用，但还未能集中他们的力量于发动一次象火山爆发那样的运动。然而，还是有零零星星的少数人预见到这种社会动乱的来临。这将是一场摆脱学究式的形式主义并以进取的姿态体现文艺复兴时代自由精神的运动。《乌托邦》这部杰作充满了微妙的讽刺、尖锐的批评、一触即发的幽默、明智的建议和智慧的闪光，以引人入胜的叙述形式充分表达了莫尔所属少数学者集团的最深刻的洞察力。它摆脱了这些学者在当时非常明智地指出的种种不足之处，提出在贸易、政治、社会生活和宗教事务等领域中建立新秩序的愿望。

《乌托邦》就象已经讨论过的所有其他乌托邦一样反映了当时的精神，这种精神有赖于文学的模式和环境。由托马斯·莫尔带头的人道主义者把希腊和基督教的文化因素结合在一起，并勾画一种既不是前一种骄奢淫逸的文化也不是后一种严肃苦行僧式的文化。莫尔的著作乃是从古典时代留传下来的基督教和非基督教文化的一种既稀奇古怪又引人入胜的混合物。柏拉图《理想国》对它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部古典作品成了后来大多数人为的理想方案据以构成的模式。它不仅提供了社会控制的方式，也确定了阐述的方法。莫尔在撰写《乌托邦》时也深受奥古斯丁《上帝城》的影响。对此我们可以肯定，因为莫尔很熟悉这一著作，他年轻时曾在格罗申教堂讲解过它。此外，从整个《乌托邦》可以窥见到耶稣教义对社会的影响。尽管全书贯穿着一条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的红线，《乌托邦》依然有很多首创和独特之处，因为这几位可敬人物所持总的观点还是大不相同的。正如古

思莱所说<sup>①</sup>：“柏拉图心目中有一个较一般的抽象目的，他力图阐明抽象的正义；莫尔则对眼前的实际问题感兴趣，并忙于制订计划以缓和现存的不幸局面。”我们知道，奥古斯丁的目的是要重建并加强庞大的教会组织。莫尔的著作则尤其关注他那个时期的具体问题。

这位 16 世纪初的英国哲学家与实际政治家不得不越来越把他的精力花费在考察造成阶级分化的形成、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贫困的积弊、教会和宗教的衰败的原因上。他把他的聪明才智用于设法防止、对付或减轻这些弊端。因此，在写《乌托邦》时，莫尔是抱有严肃的目的的，尽管他乐于在幽默面纱下掩饰既定的目的。这部书是对莫尔所处社会的控诉，也是对国家出现较好而又较公正的秩序寄予的热切期望。在书中他显示了一种超越他的环境和时代而看到一个较好社会的能力，这是我们在每一个时代中可以看到少数几个范例。他认识到他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好到不能再好的社会之中，因而提出一项消除这个不完美社会的动荡不安局面的计划。

然而，我们必须首先简略地探讨一下他对当时英国的批评和指控。这种指控是一个具有深刻洞察力、目光敏锐、审慎而且无所畏惧的观察家的作品，对产生种种流弊的原因作了正确无误的分析。这是有意识揭示英国社会弊端的最早作品之一。这种情况可以在这部书的第一卷中看到，它是第二卷的一种提纲或背景，却写在第二卷业已完成之后。<sup>②</sup> 生活在玫瑰战争之后不久，并在英国天主教会有所削弱的日子里，他对教士的贪污腐化、贵族和绅士的奢侈淫逸，穷人的悲惨处境和由战争造成的种种苦难表示愤慨不平。由于出现了诸种弊端，世界似乎处于解体与衰败的过程中。因此

① W. B. 古思莱，《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主义》，纽约 1907 年版，第 64 页。

② 莫利版《乌托邦绪论》。

他对产生弊端的种种制度加以抨击。

他首先谈到盗贼如毛、经常对盗贼处以极刑以及这种办法不能制止盗窃的情况。他首先阐明绞刑本身既不公允也对公众产生不好的影响。其次,就许多人而言,盗窃案件之多是出于无计另谋生路。“与其对盗贼实行严厉的惩罚,倒不如对每个人提供一些好的条件,让他可以谋生而不必冒生命危险去偷盗。”<sup>①</sup> 盗窃犯中有一半人可以成为诚实的劳动者,倘若他们有机会这样做的话。维持和发展工业可以为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这会是一个有效的医治办法。但是当局不采取这种办法,反而诉诸惩罚手段。但是,使用严厉的法律手段不仅制止不住小偷小摸,反而把他们变成了危险的大盗。既然没有再重的处罚可怕,他们便犯更大的罪,毫不犹豫地施用暴力手段。可见,这种制度是在不断地制作出最坏的不法之徒。

由于圈地制度,牧场增加了。这样就同样使从事盗窃的人数增多了。贪婪的贵族和绅士以及甚至是“那些圣徒即大寺院的主持,”<sup>②</sup> 都不满足于他们农场所缴纳的旧租额,通过剥夺佃农和地主的办法毁灭家宅、城镇和耕地并圈占土地作为牧场用来饲养他们的羊群,从而增加他们的利润。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以低价出卖家庭手工制品而又找不到别的工作可做,结果不是因偷窃而被绞死,便是以四处乞讨为生。<sup>③</sup> 此外,圈地不仅从劳动者手中剥夺其公有土地,从而破坏了他们可以挣点钱的副业,而且随着新耕种法的推行,可以用较少的人手耕种较多的土地。这有助于少用劳力,降低工资,增加利润,从而增加了失业、痛苦和不满。由于社会上有了这一大批闲散和半无法无天的游民,就得维持本来不必要的大

---

① 《乌托邦—理想共和国》,莫利版,伦敦1893年版,第61页。

② 同上书,第64页。

③ 同上书,第64页。

量士兵。他们在极端情况下便寻找格斗的机会。理由是“这样可以训练士兵精通杀人的技艺；或者象萨鲁斯特所说，这样可以使们熟能生巧，免得时间长了变得笨手笨脚”<sup>①</sup>。这些由懒散的士兵组成的大军又引起了广大失业群众的愤恨。

独占和抢先动手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安与工业失调。这种办法就是我们称之为“囤积”和兼并的做法。有钱的人贱买贵卖。这种无所不囤积的作法造成物资短缺——所有这些都是少数可恶的贪婪人造成的。

他绝对不赞成各阶层中的摆阔气的作风，因为这样做便加深了贫困与苦难。他反对赌博，因为他认为输家总免不了会去偷盗以维持生计。为了使王室富裕把硬币贬值，借口战争加重赋税而实际上却未用来打仗，故意将旧的或作废的法律修订以达到勒索老百姓的目的，无论是对犯法者的处分还是对那些不愿遵守税法的人课以罚金，所有这一切都是特权阶层和执政国王干下的坏事，这就使得下层阶级更加不愿臣服于傲慢国王治下的残酷而不公正的政府。何况，一个国王倘若象统治富有而幸福的臣民那样来统治一批乞丐，那毕竟不是多么光彩的事。“当身边的人都在唉声叹气而他一个人却享尽荣华富贵，这个人便是个狱卒而不是国王了。”<sup>②</sup> 宗教界人士犯了在俗人当中受到惩罚那种同样的罪，一时传为丑闻，教会自不能辞其咎。

莫尔还反对财产制度，尤其反对他所目睹的实施情况。弊端很多，“因为当每一个人都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头衔尽量搜刮，到头来不管一个国家如何富有，总免不了由少数人分得大部分的财富而使其余人陷于贫困……我认为除非消灭财产就不可能对物资进行公平的分配，这个世界也不能得到幸福的治理，因为只要保持

<sup>①</sup> 《乌托邦——理想共和国》，第6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80页。

财产制度，人类最伟大而优秀的部分就会忧心忡忡，仍然受到压制。”<sup>①</sup>金钱的存在象财产一样是一种弊端。因为它可能成为财产的一种形式，在少数人当中敛聚资财，并把他们和大众分隔开来，成为世袭的、无用的、受保护的一群。

人类福祉有害的现状受到全面无情的批评，不论是在教会、国家、工业或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如此，在透明的小说外衣掩盖下，他尖锐地讽刺一切弊端并指责所有应对弊端负责的人。社会并不需要惩处所有触犯法律者的严刑峻法，而是需要可以制止犯罪于未然的社会变革。个人犯罪大多是由于整个社会安排不当。

这部著述的乌托邦因素大部分见于第二卷有关描述乌托邦的章节中。在描写乌托邦时，莫尔紧紧摹拟英国的特点，它的首都阿马罗特几乎跟伦敦分毫不差。他描述这个理想共和国的目的是要把英国的习俗、现状和理想中的英国作一对比，倘若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并设立了可取的制度的话。乌托邦的生活正好跟英国的生活相反。然而，作者往往把这一对比留给读者自己去体会。读者可以从他自己对当时英国的政治与经济状况的了解中或者从他回想起书中第一卷所提的指控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就是莫尔选择这样一种方式以表明他所采用大胆讽刺之优点所在。它的另一特殊价值在于它是表述社会改革的理想和基本原则以及人类臻于完美的理想境界之媒介。

莫尔不象柏拉图那样从寻求逻辑原则开始，并根据这些原则建立起一个国家并一步一步地加以修建，而是设想他的理想共和国业已建成，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世界的概况，人们在其中生活和活动情况以及追求事业和乐趣的情况，从而加强对这部著作的生动印象。我们读到他的重建社会的计划时，对它的可能性有一种深刻的印象。我们感到这种计划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的幻想，

<sup>①</sup> 《乌托邦—理想共和国》，第85、86页。

对人类本能的智慧和能力具有信心，深深印上了人类世界向善论，倘若给予足够的推动力就可能实现。“文艺复兴时期的主人翁特点渗透了整部著作，赋予它以活力。诚然，莫尔并不期待立即有所变革，但他象在他之前的柏拉图一样，看到了一个国家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生活着。这一图景是如此生动，致使他坚信不移。”<sup>①</sup>他匠心独运地利用了亚美利戈·韦斯普奇游记来确定他想象中城市的位置，这城市位于这位著名旅行家的某些伙伴可能到过而别的欧洲人从未到过的地区。固然《乌托邦》是一种狂想，可是莫尔用这种方式加以描述，便使读者疑团顿消，从而将我们带进一个实际上存在的世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治理乌托邦的方法，那里的人完美无缺，生活在能产生完美成果的制度中。

莫尔的乌托邦思想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治理一个国家使之有助于社会福利事业。同时他认为，既然大部分弊病是属于经济和工业性质的，他提出的补救办法就主要是消除工业方面的弊病，取消恼人的繁文缛节。他的计划是一项重新改组社会的计划。

他的乌托邦计划的首要基本原则乃是财产公有。<sup>②</sup>我们还记得，柏拉图要求他的统治阶级那部分人的财产和妻室归公，作为摒弃只关注个人之事这一本性的措举，以便使他们有可能专心致志于公众的福利事业。莫尔一心想废除阶级差别，使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废除私有财产和建立公有制便成为实现要求平等和消灭犯罪的最可靠办法。莫尔比柏拉图进了一步，他要求在物质利益的分配上实行平等，以此作为不可或缺的基础，从而使全体公民在同样的程度上享有每一件最美好的事物——科学、艺术和各种实物等等。

莫尔的乐土并不是以欲望而是以蔑视欲望为基础。他想要把

<sup>①</sup> 斯卡德，《英国文艺界的社会理想》波士顿，1898年版，第76页。

<sup>②</sup> 《乌托邦》，第83—85页。



所有的人从总是首先想到我的和你的这种想法引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多数导致盗窃、忌妒与野心的机会消除掉，全体公民便会专心致志地去从事最好的工作。莫尔说<sup>①</sup>，“到处可以看到，人们固然在谈论共和国，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财富；但是在一个没有个人财产的地方，所有的人便都热心地追求公共利益。人们的表现彼此大相径庭，看到这种情况的确不足为怪；因为在别的共和国里，每个人都知道不管那个共和国多么繁荣昌盛，除非他自己照顾自己，否则就必定要饿死；因此他认识到照顾他自己的必要性而不去关心公共利益；但是在乌托邦，每人对各种事物都享有一分权利，所有的人都明白只要设法使公共的仓库装满东西，任何一个人就什么都会缺。因为在这些人之中没有分配不均的情况，因而没有穷汉，没有人缺什么；尽管大家都不占有东西，可是人人都很富足。因为，还有什么可以使一个人如此富足，以致他能过一种宁静愉快的生活，无忧无虑；他自己既不知道什么是贫穷，也不必为他妻子无休止的抱怨而烦恼呢？”

结果，由于财产公有，乌托邦人也就不使用金钱了。事实上他们宁愿要铁而不要金银；“因为人们生活中不能缺少铁就象不能缺少火和水一样；但是大自然并未标明别的金属有这么重要，是不可或缺的。”<sup>②</sup>人们的愚顽抬高了金银的价值，只是因为它们稀少，就把它们囤积起来，由此而引起社会的分裂。乌托邦人为了使这些金属声誉扫地，便用金银来制作各种低级器皿，并用它们为他们的奴隶和农奴制造镣铐或用以作为丑恶的标志。他们甚至强迫犯人佩戴金环以示惩罚。金质饰物是儿童的标志。他们一旦长大了，就把这种饰物扔掉，就象抛弃玩具一样。莫尔用强有力的讽刺斥责人们

---

① 《乌托邦》，第 162 页。

② 同上书，第 110 页。

过分夸大金银的价值的思想，并要求人们重视具有重要价值的物品。他指出，只要金钱失去了它的价值，人们的畏惧心理、提心吊胆、焦虑不安、劳累过度和日夜戒备等便都会一扫而光，因为那时再也不会发生因想拥有这“万恶之源”而引起的欺诈、盗窃、争夺、叛乱或变节等之类的事情了。人们将能献身于更高尚更美好的事物。

莫尔也认为，服装往往是在人民当中引起分裂与不和的根源，因此他的人民都穿同样的简朴的衣服。这种服装的特点是经穿耐用、为了掩身而不是为摆阔气。莫尔对外表的美和奇装异服几乎采取完全漠视的态度。甚至国王本人也无须用衣着或皇冠以示他与众不同，而只让人在他前面手持一束玉米穗来标明就行了。同样，高级教士的标志也是让人在他前面手持一支蜡烛。

为了表明乌托邦人是如何彻底地从爱金银、珠宝和华丽服饰的恶习中解放出来，书中叙述了从远方来访的一些使节的故事。由于不了解乌托邦人蔑视华丽服饰，他们来到时身穿五花十彩的礼服，并饰以金链、耳环、宝石，这就使得乌托邦人把他们当奴隶来看待。这个故事继续写道：“你可以看到那些孩子，他们已经长大了，看不上他们的玩具了，丢掉他们的珠宝了。他们轻轻地推着他们的母亲喊道：‘看那个带着珠宝的大傻瓜。他还象是个孩子呢。’他们的母亲却不在意地回答道，‘住嘴，我想这是大使的一个小丑罢。’”<sup>①</sup>

莫尔为我们描绘的这幅社会图景是任何幻想家也想象不出的最非物质化的社会了。在服装上、社会形式上以及几乎全部外表上都呈现五光十色的地方，莫尔宁愿保持一律朴素无华的生活。而这种思想却是在当时英国正处于五彩缤纷、以炫耀其生活富裕为荣的时刻出现的。

---

<sup>①</sup> 《乌托邦》，第112页。

大家都在公共食堂吃饭，固然这并不排除任何人从市场买回食品。但很少人这样做。“因为这样做显得可笑又愚蠢，没有人会放着一顿现成的丰盛得多的午餐不吃，而回家去做一顿不好的饭菜。”<sup>①</sup>妇女们坐在食堂的一方而男人们则坐在另一方。但莫尔向我们说明，这固然是为了进行社交与提高经济效果，其目的却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因为这是一种对青年进行道德教育并使大家都体会到什么是好事的办法。他天真地说：<sup>②</sup>“老年人和青年们混在一起。这样安排是要让年轻人和别人坐在一起，可以让年轻人和年长者共处一堂；他们说这是指定的，为了使德高望重的长者能约束那些青年，免得他们言语不当，举止失仪。”他又进一步说明如何在进餐时做文化上有益的事，<sup>③</sup>“午餐和晚餐一开始就向他们宣读一些关于道德的讲词，但是费时不长，不会使年轻人感到厌烦。此后老年人就借此机会向周围的人多讲些有益而有趣的事，但他们在就餐时并不只是自己讲而不让年轻人讲；相反，他们诱导年轻人交谈，以便在自由交谈中了解每个年轻人的精神力量和他的品性。”他们进餐时还听音乐。简言之，莫尔想在就餐时使人们在文化上和道德上有所长进。这正是充斥于他通篇著作中一种间接而隐蔽的乌托邦思想的表现。

莫尔的乌托邦理论的第二个基本原则是，一切政治权力都应集中于一人之手。由于他多半是个人道主义者，他便把专制的思想引入他完美的社会制度。他以都铎王朝的专制君主为样板，希望能有一个强有力的人来统治他的国度。尽管如此，他的制度还是含有某些民主因素的，因为他主张由人民代表选举国王，而国王也只有在为人民的前提下才能存在并进行统治。此外，经选举产

---

① 《乌托邦》，第 105 页。

② 同上书，第 106 页。

③ 同上书，第 106 页。

生的地方长官既没有阶级利益，也没有个人利益妨碍他们一心一意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进行选举和投票的工作。

立法也要慎重予以考虑。“他的政府的基本准则是：在国会首先经过好多天的辩论之后才可对任何有关公众的事务作出决定。”<sup>①</sup>

为了维持中央集权的效力，莫尔仿效柏拉图用城邦作为最完美的组织形式。他这样做无疑是由于城邦的某些特点很适合他的计划。城邦必须对日常生活细节进行周密而广泛的控制；这也是莫尔认为有必要的。他的城市在街道与房屋建设上显得极为井井有条。这种情况和他主张社会生活要具有机械般的准确是一致的。

莫尔并不想建立一个社会平等的国家。他并不主张自由。他渴望建立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这也是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所要求建立的社会。他承认等级差别，有国王、各级官员、教士、学者和普通老百姓。但职位的迁升不靠世袭而取决于所表现的才能，除国王一职外，所有职位向一切有雄心壮志、有能力而品德高尚的人敞开大门。莫尔的机会均等理论提出了一个迄今显然仍是正确的见解，因为除了在最先进的民主国家之外，大多数国家迄今仍未能予以实现。作为一种理想，它提供了最纯粹的乌托邦理论。

然而，由于莫尔采取了善意的专制政治，他并不象人们所指责的那样全然压制自发性，<sup>②</sup>而是留有让个人爱好和发展的余地。例如，每一个儿童在接受国家生活共同训练之后可以自行选择职业。

莫尔乌托邦理论的第三个原则是由国家控制家庭，以此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础，这主要是为了要获得健壮而又训练有素的后代。在这个问题上莫尔跟柏拉图和大多数共产主义作家分道扬镳

① 《乌托邦》，第95页。

② 见古恩莱上引书，第123—130页。

了。他们认为家庭对财产起辅助作用而且是它的堡垒。他们认为放弃财产就意味着毁灭家庭。可是莫尔却满足于对婚姻和家庭生活进行监督。这种监督在建立家庭之日起就开始实行。对他来说，婚姻是最神圣和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因此应当审慎加以管制。任何人不得违反。自然选择的规律必须由颁布法令加以补充。因此只有在当事人双方的身体健康情况获得保证之后才能履行婚约。理由是人们购买一匹马时还要详细了解它的健康状况，而娶妻时却只凭信任，这是多么荒谬呀。他不只是强调体质，还补充说道，“甚至明智的人也认为健康的身体对思想有不小的影响，这就可以肯定，可能有某种由衣服掩盖的缺陷使一个男人疏远他的妻子，可是到那时离开她就太晚了”。<sup>①</sup>

每个家庭限制在16口人以内，并由父亲管理。“妻子服侍丈夫，子女侍奉父母。总是年轻人侍奉年长者”。<sup>②</sup>不许一夫多妻，也不许离婚，除非有通奸或难以忍受的反常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可由国家解除婚约并允许受害者另行婚配。但犯有罪行的人是不名誉的，因而永远不允许再婚。但他也说，“有时已婚夫妇感到不太情投意合，他们互相同意离婚，可以另找一起生活得美满的人。”<sup>③</sup>但是没有元老院的批准便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准许任意离婚可能使已婚者失去信心。”<sup>④</sup>婚配应该完全受理智的支配。

乌托邦理论的第四个重要方面涉及他们的教育制度和灌输道德、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其他方法。他们的教育制度是全民的、终生的，在内容上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他们专心学习精密科学如算术与几何学。城市居民轮流派往农村去学习农业，“这样就可以使他们不犯错误，因为这些错误可能是致命的，使他们陷入缺粮的境

① 《乌托邦》，第131—132页。

② 同上书，第103页。

③ 同上书，第132页。

④ 同上书，第132页。

地”。<sup>①</sup>然而，除在农庄上学艺之外，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其职业或手艺。<sup>②</sup>此外，“他们的子女和全国大部分的人，不论男女，除工作时间外，都必须用于阅读，而且要终生坚持下去”。<sup>③</sup>那些在儿童时代就对文学有特殊才能和爱好的人可以完全免除劳动，以便他们可以专心致志于学习。

乌托邦居民兼有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乐趣。精神上的乐趣在于知识以及对真理的沉思所带来的喜悦：此外，还可以心情愉快地想到自己没有虚度一生，以及对未来的幸福生活有了保证！<sup>④</sup>肉体上允许享有的乐趣在于能导致人们日益健康并且允许人们按照自然的规律去生活。最有价值的乐趣是精神上的乐趣，而肉体上的乐趣之所以有价值则主要在于它能对精神作出贡献。然而，乌托邦人并不接受那些认为美德就是排除一切自然欲念、禁欲和根除自然本能的苦行观念。他们对各种欲望要求得到对身心都有益的满足。一切为了幸福，而这是一种包括其他人幸福在内的概念。他们所称道的幸福是指为了长远的快乐而推迟眼前的快乐，为更大的快乐而牺牲较小的快乐，把国家所有的幸福遍施于个人。乌托邦人认为，将公众利益置于个人私事之上是一种爱国的表现。他们认为，一个人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乃是获取最高形式快乐的一种方法。这是因为“他感到他做了好事，他想到那些对他感恩戴德的人给予他精神上的快乐大于其肉体在自我克制的情况下所可能获得的快乐。”<sup>⑤</sup>快乐并不在于满足肉体的欲望，而是按照开明理智的旨意行事。这就包括了一切善良、诚实和合乎道德的行为，也包括在将来永远不会做危害他人之事——这确实是

---

① 《乌托邦》，第 91 页。

② 同上书，第 96 页。

③ 同上书，第 114 页。

④ 同上书，第 122 页。

⑤ 同上书，第 118 页。

一个崇高的理想。

为了激励人们为同胞的利益而过明智而有道德的生活，他们公开授予这样的人以荣誉。他们为这些对国家做过好事而受人尊敬的人树碑立传以资纪念，把他们的雕像树立在广场上来永远纪念他们的业绩并用以激励后代学习他们的榜样。<sup>①</sup>

为了开展这一广泛的教育运动，提高每个人的文化水平，莫尔希望每人一天只工作六小时。人们不能象牛马那样拼死拼活地从早干到晚，因为这比奴隶所处悲惨的恶劣处境更糟。<sup>②</sup>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只要把房屋建造得坚固耐用，将衣服做得结实耐穿而不是徒有其表，就可以大大减少建筑工人和成衣匠的劳动。一切奢侈的东西都在禁止之列。每一个生活在乌托邦中的人都得工作，因为那里实行的是强制性的全民劳动。妇女和大部分男人和教士都从事有益的工作。所有的人都要从事某种工作并学会某种手艺。男女之间按性别的不同实行适当的分工。妇女体力较差，就分配比较轻松的工种，如织羊毛和亚麻的工作。不让人当乞丐，因为在莫尔的社会里将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在蜂房里是没有寄生虫的，在那里也无有闲阶级，不论是乞丐、行乞的修道士、酷爱游猎的绅士也罢。因此，倘若每一个人都完成了定时的的工作，就会有足够的东西来满足该社会物质上的全部需求。那么，其余的时间用来做什么呢？可以专门用来处理国家事务、增进思想的自由和发展，从事有益于健康的娱乐活动。他主张实行短的工作日，使劳工们从条件恶劣的苦役中解放出来，从而有机会学习文化和自我改善。<sup>③</sup>乌托邦提供了许多这样的机会。

此外，由于认识到人们的思想与道德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取

---

① 《乌托邦》，第134页。

② 同上书，第97页。

③ 同上书，第97页。

决于他们的健康情况良好和环境的优越，这座城市就没有狭窄、弯曲、坑坑洼洼的街道，低矮、肮脏不堪的房屋，象莫尔所熟悉的伦敦那样可怕的不卫生情景。在乌托邦中，一切都是实实在在而又合乎卫生的，各方面都有助于增进身心的健康。<sup>①</sup>因此，由于这种教育和健康的生活，便消除人类犯罪和苦难的最大根源——无知。乌托邦制订的法律为数甚微，因为对人民施之以法是违反一切权利和正义的，何况象这样的法律多得人家都看不过来，而且又隐晦难懂哩。

最后，乌托邦的居民厌恶战争，认为那是一种极野蛮的行为。“和几乎所有其他民族的想法相反，他们认为没有比通过战争赢得的荣誉更不光彩的了”。<sup>②</sup>莫尔提议战争应当通过刺杀敌方领导人来进行；倘若这办法失败了，可以代以在敌人中制造怨恨与不和的办法。作为最后一手，可以雇佣邻国人当兵。乌托邦人只愿意参加自卫的战争或保护友方免受侵略的战争。即使如此，他们对待敌人方面也是宽宏大度而又合乎人道的，尽管他们在战斗中很勇敢而又机智，直到取得最后胜利。他们认为狩猎也是一场最卑劣、最可耻而又可憎的大屠杀。

莫尔的第五个广泛而又明显的乌托邦因素就是宗教信仰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他认为应取宽容的态度。乌托邦人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纯粹的多神论思想。他们“崇拜一种永恒的、看不见的、无限的而又难以理解的造物主。作为一个远远超出我们理解力的神祇，它的影响遍及整个宇宙，这并不是由于他肉体上硕大无朋，而是由于他的威力与美德。他们称他为万象之父，并承认万事的起源、增长、进程、变化和归宿都只能出自于他，而他们也只赋予他以神圣的荣誉称号。诚然，尽管他们对其他事物的看法

① 《乌托邦》，第 93 页。

② 同上书，第 138 页。



有分歧,但在这一点上却意见一致,即认为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创造并主宰着这个世界。<sup>①</sup>然而,尽管对这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态度各不相同,但他们认为这样做对宗教本身有好处。由于他们对宗教的信仰是通过理性而不是通过神启示所得出的结论,认为理性不久就会确定那些信仰是虚假的,真实宗教本身的力量也就会大放光彩。<sup>②</sup>他们坚信,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真理的内在力量将占居上风,倘若不为诉诸暴力和动乱所否定的话。至于哪一教派最好,在他们当中并不存在顽固的斗争与无用和激烈的纷争,因为这些争辩往往会破坏友谊并引起帮派活动。他们认为,应当允许每一个人持有自己的信仰,只要这种信仰是积极的。但不让无神论者参与对国家的管理工作,因为他们认为这帮人肯定会蔑视一切法律和风俗习惯,而且基本上是一些抱有卑劣而肮脏思想的人。<sup>③</sup>可是除此之外他们并不惩罚无神论者和不信神的人,“因为他们有这样一则格言:人不能随心所欲地使自己信仰任何东西。他们也不用威胁的手段强迫人们掩饰他们的想法,这样就不会诱致人们去编造谎言或掩饰他们的观点。因为这样做就是欺骗,是乌托邦人最厌恶的东西。”<sup>④</sup>因此,对各种宗教观都持宽容的态度,只要不具有明显的反社会性质。的确没有一本书在宗教宽容的伟大学说上比《乌托邦》阐述得更充分有力的了。道德的基础得到了适当的保证,而在另一方面,乌托邦的每一个人都不受阻碍地信仰适合其特性的宗教。理性这个仁政的唯一试金石证明没有别的规定比这更合理的了。哪里不强迫人民信仰某种宗教或压制某种宗教,哪里就不用害怕派别斗争和由此而引起的反社会后果。

莫尔宽容精神也延伸到科学领域。这种思想即使在 20 世纪也

---

① 《乌托邦》,第 149 页。

② 同上书,第 151 页。

③ 同上书,第 152 页。

④ 同上书,第 152 页。

是不常见的。这种乌托邦理论的最重要而独具特色之点就在于它毫无畏惧地相信自然法，并对宗教怀有深切的信念。乌托邦人并不怀有愚蠢到担心科学也许有朝一日会同宗教发生冲突的地步，因为他们看到，倘若宗教确有真理，那就不会跟大自然发生冲突，因为二者均系同一奠基人所制定，必然是和谐一致的。以科学反对基督教或任何其他信仰为由而闭眼不看事实，那就无异于打一场毫无胜利希望的战争，其前景可能是有害的而不是好的。<sup>①</sup>因此他们把科学研究看作是宗教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与之相对抗的东西。

这种美好的宗教自由观念在公众的宗教活动中得到了赞许。这些活动是这样进行的，即每个人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思想感情随时参加活动并继续景仰上帝，但兄弟情谊却显得非常浓厚，所以大家认为参加礼拜以前做礼拜的人要是事先不净化自己的思想而心怀愤懑或仇恨，那就是对神明的不敬。所有的人都身着白衣聚集在雄伟的庙堂里。庙堂内部光线微暗，香烟缭绕，正好让人们静心做礼拜。我们都爱听教堂的音乐，因为所有的音乐，不论是声乐或器乐都用来模仿和表达种种感情，非常巧妙地适应各种场合，不论圣诗的主题是欢畅的还是用来抚慰心灵或表达苦恼或自谴心情的，这音乐都能表达自如，起着陶冶性情、修心养性的作用。”<sup>②</sup>莫尔在四百年前就已经懂得音乐的乌托邦性质和作用。他们以一组词语为祷文，“这些祷文的内容既可适于在集会上宣读也同样适应每一个人特定情况的需要。”<sup>③</sup>他们的礼拜形式是统一的，也允许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满足他的精神上需要。那些具有个人特点而不属于大众信奉的宗教仪式则由个人在家私下举行。最后，他们的宗教具有这样一种特点，即赞扬对社会的服务工作，认为这

---

① 西博姆著上引书，第 355 页。

② 《乌托邦》，第 181 页。

③ 同上书 181 页。

是宗教的一种表达形式。<sup>①</sup>在宗教方面，宗教改革运动的各种言论已开始有所耳闻，人们也逐渐开始了解新约的本来面目。

莫尔通过这些方法使宗教不致成为社会分化成阶级的根源，让派别分歧的顽固路线割裂开来，而是使之成为一条社会团结和四海一家的纽带——一种为实现个人完善和社会进步的真正力量。这可能是幻想，但这也正是我们这些20世纪的人想要实现的幻想。

因此，我们看到，莫尔并未这么坦率地把他的乌托邦思想提出来，但实际上已作了大量而详尽的陈述。从那些使人卑躬屈膝的制度开始，他试图加以脱胎换骨的改造或全部予以废除，因为他认为表面的修修补补是无济于事的。他寻根究底，追本溯源，一经抓住要点就以之作为可靠的社会制度结构的基础，或以之作为健全而产生实效的理想。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教育人民，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之间臻于完美的境界。他的乌托邦思想是一种要求对社会进行大规模合理改组的不可避免的产物。无可否认，他超越了他的时代达好几个世纪。事实上他的大部分理想在本世纪也仍然的确以别的形式为人们奉为对社会预测的最高典范。

### 三、弗朗西斯·培根《新大西岛》 中的乌托邦思想

在莫尔的《乌托邦》问世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乌托邦的著作。这种沉寂空气是在英国由沃如兰姆男爵弗朗西斯·培根以其富于独创性的《新大西岛》未完稿打破的。他没有完成这部著作，但遗稿已足以表明他的思想实质，并表明他如何将他的思想精华应用于社会科学。

<sup>①</sup> 《乌托邦》，第145—155页。

弗朗西斯·培根是掌玺大臣尼古拉斯·培根的儿子，1561年生于伦敦。象莫尔一样，他曾准备当牧师，却被培养成为律师。与莫尔不相同之处是，他就学于三一学院，而不是牛津。他本人当过英国的大法官，是莫尔的继承人之一。他的一生是优柔寡断与宏图大略的古怪混合物。作为一个身居要职的人，他不惜降低自己的身份去干最卑鄙的勾当，在和别人交往中做过各种违法的事。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能捞到钱他就进行欺骗，同时又以诚实坦率的面目出现。在处理人事方面，他同样是个可怜的不得意的人。但是他那不幸的两面派政治生涯于1621年突然宣告中断，他在被控受贿和舞弊之后，承认了罪行并被解除了大法官的职务。他被判处四万英镑的罚款和终生监禁，但国王赦免了他。就这样，他很不光彩地被从伦敦赶了出来，隐退到他在圣奥尔本斯故乡的家里。<sup>①</sup>他在那里以其余生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哲学探讨和科学研究。<sup>②</sup>他隐退期间取得的成就表明自己是个真正的伟人，很少有人超过了他。《新大西岛》就是在这个报应和沉思的最后时期于1622年写成的作品，<sup>③</sup>因而也是一个老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的作品。而《乌托邦》则出自一个还没有经历过上层社会生活的折磨与失望的年轻人之手。培根卒于1626年，享年65岁。

在16世纪英国的知识界中，培根无疑仅次于他的同时代人莎士比亚。在思想上，培根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典型产物。他对学术的兴趣涉及到当时的每一个论题，而他的著作也触及几乎所有的学科。他同时是历史学家、散文家、法学作家、逻辑学家、哲学探讨者和论述几乎每一门学科的作家。他对每一门学科都抱有同样热切的好奇心和有效的洞察力。

---

① 西德尼·李著同上书，第235页。

② 在勒《培根》，纽约1851年，第23—24页。

③ 库什曼著《哲学史》，第2卷，波士顿1911年版，第41页。

《新大西岛》是培根为准备撰写他那体现他科学方法的《新工具论》一书而进行的研究工作有关的伟大副产品。在这部著作中，他幻想出一个《新大西岛》。这是一个自由和正义之乡，在其中建立起可以实施他在《新工具论》中论述的种种制度和原则。托马斯·莫尔是文艺复兴运动中人道主义阶段的代表，他强调多神论，承认所有具有理智的人享有平等的社会权利；而培根则是文艺复兴运动中自然科学阶段的代表。在这个阶段里，思想家们已开始认为人类的最终复兴和臻于至善的境界，主要地并不是靠对财产法的改革或社会革命，而是靠科学进步和以科学精神来管理人类生活。“培根的《新大西岛》以近乎浪漫主义的热情宣告唯有科学方法才是人类登上完美生活境界的唯一阶梯。”<sup>①</sup>它的到达乌托邦的新方法是借助于知识和发现以重建社会。培根具有并表达了他那个时代的信心，认为只要掌握了自然奥秘的钥匙，奇妙的事物就会展现，而且对人类来说没有做不成的事。正如每一个感觉到自己就要跨入新纪元的时代都要写一部乌托邦一样，培根撰写了《新大西岛》。在这部著作里他表达了他对卓越的世俗科学的乐观主义看法。人们借助于实验科学支配着许多事物，“因为只有顺从自然才能主宰自然”。或者用杜兰特的话说<sup>②</sup>：“培根说，我接受它（指大自然），但只是作为原料。我们要倾听大自然的话，可那不过是为了要了解她懂得哪种语言。我们遵从的目的是为了征服。”他深信，倘能恰当地运用卓越的才智，就可以彻底改变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使自然界的奥秘展现在眼前。

培根的乌托邦理论在于集中论述科学和知识的力量，但却有少数其他因素要求我们予以优先注意。从该书的精神我们可以看

---

① 李著同上书，第252页。

② 杜兰特，《哲学与社会问题》，纽约1917年版，第76—77页。

出，建立政权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民的幸福。<sup>①</sup>国王应靠他的才能和品德治理国家。一个国家应在很大程度上能自给自足。这种说法反映了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思想。必须密切注视外来的影响，以免本国居民受到腐蚀。

对培根来说，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单元，整个社会组织就建立于其上，因而他颂扬家庭的职能。<sup>②</sup>他用了多种特定的仪式来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其中之一就是由国家发起并付资以举办家庭宴会，对那些至少有30个3岁以上目前还健在的家庭成员的家长表示祝贺。这家的家长从此佩带由国王颁发的奖章。这种宴会主要带有宗教性质，内容一部分包括唱圣歌、祈祷和祝福。同时也借以调解家庭成员之间的小纠纷，教导家庭成员要有道德、虔诚、爱国和服从。从社会观点出发，它强调了三个主要之点。第一，详细讲述了家庭团结的原则，强调不应成为一个因缺乏团结的精神和适当的权威而破裂的家庭。在举行仪式时就从家庭成员中选出一个日后在父亲居室同父亲一起生活的儿子，以便一旦父亲去世就接替父亲以主持这个家庭。第二，树立起建立大家庭的思想，因为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人能比当一个“大家庭之父”更光荣的了。那时的世界还没有受报酬递减说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干扰。第三，与所有早期的世俗乌托邦不同，除了为寄宿学校学生所设的食堂外，没有公共食堂。家庭成员每天在自家的餐桌上相会，因而密切了家庭关系。<sup>③</sup>

在对婚姻关系的论述中，培根尖锐地讽刺当时的社会道德规范。他指责他们把婚姻只当成对非法荒淫行径的一种补救办法。婚姻在欧洲“不过是一种地道的买卖而已。人们在这种买卖里就

---

① 《新大西岛》，摘自《理想共和国》，第188—189页。

② 古恩莱著同上书，第185页。

③ 为了进一步探讨，可参阅原著192—194页。

是企求获得家族之间的联合或财产、名声和某种(几乎采取淡漠的态度)传宗接代的要求”。<sup>①</sup> 婚姻在男人当中也似乎未必产生多么大的好影响。“他们留连于放浪形骸的场所或浪迹于名妓之间，已婚的男人不见得比单身汉受到更多的惩罚。当时腐败的喜新厌旧的习俗和淫荡拥抱中的乐趣(在这种活动里，罪恶变成了艺术)，使得婚姻黯然失色，甚至成了一种多余的负担或压力”。<sup>②</sup>

培根想使婚姻成为一男一女真诚的联姻，<sup>③</sup> 贞洁而清白，因为“他们常说，无论什么人不贞就不能自重”<sup>④</sup> 而且结婚的目的是向国家提供身强体壮、智力发达的后代。任何危害社会利益的婚姻就会被禁止或受到社会的非难。培根反对莫尔检查和选择配偶的办法，即“男女双方在订婚之前允许裸体相见”。培根说：“他们不喜欢这样做，因为他们觉得经过那么深的交往之后再拒绝成婚是不得体的，但是对于男女身体上隐藏着缺陷，他们有比较文明的办法加以检验，因为在每个城镇都有一两个水池(名亚当夏娃池)。在那里可以让男方的一个朋友和女方的一个朋友分别去看他们裸浴。”<sup>⑤</sup> 这样，莫尔和培根便都在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上摸索着人种改良的理想方法。

使《新大西岛》一书负有盛名和具有最大价值的乌托邦因素，在于它描述了一个伟大的“称作萨洛蒙之家的学院”，由一批自发的、有学识、有才能的人组成，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一起工作——“世上最崇高的机构，这个王国的明灯。”它的目标乃是通过实验、研究和旅行，掌握知识，通过调查大自然和人类的生活方式以丰富世界的知识宝库，发现能使人类走向幸福与进步的真理和原则。培

① 《新大西岛》，第198页。

② 同上书，第198页。

③ 同上书，第198页。

④ 同上书，第199页。

⑤ 同上书，第199—200页。

根试图描绘一个想象中的学院。它应该是为了解释大自然，写出伟大而出色的著作，以造福于人类的目的而建立的。培根使萨洛蒙之家的主持人对这个学院的作用作了如下的描述：“我们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了解事物的根源及其奥妙的运动，扩大人类王国的疆界，使所有可能做的事情都能做到”<sup>①</sup>。据此，我们认清了培根这个文艺复兴时代学者的个人信念和理想。他看到了人类舒适生活的理想境界，要求人们系统地运用知识并利用科学控制自然这一理想成为可能。他和他同时代的人认为，靠科学的物质文明进步以提高人类社会的水平可以医治一切社会创伤，使之不再受忧虑和贫困的苦恼。一旦发明、研究和实验成为人类明智地加以运用的艺术，变革的可能性将会多么大啊！这种对自然伦理所起的反作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当独裁的、超自然的宗教约束力正在渐渐变得软弱无能并为人们所抛弃时更是如此。人们感到只有依靠思考、研究才能消除社会弊端。用屠格涅夫的话来说，对他们来说“大自然并不是一座庙堂，而是一座工场，”而乌托邦思想家就是用这个工场的材料建造起来的。

当然，培根的思想有许多东西是异想天开的。例如，打一些深入地下达 600 呎的洞，可以在洞中“冷冻和保存尸体”；人工制造新金属；<sup>②</sup> 用于气象观测的半英里高的塔；<sup>③</sup> 用一些意想不到的化学发明，通过象沐浴疗法和空气疗法那样的特殊变化来消除疾病，延长寿命；<sup>④</sup> 在果园里培育出新的花卉和水果来增进人类的幸福。“我们特意培养了许多花果，使之用于医药”。<sup>⑤</sup> 在动物和鸟的身上作活体解剖，以使用以检验毒品的效力和进行新的外科手术，从而

① 《新大西岛》，第 202 页。

② 同上书，第 202、203 页。

③ 同上书，第 203 页。

④ 同上书，第 204 页。

⑤ 同上书，第 205 页。



扩大生理学方面的知识。<sup>①</sup>还设立了这样一个机构，其中如魔术技巧或招魂术，以及魔鬼般影象等使感官造成错觉的种种手法都搞得天衣无缝，然后传授给那些要走向社会的真诚学生，并通过他们的施教以防止头脑简单的人受庸医和骗子的蒙蔽。<sup>②</sup>他们对疾病、瘟疫、地震、气温和某些其他事物也都进行诊断、预测，并对人们应如何预防这些灾害和进行事后补救提出劝告。总之，学院本身的整个目的是旨在改善社会的物质状况。

萨洛蒙之家是由一些研究员和有才华的学者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管理着，他们是岛上真正的贵族。这些人进行实验，设计具有哲理性的发明，作研究工作，并尽力协助名副其实的民族福利事业。他们每隔12年就派一些人去国外学习其他国家的事务、改良措施和科学，在那里待到12年后，由派出的下一批人来接替他们。这样，他们回国时就带回许多书籍、图样和工具以及各种思想观点，以利于有效地利用他们所收集到的情报。培根以一个居民的口吻说道，“你看，我们是在进行一种贸易，但不是为了黄金、白银和珠宝，也不是为了丝绸、香料或别的什么商品，而只是为了取得上帝的第一件创造物，那就是光明。我说，就是要取得照亮全世界成长之光。”<sup>③</sup>这句很说明问题的话显示出作者的精神和崇高的宗旨。通常，有伟大发明创造的人都获得在家里树立塑像的荣誉，并获得优厚的光荣奖金。

培根的社会不是建立在财富共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知识共有的基础之上的。它是一种让所有成员都能尽量享受社会福利的共产主义。<sup>④</sup>而且它在某些地方与柏拉图的共产主义相似，即由少数有哲学修养的人来引导未受过教育的多数人。

---

① 《新大西岛》，第205页。

② 同上书，第210页。

③ 同上书，第191页。

④ 古恩莱著同上书，第16、17页。

在《新大西岛》中培根阐明了社会意志的影响，有意识地指导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任何人民或任何民族通过把一部分物质资源用于科学工作、研究、探索和哲学探讨，就可以使其获得进展并取得预期的效果。愚昧、黑暗、带有偏见的无知乃是社会万恶和人类苦难的根源。社会的希望在于将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解释的方法加以重新改组使之为社会的目的服务。一旦发现了真理，人类就会得到自由。培根还认为，这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们将不断获得自由。引用李的话来说，<sup>①</sup>“他不相信有任何限度是经过澄清和提炼的人类智慧所不能逾越的。他争辩说，不论我们认为我们在知识或科学方面已经取得多么大的进展，总还是没有尽头。不过在我们现有视野之外的领域将会在某一时期进入纯净的理性探讨范围。对人类思想可能完成的业绩来说是无边无际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产儿也曾有过同样强烈的信念，但从来没有人象培根那样如此强调过。”

当我们披阅《新大西岛》一书时，另一个乌托邦式真理突现了出来：我们想做一件事，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就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不过既要在目的上也要在方法上下狠工夫。顽强的目的性受到经精心组织的文艺和科学知识的支持，并辅之以极大的坚忍不拔精神，我们就有可能做好一切事情。

然而，有一件事却是培根和他的同时代人所未能象我们今天这样理解得清楚的，即光靠科学和知识是不能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的。在过去的四个世纪中，我们推出了一项又一项的发明，但这只能扩大各阶级之间的裂痕。因此，自然科学家还必须是一个社会哲学家，把他自己的工作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以便使他的工作一般能有助于人类福利和社会进步。为科学而科学是要遭到诅

---

<sup>①</sup> 古恩莱著网上书，第240页。

咒的。杜兰特<sup>①</sup>曾对人格化了的科学成果作过恰当的描述：“科学在其能够真正为人生服务之前，必须受某种思绪的启示，使之和人类的目的挂上钩，因为，没有哲学作它的目标，科学只不过是一个常见的孩子，他拆开了一只平平常常的表，结果只能把表搞坏。”

#### 四、康帕内拉和他的《太阳城》

康帕内拉是培根的同时代人，就在培根写他的《新大西岛》的同一年(1623)撰写了他的《太阳城》。他是意大利人，1568年出生于卡拉布里亚省的斯提罗城，1639年去世。同莫尔和培根一样，他一开始也是打算献身教会的，不过和他们不同的是他一直求学直到他最后成为多米尼克教会的修道士。他既是僧侣，又是哲学家，又是大学教授，<sup>②</sup>又是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他在年轻时就流露出迫切的求知欲望，终于使自己成为他那个时代最知名的哲学家之一。他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将实际事务的知识与细致入微的哲学洞察力和敏锐的形而上学观结合起来。

当我们着手研究托马斯·康帕内拉时，我们的视线就从北欧转到了南欧，从英格兰转到了意大利；即从文艺复兴运动直接沿着哲学和社会的路线进行理论探讨这一方面，转到一个几乎完全受新学问所渲染的文化和艺术环境中去了。不过，在前一时期南欧也受到了社会上不满情绪和反社会理论的影响则是不足为奇的，尤其是考虑到资本主义政权在那里出现得很早这一情况；然而社会骚动还没有频繁到足以引起暴乱的地步。这无疑是由于在北欧的社会改革企图遭到灾难性失败的缘故。宗教改革运动把事情搞得

<sup>①</sup> 古思莱著同上书，第83、84页。

<sup>②</sup> 曾任教于比萨与帕杜亚大学。

乱七八糟，反变革运动也就象通常那样发生了。激进的鼓动者被当作国家、教会和文明的敌人。这种结论似乎已为洛拉底和在波希米亚的胡斯派运动以及类似的暴动证明是正确的。但是，随着17世纪的到来，又再次掀起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兴趣，并且未能加以扑灭。这些问题又与宗教和经济问题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典型问题掺合在一起，便促使一批杰出的人物做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因为此时意大利，除哲学家康帕内拉之外还产生了伽利略的前辈：布鲁诺、泰利塞尔斯、博丁、卡达莫斯、帕特里厄斯、政治哲学家格劳秀斯和医学创始人帕罗塞尔萨斯。<sup>①</sup>但是在这个学者队伍中，康帕内拉是一位最富于理想主义而又最坚定的社会革新家。即使他那个时代的人把他看作是激进派，他对当时的政治问题却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我们现在所说的激进思想促使他参与了反西班牙统治的卡拉布里亚起义，这就导致西班牙宗教法庭对他进行攻击。他被指控写了他事实上并未写过的事和并未持有的观点。他7次遭到审判，并怀着坚定的信念经受了极其严酷的拷打。此外，他在狱中经受监禁和折磨达27年之久。他就是在监禁期间写出这部富于政治和社会理想的《太阳城》的。

最后康帕内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他前往罗马，在那里他由不赞同这种持续暴力迫害的教皇厄本八世保护起来。但他最后还是被迫离开了罗马，装扮成作法国大使的仆从逃了出来。在法国黎塞留成了康帕内拉的好朋友。法国国王赐予他3,000里佛作生活补贴。索邦神学院确认了他的著作的正统性。他在巴黎的多米尼克教会的修道院中去世，享年71岁。<sup>②</sup>

尽管康帕内拉是个修道士，但他既不受传统模式的思想 and 哲学的迷惑，也不为他那时代的政治所愚弄。康帕内拉有一次说，“我

<sup>①</sup> 古恩莱所著同上书，第137页。

<sup>②</sup> 考茨基：《社会主义的先驱》，第2卷，斯图亚特1895年版，第477、478页。

生来就是要同暴政、诡辩和虚伪这三大恶行斗争的”。<sup>①</sup>他把他广博的知识献给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新时代——一个紧接文艺复兴的发明和影响之后的时代，一个因而引起人类思想解放的时代。康帕内拉起初是对这些是持怀疑态度的，但随即否定古老的教条并信奉归纳哲学。他认为通过直观感受所得到的知识是唯一的真知，但对他来说这只是用以迎接一个社会复兴新时代之曙光的一种方法。在《太阳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哲学和他的激进的社会改革思想。

在讨论康帕内拉的乌托邦思想时，我们会发现许多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莫尔的《乌托邦》相似之处，从中可以看出理想是如何跨过好几个世纪而坚持下来的。

“太阳城”的组织结构是建立在城邦的原则之上的。这类结构，对康帕内拉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在他和大多数意大利人看来，包括马基雅维利在内，文明问题一向是个市政问题。因此，康帕内拉和他那个时代相信个人专断特权制的大多数社会改革家，一向信奉中央集权的政府形式。象马基雅维利一样，他相信“君主”，赋予他以突出的领导地位，使这种形式理想化。但那是一种为了更好的管理社会事务的专制主义。“太阳城”居民的伟大统治者是侯赫教士或形而上学家，他是一切世俗和宗教事务的领导人，最高的权威。”<sup>②</sup> 他由三位具有同等权威的亲王——权力、智慧和博爱——辅佐，这三个人各司其专门的行政职责。“这样，这个形而上学家同这三位统治者一起掌管一切事务，甚至单靠他一个人什么事也做不成。所有的事务都由四人一起办理。但是不论什么事，只要形而上学家想怎么干，其余的人准会同意。”<sup>③</sup>

① 引自考茨基所著同上书，第 478 页。

② 莫利所著《理想的共和国》中援引康帕内拉的《太阳城》。

③ 同上书，第 224—225 页。

不过，政府全是由选举产生的，因为正如柏拉图所说，这些人以及其他官员和执政者都是从符合被选举条件的名单中挑选出来的。而这个名单却仅仅限于那些在文艺和科技方面所受训练使得他们最适合于治国的人。城邦的统治机构既非出身于富有的贵族集团，也非出自高贵的名门，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优秀分子。这样的人将掌管整个社会。此外，由文艺和科技教师选派政府各部门的执政人员。康帕内拉并不担心教育可能使人们不能胜任实际工作或不能担任政治首脑的工作，而是谴责了世袭的选拔原则。谈到选拔形而上学家的问题时，康帕内拉说：“我们确实认为这样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具有管理好国家的知识，而你们却让无知的人当权并认为他合适，不过是由于他们出身于执政者家庭或为某一个有权势的集团所选中而已。”<sup>①</sup>不论什么人，要是他懂得越多，他就应该在这个国家拥有更大的权力，以便把国家治理好并运用他的知识改善人民的物质条件。此外，倘若某人特别精通某一学科，他就会因此而被任命为统治者。在谈到地方长官时，他说：“他们之所以被挑选来担任这种职务，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从孩提时起就被认为是最适合担任这项工作的。”<sup>②</sup>他认为受过训练的人是最适于担任政府首脑的人。只要我们读一读下边这段话，我们就会对所要求的训练程度有所了解：“没有人能提升到侯赫的高位，除非他懂得各民族的历史及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法律条文，还有他们的政府形式——不论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他必须知道法律的制订者和科学发明家的名字并熟悉地球和其他天体的规律和历史。他们认为他应该懂得机械工艺、物理学、星占学和数学，”<sup>③</sup>这也是有必要的。毫无疑问，这是一位有知识的统治者！

---

① 莫利，《理想的共和国》，第 229 页。

② 同上书，第 226 页。

③ 同上书，第 228 页。

尽管这一规范在好些方面都是异想天开、不可能实现的，然而有一种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却比莫尔的《乌托邦》更加坚定地表达了出来，即认为国家应是用以医治社会创伤的人类智慧产物。和柏拉图一样，这两位作家都无意提出一种纯属空想的东西来。他们都认为有可能建立一个“通过理性反思出最适合于自然规律的社会关系秩序之后而建立起来的最美好的政治结构，尽管他们都怀疑其可能性。”<sup>①</sup>

教育制度的正确方向是与国家制度同样重要的乌托邦措施。教育乃是国家的一项职责。由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很好地教育他们的孩子，<sup>②</sup>所以孩子们一到3岁就都得交由国家管教，并在初期阶段接受直观教育而不是书本知识。在“太阳城”的7面墙上<sup>③</sup>可以看到美好生活所需的各方面基础知识，而且这些画的表达方式使孩子们在学习时“非但不感到费劲，反而象是在作游戏。”<sup>④</sup>在墙上可以看到数学图表和对它们所作的解释、地球的图形以及关于各种问题的论述，如习俗、法律、各地居民的起源，还有矿物和金属、治疗疾病的药剂的图画与标本、对气象的描绘、人体各部位和地球上各种动植物的图解和论述、科学和法律上的发明家，以及在和平与战争中著名英雄的画像。通过直观教学对青年人进行教育的用意在于使孩子们能够不知不觉地、毫无厌烦地获得对生活中重要而又基本的事物的知识。据此，康帕内拉在三百多年前就预先提出了现今实行的教学法。

男女学生在公认为超群的教师指导下，一起接受教育。他们还以体操、竞走、掷圈和其他项目来锻炼自己，“以此来增强他们的全身肌骨。”也教他们干一些实际的活，如制鞋、烹调、金工、木工、

① 温德尔班德：《哲学史》，纽约1896年版，第430页。

② 《太阳城》，第223页。

③ 同上书，第221—4页。

④ 同上书，第224页。

绘画等。<sup>①</sup>当孩子们长到7岁时，教师就能开始看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天生的爱好，”<sup>②</sup>然后就让孩子们去学习一系列基础科学课程。这些学生发现了他们自己的专长之后，就自行力求精通它。对每个人的训练都尽力使之成为最有用的人。“智力差的人就送到农场去”<sup>③</sup>，在那里他们主要是干体力活。但是，他们并不相信狭窄的专门化，因为“他们认为，凡献身于多种学术的研究并知道如何明智地加以应用的人，就更高尚，也更值得称颂。”<sup>④</sup>不论男女都要受军事训练。和培根一样，康帕内拉要求将科学在他的乌托邦国民生活中置于显要的地位，甚至使之列为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康帕内拉也是比生活实践提早了几个世纪。

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乌托邦措施就是他维护社会团结的方法。康帕内拉和他的先辈莫尔与柏拉图一样，看到如果要想使社会臻于完善就有必要保证社会团结。他的社会团结的理论同柏拉图的理论十分近似。在他看来，持久的社会和平与个人幸福有赖于废除私有财产和家庭。他认为财产是首要的不稳因素和相互倾轧的原由，也是前进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人们之间相互团结的破坏者。在“太阳城”里，所有的东西都归公有。“共享艺术、荣誉和欢乐，并以这样的方式加以维护，即使任何人都不能将任何东西据为己有。”<sup>⑤</sup>“我们之所以要获取并增加私人财产，乃是由于每个人自己有他自己的家庭、妻子和儿女。”<sup>⑥</sup>因此，康帕内拉也要求将妻室儿女变为公有，因为自爱源出于家庭，而“一旦我们抽去自爱，剩下的就只有对国家的热爱了。”<sup>⑦</sup>这是最终目的。康帕内拉维护妇女公

① 《太阳城》，第227页。

② 同上书，第227页。

③ 同上书，第234页。

④ 同上书，第228页。

⑤ 同上书，第225页。

⑥ 同上书，第225页。

⑦ 同上书，第225页。



有的原则，指出在基督教的使徒传教士们的著作中，在克利门特、(Clement)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著作中也曾提倡过。<sup>①</sup>因此，康帕内拉和柏拉图一样，都认为家庭乃是公民完全献身于国家的障碍。如果废除家庭，就不会有人“去为其子孙的荣华富贵而奔波，”<sup>②</sup>除了国家他就没有任何促使他作出努力或牺牲的因素，也没有引以自豪的原由了。康帕内拉之所以接受柏拉图的观点，无疑是受了意大利近代史的影响，“这段历史提供了盖尔福与吉伯林争夺权力的实例，还有些野心勃勃的大家族干扰以至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并直接危及意大利国家的生存。”<sup>③</sup>当有人问他这个计划是否可以成功时，康帕内拉让他的一位来访者回答道：“我必须向你们表明的是，他们对他们的祖国怀有那样炽热的伟大的爱，这使我几乎难以置信。”<sup>④</sup>在这个共和国里根本没有社会等级，因为“对他们来说，所有的富人和穷人一起组成了这个社会。富有者因为他们不缺什么，贫穷者因为他们不占有什么东西，因此他们不是环境的奴隶，而环境却为他们服务”。<sup>⑤</sup>

“太阳城”的居民们在公共寓所和宿舍中居住，在公共餐厅中进餐。就餐时“宛如在僧侣食堂里一样鸦雀无声。”<sup>⑥</sup>工作尽可能按爱好和能力来分配，因而减免劳动带来的许多苦楚。古思莱说，<sup>⑦</sup>“这就是他在消灭了强烈的谋求个人私利的目的之后，仍然保持劳动效率的计策。但是，因为除了穷苦人而外，所有的人不论男女都参加劳动，所以每人每天只工作4小时左右……剩下的时

---

① 《太阳城》，第238页。

② 同上书，第225页。

③ 古思莱所著同上书，第178页。

④ 《太阳城》，第225页。

⑤ 同上书，第225页。

⑥ 同上书，第232页。

⑦ 同上书，第181页。

间都用来欢快地进行学习、讨论、阅读、背诵、写作以及用于各种游戏来锻炼身体和思维能力。”<sup>①</sup> 我们还记得，莫尔曾要求每天工作6小时，而且用的是同样方法，为的是同样的目的。与莫尔和柏拉图不同之处是，他们没有奴隶，因为所有的人都参加劳动，就不需要奴隶了。何况，一旦人们拥有奴隶，就会产生许多有闲阶级，逐渐变得“游手好闲，贪得无厌，荒淫无度，体弱多病，放高利贷，并染上其他的恶习。”<sup>②</sup>

由于他们当中还有瘸子、盲人或其他生理上有缺陷的人，这些人也被分配到适当的工作，免得他们衰退或成为社会的累赘。<sup>③</sup> 没有什么生理缺陷可以使人成为无用的人。衰弱的老年人除外，<sup>④</sup> 贫困的老人则由国家予以照顾。

由于所有的劳动都是光荣的，所有的人都得参加劳动，就不会产生阶级差别。只有游手好闲受到谴责。于是劳动成为公民义务的一部分。事实上，“劳动强度最大的工作，例如金工与建筑工，在他们当中是最受称颂的。”<sup>⑤</sup> 这里向我们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荣誉——建立在劳动上的荣誉，劳工中的优秀分子。康帕内拉认为，社会上的寄生虫，不论他们是乞丐还是王子，都是靠劳动群众养活的，并指出劳动的艰辛。因此他希望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要分担劳役并作出牺牲，从而把劳动者从长时间而又卑微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他还根据每个人的适应性和能力安排每个人的工作，以免在从事毫无乐趣的工作时产生厌倦和沮丧情绪，并使之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在分配工作方面，康帕内拉对女人给以对男人同样的关注。他

---

① 《太阳城》，第238页。

② 同上书，第237页。

③ 同上书，第239页。

④ 同上书，第239页。

⑤ 同上书，第246页。

承认两性的平等地位。他坦率地说：“无需多大体力的工作应当让妇女去承担。”<sup>①</sup> 还有，“所有需要久坐和固定不动的工作应由妇女来做，例如编织、纺纱、缝纫、理发、修面、配药以及制作各色服装。”<sup>②</sup>

这里也没有货币，“因为黄金和白银在他们这里没有多少价值，除非是用来做器皿与装饰品的原料，而这些用品对所有的人来说又是为大家所共有的。”<sup>③</sup> 由于这是一个没有诱惑而又具有良好社会意识教养的共产主义国家，又没有制订多少法律，<sup>④</sup>也就没有犯罪的现象发生了。<sup>⑤</sup> 尽管这样的共产主义在许多方面还是粗糙的，但它毕竟属于一种高尚的类型，因为这意味着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分享全社会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好处。

再者，为了有利于国家，两性的结合受到控制。为了使这个国家在体力和脑力上都具有较高的水平，并有能力抵御可能的外来侵略，为了使民族继续臻于强盛，康帕内拉认为行政长官应在考虑到身体和性情两方面特点的情况下促成男女的婚配。这样，高大健壮的后代就有了保证。他借一位来访者之口说，“诚然，他们嘲笑我们精心关注马和狗的培植，而忽视了对人类的培育。”<sup>⑥</sup> “何况，人种的管制（在他们中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因此他们说养育孩子是为了传宗接代而不是为个人的欢乐，正如圣托马斯所说的那样。所以培育儿童与国家有关而与个人无涉，除非是把他们当作共和国的一部分。”<sup>⑦</sup>

至此，康帕内拉的社会观的人为因素便充分暴露了出来。男

---

① 《太阳城》，第 247 页。

② 同上书，第 231 页。

③ 同上书，第 235 页。

④ “他们只有少数几个法律，而且简单明了，写在平石板上，挂在庙堂门前的柱子上”，同上书，第 256 页。

⑤ 同上书，第 226—227 页。

⑥ 同上书，第 224 页。

⑦ 同上书，第 235、236 页。

女双方都不能自行选择配偶，感情和正常恋爱便都消除了；情欲和冲动受到挫折，而婚事则全由行政长官包办。“他们根据哲学的规范来分配最好的男女生育者。”<sup>①</sup> 如果不宜于生育的男女之间产生了爱情，“可以允许这两个人在一起谈笑、互赠花环和作诗。而一旦危及后代，就绝不允许他们作进一步的结合。”<sup>②</sup> 但是一般说来，“这一双男女知道，他们之间的爱情不得超过友谊的界限。”就这样，这位独身的教士（按指康帕内拉——译者）是臆想以理想的健康来改进人种的体质。但谁又能说他没有掌握优生学的观念呢？在这里我们还看到另一种想法，即除非社会的意志完全支配个人的意志，这样一种社会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康帕内拉是想摧毁所有那些鼓励自私自利与利己主义的制度。

对于健康和清洁的理想，康帕内拉所定的标准却与他同时代的人大相径庭。食品要在医务官的指导下来制作。“这个医务官告诉厨师每天应该做什么样的饭菜。老人吃什么，年轻人吃什么，病人吃什么。”<sup>③</sup> “他们善于烹饪，用酸性调料调拌丰盛的菜肴，所以他们从不呕吐。和中国人不一样，他们既不喝清凉饮料，也不喝人工制作的热汤。”<sup>④</sup> 人们对衣物以及工场、厨房、餐具室、谷仓、储藏室、餐厅和浴池保持绝对的整洁。他们设有专用的管道，使所有的地方能用上水。所有的人都要适当地锻炼身体。康帕内拉对妇女尤其提倡锻炼，以便使她们成为合格的母亲。<sup>⑤</sup> 他们认为多数疾病是由于缺乏锻炼所致，“因此通过节食和加强锻炼他们消除了心情烦躁和脾气坏的毛病。”<sup>⑥</sup> 通过流汗的锻炼他们可以将那些

---

① 《太阳城》，第 236 页。

② 同上书，第 237 页。

③ 同上书，第 232 页。

④ 同上书，第 252、253 页。

⑤ 同上书，第 236 页。

⑥ 同上书，第 261 页。

腐蚀血液和骨髓的毒气散发出去。”<sup>①</sup>至于发烧，他们有专门的治疗方法。任何人只要他对个人清洁的理想、环境卫生的标准和中世纪意大利医务职业的情况有着那怕是一点点的了解，都会意识到康帕内拉在这个问题上超过他的时代多么远。“他们不用粪肥和污物在地里施肥。认为那样培育出来的果实容易腐烂，营养价值低，就象涂着口红的漂亮女人一样，由于缺少锻炼，结果生下身体虚弱的孩子。”<sup>②</sup>“他们知道如何使年过70的老人返老还童和根除病痛诀窍，而这全靠一种令人心身舒畅的妙方。”<sup>③</sup>“他们的寿命一般长达一百岁，但往往能活到二百岁。”<sup>④</sup>“他们不埋葬遗体，而是将它们火化，这样就不可能发生瘟疫。”<sup>⑤</sup>

就象我们在莫尔和培根一生中所看到的那样，在康帕内拉一生中也曾看到一些奇怪的前后矛盾的事。作为一个正统的修道士，他希望太阳城的居民所信奉的宗教和他所代表的宗教并无丝毫差别。对他们说来，上帝是他们的唯一圣父，他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一切。上帝也是他们所崇拜的三位一体的象征，但所代表的却是权力、智慧和博爱。<sup>⑥</sup>他们非常尊崇使徒的生活，并在礼拜中用基督耶稣传授给人们的简短祷文。赦免罪孽是地方长官的职责。他们相信灵魂不死<sup>⑦</sup>和阴间。<sup>⑧</sup>他们也相信祈祷，并经常祈祷。但康帕内拉却是一个自由的思想家和星宿崇拜者，把占星术置于宗教之上。在庙宇的墙上可以看到星宿的标志，描述它们体积大小的

---

① 《太阳城》，第252页。

② 同上书，第248页。

③ 同上书，第253页。

④ 同上书，第250页。

⑤ 同上书，第260页。

⑥ 同上书，第263页。

⑦ 同上书，第240—262页。

⑧ 同上书，第263页。

诗句、运行的轨道和神秘的影响<sup>①</sup>。人们选定星辰串连在一起的时刻来植树、繁殖牲畜甚至办理婚事。在天体的影响下，才有发明与科学发现，才能防止天灾，才能做成每一件事情。事实上所有的物质和社会变化都可以归因于星宿。自始至终强调宇宙志，用以帮助加深对掌握人类事务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甚至教士也是从星宿而不是从上帝接受启示的。<sup>②</sup> 他们的节日都订在太阳进入天穹四个基本方位的时候，而不是天主教的节日。他们对着世界的四个地平线角祈祷。“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真切神谕是通过太阳、月亮和星宿的朕兆得来的。”<sup>③</sup>

尽管康帕内拉的乌托邦思想只不过是對他前辈的观点略加修改，但这是自一百多年以前萨沃纳罗拉在佛罗伦萨发表强有力的宣言以来，第一个在意大利提出的综合性社会改革方案，因此是很重要的。它表明当大多数哲学家都忙于学术上的争论时，当政客们正在为官职而争夺并沉湎于玩弄最卑鄙的权术时，这里却再次发出了一个声音，一个卡拉布里亚修士的声音，高声提出了抗议，并宣布一项重新组织社会的新方案，其中公众福利和社会便利乃是其唯一准则。他的主张产生了效果，这已为事实所证实：在所有遭受西班牙统治者压迫和专横权贵剥削的意大利各省中唯有卡拉布里亚起来造反，要求建立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sup>④</sup>

## 五、哈林顿的《大洋国》<sup>⑤</sup>

在讨论哈林顿的《大洋国》时，英格兰又成为我们的背景，而这

① 《太阳城》，第 222 页。

② 同上书，第 258 页。

③ 同上书，第 261 页。

④ 考茨基，《社会主义的先驱》，第 472 页。

⑤ 本文所提“大洋”是指 John Toland's 所作《大洋国与詹姆士·哈林顿的其他著作》。

一次英格兰却处于起义之中。查理一世曾依靠他的星院、宗教法庭以及其他方式的残暴统治视“权利志愿书”为儿戏，还利用他和他那个小集团的权力歪曲英国的政治制度。他被处死后，克伦威尔和他的摄政政体便掌握了政权。虽然当时英国在名义上是立宪政府的共和国，但实际上克伦威尔的统治乃是军事篡权者的专政，他纯粹是靠武力掌权的。因此，和其他早期的现代乌托邦思想家的处境不同，这时英国的创伤主要是政治性而不是经济或社会性的。在这个时期里，与政治机构、政治自由和权力平衡有关的种种问题，受到人们的普遍注意并要求予以解决。

哈林顿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一项解决办法的，并以乌托邦作为他的表达形式。这个政治乌托邦《大洋国》于1656年问世。詹姆士·哈林顿生于1611年，即莎士比亚逝世前5年，亦即约翰·密尔顿诞生后数年。他是鲁特兰大郡埃克斯顿的萨帕科茨·哈林顿爵士的儿子。在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以好学、恬静的性格而显得与众不同。1629年他以出身高贵的自费生身分进入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当了学院逻辑学家奇灵沃斯博士的学生。在大学里他主要学习现代各种语言，为出国旅行作准备。但他在出国之前还未成年时，他父亲就去世了。他继承了他父亲的遗产。到外国去游历对他构想一个理想的政体非常有利，因为旅行使他得以深入洞察各种不同的政府形式。托兰是哈林顿的热忱的传记作者，他告诉我们，<sup>①</sup>“听说他常说，在他离开英国之前他对君主制度、无政府状态、贵族统治、民主制、寡头政治或其他诸如此类制度的了解，只不过是一些他在字典里学到的难懂的词句而已。”但是，在他回国之后，他就能更亲切、更有信心地谈论这些制度。在荷兰，他经历了伊丽莎白女王执政时期曾经发生过的那些宗教和人权斗争的

---

<sup>①</sup> 托兰，《大洋国与詹姆士·哈林顿其他著作》中《哈林顿的一生》，伦敦1737年版，第14页。

余波。他还先后在克雷文勋爵与罗伯特·斯通爵士的军团里工作过。他在海牙作长期逗留，熟悉奥兰治王朝的情况，并一度担任英国事务的官员。<sup>①</sup>哈林顿从荷兰经佛兰德斯进入法国，又从那里前往直意大利。意大利以威尼斯最中哈林顿的意。他对威尼斯的政府形式最感兴趣。他在那里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又读了很多书，以致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后来在他的《大洋国》一书中开花结果。“荷兰和威尼斯都引发了他的想象力，激起了他的热情，但在方式上却各不相同。在荷兰他看到一个民族能做什么，在威尼斯他了解到一种制度可以做出什么。前者使他的兴趣转向政治；后者使他相信政治学。由于他对人民的绝对忠诚和对政治制度的坚信不移，他的思想开始转向共和体制。”<sup>②</sup>他返回英国后，便尽可能使自己脱离宫廷生活，而致力于家务并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主要是研究政治制度史。据说他卷入了1464年的宫廷纠纷。当时议院的高级特派员们置国王于他们的监护之下，要求哈林顿作为一个同任何政党或集团都无任何瓜葛而又为国王所了解的人来侍奉国王。他虽然是个共和主义者，但仍然陪伴国王上断头台。共和国倒台后，查理二世复辟，哈林顿便过着退隐的生活，不参与任何政治斗争。然而，当时拥护共和主义也就犯罪。他因被控参与谋反，于1661年被监禁在伦敦塔，在那里无故受到长期监禁。折磨他的人除了发现他著作中阐述的理论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断定他有罪的事实，但他却受到宗教法庭式的审讯。长期监禁使他的身体健康受到损害，终于得了坏血病而精神失常。后来经过家人的努力，由查理二世恩准释放了他。他再也没能恢复健康，但仍用大量时间从事写作。他在备受损害的一生的晚年结了婚。1677年于威斯敏斯特辞世，终年66岁，葬在圣玛格丽特教堂沃尔特·雷利爵士的

① 托兰所著同上书，第14页。

② 史密斯，《哈林顿和他的大洋国》剑桥，1914年版，第5页。



墓旁。

哈林顿所生活的时代是人们作出最英勇的努力、使政治制度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时代。人们一旦发现现存制度有缺陷就会创造出新的制度来。当时清教徒思想流行。这并不是单纯为了恢复宗教的纯洁性，而是反对一切权威，不放过任何腐败无能的政治机构。德怀特说：<sup>①</sup>“它提出，在陈旧而无用的东西消灭之后，要建立一个不仅是新的精神王国而且是政治王国。在这王国里，要重建政府和教会，使二者建立正式的关系，并热切期望这种关系能和谐而又长久地维持下去。为了完成这一伟大的创举，一切事物都必须加以修整。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在所有的危难时期那样，许多伟大人物被推上了显著地位。除了詹姆士·哈林顿的杰出观点之外，托马斯·霍布斯，奥利弗·克伦威尔和约翰·密尔顿的精湛思想也都于最近问世，在这一时期激动着他们同时代人的心灵。

《大洋国》在乌托邦著述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尽管它采取了一个理想的国家形式，但它是一部不同于其他乌托邦类型的著作。写这部书的目的，它既不象《理想国》那样是为了表达一个伟大的社会哲学家的理论，也不象《乌托邦》那样，对时弊进行讽刺，更不象《新大西岛》或《太阳城》那样用以阐明个人的殷切愿望和理论，而是为了解决国家处于历史上非常关键时刻的问题。作者为了保证该书的出版，采用了生动的叙述法并赋予它以一种他称之为“政治传奇”的形式。

这部书是在克伦威尔统治时期撰写的。“场景安排在英国，但以‘大洋国’的名称出现。故事中的主人翁是克伦威尔，但用的是奥尔伏斯·梅加莱特尔的假名。此人由于半夜想到一个单身汉利克

<sup>①</sup> 德怀特，《哈林顿及其对美国政治制度与思想的影响》，载政治科学季刊第2卷，第2页。

古斯能够为斯巴达做的事而苦恼。由于受到这个事例的启发，他便召集一些政治学家，在一起制订一部新宪法。克伦威尔得到了一个实际上就是护国公的职位，并建立起新的秩序。他等到这架政治机器的齿轮运转正常了，便退休过隐居生活，英国从此成为世界上最繁荣和最令人满意的共和国。一旦删去了这部书的寓言似的词句，它就不过是一部夸大其词的成文宪法。它没有传奇式的《乌托邦》那种富有诗意的气氛，而是详细论述了一些宪法文件未包括进去的细节，但它从不背离自己的政治观点或提出实际上难以实现的建议。为了解决英国自废除君主制而陷入混乱状态以来所面临难题，它提出了明确的建议。这也是该书作者希望能使克伦威尔采纳的建议。”<sup>①</sup>

哈林顿确是一个文艺复兴运动的产儿。他满脑子的古典学术思想在《大洋国》一书中清晰可见。尽管这些思想有许多是犹太人的、威尼斯人的或英国人的，但更多的还是源于希腊人和罗马人。他很向往斯巴达、雅典和罗马的宪法。他也属意于另一部为克里特岛上想象中的殖民地而制定的宪法。这就是柏拉图的第二个最好理想国即“法律篇”，这也是一种切实可行的乌托邦，很象一部精心撰写的宪法。由于哈林顿是在“古‘审慎国’的档案中”<sup>②</sup>而不是在“幻想”中发现了他的《大洋国》，所以我们必须根据这部书的政治思想而不是它的艺术性和幻想来作出评价。毫无疑问，由于人们都在中世纪著述中寻找异国情调和奇谈怪论，致使《大洋国》未能广为流传。

哈林顿的乌托邦主义主要是政治上的乌托邦主义。其目的在于树立某种能从混乱中建立起政治秩序的政治理想，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和政治的必要原则。他的整个乌托邦思想集中于人民的

① 史密斯着同上书，第13页。

② 《大洋国》，第179页。

主权问题。他大声疾呼：“这个自由诞生的国家，每年分配一次官职和荣誉……人民自己就是国王。”<sup>①</sup>他直接了当地认为，人民有能力实现政治自救。他相信共和国和民主原则。此外，他还相信人民能接受正确的政治理想和优越的政治制度的建议。这些理想和政治制度一旦付诸实施就会按公共的利益进行管理。可见，他的乌托邦思想实质乃是一种完美的政权。有了这个政权，人民就会变得完美。

在这一类乌托邦措施中，着重强调的是明确的成文法。其基本精神乃是将法律而不是将人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界定政府的意义时，他说<sup>②</sup>：“它应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人由于他们的多变性、不确定性与个人的特性，打乱了精心的计划，他们见风使舵。但是，白纸黑字写出的而不为任何意外事件所左右的法律，乃是真正可靠的基础。这种观点当时在为数不多的有头脑的人当中非常流行。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一种没有争执与没有不稳定因素的大宪章上，这个大宪章是不可更改的。此外，他只要为数不多的法律<sup>③</sup>。这样，法律便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因为只有法律才能使自由成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自由决不是出自于法律，而是通过实施法律取得的。

他的第二个伟大的乌托邦式措施乃是创建合理的“财产均衡制”。这种财产均衡制在这句话里得到说明，“这个帝国的特征有如领地或地产按比例或均衡原则分配的那样。”<sup>④</sup>这个建议从那时起一直得到普遍的赞同。财产所属范围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土地、货币或货物。<sup>⑤</sup> 哪里的土地集中于一人之手，哪里就有君主制；哪

---

① 《大洋国》，第 100 页。

② 同上书，第 37 页。

③ “一般说来，制订法律的最好办法是条文要订的少。”同上书，第 60 页。

④ 同上书，第 39 页。

⑤ 同上书，第 39 页。

里的土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哪里就有贵族；哪里土地普遍由人民来管理，哪里就有人民共和国。在这些形式的财产中土地是最重要的，因为政治权力通常是建立于其上的。他称这种平均土地的做法为“农业均衡制。”<sup>①</sup>哈林顿向往民主制，所以他觉得土地所有权应尽量分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政治权力的均势。在谈到建立共和国所必需具备的秩序时，他说：<sup>②</sup>“土地均衡制是永恒的法律，通过这种分配方法可以建立并保持领地的均衡。这样，没有一个人或一帮人会在少数人或贵族集团之下依仗所占有的土地来压制全体人民。”这乃是共和国的基础。历史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占有土地的政治重要性的例子。后来研究政治学的学者也渐渐看到了哈林顿这一理论所含的智慧和真理。<sup>③</sup>自约瑟夫在埃及发生大饥荒以前投资敛财时起，人们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真理了。另一些例子是，犹太人中的五十年大典制；利克格斯和索伦的改革；格拉齐、朱利叶斯·凯撒和后来一些罗马帝王的业绩以及整个封建制度，它们都是建立在实际认识到这一事实的基础之上的。

他的贡献在于，他首先清醒地认识到这个由大量实例证明了的事实，并将其作为理论确切地加以阐明。这种理论从乌托邦主义的观点来看，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认识到财产和社会稳定之间极其重要的关系。与政府和政治有关的经济事务中，哈林顿是首先阐明经济问题应有的重要性的许多作家之一。在其关于共和国

---

① 《大洋国》，第40页。

② 同上书，第54页。

③ 史密士著同前书，第23、24页，对这一问题引用了别的作者的话写道，博纳在他的《政治经济的哲学》（第90页）中，把《大洋国》的重要性归因于它的“新原则，即在一个国家中的经济基础将决定它的政府性质”。康沃尔·刘易斯在《一篇关于政治的论文》（第2卷，第46页）中除例举一般的政治真谛之外，还加了一条：“任何国家的权力基础都依靠财产的优势。”索罗尔德·罗杰斯在《历史的经济解释》（第168页）中认为，在实际政治活动中，“由占有一个国家土地的人制定这个国家的法律，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的概述中，<sup>①</sup>他在结尾坚持认为决不可使平衡达到“使权力逸出多数人之手的程度。”

然而，他所想要达到的分地运动已在英国推行了一段时期。<sup>②</sup>封建大庄园在逐步瓦解，终于使政治权力日益分散。但是，当时君主政体的机构已无力应付这些新的情况。他认为有两种办法可使权力与财产一致起来：或是通过改变政体使其适应已经改变了的财产均势，或是改变财产均衡制度使其能适应旧的政体。鉴于其它大量变化的层出不穷，他自己认为，改变政体比回复到旧的经济状况为容易，好处也多些。这无疑是由于他抱有不调和的共和主义思想。因此，他的努力方向是制订应能建立并保证一个共和政体的计划。<sup>③</sup>

哈林顿提倡用四种办法来保证政府的廉洁与健全并防止权力转移，导致动乱。这四种办法是：无记名投票、间接选举、轮流执政和建立一个辩论与投票职能分立的两院立法制度。这些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方法，但却是受一定约束的民主。无疑，这类做法在意大利，尤其是在威尼斯、德国、瑞士与荷兰的城市中，在教会的组织机构中，在一些私人俱乐部里到处都可以见到。但哈林顿的胆略却表现在他把他的建议推广到整个国家并纳入宪法。

无记名投票是针对选举人经常陷入混乱和贪污受贿这两大弊端的，这正是旨在予以纠正的。<sup>④</sup>他说，<sup>⑤</sup>“选举或公民投票是完全自由的，其做法应是：既不施予或接受对方恩惠，也不畏惧某仇人或对朋友自吹自擂，以损害个人的自由。”<sup>⑥</sup>

---

① 《大洋国》，第 204 页。

② 同上书，第 73 页。

③ 关于他的“农业均衡”思想可进一步参阅《大洋国》第 54、57、61、63 页。

④ 同上书，第 120 页。

⑤ 同上书，第 54 页。

⑥ 详见同上书，第 113 页（对开本）。

主要为了防止选举人陷入混乱和贪污受贿，第二个办法是间接选举官员制。在他那个时代的议会选举中盛行的混乱与贪污受贿现象，迫使他认为有必要在这方面进行某种改革。他建议将国家分成大致相等的 50 个部落，每个部落有 2000 人，每百人中分为十个教区。<sup>①</sup> 选举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选出每个教区选民总数的五分之一的人组成整个部落的选举团。<sup>②</sup> 第二阶段在代表们集会的各部落主要城市中，选出这个国家议会的本届代表。<sup>③</sup> 他还想要某些能代表人民的、更加开明的人士起中间作用，以确保担负起挑选政府官员这一责任重大的工作。哈林顿一向认为，实现民主国家的真正理想，并不在于让人民把政府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而在于把主权交给经他们选出并为他们经管政府的代表。

另两项办法——轮换制和哈林顿的特殊形式的两院政府制——是针对被选举上来的人们所面临的诱惑力的。他坚信并支持公职的轮换或更替原则，“因为官员任职过长势必破坏共和制的寿命和它的正常运行。”<sup>④</sup> 轮换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政权的连续性而又防止因执政时间长了发生压制人的危险。逐年选出任期三年的制度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样，每年都有一批新官进入管理机构，并有一批旧官员退职。这样“便可使盛开的花朵、半熟的果实同时并存，而其他已熟透的果实则落到地上。”<sup>⑤</sup>

第四项措施是一个立法、辩论和投票各职能分立的两院制议会。参议院由 300 名较富有者及上层知识分子和德高望重的代表组成。<sup>⑥</sup> 哈林顿认为，社会上确有这种类型的天生贵族阶层，因此

---

① 《大洋国》，第 84 页。

② 同上书，第 89、90 页。

③ 同上书，第 92—99 页。

④ 同上书，第 64 页。

⑤ 同上书，第 140 页。

⑥ 同上书，第 47 页。

他想使这些人起人民的引路人的作用。他们的职责是讨论、辩论、提出建议和启发人民。他们的政令绝不能成为法令，除非将这些政令提交由 1050 代表人民的特权部族或称参议院并经其批准。这些机构是真正的立法机关，因为它们依次接受或否决所有提出的方案。这些问题由特选的参议员提出。在听取了双方对问题的争论之后，他们不予辩论就对这些提案进行投票。“这样，不论什么问题，经参议院辩论后向人民提出并经人民同意，然后经元老们发出指令并经人民授权予以颁布。在各方同意下制订成法律。<sup>①</sup>”在这方面哈林顿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政治观念。英国当时正处在过渡阶段，在此期间控制权正逐渐由贵族转入平民之手。这是一个中间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代表大会还没有立法权。这时人民只具有对统治者所提建议表示赞成与否的权力，而不论统治者是否系由他们选出的。下一步就是争取使他们也能参与立法的实权了。哈林顿固然是个乌托邦主义者，但他并没有走得那么远，尽管他可能是受到实用观点的束缚。

同上述乌托邦措施在实质上多少有的区别的另一方面是，他对宗教信仰的宽容理论。他的原则并非是一种在毫无民族、教会或政府干预下的绝对自由，也不是在国教影响下的无限制宽容，而是围绕着国教的有限宽容。<sup>②</sup>哈林顿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但他承认不同意见的存在，并同意给予私人以信仰自由。<sup>③</sup>在允许私人信仰自由之后，他觉得必须伴以民族信仰自由，而这乃是他的民族宗教的基础，因为他说：<sup>④</sup>“共和国不是别的而是民族信仰。如果私人信仰产生出私人的宗教，那么民族的信仰就必然产生一个民族的宗教。”

① 《大洋国》，第 48 页，并参阅第 121—131 页。

② 同上书，第 58—127 页。

③ 同上书，第 58 页。

④ 同上书，第 58 页。

但这种民族宗教不仅范围广泛而且允许有不同意见。他坚持认为所有党派在从事和平的职业中都应得到同样的保护，并同样可在共和国中参加选举、任职和升迁。事实上，他的宗教理事会也“不会容忍在这个国家中使用强力来处理宗教事务。”<sup>①</sup>然而，他的确将犹太人与天主教徒排斥在外。哈林顿所强调的这些信仰自由的原则是他对一定限度的民主体制的补充——这种有限民主与宗教的结合还是第一次提出的。哈林顿这些想法显然与查理二世执政初期的严酷而不宽容异教徒的立法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属于新教的非国教教徒以及其他教徒，由于叛离国教，便遭到剥夺重要的公民权和严厉的惩罚。

哈林顿提倡普及教育，以保证其政府形式的延续性并维系整个社会。他的这个观点我们今天也是同意的。他说：<sup>②</sup>“人是神奇的自然创造的精灵。倘若他能循规蹈矩，自然便可让他去做好事和有益的工作，不然他就会去放火，去炸毁城堡，因为哪里有生命哪里就必然有运动或工作。游手好闲就是捣乱，勤奋工作就是健康。为了使人们从事有益的活动，共和国必须及时开始工作，不然就太晚了；而它使人们这样去做的手段就是教育，或者叫做政府的塑造艺术。”所以，教育是为了防止动乱，使社会免于衰败，消除愚昧无知，并接连不断地为政府提供新人。教育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教育大多数人使他们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并对重要问题有正确的洞察力。他说，“你们这些达官贵人和聪明才子没有任何理由把共和国当作荒谬的东西来加以公开嘲笑。就从表面而言他们看来不过是些白痴（实际上也是如此），但原因是人民没长眼睛。”<sup>③</sup>

但是，他并不主张把一个人的孩子的教育全盘托付给他本

---

① 《大洋国》，第 127 页。

② 同上书，第 171、172 页。

③ 同上书，第 180 页。



人。<sup>①</sup>他建议推行政府监督下的免费义务教育制。据此,凡有一个以上儿子的人必须把他们的儿子送入学校,否则就要受到惩处。对无力交付学费者实行“免费”。然而,基于他通常采取温和的态度,他把独生子女的教育交由他们的父母处理,并让所有父母有其子女选择学校的自由。这种教育制度将持续到受教育者15岁时为止。此后,孩子们应学会某种手艺,或进入法律学校或大学。<sup>②</sup>共和国仍然关心他。他留在学校的时间不能超过18岁,除非他正在学习某种专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漫无目的的学习。这就是历史上最早为免费和义务教育制订计划的突出例子。他还认识到把公开讨论作为一种教育方法的好处,因而想在“每星期二对人民进行讲学或演说。”<sup>③</sup>其目的是向群众阐明国家大事,从而帮助树立公众舆论。

然而,哈林顿的这个教育计划却带有一个为其他早期乌托邦思想家所不能容忍的弱点,那就是他根本没有提及女孩子的教育问题。不过,妇女在英国的革命运动中很少起过作用,而且,由于一向对妇女运动怀有热情的人士也几乎没有发现妇女在古代史中起过伟大作用的例子,所以哈林顿在他的乌托邦中就没有让她们扮演重要的角色。

总之,尽管哈林顿的思想在各方面都具有浓厚的实用色彩,他却是一位典型的乌托邦思想家。他热情洋溢地设计了一个脱离实际的乌托邦,并认为一旦条件具备即可实现。他以极大胆的精神,历史地承担了这样一项工作。他大规模地发展了国家的路线、思想和政治制度,而这在私人的或教会的组织中,或在大陆上的市政机关中,都曾长时期在小范围内推行过。因此,哈林顿对以前只是

---

① 《大洋国》,第172页。

② 同上书,第177、178页。

③ 同上书,第157—160页。

缓慢地演变着的国家民主形式突然予以猛烈的推动。事实上，在许多新近设计出的美国政治制度中，都可以找到哈林顿的思想痕迹。<sup>①</sup>

哈林顿的乌托邦理论，就其实质而言几乎完全是政治性的。但这不仅是一种寻求完美政府的乌托邦理论，尽管这是《大洋国》的主要含义，却对社会是个无可避免的推进。把一个关于政府的好理想予以实施，便可建立一个健全的政体。他所寻求的这个美好政府的根本性质，是通过这样一些法律或秩序或制度所导致和维护的民主制度，足以在任何情况下使平民的权利与利益占居上风。他的所有建议都是专门围绕着共和国这一目标而发的。一切工作都要为这一目的服务<sup>②</sup>。而他所提倡的制约和均衡措施，也只是为了保持这种新的政治结构的稳定性。

## 六、对早期近代乌托邦思想家的小结

我们没有论述所有的早期近代乌托邦思想家，但我们已谈到最重要的一些人，并已囊括这个时期乌托邦理论的基本因素。我们讨论了最杰出而最有代表性的、最能真切反映他们那个时代社会理想的乌托邦思想家。<sup>③</sup> 这些乌托邦思想家都是那个时代的社

① 关于这个问题将在本书结尾部分加以论述。

② 同上书第 194 页。

③ 16 世纪和 17 世纪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对探讨这些乌托邦思想最为兴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除其他著作外，下列著作尤为重要：霍尔的《当今的世界与另一世界》（1607）；普提勒斯的《乐神》（1608）；安德烈·约翰·伐兰蒂的《基督城》（1620）；埃利奥特的《人类的君主制》（1622）；巴克利的《阿吉尼斯》（约 1630）；埃里思雷克斯的《欧迪米》（1637）；戈德温的《月中人》（1638）；比德曼勒斯的《乌托邦》（1640）；密尔顿的《新索尼马，理想城，再生的耶路撒冷》（1648）；霍布斯的《利维坦》（1651）；萨德勒的《新岛，奥尔比亚》（1660）；菲尔默的《父国》（1680）；斯威夫特《古利弗游记》（1726）。关于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斯堪的那维亚诸国和俄国的乌托邦著述，可参阅舍奥曼搜集到很好的全面书目《法国乌托邦主义及其妇女运动》柏林（1911）。另有教士沃尔特所著英译本《新索尼马》纽约（1902），第 2 卷结论部分附有这方面的有限目录，但描述较详。

会理论家。他们主要通过阅读古典著作回顾了人类以往的盛世，展望并寻求未来的美满境界，以期消除当时的种种弊端。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真正的继承人，他们不怕背离传统的道路。他们所走的道路是飞向高空的自由解放，从无聊的繁重劳作中解脱出来。他们让他们的幻想飞上新的高度，达到新的思想水平。然而，因为他们是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写作的，并非单是为了表述奇思异想，所以他们都非常严肃而又实际。

作为文艺复兴的产儿，他们充满了对知识的热爱和对新发现的科学真理的向往。他们认为，普及知识就是使社会全体成员尽可能地分享其中的欢乐和好处。这是培根的主要论点，其他的乌托邦思想家也不虚此言。因此，他们最突出的乌托邦措施之一就是教育。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必须锻炼人的思想，倘若你想做一个完美的人，就必须保持良好的习惯。他们对教育有一种新的想法，即使教育成为社会团结的重要媒介和巨大机会的阶梯。通过教育可使下层阶级达到以往只有少数特权者能达到的高度。教育乃是社会化了的道德的鼓吹者。直到今天，在我们中间也只有少数人才逐渐地明白这个道理，就象三个世纪以前这些作家已经看到的那样，认为教育是最典型的乌托邦主义。通过它也只有依靠它，才能把社会理想和博爱精神灌输到老百姓当中去。

所有的乌托邦思想家都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团结的必要性，尽管他们所想到的方式和目标各自不同。三百年前他们已经认识到社会团结一致这个原则的重要性。然而，他们在如何付诸实施这一点上各执己见。莫尔、培根、康帕内拉认为，维护这种团结最好的方法是牺牲个人利益以确保政府的最高权威。哈林顿则走向另一极端。他认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力是一个稳定而幸福的国家必备的首要条件，但这个国家的权力是经过有组织的安排的，它的各个

部分是相互均衡的。

在个人财产和私人占有土地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也并不一致。我们看到了哈林顿同其他人的土地理论的根本分歧。那些人都提倡绝对放弃个人财产，尤其是土地。他们认为只有消灭私人财产，才能实现社会的长存，才能消灭自私自利并使个人获得幸福。在他们看来，私有财产是首要的动乱因素，也是互相倾轧的不尽源泉。另一方面，哈林顿却赞成一种慎重地保存个人财产的制度，尤其是保留土地，因为他认为这对维护社会的长存和对个人的保护是一种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对他来说，私有财产的合理分配意味着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平衡。

正当莫尔和康培内拉寻求消灭阶级界限，从而达到大致上的社会平等时，哈林顿显然是出于注重实效的考虑，看到消灭阶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而试图谋求在阶级与阶级之间建立一个保持平衡的可行办法。

所有的乌托邦思想家都认识到，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的必要性。这位掌权人应经选举产生，并经证明是胜任这项工作的，但须由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组织加以监督和辅助。今天也证实这种想法是明智的。我们的民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深信，将权力集中于由人民认真选出的一个人之手的必要性，并由一个代表公众意见的组织来进行检察。

除哈林顿外，这些人都表达了今天称之为“优生”的思想。他们认识到使社会臻于完善的物质基础。一个欢快、幸福、聪颖的民族必须是身体健康的民族。而要想身体健壮，作为父母的身体也必须是健康的，而且要在卫生而良好的环境中成长。

此外，他们也看到在改善社会的计划中，必须重视工业和经济的条件。无人监督的、个人主义的工业意味着退化、动乱和反社会的条件。倘若经过协调，它们便可成为社会建设的工具。这方

面可谈的问题很多，但无须加以赘述。我们只要记住：这些早期乌托邦思想家是走在他们时代前面的人。他们是一种新秩序的预言家。这种新秩序有好些方面目前正在逐步实现。我们今天采用的正是他们以前建议的那些乌托邦式的措施，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按照逐步前进的思想重新改造社会。

## 第五章 空想社会主义者

### 一、绪言

就某种情况而言，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乃是引起法国革命的那种精神的继续；而就另一种情况而言，则是一种对巨大动乱中过火行为作出的合理反响。然而，不论是继续还是反响，它们都是那些同样巨大社会力量的产物。这些力量已累积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实质上是经济的、政治的和哲学思想等方面的力量。既然除一人外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是法国人，我们就简要地谈一谈在法国展现的这些力量吧。

早在路易十四时期就种下了法国革命的种子。路易十四是否要对“朕即国家”这话负责，我们不得而知，但在他统治下72年却使这句话所表明的独裁和专制的思想具体化了。即使他的统治很少引起积极的反抗，但却蕴藏着在开始阶段只起缓慢作用的酝酿运动。他那贪得无厌的野心驱使他进行不停的征伐。战争抽尽了壮丁，阻碍了生产，并加重了前所未有的税收负担。他在凡尔赛的辉煌官庭里，聚满了贵族和教士，过着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生活，从而增加了税收，缩减了贸易。国家濒于崩溃，农民饥寒交迫，国内怨声载道。此外，路易还由于可耻地滥用了他无限的权力，使绝对君主制的名声扫地。由于他实行了“多数人生来是为一人使用的”这一骇人听闻的信条，广大人民苦难深重，这就为巨大的灾难——法国革命——扫清了道路。最后，在路易十四时期，尽管在艺术方面尤其是在纯文学方面有所进步，但这只不过是以此来窒息政治和哲学思想的传播而已。这就象火山一样，总有一天要爆发的。

到路易十五执政时，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便沸腾起来。波旁王朝遭到强大的攻击，它的霸权地位日益消逝。在腐朽堕落的奥尔良公爵和受情妇摆布的路易十五的荒诞统治下，还可能有什么别的出路呢？法国在物质上和军事上每况愈下。这正是法国孤独无援的公民奋起反抗长期以来束缚他的统治机构、争取自己的权利的大好时机，但却无补于事。法国启蒙运动逐渐得势，以其新的个人主义思想开始冲击迷信的教会和挥霍无度和荒淫无耻的独裁政权。最初，启蒙运动是纯属思想性的，<sup>①</sup>但逐渐发展成为强有力的、属于感情性的社会运动。这主要归功于卢梭的著作。伏尔泰却从不曾有进行社会革命的想法。他的目的在于通过自我文化修养和自由思想以恢复人的理解和判断能力，使个人获得解放。<sup>②</sup>他未能从历史观点看出，如不摧毁社会结构就不可能使法国的思想革命化。他只把希望寄托在不能起作用的力量上。但卢梭却认识到，在法国这样灾难深重的社会状态下，进行思想上的启蒙运动是多么荒谬可笑。他便转而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也反对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改良家，并坚持谴责整个的统治秩序，因为它是人为的、卑劣的而残暴的统治。他想消除一切所谓的文明，削平不平等，回到自然状态。私有财产是建立在掠夺的基础之上的。社会团体的发展成长，只是扩大了强者、富者和对生活绝望者之间的鸿沟。为了恢复正义与和平，必须摧毁这些机构，有关著作也必须加以销毁。在人类的初级阶段，所有的东西都属公有，那时并不存在妒嫉和暴力。人们必须回到自然状态，才能恢复往昔的黄金时代。

处在一个对压制和腐败感到厌倦的时代里，卢梭以其充满激情和同情心的辉煌语言，弹奏了一首动人心弦的曲调。他的哲学

---

<sup>①</sup> 在伏尔泰与孟德斯鸠领导下，还有百科全书派，其中有狄德罗、德欧巴赫、戴勒姆贝尔和海尔威席尔斯。

<sup>②</sup> 见库什曼，《哲学史》，波士顿1911年版，第2卷，第213页。

思想掀起了一阵波及全世界的骚动。他的思想最明显的方面是对自然的热情，提高人类的地位，以及对现存时代和社会的轻蔑。法国人民欢迎这种行将到来的变化的征兆。

当时根本没有调整现有制度的想法，因为路易十六的傲慢态度使得政治调整不可能。美国的革命产生了一个新生的、纯朴的共和政体国家，这也使得法国不可能进行政治调整。当时的呼声是：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恢复人权。法国人民急于要看到法国本身享有他们曾帮助美国殖民者取得的那种自由。

于是，事态的迅速发展到了法国大革命时达到了高峰。强有力的运动遍及全法国。它不断动荡，变化，荡涤着一切有妨碍的事物。政府机构陷于瘫痪，政治权力转移到另一些集团手中，新的思想占上风，独裁体制被摧毁了，人们在寻求自由。老皇历不灵了，理性占了统治地位。然而，田园式的政权并未也不可能建立。宣布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人的本性并未改变，个人所有制的原则也未触动。当骚动已平息下来，人们可以计算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时，他们才看到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并没有全部在政治改革运动中得到纠正。从目前所取得的成就来看，未来世界很可能同过去一样。同样明显的是，在政治和社会革命之前和在革命过程中所进行的工业革命正在法国产生效果。它将注意力指向经济结构令人不安的变化，由于机器发明而产生的失业问题，以及由此引起各种社会集团在劳动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重新组合，一种新的阶级意识，还有新学来的自由主义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产生了经济上牢固而强有力的阶级。它们使自己更深地扎根于牺牲广大群众的利益上。这场革命产生了一种新的绝望感。许多人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完善的国家，但却因这次失败而感到沮丧。他们的希望变成了冷漠或痛苦。但革命的后果并不全是具有这种不幸的性质。它引起了很多想法。它表明现有的秩序是过渡性的，因而在



人们头脑中产生了一个原始的、摆脱了传统罪过的国家的图景，尽管传统的东西并未完全消失。这次革命的失败激励一些人去另行寻找重建社会的方法。对我们的目的最重要之点就是，它产生了一个由所谓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提倡的社会乌托邦新时代。<sup>①</sup>

空想社会主义者并不象艾赛亚、约翰、柏拉图或莫尔那样，对乌托邦作浪漫主义式的渲染，但他们在一些理想家当中应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以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后的时代都把他们所提出的理想规划看作是十分荒谬的、不可能实现的。对他们来说，理想的社会就是一种有意识的、武断的结构，是要强加于全体人民的。然而，这种思想并不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武断，因为在那时，社会被看作是远古时代所订契约的产物，而这种契约是可以在任何时候按有关各方的意向予以解除或改变的。他们是乌托邦思想家，因为他们认为有一个无底深渊把未来的社会和当时的社会分隔开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人还不习惯于历史发展的观点，所以对这些改革方案并没有多大兴趣。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作品充满了我们称之为乌托邦的思想。我们就是要说明这些作品中最出色的部分。他们制订了一些原则，认为按照这些原则去做就可以达到完善的境界，并永垂不朽。

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他们的紧密追随者都是些极其严肃认真的人。固然，他们是梦想家，完全被那些模糊不清的、不可捉摸但却极为气势磅礴的、人类完善的理想所吸引住；但是，他们极为诚挚并下定决心要使这些梦想变成为现实，向全世界宣讲这一福音，说明它的道理，直到人人可以接受。正如史克尔顿所说：“这个学派的领导人全都是富有感染力和极大热情的人。他们无限自信，宁愿

---

<sup>①</sup>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并不是从政治经济观点将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看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而是从社会学的观点将他们看作是社会改良理论的倡导者。

今天蒙受冷落与耻辱，以便明天被誉为社会的救星。”<sup>①</sup>

大多数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的理想国家抱有希望；而这个理想国家的基础实际上却是属于旧时期的。尽管他们所推荐的处方各不相同，从最僵硬的政府控制到最模糊的靠志愿合作的想法都有；尽管他们的乌托邦思想各不相同，从热情奔放到极度的理性思想都有，然而他们都深信拯救人类要靠完美的自然社会秩序，而这乃是一个人类经受过腐蚀，必须重新予以发现的社会秩序。人的生性本来是善良的，大自然也是美好的，然而人类由于邪恶的习俗、束缚性的规范和罪恶的制度玷污了大自然美好的方面，弄得现在一切都不对头了。原始的完美无缺的信条，证明他们的理想社会和乌托邦国家的规划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倘若铲除了世俗社会的种种弊端，人类是能够达到完美境界的，至少是可以使之完美的。在一个自然状态里，人类会获得幸福，并能乐善好施，倘若是适当的有适当的社会环境，人类是可以这样保持下去的。<sup>②</sup>问题在于要去发现这种自然的国度。一旦社会能组织到使大自然的力量自由发挥作用，那么，社会就会自然达到完美的境界。但从这样一种总的设想出发去作出具体的推断时，使用的方法就会因人而异，从而便提出各式各样的组织方法。

## 二、摩莱里

另有一位独立于卢梭的作家在促进空想社会主义方面起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他的理论几乎反映了每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设

<sup>①</sup> 《社会主义：批判性的分析》，波士顿 1911 年版，第 12 页。

<sup>②</sup> 莫林那利在《未来的社会》第 207—8 页复述这一思想时写道，“我们可以证明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一个消除了一切限制和障碍的社会，这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社会——这个社会将免受我们今天所受多数弊病之害。我们可以证明这样的社会组织是凡人所能达到的，是个最公正、最好也是最有利于生产与分配财富的组织。”

想。实际上，我们如果不把他看作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至少也应看作是最杰出的先驱。这个人就是摩莱里教士。古思莱教授<sup>①</sup>很好地将他的理论介绍到美国。摩莱里是一位不知名的作家。有关他的生平材料很少，有一些不太可靠的材料也只提到他一生中的某些重要之处。从他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的情况来看，他大约生于1720年，因此是卢梭、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同时代人。关于他的性格和生平只能从他的著作中略知一二。他的《自然法典》阐明了他的基本原则。<sup>②</sup>这本书看起来并不象是受过卢梭的影响，而是受当时“流传的”一些说法的影响而写成的。<sup>③</sup>

固然，他论社会的著作为了避免当时在法国普遍施行的严厉新闻检查而以小说的形式出现，然而我们仍有可能从这些作品中剔出对我们有价值的乌托邦因素。在同时代的作家中，他是最清楚地看到新社会制度必将取代旧制度的一位作家。只有他才是真正具有建设性的，因为他确实描绘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他认为倘若推翻了旧社会，他的这一新社会就可以符合要求。在运动初期，别的人可以称得上是对旧社会的评论家、分析家和毁灭者，唯有他才配称为乌托邦思想家。

他从事人类心灵的研究，<sup>④</sup>以作为他对社会进行分析的先导。当涉及到人类的欲望时，这项研究含有某些为傅立叶在其广泛的体系中作了进一步阐述的思想。他认为，人是一个实在的、有感觉的有机体。人的唯一目标或最大的好处就是享乐。正如在物质世界中引力占绝对地位一样，在精神世界里亦复如此，即引力的地位为以欲望为基础的自爱所取代。他认为人类所有的欲望既不错也无害，它们都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较完美的社会

① 《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主义》，第195对开页。

② 约于1755年。

③ 格雷厄姆，《新旧社会主义》，纽约1891年版，第65页。

④ 《人心论》，巴黎1745年版。

化境界。他不认为人类自然而然倾向于为非作歹，或具有妒嫉和无秩序之心。人自然会认识到别人的要求并具有正确的道德观。构成人类性格的真正因素是社会化的利己主义和开明的自爱精神，这乃是主导力量并由此导致最高级的社会活动。摩莱里的看法是，人类具有良好的品德，能够进步；并且由于受人类存在的法则所限，是注定要较彻底地社会化的。

因此，摩莱里认为，罪恶的根源是由次要原因而不是由首要原因引起的；尤其是象环境所表明的那样，是社会力量失调所致。倘若摧毁那些歪曲社会本能的机构，那么，罪恶的势力便可根除，社会便可得到拯救。在这一点上他预示了欧文的思想。

他认为当今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和随之而来的人类苦难，是由私有财产制所导致的<sup>①</sup>；因为私有财产制腐蚀了原来共产主义在人民当中所占居的领导地位，从而造成社会上一切罪恶和混乱的基础和根源。他和巴贝夫以及巴贝夫的某些继承人坚持废除私有财产，实行一切财产公有，共同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所有的社会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这种共产主义将把财产控制权从私人手中转移给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并使财产所有权社会化。生产物资不准私有。只有身边使用的物品才可以为私人占有。<sup>②</sup>

工业要由公众管理。每个人都成为公仆，做切实的工作；因为从上至下都没有让有闲阶级生存的条件。事实上他首次提出了后来为圣西门和其他几个人所用的名言：“按能力计报酬，按功效定能力”。<sup>③</sup> 这乃是他重建社会的基础。此外，象傅立叶一样，摩莱里认为——人们所讨厌的不是劳动，而是它令人不快的一面。使劳

---

①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巴克斯所著《法国大革命的最后阶段》，波士顿1911年版。

② 《自然法典》，第152页；古思莱著同上书，第263页曾论及。

③ 同上书，第153—154页；古思莱著同上书，第266页。

动充满吸引力，使游手好闲令人厌恶，不受欢迎，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莫尔和其他在他之前的早期近代乌托邦思想家以及在他之后的傅立叶和欧文都要求建立免费的义务教育体系。其目的在于推行一种既能促进个人利益也能提高公众福利的教育。他还把重点放在工业技艺的培训上。既然在他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必须劳动，那就没有一个人能免受这种技艺训练了。

至于婚姻问题，摩莱里坚持认为每一个达到成年的男性公民都必须结婚。为此，他主张举行“婚姻节”。在那里男人可以为自己物色到妻子，只要女方同意的话。满40岁以后才让过独身生活。

摩莱里就这样同过去、无知的传统习俗与偏见决裂，不断提出作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基础的新社会结构的计划。

### 三、巴贝夫

在法国革命的后期，我们注意到了可以称之为第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物。他以一个对文明社会制度的批判家和理想社会的画家而著称。然而，他是一个更加伟大的政治革命家和叛逆者。他把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献身于这些危险的活动。他的名字之所以流传于世，是由于他曾密谋通过暴力以创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除了政治平等外，还保持经济平等。

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于1764年出生于法国埃纳省圣康坦城中一个显然是很好的家庭里。他从16岁时开始独立谋生，从那时起他的整个一生充满了惊涛骇浪。在年纪较轻时他就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并在先贤祠协会<sup>①</sup>和秘密协会以及其他几次预谋暴动的组织里担任过十分惹人注目的角色。他对当局的辱骂非常凶

---

<sup>①</sup> 因开会地点命名，先贤祠是法国民族英雄庙。——译者

猛，在活动中又十分激进，终于在1797年被送上断头台。<sup>①</sup>

巴贝夫从未系统阐述过他的乌托邦思想。关于他的思想，必须从他主编的《人民代言人报》、他参与撰写的《平等派宣言》和他同一时代的共事人邦纳罗蒂的著作中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sup>②</sup>由于这些思想主要是重复摩莱里说过的话，因此我们不拟加以赘述，只在此简要地概述其最重要的原则。<sup>③</sup>

他纯粹是一位提倡高度集中制的共产主义者。他所坚持的理论大都出自《自然法典》。还可以补充一点，摩莱里的思想对巴贝夫的《平等人的社会》奠定了明确的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不过，他的确比摩莱里更鲜明地强调了平等权利。他说：“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而幸福存在于平等之中。”他曾反复强调这种平等应是完善的、绝对的，因为他具有卢梭的思想，即认为社会组织应以相互间缔结的契约为基础。加入这种契约的每一个成员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在这个原始的社会里，财富和个人机会都是绝对平等的。不平等是由早期文明所引起的，后来成为法则并在民法中确定下来。巴贝夫想回到这种自然状态。社会的目的在于维护这种平等。<sup>④</sup>

这个理想的社会组织要求财物和社会地位共有。他说：“自然给予每个人平等享受一切财物的权利。”<sup>⑤</sup>他认为私有财产是正义和秩序的敌人，因此他希望在共产主义取得统治地位时能消灭社会混乱、犯罪和懒惰的现象。只有到那时，社会问题才能得到永久

---

① 关于巴贝夫的传记、活动和理论，可参阅巴克斯的《法国大革命的最后阶段》，波士顿1911年版。

② 巴贝夫口述，《为平等而密谋的历史》，2卷集，布鲁塞尔1828年版。

③ 伊利，《现代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纽约1883年版中有《巴贝夫》一章。它简要而精辟地阐述了巴贝夫的一般原则。

④ 见巴克斯著同上书，第114页第二段所载他的起义委员会的总目的的官方声明。

⑤ 见所提巴克斯著作第一段。

性的解决。他和他的追随者还极力提倡每个人对吃饭、住房、穿衣、洗涤、取暖、照明和医疗都拥有权利。简言之，他的制度的目的就是，在使用与分配物品的种类与数量上都达到绝对机械地平等。

巴贝夫还提倡所有的劳动都应该在国家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并通过法律加以制约。他还为法国的生产组织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同摩莱里的主张一样，没有一个人能免除劳动，也没有人会过于劳累。身体弱的人不会闲着，但可免除繁重的劳动，而让身体较好的人承担较繁重的工作。然而，并非所有的工作都被认为是有用的。他们对文学，艺术尤其不喜欢。政治权利的大小要看公民们的劳动是否有用。

巴贝夫进一步认为，只要不同社会阶级之间还存在资财不均衡的状态，社会就必然经常动荡不安。他说：“在一个真正的社会里，不应有贫富之分。”<sup>①</sup>除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外，<sup>②</sup>其它社会差别都是有害的、不自然的。由于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需求和相同的自然能力，就应该享有同样的文化和同样的衣食的机会。因此他要在财富方面建立阶级间的平等，这样才能消除干扰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基本因素。所有的差别甚至衣着上的差异都要废除掉。

与大多数其它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精神有所不同之处是，教育只局限于对一些基础知识和对有实用意义知识的掌握上。他的教育主张乃是把人拉平到愚蠢得自我满足于平庸的程度。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象其它乌托邦思想家那样令人兴奋的想象力和光彩夺目的理想。他的规划散发出一种法国大革命时期粗俗的唯物主义和愚笨的平均主义气息。在各方面的干扰和相互对抗集团的包围下，他的思想未能独立飞向后来的空想主义者所达到的高峰。

---

① 巴克斯同上书，第7段，第115页。

② 《平等派宣言》。

## 四、圣西门

从圣西门身上我们看到他对那个时代作出了同巴贝夫完全不同的反应。尽管他参加过美国革命，又经历了法国大革命，但他并没有全盘接受平均主义思想，从而产生一种象巴贝夫那样的反动和倒退的色彩。毫无疑问，圣西门是个天才，具有真知灼见——一个大胆而有创见的思想家和改革家，他成功地使自己提高到超出他那个时代一般思想之上的水平。

亨利·圣西门伯爵于1760年生于巴黎。他出身于一个与查理曼有同宗关系的贵族家庭。这个家族在法国历史上声名显赫。还在他16岁时就可以看出，即使他没有特殊能力，但至少已经显露出具有特殊思想的迹象了。当他听说由于他父亲和他叔叔圣西门公爵吵架，叔叔取消了他的财产继承权时，他说：“我失去了圣西门公爵的爵位和财产，但我却继承了他追求荣誉的热情。”<sup>①</sup>他让他的仆人每天早晨用这样一句向着伟大目标奋斗的话语来叫醒他：“起来吧，伯爵，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你！”<sup>②</sup>以此来培养他追求荣誉的热情。17岁时他来到美国，支援美国的革命战争。在那儿逗留的那段时间对他后来的一生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并为之指明了方向。这一点可通过他晚年所写叙述他在美国经历的“书信”摘抄得到说明。由伊利教授摘录的其中一段说，“我做的并不是一个战士的工作；我确实是被一种完全不同的、完全相反的活动吸引着。摆在我面前的生活目的就是研究人类的思想活动，以便我能为改善文明而做出贡献。从那时起我就把我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

① 伊利著所引《现代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第54页。

② 同上书，第54页。



这项工作。我为它奉献了我整个的一生。”

回到法国后，他原打算从事一些科技性和工程方面的工作，但没有得到别人的支持和鼓励。他的追随者后来重新捡起了他以前的一些工作并加以完成。他对周围的政治活动也颇感兴趣。他无视他原来贵族家庭的传统和教养，站到了人民的一边。事实上，由于对贵族丧失信心，他放弃了伯爵的尊称，成为他那个公社的负责人。不过，由于他的贵族出身受了不少折磨，被关押将近一年。

从那时起，他便过着贫困交加的生活。他写出了崇高的而发人深省的著作，成为他所设想的伟大社会组织中志同道合的信徒和赞赏者的领导人。在这里，值得顺便提起的是，奥古斯特·孔德也是他最著名的门生之一。孔德在划时代的著作《实证哲学》一书中，把他的老师的基本思想发展成为详尽系统的形式。圣西门在完成了他自己的巨著《新基督教》后不久，于1825年去世。

当圣西门看到周围许多国家在社会治理方面完全陷入混乱时，他却不象巴贝夫那样认为革命是重振社会的方法。革命是一种毁灭性的行为，吞没一切好的和坏的事物。圣西门想要有一个建设性的、逐渐改组社会的运动，他便和他的学派开始通过讲演、出版刊物和实际行动使公众接受他们的思想。他们并不是旧社会的破坏者，而是为了可能实现的社会十字军。知识和工业是他们重新组织社会的主要手段。封建主义、神学教条与信仰是不适于新时代的。人们必须采取新的方法。发现并运用这些方法之后，人类的黄金时代就会到来，就可以保证社会达到完美的境界。正是对这些措施的探讨，才使我们对圣西门的乌托邦思想有所了解。由于他的方案一般是人所共知的，我们只专门阐述与我们的研究有直接关系的那些观点。他的最大的乌托邦思想机制乃是具有天才或能力的特权阶级以及其他方法。后者指社会宗教，是对前者的补充。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以后会详加论述。

如果说圣西门的特权阶层是以某一古老制度为依据的话，那就是康帕内拉的制度，因为二者非常相似。由于具有经过证实的优点而被仔细挑选出来的形而上学家和三位亲王以及其他地方长官的统治，很可以作为圣西门所提议建立的伟大的、相互依赖的而等级分明的国家机构的模式。但我们并不知道究竟圣西门是否早就熟知康帕内拉的想法。不管怎样，他的观点是对共产主义和法国革命时期的机械平等思想的反动，也摈弃了法国革命前的封建势力和教会势力。他并不认为，封建世袭的，或由制度规定的治理方法，或无所不包的平庸才智，能将社会治理好。他相信天才，不是军事天才，而是科学天才、学者和工业首脑人物。这种信仰表明他完全背离了同时代人的思想，真实地表明他脱离了旧的道路，另行寻觅新的非常规途径。他看到封建贵族、军人当权，甚至旧式的教士问政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不应寄希望于以战争作为正式行当来建立国家，因为从今以后办工业才是首要的任务。今后人类社会的真正目标乃是生产对人类生活有用的东西，正如他用更普通和夸张的话语表达的那样——“联合起来，开发全球”。

圣西门在《组织者》（1819）一书中，开始论述三种对社会进行控制的计划<sup>①</sup>。它是一半实际，一半空想，和康帕内拉的《力量、智慧、博爱》三合一思想大体上有相似之处。圣西门想要建立三个院：一是发明院，二是考核院，第三个叫执行院。第一、第二院由工程师、专家、文人、艺术家组成。他们的工资由包揽一切的国家支付；但这两个院也只不过是咨询机构。第三院的成员都是大工业领导人、资本家和银行家。他把行政权、控制税务和开支权都交给第三院。这样，他就把真正的世俗权力交给了他们。但是他希望尽量把他们作出的指令提交给其他两院去经受最科学的检查。对于那些由文人和艺术家们辅助的学者们则完全赋予以精神权力。圣西

<sup>①</sup> 见格罗厄姆，《新旧社会主义》，纽约1891年版，第74对开页。

门在他所著《工业体系》(1821)一书中作了一些改动,取消了学者和文人的地位;因此免去了他们的精神上的权力,尤其是学者们,其理由是这种权力很容易腐蚀科学团体。世俗权力只留给实业阶级和资产阶级。从学者手中撤回的权力将交给实证哲学家。这样,他所设想的政府便成为由科学家集团用最科学的方法来管理社会事务的政府。

因此,圣西门在他的计划中消除了世袭官爵的贵族阶层之后,并没有企求绝对民主制来领路。相反,他却发明了一个由新的专家贵族统治的国家。这种由杰出的、称职的官员来统治世界的想法是圣西门的最大贡献。正如他想象不出一个人人皆主人的工业作坊一样,他也无法想象出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要做好工作和管理好社会,就必须由专家当政。圣西门毫不动摇地相信世代处于领导阶层的祖先的后世子孙的领导能力。他正如后来的卡莱尔一样,盲目相信伟大人物的价值。他向斯塔尔夫人求婚时说道:“夫人,正象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男人一样,你也是最伟大的女人;并且毫无疑问,我们的孩子将会更加伟大。”他的朋友和追随者都是一些有卓越才能的人,后来都以伟大的工程师、工业首领、科学家、精神贵族和天才著称。这些人都是上述救世论的实际榜样。

这个庞大的阶级组织中,地位是按能力来调配的。这种做法又一次反映了早期现代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儿童的才能要经过挖掘,然后按照那些看来对他们最适合的职业加以培训。他旨在为才能开路,使那大有希望的人摆脱在生活竞争中由于政治、经济特权的障碍所处的绝望困境。因此他要求建立一个把土地、资产和一切劳动工具收归国有的国家。应当废除由于继承权而在生活中享有不公平的优越地位的做法,以便排除对有才能的人的人为干扰。但这样就不能使人们共享所生产出来的财富了。工人的能力各不相同,因而应按比例付酬。“按工效定能力,按能力计报

酬。”报酬要按能力而定。可以假定，在未来的社会里会和当前一样分成许多等级，但以个人为基础，而这乃是能力、智力、技能和道德品质各有不同所致，而不是出自继承财产和地位的缘故。此外，不应把妇女排斥在外。他认为女性仍处于宗教、政治及公民地位卑下的奴役之下。圣西门想废除这种奴役状态，使妻子和丈夫处于平等的地位。在这个国家里，妇女也象男子一样，将有机会取得同样的成就。<sup>①</sup>

这就是圣西门的基本的乌托邦思想。他相信人们天生的不平等，并视此为社交的基础，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条件。认识到这个真理，最伟大的人就会登上社会的顶端，而社会也正是由时代的出类拔萃的人物来管理的，从而使最大多数的人享有最大的益处。所有想要改善人类状况的努力都应以此作为起点向前迈进。这乃由专家所取得的进步和完美境界。少数人的知识可以为全人类服务；弱者由强者领导前进。圣西门临终时说：“我的一生寓于这种思想之中：保证使所有的人都能最充分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sup>②</sup>倘若做到这一点，那么，完美的社会就会实现，因为这乃是真正的平等。

他的第二个伟大的乌托邦思想乃是社会宗教。这对他的第一种思想是个补充。为了保证人们能团结起来并积极地执行“按能力计报酬”的原则，有必要利用宗教的向心力。这对激励各级领导人去攀登所担任工作的最高峰是有必要的，也可以使普通工作人员对他们所处地位感到公道。他是企图要找到一种既能治理人们的外在行为又能去治理人们内心活动的权威力量。

这种权威必须是一种基于新基础的新道德观。他想使他的等级社会渗透着道德和宗教理想；但它们必须与事物的新状态和新知识的“实证”情况相适应。用现代术语来说，它们必须通过社会

<sup>①</sup> 伊利著同上书，第71页。

<sup>②</sup> 引自伊利所著同上书，第61页。

效益的考验。在寻找这一内心主宰的过程中，他选中了基督教原则。这是具有伟大的伦理和人道主义价值的原则，它使社会问题成为宗教的基本问题。圣西门说：“新基督教所有的道德观念都是由这个原则派生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应以兄弟相待。”这是原始基督教的原则，应予以极大的赞美，而它的新形式应是：“宗教必须有助于实现社会的主要目的。这目的乃是尽快地改善穷人的处境。”<sup>①</sup>他在他的《新基督教》(1825)一书中，当谈到最下层阶级之上的所有阶级时，对此作了一点小的修正。他说，“所有的人都应为数量最多而又最穷困的阶级在发展物质、道德和智力方面作出贡献。”<sup>②</sup>这就是圣西门的门徒们的出发点，并导致后来组成负有教士职责的圣西门派。固然，建立这样一种宗教的动机可能是纯粹功利主义的，或许甚至是实用主义的；但实际上，它仍然具有真正的宗教性质，因为它认识到精神力量、博爱原则和相互敬爱原则的道德效力，因而是最崇高的乌托邦思想。

## 五、傅立叶

当法国革命失败使得圣西门摒弃机械的平均制度和随之而来的趋于平庸的思想，并且使得他去细心观察社会，研究社会的历史与发展，终于发现了他以才能为伟大原则的等级或贵族制度作为最伟大的乌托邦式的解决办法时，另一位法国人正在他自己的思想深处考虑着并探索着一种新的社会科学。他的社会科学原则一旦为人们认识并付诸实施，就会铲除人类的贫穷、罪恶和别的灾难性因素，从而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理想和完美的社会。这个人的目的就是要找出统治社会的规律。在这方面，他可以号称为后期的

<sup>①</sup> 伊利著作同上书，第 65、66 页。

<sup>②</sup> 格雷厄姆引语，同上书，第 73 页。

社会学家，尤其是现代心理社会学家的开路人。

此人便是沙利·傅立叶。他于1772年出生于贝藏松的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个布商。少年时期，傅立叶就显得相当早熟。11岁时，由于在拉丁语和法语方面的优异成绩而获奖。他酷爱音乐和花卉，表现出非凡的技工能力。他在父亲去世后继承了大约十万法郎的遗产。他把这笔钱投入一家外贸公司，但在1793年里昂被围时破了产。在恐怖时期，他的大捆大捆的棉花被用作街垒，他的粮食被用作军粮。后来他坐了牢。释放后他参了军，显示出极大的才能。在早期生活中，他逐渐形成这样的印象：当时的社会组织是个灾难性的失败，应该处以死刑。他在他周围看到的尽是谎言、欺骗、浪费、不和、失调。因此，他很早就着手设想一个社会方案，使它能发扬真理、诚实的作风、节约资源并发展我们固有的爱好。<sup>①</sup>他卒于1837年。

傅立叶的乌托邦思想大部分是从他的伟大发现中演变而来。<sup>②</sup>牛顿发现了宇宙的万有引力，莱布尼茨曾加以揭示和解释，而傅立叶却发现了另外三种运动，即社会运动、动物运动和有机运动。每种运动都受这种强有力的引力规律的支配。他发现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具有这种运动体系的统一性。在精神世界方面，所谓三种运动的统一性就是“情欲的引力规律”，它是支配整个人类活动和学识领域的伟大基本原则。

这种原则以人类行为的泉源即感情或“情欲”为基础。他说：“我们一直认为与社会的整体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情欲只倾向于社会的和谐一致，而这是与我们想到的情欲相距甚远的。”他认为没

---

<sup>①</sup> 关于傅立叶的较详尽的传记，可参阅伊利所著《现代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第82—84页。

<sup>②</sup> 傅立叶的主要著作有《四种运动的理论和普遍的命运》，1868年版；《论家庭农业协作对工业的吸引力》，这部书后已列为《关于普遍和谐的理论》，1822年版；《新的工业与合伙关系的世界》，1829年版。

有有害的情欲和冲动。他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上的苦难和纷争出自于约束和阻碍人类固有的情欲、冲动和本能。在这一点上，他反映了卢梭的思想，认为自然本来就想使它们得到满足。如果它们受到了束缚和扼制，它们就会象被锁住的老虎一样挣扎。倘若听其自然，它们就会为社会的和谐与幸福作出贡献。他不愿扼制情欲，而是要增加情欲的强度，并通过使情欲经常处于高涨的状态来对个人的情欲加以控制。将这一原则应用于社会，在他看来就是：倘若人们的欲望不受束缚，那自然是倾向于做好事的；由于他们受到愚昧的、称为文明的陈旧制度的束缚，才干了坏事和有害的事。文明必须与情欲相适应，因为情欲是不可更改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社会形式则是可变的、转瞬即逝的。社会秩序应该是这样一种形式：使情欲能增进社会的利益而不是对社会造成损害。傅立叶相信，听任人类情欲自由发展，便可成功地为全人类解决最大的幸福问题。

对这些情欲应进一步加以培养，而不应加以压抑；因为它们是同自然本性和谐一致的。他把它们<sup>①</sup>分为三大类共十二种。第一类属于“奢侈”类。这就是五种感官的欲望。它们对个人或多或少起着主导作用。这五种感觉分别是味觉、触觉、视觉、嗅觉、听觉。按照词的原义，这些都是属于感觉或富于敏感性的词。第二类是“四种单纯心灵上的欲望”。它们倾向于构成感情上的组合：和睦或友谊的组合；爱情的组合；双亲或家庭的组合；志向或团体的组合。第三类情欲是由傅立叶发现并由他揭示出来的总称为“分配的情欲”构成“谢利叶主义”或欲望系列。它们是“神秘的”情欲或想搞阴谋诡计、图谋不轨的欲望。其目的在于激起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另一种是蝴蝶情欲，喜欢变化的人需要这种感情，如场景的变换、

<sup>①</sup> 见伊利所著同上书，第81,82页，沃伦：《十九世纪的十位法国人》，纽约1904年版，第55页。

花样翻新等，以刺激五官和心灵。最后是“组合”情欲或对联合的欲望。这也是多种感觉在快感交织中产生的一种兴奋状态，同时也使精神上得到了享受。所有这十二种情欲结合到一起，便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控制一切的推动力，称为“统一主义”或“和谐主义”。这乃是个人要把他的幸福同他周围所有的人的幸福和人类的幸福协调起来的意向。这是人类文明前所未有的情欲。这些情欲将树立起一种无限的博爱精神，一种普遍的善良意愿。但是为了树立它们，就必须分别定出五种感官的职责，使四种感情方面的情欲获得充分的自由并使“分配情欲”得到公正的分配。傅立叶再三强调要让所有这些情欲听其自由发展。任何其他道路都是与本性背道而驰的。通过放纵情欲，才能使它们培育出更高形式的情欲，创造出新的情欲；最终走向和谐与幸福的完美状态，实现完美的社会。

对傅立叶来说，他所谓宏大的主宰一切的“统一主义”情欲，“就是所有的人自然地倾向于聚集在社会集团里为相互的利益而工作，而不是竞争制度下的相互斗争。但是，为了使这种做法有效地发挥作用，就首先必须谴责并废除现存的人为环境。环境应对社会有所帮助。因此傅立叶提出这样一个理想的环境并称之为“法郎吉”——在这个环境中，所有的情欲得到了完全自由的发挥，可以和谐地联合起来，起到有益于社会的作用，从而证明这是一个理想的环境。他使这种社会组织或社会单位成为人类社会的构架。

每个“法郎吉”是一种由适当数目的个人联合体。这些人居住在号称密集堂的建筑物中，占地约三平方英里。在这块土地上靠整个集体的一致努力经营工农业，在经人民选出的管理人的指导下进行劳动。每一个社团都居住在巨大的中心建筑密集堂中，其中有作坊、住所。在那里，共同的消费经济带来了现存社会分散的住户无法理解的舒适和豪华程度。密集队的适当人数亦视人类的十二



种情欲而定。这些组织就象许多个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性格一样，可以用 820 种不同的方式加以组合。工人的法郎吉不应缺少任何一种组合形式，否则就会出现不和谐的现象。400 人可以作为最低数，但不太理想，故提议以 1800—2000 人为适宜。<sup>①</sup>人太多会发生纠纷。但是，即使 1800—2000 人也不能毫无秩序地拥在一起。要使他们合理地、根据相同的爱好按 7—9 人组成系列，再组成 24—32 人一组的集体，然后把这些人结成一个法郎吉。当时，傅立叶并不急于建立一个国家。他预见到未来世界上的密集队可能在某一伟大的首领下组成联邦。这位首领将在君士坦丁堡定居。对于这件事，泰勒评论道：“由于那时还没有铁路，也没有电报，傅立叶可能认为，从自由的观点来看，这样一个远方的君主，是会安然无恙的。”<sup>②</sup>

在法郎吉里，每个人的地位取决于他本人。他完全可以自由选择一种或几种职业，因为傅立叶特别提倡工作多样化。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加入一个构成工业组织单位的 7—9 人基础小组。象康帕内拉一样，傅立叶希望能使工作同劳动者的爱好和能力相适应。他还说过，工作应该永远是快乐的源泉。他认为，在现存的社会里，工作使人厌烦而不是引人入胜，优秀的才能不能得到发挥而是受到抑制。从来没有设法使能力与工作相适应，也没有为青年人提供机会以发现自己才能的志趣所在并为之而锻炼自己。<sup>③</sup>在法郎吉里，当劳动使人感到疲倦而对之不感兴趣时，小组的成员就加入另一个新的小组。这样，他们就能精神焕发去干新的活。傅立叶认为，在他那个时代，所谓“懒惰”实际上不过是对单调工作的厌恶而已。“蝴蝶”（喜变的）情欲必须得到满足。在密集队里，没

① 关于同样的叙述见伊利所著同上书，第 93 页。

② 泰勒著《过去与现代的社会主义领袖人物》，伦敦 1908 年版，第 39 页。

③ 斯克尔顿所著同上书，第 67 页。

有什么工作是单调的，因为所有的人都可以做他们想要做的工作；而且由于每个人都想显示一下自己，所以全都愿意尽快努力工作。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爱好去劳动。竞争的思想、自爱的思想和其它动机，由于与自我利益相一致，都会促使每一个人奋力向前。<sup>①</sup>这样，生产就会增长。因为，只有当人们能去做他们想做的工作，能同他们喜欢的人在一起工作时，劳动才会是光荣而具有吸引力。今天雇人干活的经理们可以从读傅立叶的著作中获益。也许有人要问，那么令人生厌的工作怎样去完成呢？傅立叶会回答说：社会需求的性质和人们劳动的方向之间总会不断相互适应。生产会保持达到最大限度。这是因为“神秘的”情欲会引导一个小组设法超过别的小组。

总的说来，傅立叶倾向于推行复杂的按劳付酬体制。公社中每一系列所分得的红利是不同的，直接与促进团结和睦的重要性成正比，而与所承担工作易做的程度成反比。这种分得的酬金又分为十二份。其中五份作为劳动基金；其原则是干重活或干令人厌烦的活的人多得报酬；三份是按“才能”分配，所谓“才能”乃是由同事们推选出的个人担任的职位来衡量。剩下的四分作为私人对公社投资的利息付出，因为傅立叶允许在共同使用的范围内有私人的财产和利息。如果否认这一点，那可是违反了一种最强烈的情欲，而傅立叶是过于热衷保护自由意志的，他对此不会持相反的态度。

与他的情欲和吸引力至上的学说严格一致，他提出了一种彻底的自由恋爱制度。按照他的想法，法郎吉一方面取代了家庭，另

---

<sup>①</sup> 斯克尔顿对此评论道：“傅立叶确实指出了现代工业的弱点，认为工人的工作单调。但解决的办法却在于如何使每个人的能力适应工作，这只有普及教育才能做到；在于改进工作环境；在于缩短工时，让工人可以自由利用闲暇时间；而不是象他的法郎吉那样，在有组织的情况下马马虎虎地干点活，把工作当儿戏，没有适当的职业培训。这些都不过是梦想而已。”同上书，第84页。

一方面作为一个组织单位又取代了国家。但对两者他只赋予非常次要的作用。<sup>①</sup>事实上，婚约完全是自由的。未来的妇女们将获得解放，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地位。由于妇女同样参加法郎吉活动，她们的经济便有了保证。她们可以自由选择永久性的婚姻，也可以随便交往。友谊、父子关系、个人志趣都是自由的。婚姻和家庭关系都出于自愿，因为有真正的吸引力便无须采取强制和约束的措施。

这些思想很快就从法国传入美国，结果便产生了许多试图加以试行的想法<sup>②</sup>。傅立叶的计划确认了这一事实，即社会组织必须集合在工业生活要求的周围。此外，工业生活还必须受制于每个人心灵上的欲望。按照这种理论，个人的自由不会受到限制。傅立叶认为，他的情欲理论和他的相互联合原理结合在一起，将改变人类的处境。他的办法是要满足大多数人共同的基本欲望，并以各种利益与欢乐诱使他们走向完美的境界。

固然，上述各节看来是颇为美妙的梦想，有时几乎达到可笑的程度，但确有不少实质性的东西。有好些东西我们只是到现在才逐渐认识到其全部重要意义。傅立叶有一种现实主义的气质。他认识到要改进人类，我们就必须从现实情况出发。然而，人根本上是自私的，只想到自己。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人的本能素质和由此而产生的推动力使然。但是这些特点都是难以用新设想出来的思想因素所能改造的。我们现在的社会改革家尤其是那些有哲学思想倾向的人，最好能认清这一点！我们和傅立叶的分歧之点，在于他走得太远了，从而终于走到了显然反社会的边沿。

---

① 见斯克尔顿所著同上书，第79页；与泰勒所著同上书，第33页。

② 关于傅立叶主义在美国的情况，可参见康芒斯及其合作者所著《美国劳动史》第4卷，第2章以及康芒斯所编《美国工业社会实录》，第7卷。

## 六、卡贝

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埃蒂耶纳·卡贝。我们在此只研讨他乌托邦思想的最基本之点。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模仿摩莱里和巴贝夫，要求进一步的平等，并试图抵制能力遗传的观点。他代表了一种与圣西门、傅立叶一再强调的根据能力划分等级原则相对立的力量。当人们问到他是否不对能力、才智和天赋加以区别时，他回答说：“是的，难道这些东西不是大自然的赏赐吗？难道惩罚那些天资较差的人是合理的吗？难道理智和社会不应纠正那些因纯属偶然机会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吗？有的人由于能力高强，使得他们较为有用，难道没有因此而得到补偿吗？”<sup>①</sup>

埃蒂耶纳·卡贝是桶匠的儿子，1788年生于法国第戎省。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他成为一名律师，先是在他家乡的城市，尔后又在巴黎开业。他作为起义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参加并领导了1830年的革命。由于这件事，他实际上被流放到科西嘉岛；在岛上他被任命为大法官。他在那里又一次参加了反政府活动，反对路易·菲利普。后来，他被撤销职务，并被判处两年徒刑。可是他越狱逃走了，以后寓居伦敦。在伦敦，他受欧文学说的影响，成为欧文观点的信徒。在流亡期间，他熟读了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并为之倾倒。于是产生要写一本同样的小说来传播他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念头，就撰写出一部“哲理性社会小说”，名为《伊加利亚旅行记》。该书于1839年他返回巴黎后不久出版。在这部书里，卡贝完全模仿了莫尔的方法，把“伊加利亚”描绘成“福地”、“伊甸乐园”、“乐土”、“新的人间天堂”。<sup>②</sup>尽管本书的

<sup>①</sup> 《伊加利亚旅行记》，第102页。

<sup>②</sup> 所述各事详情，可参阅伊利所著同上书，第39—40页；斯帕哥所著《社会主义》，纽约1906年版，第50,51页。

目的不是要讨论卡贝的共产主义和伊加利亚极乐园的结构和物质方面的细节,但我们还是应该提到,卡贝对这种生活的外貌却进行了认真详尽的考虑的。政府、土地的划分、房屋的特点、衣着服饰,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按他的两条指导原则——绝对平等和博爱——描绘得淋漓尽致。正是他的这些理想引起了我们对这部著作的关注。<sup>①</sup>

卡贝在许多方面代表了现代化的、受过基督教影响的巴贝夫主义。他们两人都主张摧毁当时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以每一个人的自然权利为基础的新世纪,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权利基础之上并在国家的基础之上建立共产主义制度,通过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来重建经济生活。<sup>②</sup>巴贝夫的培育平凡人才的共产主义固然可以对一些禁欲主义者、性情古怪的人产生影响,卡贝的乌托邦思想却充满了乐观主义和蓬勃向上的精神,所涉及的方面广泛,达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巴贝夫的共产主义令人颓唐沮丧,而卡贝的共产主义则令人欢欣鼓舞。

绝对平等的原则是社会结构的基本法则。社会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把任何不平等的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各种行当和业务一律平等;制鞋工人和内科医生同样高尚。正如在上文的一段引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对有天资和才智的人不给予任何特权,因为天资是自然赋予的礼物。那些没有得到这份礼物的人不应受到处罚。每一个公民都从国家那里获得他的一切消费品;对所有的人一律配给住宅和家具;把大量缝制的、款式一样、质地相同的服装发给每一个人;人们在社会公共食堂里就餐。他们的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分配相同的用品和工作,享有平等的义务和权利,

---

<sup>①</sup> 对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所作最好的论述是勒克斯所作《埃蒂耶纳·卡贝与伊加利亚式的共产主义》,斯图加特1894年版。尤其是第111—160页。

<sup>②</sup> 马克思,《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史》,第1卷,第46页。

承受平等的负担、利益和娱乐。所有的人和事都表现出具有平等特征的国家社会组织；而所有这些都依靠人的自觉意志来予以实现。所有的事物都应通情达理，并对公共福利作出贡献。

但是，要维持这种绝对的理性上的平等，就要有国家，由国家来控制一切。这在国家对新闻、教育制度和宗教的控制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国家是唯一的印刷者。当然，“国家除了好书之外，不印制什么别的东西”；国家对书刊的检查是万无一失的，甚至烧焚了所有被认为是危险而无益的古籍。但是这与奥玛尔烧毁亚力山大图书馆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这样做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不是违背人类的利益：“我们点火烧掉的是坏书，强盗们和狂热分子却点火烧死无辜的异教徒。”<sup>①</sup>每一个公社、每一个省以及整个国家只许发行一种报纸，即一种商业性报纸、一种省报、一种全国性报纸。编辑由人民推选。他不能为个人的情趣和个人对时局的看法所左右。正如卡贝通过书中一个人物之口所说的那样：“为了根除这种弊病，我们决定只刊登简单的记录性文章，注重事实而不带有记者的任何评论。”<sup>②</sup>

教育也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卡贝把教育看作是他的乌托邦社会的根本措施。国家将推行深入广泛的教育——包括体育、智育、伦理、工业技艺和公民教养。父母负责把儿童教育到五岁。此后，儿童便进入国立学校，由精心挑选的教师对他们进行教育，伊加利亚人说：“教师教育国家。”青年人成年后应成为合格的生产者、公民、丈夫和妻子。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始终力求教导男女之间要互相敬重；因此，他们是男女同校。

卡贝感到仅仅通过理性和科学还不能使社会溶为一体、重新振作并重新组合起来，还要有由信仰和宗教才能注入的那种力量

<sup>①</sup> 《伊加利亚旅行记》，第 127 页。

<sup>②</sup> 图岗·巴拉瑞斯基引语，见所著同上书，第 14 页。

和生命力。因此，他试图提出一种正式的国教。他希望这种国教能成为全体人民宗教精神的表达方式，其基于包揽一切的基本信条则由一批牧师、教授、哲学家、道德学家和其他学者共同拟定。其重点是敬仰上帝和灌输道德思想。事实上，它是力图仿效早期基督教，强调博爱、平等、自由、和睦以及财产公有的共产主义原则。

在这些论说中，最能起平等作用的是博爱精神。他想要使全体人民都普遍充满这种精神。这是他整个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内容。这里，他提出了一个从未为其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表达过的思想。当伊加利亚人被问道：“你们的学科是什么？”他们回答说“博爱。”“你们的原则是什么？”“博爱。”“你们的教义是什么？”“博爱。”“你们的理论是什么？”“博爱”<sup>①</sup>这是一个期望创造出至善至美的伊加利亚社会的理想。在那里，没有犯罪现象，没有警察，没有监狱，没有贫民窟。人人都是他兄弟的保护人。

象傅立叶的理论一样，卡贝的理论亦被人们广为接受，并努力将之付诸实施。但是，象许多夭折了的社会改革纲领一样，这些努力都失败了。这是因为，一方面计划不切合实际，另一方面完美无缺的人太少了。<sup>②</sup>

## 七、勃朗

路易·勃朗于1839年即卡贝发表《伊加利亚旅行记》的同一年发表了一部巨著《劳动组织》。但是，勃朗的这部著作与他同时代人的著作截然不同。当卡贝正在勾画出一幅乌托邦的图景时，勃朗就在考虑一个计划周密、旨在促使实现完美社会的经济组织的

<sup>①</sup> 经穆克尔引语，见所著同上书，第148页，亦为伊利所引用，见所著同上书，第50页。

<sup>②</sup> 关于在美洲实现伊加利亚式社会的企图，可参阅伊利所著同上书，第40页，以及肖所著《伊加利亚，对共产主义史之研究》，纽约1884年版。

细节了，并提出了实现这一组织的方式方法。

身兼数任的勃朗于1813年10月28日生于西班牙的马德里<sup>①</sup>，他是记者、作家、政治家，又是社会主义者。他的父亲当时任约瑟夫·波拿巴治下的财政总监。然而，他们不久就离开西班牙前往科西嘉岛，在他母亲的故乡度过了他的童年。他就读于罗德兹学院，大约在1830年赴巴黎深造。革命使他的父亲破产，勃朗的处境也很窘迫。他当过誊写员，教过书，卖过文，以此来维持生活。最后，他成为一家报纸的编辑和几家杂志的撰稿人和《进步杂志》的创办人。他的《劳动组织》一书在出版前曾发表在这本杂志上。后来，勃朗因他的两部历史著作而成为著名作家<sup>②</sup>。他于1848年革命中脱颖而出，成为1848年2月临时政府的成员之一。然而，我们即将看到，他所倡导的措施并没有取得多大成果。倒霉的政治运动迫使他于5月逃往比利时，后来从那里又前往伦敦。他在伦敦一直生活到1870年拿破仑三世垮台。回国后他被选入国家委员会，在委员会中站在左派一边。但是，他在这个组织里的活动远非激进，有时几乎是保守的。他的一生坦荡无私，清白无瑕，意气风发，诚恳待人。伊利说：“他始终不渝地代表被压迫的人类默默地倡导他的信条，所以博得了公众的爱戴。当他于1882年12月6日于法国的加恩逝世时，国民议会投票决定为他举行国葬。”<sup>③</sup>

路易·勃朗要求建立劳动组织的想法是由于受到圣西门的影响。其实，他那本名著的书名和许多改革的办法都是借鉴于圣西门的，尤其是他关于由国家组织劳工的总想法。象他的先辈那样，他看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他那个时代的主要弊病。因此，他赞

① 伊利著同上书，第109页。

② 《十年史——1830—1840》，共16卷，1844年版；《法国革命史》共12卷，于1847—62年陆续出版。

③ 伊利著同上书，第114,115页。



同必须创立社会科学,这门学问可以事实为基础,为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制订措施。但是,与圣西门、傅立叶不同之处是,他不仅是一位社会改革家,因为他试图把前辈们探讨过的社会改革计划付诸实践。他不象他的前辈那样利用人们的革命热情、宗教方面的狂热性、自私自利的心理、博爱观和公众舆论,而是利用社会的政治机制作为使他的社会复兴最理想的手段。他胜任愉快地集政治家和改革者于一身。这样,勃朗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就同萨沃纳罗拉与伦理-宗教性乌托邦主义者的关系采取的立场是一样了。他试图利用政治权力建立他所信奉的理想的可行秩序,并象萨沃纳罗拉一样为反动势力所颠覆,于是美妙的纲领反而使自己自食恶果。勃朗的思想在政治和进化方面介于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之间。他主张政治改良,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则引用了黑格尔的原则。勃朗是一个乌托邦思想家。因为,他认为在当时原是不可能的事可以变为可能,他的计划可以成为现实。

正如所有具有社会主义头脑的思想家一样,对勃朗来说,人类生存的目的就是要追求幸福。任何一个为人们可接受、可容忍的社会团体都必须使人类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得到幸福。可是按他的分析,这种想法在目前的社会行不通。因为当今社会是一个竞争、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统治一切的社会。其结果便是贫困和不幸,人类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这种情况必须由一个崭新的劳动组织来纠正,这个组织要摒弃个人主义、私有财产和个人竞争——现存社会的基本要素——而以博爱为其指导方针。<sup>①</sup>这种不公正现象长期存在的基本原因在于社会机构不能为人们提供通过自己的劳动而生存的保证。贫困潦倒的无产者不能把自己从经济奴役中解放出来,因为他们既无生产工具也无生产资料。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取得为社会所公认的“工作权利”。以上就是勃朗的乌托邦

<sup>①</sup> 见伊利著同上书,第117页。

思想。

第一步是设法确保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这是国家应尽的职责。国家通过建立社会工场——农民的农场、工人的工厂、商人的店铺来履行这一职责，“逐渐地而不是突然地取代私人工场。”<sup>①</sup>勃朗十分清楚，国家在重建经济结构中的作用十分重要，要是国家的作用能恰如其份地得到发挥的话。他认为，为全体人民的利益建立这些“社会工场”、通过管理这些工场的法令并监督这些法令的实施，乃是国家的职能。但他希望国家是一个用民主方式组成的国家，一个随着工场的建立和受到保护，随着经济上各阶级最后消亡它自身也会消亡的国家。国家在他看来是一种难免的祸害，但在时间的流逝中行将自行消亡。

然而，在当前，国家却要把所有那些就其性质而言可以或需要集中管理的工业部门调动到自己的手中。因此，他鼓励由国家收买铁路、运河、矿山、大工业企业、银行和保险公司。此外，作为临时的补救措施，应向工人集体发放国家贷款或发放由国家保证的私人贷款，使工人们用以建立起自己的工场。这样，国家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有助于使私人和资本主义的企业及其所有的弊端，逐渐为国家控制下的劳动组织和联合企业所取代。不久，所有生产同样商品的组织分散的团体将组合成为一个政治-经济体系，由中央加以管理。于是竞争将不复存在，各个工业部门的关系将处于相互平等的地位。到那时，经济统一和通过经济而形成的社会统一将得以实现。这样，我们就建立了我们所期望的一种原始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每一个生产部门都置于受国家轻微控制的、有组织的工人手中，并由他们来使用为国家所提供的生产机构。每一个工业部门在市场上都被看作是单独的企业，减

<sup>①</sup> 《劳动组织》，第 13、14、17、18、199 页。

\* 基尔特是当时的行会组织。——译者

去了应向国家缴纳的部分利润之后，全部收入在各成员中进行分配。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从现存的社会逐步转变到理想国家的过程。与巴贝夫、傅立叶的纲领相比，它是一个颇有希望的而又较为实际可行的纲领。

勃朗象圣西门一样也看到了会有社会等级差别的存在。人的智慧、能力和才干千差万别，但应充分尽其所能以造福于他人。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是许可社会地位存在的。但是，勃朗反对圣西门按工效计报酬的思想。他说，按工效计报酬是自私而残忍的，它将置弱者于死地。他主张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体力和脑力各尽所能，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取其所需。并不存在什么平等。倘若真有什么平等的话，那会是不自然而又不公正的。勃朗说：“那么，平等乃是一种比例关系。只有每个人在按照上帝本人旨意组织的社会中，根据某种形式的成文法，尽其所能从事生产，并用其所需，才存在真正的平等。”<sup>①</sup>这就是公平分配的公式。

可见，勃朗的乌托邦是一个理想的经济组织，他认为这样一个组织能带来完美的社会。他的乌托邦管理机构是一个为了拯救人类而工作的、有效率而又仁慈的国家机关。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能够吸引很多人的梦想。早在1846年，法国工人就要求建立勃朗式的工场。这种要求变得如此坚决，以致临时政府于1848年2月28日通过了一项法令，下令在法国建立国家工场。4月27日又进一步采取措施，把这种工场推广到法属殖民地。事实上，只是在巴黎及其邻近地区才建有这种工场。<sup>②</sup>然而，政府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并非是要满足工人的要求，而是要损害勃朗及其理论的声誉。勃朗的死敌之一埃米尔·托马斯被任命为巴黎工场的场长。公共工程部长马利先生告诉他说：“政府进行这项为了工人的试验是一项筹

<sup>①</sup> 《劳动组织》，第72页。

<sup>②</sup> 蒙杰：《对全部劳动成果的权利》，伦敦1899年版，第21页。

谋已久的计划。这次计划本身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因为，这次计划将向劳动者表明，那些不可行的理论是虚假的，将使他们亲自见到它给他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从而使勃朗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勃朗就永远不再是个危险人物了。”<sup>①</sup>我们知道，托马斯果然把工场整垮了。在把法国半数的地痞流氓吸引到巴黎之后，发给他们工资，又使他们无所事事，以后整个计划便烟消云散了。这项计划本身可能有错。法国当时确实不具备实行它的条件。可是，在那样的管理工作之下，无论多完美、多及时的计划，也都会失败的。勃朗受到了指责，但他今天却成了法国劳动者崇拜的偶像。

## 八、欧文

18世纪的哲学震撼了英国，其程度并不亚于法国。但是英国人的气质和英国的经济条件使英国的社会改革运动没有采取与法国同样的乌托邦形式。性情暴躁而又富于想象的拉丁民族以或多或少不可能实现的计划作为表现形式来反对现有的生活秩序。情感冷漠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则不同，然而经济条件却是使英国没有建立乌托邦的主要原因。英国的工业革命已获得长足的发展。就其特点而言，它在英国比在欧洲大陆的影响性质上更为深远。机器发明极大地提高了英国的生产力，随之也带来了可怕的贫穷和苦难。机器就是一切，而人则几乎什么也不是。农业受害，小手工业者无力与大机器生产者竞争而逼得走投无路，成为雇佣劳动者，与早已十分庞大的工资阶层相竞争。这种贫困交加的情况极大地加深了当时的灾难。但是，新体制最糟糕的后果在于它破坏了迄今为止存在的雇主与工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剩下的只是生硬、冷淡、现金交易的关系。住房条件令人生畏，童工和女工人

<sup>①</sup> 斯坦，《社会运动》第3卷，第292页。

数随着灾难造成的恶果而日益增多，失业人数也不断增加，工业生产和私人关系之间盛行的自由主义冷酷无情地支配着一切。拜金主义之风劲吹，人道主义则几乎荡然无存。

这种局势不容有抱凭空幻想或作随意预测之余地。这就要求脚踏实地的英国改革家设法立即解决各种日益恶化的难题，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社会史就是这种一个接一个的改革运动的纪述。然而，这个时期的一位改革家从严峻而冷酷的现实着手，逐渐在思想上接近了当时称之为“乌托邦的观点”。

这个人就是罗伯特·欧文。他于1771年生于威尔士一个手工业工人世家。他早年在一家棉织厂当学徒，不懈的进取心使他很快成为一名杰出的织布师傅。他晋升得很快，30岁就当上新拉纳克纺织厂的厂长，并使自己成为股东。他乘着商业的大浪潮发了大财，赢得了当时最大工业领袖之一的声誉。他还以在新拉纳克厂的技术改革和为工人建造模范宿舍而著称。他的教育观点也是在这里形成的。诚然，他的改革和社会实验是如此非同凡响，如此广为流传，以致不断常有人甚至某些皇族成员也参加到他工厂去实地瞻仰的行列。世界各国著名人士也前往参观，并一致对欧文的作法表示罕有的崇敬心情并以诚恳的心情高度加以赞扬。他所得的其它实际成就也绝非一般。他对1819年创立英国第一个劳动法即《工厂法》起了实际的推动作用。他直接激励了伟大的合作运动，因为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的创建乃是由于新拉纳克厂取得了成功。欧文是工团主义倡导者之一。早在1834年就主持过工会的第一届有组织的大会。他基本上是个乌托邦思想家，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个务实的改革家、一个精明的商人。在他的朋友当中，有几位是英国的伟人，至少从社会和经济的观点上看是如此。他们中间有马尔萨斯、穆勒、李嘉图和葛德文。他于1857年87岁高龄时逝世。

我们所关心的主要是欧文的理论和他的乌托邦思想。因为他不曾写过类似例如托马斯·莫尔那样的传奇式小说，所以我们只好在他给我们留下的卷帙浩瀚的小册子、声明、讲稿、辩论稿、书籍和哲学论文中探求他的理论和观点。<sup>①</sup>

欧文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社会的目的是在最大的实际可行范围内为每个人创造幸福，这种幸福与全体人民的最大幸福是一致的。欧文这种最大幸福的观点，这种乌托邦思想的目的，是他从一位一度曾与他在商业上合作过的朋友杰里米·本瑟恩那里学来的。欧文声称：

“所有一切生存的首要目的就是求得幸福。但幸福不能由个人单枪匹马地去获得；希望获得独享的幸福是徒劳的；大家必须共享幸福，否则少数人是永远不能享有幸福的。因此，人只能有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目的，那就是使他的同类性格安宁，精神愉快，如同原始社会组织或每个人的本性所允许的那样。一旦所有的人都真诚地致力于使周围的人的幸福都达到这种程度，他们便进入了真正的生活，然后他们将最大限度地一心促进他们个人自己的幸福，而这种幸福与人类的幸福却永远是一致的。那时，人与人之间仅存的竞争乃是谁能最有成效地为他的同胞创造更多的幸福了。”<sup>②</sup>

对他说来，这种对幸福的追求，既是社会所要达到的目的，亦是社会应持有的信仰。他说：“这种思想包含着真正的信仰，包含着对宇宙中一切伟大的、善的、美好的和宏大的事物所应怀有的真诚景仰。”<sup>③</sup>人的全部责任在于使自身幸福并使他的同胞幸福。在未来的一万年内，“创造幸福将是人类唯一的信仰。对上帝的崇拜

<sup>①</sup> 他的主要著作有《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形成的原则》，1813年；《新道德世界书》，1826—44；《罗伯特·欧文自传》，1857年版。

<sup>②</sup> 《新道德世界书》，第4卷，第54页。

<sup>③</sup> 同上书。

将体现在经营实业之中；体现在增进知识、宣讲真理之中；体现在表示欢乐的心情之中，而这种欢乐心情是一个人按自然规律和真理而生活时必然会流露出来的。”<sup>①</sup>欧文就是这样以一种实际的社会信仰形式表达了他的社会理想。这种信仰并非寺庙礼仪式的信仰，而是“每日对每个人坚定不移地在思想、言论与行动上行善、做好事和心存厚道”。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便生活在“新的道德世界”即黄金时代。就是这一纲领的细节使欧文获得了乌托邦思想家的称号。

然而，一个人适应这个新世界的的能力，完全取决于他周围的环境。人的一生和性格由他的境遇所决定的。波德莫尔在他那论欧文的巨著扉页上，引用了这段话：<sup>②</sup>“在所有的真理中，最重要的真理就是，人的性格是为他形成的而不是由他所形成的。”这乃是他著名的环境论——一个几乎使他着迷的理论——的要点。这就是以人类对环境的屈从和适应为基础的原因论原则。它是建立在摩莱里的环境论和否定爱尔维修所主张的天生思想说的基础之上的。

欧文的理论是一种导致绝对否定个人责任的宿命论观点。“人的性格，无一例外，总是由别人给他造成的。……人的性格可能并主要是由他的前辈所缔造的。他们赋予他或可能赋予他以观念和习惯，成为控制和指导他的行为的力量。因此，人从不也不可能自己形成自己的性格。”<sup>③</sup>根本没有什么“生来堕落”或道德责任之类的东西。波德莫尔认为，欧文实际上无视基督教叫做“原罪”和现代科学视为“遗传倾向”的种种说法。<sup>④</sup>可见，欧文这个乌托邦思想家的整个改革体系乃是基于这样的主张，即在适当的社会与生产环境中，人们一般是善良的也会做好事。“任何一种普通的性格，

① 《新道德世界书》，第2卷，第33页。

② 波德莫尔，《罗伯特·欧文》，两卷集，纽约1917年版。

③ 《新社会观》，第4版，第83页。

④ 波德莫尔著同上书，第2卷，第648页。

从最佳到最劣的，从最无知到最睿智的，通过应用适当的方式方法，都会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甚至在整个世界上出现；而这一方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那些对世事具有影响的人来操纵掌握的。”<sup>①</sup>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注意欧文认为环境是直接由人控制的这一论点便很重要。因此，对社会来说，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建立起一个正确的物质、道德和社会环境，从而用适当的行为准则来影响那些已无可否认地陷入了可悲的恶劣处境的人们。欧文乐观地相信，通过适当的教育和相应的社会经济组织。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人类基本上是身心健康的动物，本质是善良的。为了人类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合适的环境。一切错误、罪行和苦难，一切来自环境的失调现象都是由过去人类的邪恶造成的。消除这些恶劣的条件，人类就会得到充分的发展，达到完美的境界。

欧文提出了要重建人类社会应采取的若干措施。第一项措施是国民教育计划。在这项计划中，他认为教育是逐渐使社会状况趋于完美的适当方式，因为知识乃是最有力量的手段。在1816年1月1日建成的新拉纳克学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欧文说：“我知道可以建成这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犯罪，也没有贫困，健康得到极大的改进。倘若还有的话，也只有很少的灾难发生。知识和幸福成百倍地增长；这时，除非出于无知，再也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这样的社会国家遍及全世界。”<sup>②</sup>通过教育，任何一个社区的居民都能学会过美满的生活。因此，教育应予以普及并成为强制性的。在整个帝国中，任何一个儿童也不会受到排斥而得不到受教育的权益。教育将不受宗派偏见的影响，而是真正的教育，也不只是内容贫乏、死记硬背式的教育。它将在幼儿和儿童可塑性很大的时期灌输博爱和勤奋的原则，然后根据整个社会的福利来塑

① 《自传》，第I卷，第226页。摘自他本人所著《论人类性格形成的原则》。

② 波德莫尔著同上书，第I卷，第130页。



造每一个社区的生活。“一个从童年起就受到这种合乎理性原则教导的儿童，将容易发现并找出他的同伴们的观念和习惯从何而来，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观念和习惯。到了这个年纪，他会具有理性，足以使他认识到对一个具有在本人无法防止而在被动中形成的那些性格的人感到恼怒是没有道理的。”<sup>①</sup>这样，他将因此受到感动而转为怜悯，而不是恼怒那些在成长过程中不及他幸运的人。受过这种教育的儿童将充满对人人宽容的精神和善意的品格；他愿为所有的人做好事，甚至为那些把他看作敌人的人做好事。“这样，我们就可以简明、直截了当而肯定地认为，人类是可以施以一切先前的道德和宗教教育之精华并达到其最终目的的。”<sup>②</sup>

但是，改造社会机构并无需等到对新一代的理性教育完成之后。一个开明而果断的政府可以立刻做许多工作来改进那些受到阻碍和压抑的男女，这些人已过了接受教育的年龄。他倡议建立一个劳动局“以定期而准确地接收与整个联合王国劳动力价值和需求有关的情报，”<sup>③</sup>因为，“认真关心国民福利，对他们提供在真正的公共事业中长期就业的机会，使所有提出申请的人都可立即担任工作，这乃是政府的首要职责。”<sup>④</sup>国民教育与全民就业这两项措施，是欧文全部计划中主要而急待推行的必备措施。但在他所提倡的次要改革方案中，为了国民利益而停止发行国家彩票，对酒类走私实行管制，改革并最终废止贫困法，清洗教会中的神学教条与建立普遍的慈善事业等项措施，都占有重要的地位。<sup>⑤</sup>

但是，他也提出了建立乌托邦的建议。继1817年欧洲大战经滑铁卢之役而突然宣告结束之后发生的工业瓦解，促使欧文开始

① 《自传》，第1卷，第273页。

② 同上书，第273页。

③ 《论人类性格的形成的原则》，第324页。

④ 同上书，第329页。

⑤ 波德莫尔著同上书，第1卷，第118页。

寻找解决失业和灾难的办法。他提出了“团结合作村”的计划，在那里失业者聚集在一起，组成自给的公社，为了相互的利益而进行合作。这个原则在他头脑中开始逐渐形成，终于使他放弃新拉纳克的工作，去宣传他那合作世界的理想。他想出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与社会福利水火不相容的私有财产，由为集体利益而生产的村庄所组成的世界。一旦他进一步提出建立这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具体方法，他就不再是一个具有科学头脑的人，而是一个乌托邦思想家了。简单说来，他建议把工会变为生产组织；或者根据合作的原则建立工人移民区。这个人口从 500 到 2000 不等的移民区或村庄，得创造必要的有利环境。与傅立叶精心构思的空想相比较，欧文的空想是粗糙而原始的。成员们得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制造业，居住在座落于每个区中心的四方形院子里，里面包括公共宿舍、公共厨房、餐厅、公立学校、图书馆、阅览室、会客室等等。在四方形院的空地上种上树木，形成花园和游戏场。另一些花园建在院子的四周。再外边是马厩、洗衣房、作坊和农用房屋。<sup>①</sup>除儿童外，所有的人都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儿童在幼年时期上学读几年书，然后逐渐参加劳动，最初只干半天活。这些自愿组成的社区再组成一个有千千万万村庄的大联合体，遍及整个文明世界，从而使旧式国家成为多余的。这个联合体将取代充满贫困、灾难、不公道、不平等、虚伪、欺诈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切都要在兄弟般的合作中团结一致。<sup>②</sup>欧文实际上曾在苏格兰的奥比斯敦和马瑟威尔，在印地安那州的“新和谐”村进行了乌托邦试验。但是，它们象以前的孤立的天堂一样，都失败了。这只是因为，社会是个有机的统一体，必须全面加以改革。在这种幻想的地区与辽阔的世界之间

<sup>①</sup> 见波德莫尔著同上书，第 I 卷，第 218、219 页。

<sup>②</sup> 波德莫尔写道：“将世界划分为无数四方形天堂，每个小天堂都有它自给自足、精耕细作的园地，这样一个光辉远景总是盘旋在他的脑海里。而所要达到这样一种情况的漫长岁月在他看来总是拭目可待的。”第 2 卷，第 462 页。

发生了微妙的渗透,从一开始整个世界就宣告幻境的破产。

罗伯特·欧文所采取的乌托邦措施大体如此。他在世时,人们把他看作是工业领袖又是改革家。但他实际上比这要伟大得多。他是一位先知,早就预见到一个感恩戴德的民族生活在由幸福主宰一切的环境中的情景。他是具有卢梭传统的先知。他宣讲人性本善的福音。“如果欧文所预见的那个新耶路撒冷竟然体现在一个颇为荒唐的四方形院中的话,那就必须记住欧文的预见是有局限性的,正如欧文本人在除自己以外的任何其它情况下,都会提醒我们的那样——他的性格,他的个人经历、他的环境以及整个时代的条件都使他的思想受到限制。”<sup>①</sup>欧文的乌托邦思想影响颇大,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他对本国的社会进步产生了极有益的影响。恩格斯在谈到欧文时曾说:“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的名字联在一起的。”<sup>②</sup>总之,欧文是一位伟人。“希望谷”的创始人艾丁·巴卢1845年说了些颂扬欧文的话,对欧文的特点作了极为精辟的概括:“罗伯特·欧文是一位卓越人物。论年纪,他行将七十五岁;论知识与经验,他渊博丰富;论心地,他无比善良,朴实无华,慈悲无限;论宗教,他是个怀疑论者;论神学,他是个泛神论者;论形而上学,他是个必要的环境决定论者;论道德,他是个无所不在的游历者;论为人,他是个哲理上不抵抗主义者;论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他是个共产主义者;论对未来的希望,他是个世俗的极乐主义者;论对实际事务的处理,他是个按部就班的人;论行为举止,他是个心胸坦荡的长者。”<sup>③</sup>

---

① 波德莫尔著同上书,第2卷,第6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4页。

③ 诺伊斯引语,见《美国社会主义史》第88、89页。

## 九、结论

我们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可以作出什么结论呢？

与许多现代社会改革家或革命家不同之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其他人想要帮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代表。他们是一些伟大的具有社会思想的编辑、记者、政治家、科学家或实业界人士，这些人感到“世界问题紧迫”，因而提出各自的看法，但说法大致相同。此外，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先解放某一特定的阶级，而是要一下子解放全人类。象法国的哲学家一样，他们要求实现理性的、具有永恒正义的王国。他们各自关于完美国家的基本内容固然基本上相同，但在方法和气氛上与它们各自的创始者一样却相距甚远。

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厌恶他们那个时代所呈现的混乱而又痛苦的景象，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理想共和国，“确信有可能实现一个财产共有、普天同乐、和谐协力和团结的人类，一个能使人类的力量，人类的美，人类的光辉和荣耀升华到最高境界的社会，一个安抚受难的人民、把不幸的人们从饥饿和悲伤的苦难中拯救出来而把幸运的人从自我主义中解脱出来的社会，一个使劳动与欢乐、富有与善良、德行与幸福在尘世间结合起来的社会。”<sup>①</sup>但这种幻想中的伊甸乐园在细节上却各不相同。然而，如上所述，它们在精神上和基本内容上是一致的。

他们的基本观点就是相信上帝或大自然业已作出规定：一切事物都是为了人类幸福服务的。从摩莱里认为大自然目标是促进普遍的幸福起，到半个世纪后傅立叶的宣言为止，我们往往听到这样的说法：“上帝已经把他所做的一切都做得很好了；倘若他安排

<sup>①</sup> 孔西德明，《社会的命运》，第2卷，第32页。

了一个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不能为每一个人——无论年纪大小和性别差异——服务的社会，那么，上帝的意志就不是尽善尽美的了。”<sup>①</sup>我们记得，欧文的乌托邦思想也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他们都认为，有了适宜的环境，人类就会真正变得尽善尽美。人的本性是好的，但是现存的环境，以其过多的缺陷与矛盾注定驱使人们走上邪恶与苦难的道路。因此，他们的乌托邦活动大都是教育人获得这种适宜环境的知识，并设法使之得以实现。象所有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家一样，他们都认识到教育的巨大价值。除了巴贝夫外，他们在各自的实施方法中都赋予普及和义务教育以极其重要的地位。

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必须消灭那个“简明而又自然的自由制度”的敌人——私有财产。他们的先辈曾对此寄予希望。因此，他们都是财产社会化的倡导者。私有财产是属于个人的。它使人的感情和同情心变得狭隘；它使共同的自然资源不能用于共同的福利事业；因此，必须把它从人们的头脑中清除出去。生产也必须社会化，并由社会为其本身的利益来管理。在这方面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确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

他们几乎都期望将来能有某种形式的社会信仰。在他们那个时代，这些不怀偏见的思想家看到，当时教条式的宗教是多么软弱无力。他们那个时代的宗教事实上就是一种习惯和形式，而不是一种旨在不断使生活充满生气的社会推动力。这种宗教激起人们的反抗情绪，而不是鼓励人们勇敢地面对未来。它是一种累赘，一种麻醉剂，一种瘫痪了的体系。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把一种新的宗教交织在他们理想的纲领之中。这种新的宗教既看到人又承认信念，既承认社会业绩又承认礼教仪式。它谋求普遍的幸福，而不是普遍的一致。

<sup>①</sup> 见纪德所引《新世界》，第 31 页，《傅立叶著作选集》，伦敦 1901 年版，第 48 页。

在其他某些方面，他们的意见就不完全一致了。在平等这个问题上就无统一的观点。巴贝夫和卡贝的观点是绝对的平等，死板的一律。傅立叶和圣西门则承认能力上的差异，提出按能力付酬的纲领。勃朗是最先进的，承认不平等，但不主张按能付酬而主张按需付酬。在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当中，他说得最恰当。

他们对国家的看法也不一致。傅立叶对中央集权的观点是，倘若非有不可，那就把它放在不比君士坦丁堡更近的去处\*。圣西门则完全信奉国家。勃朗不仅认为国家的主要希望在于有一个好政府，而且把他的理想带入政治生活的中心，并呼吁国民大会支持他的观点。欧文藐视国家，认为国家在任何一方面都起不了什么作用，为了某种社会目的可能暂时派点小用场，然后就逐渐趋于消亡。

那么，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纲领究竟有多少是可行的呢？他们的想法就是把一个完美的计划放在世界面前，然后让人们接受它。但是，正如他们看到的，他们的纲领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他们以及所有的乌托邦思想家是在跟他们理想中的人打交道。然而，自有史以来，“理想的人”不过是一种光辉的理想而已。然而，他们毕竟是先驱者，耗费了多少坚韧的脑力劳动才创造出种种异常精巧的计划。尽管在许多方面这些计划乃是富有高度想象力的拉丁民族的理想产物，例如半疯狂的傅立叶，他们却依然唤醒了社会的理想，因为他们的设想向周围世界的残酷现实提出了挑战，他们唤起了广大社会集团对实现改进了的社会生活计划的兴趣。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最后的一批乌托邦思想家。他们没有认识到尊重历史的深远意义，而这是在设想一个可实现的社会改革时所必不可少的。对他们来说，理想的国家乃是一个已经完成了改革的国家，而不是一种过程。就他们而论，无限向往于

\* 意即将中央集权机关置于偏远的地方，使它不能发挥过多的作用。——译者

追求完美境界的乌托邦精神，由于与黑格尔的新学说——该学说曾提出实现社会理想的希望——发生密切关系而逐渐消失了。随着黑格尔主义的发展，社会改革开始具有有效而带机会主义策略的色彩。这种策略逐渐将臆想变成现实。可能性的观念开始受到这种追求完美的理想的影响。<sup>①</sup>

空想社会主义者“批判深刻、诱导灵活而又洋溢着富有感染力的热情。”但他们自己想要直接解决问题的企图却失败了。一个又一个学派一闪而过，名噪一时，很快也就消失了。只有他们的理想历久不衰，成为进行新的改革的基础。

---

<sup>①</sup> 这一问题将于第 10 章中详加研讨。

## 第六章 现代社会的理想 ——拟乌托邦

按原来广为人们所接受的乌托邦这一名词的含义，上述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是最后一批乌托邦思想家。随着理论史的不断完善，思想进化的不断发展，真正的乌托邦已不再出现。这是因为人们这时已具有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思想，无需想出一个完美无缺的代替物，而需要对当前的社会进行改革。如今，我们靠进化思想就可以有同样的理想主义，但这种理想主义不采取不现实的形式，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即使最终目的依然遥远，改革还是可以继续进行的。现代乌托邦和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乌托邦不同，差别在于前者能给予人以即将取得成功的感觉。<sup>①</sup>它们实事求是地对待人们，并采用人所熟悉的方法。完满地实现他们的理想似乎指日可待。这是一个完全可以实现的过程，从不久以前和当今社会发展出来的过程。人们在这些乌托邦中看不到任何可以认为是不着边际、异想天开的东西。它们实际上乃是拟乌托邦。下面我们就把它们作为在社会思想方面较为优于旧乌托邦的范例加以介绍。

我们不必全面回顾现代思潮，而只需较为慎重地挑选三部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第一部是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 1889年写的《回顾》，因为它是最负盛名的著作，在美国象这样的书只出过少数几部。其次，我们选择了杰出的奥地利经济学家西奥多·赫茨卡于1890年写的《自由之乡——一个社会理想》。这是由于它在欧洲有一大批追随者，组成了无数的协会，以便将其原则和

<sup>①</sup> 其根本区别和原由将于本书第二篇详加探讨。



机构付诸实践。最后，我们将简略地讨论一下威尔斯先生于 1905 年写的《现代乌托邦》。我们提出这部书主要是因为威尔斯先生在现代社会空想家中是最负盛名而又最富乌托邦色彩之一。毫无疑问，这部书在威尔斯先生的三部乌托邦著作中占居首位。

在这些著作中，我们看到上述的假设事例。贝拉米在回顾了当今时代巨大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改进之后，认为他之所以敢于预测不久的将来会发生某些变化，是由于他站在事实的牢固基础上。他声称<sup>①</sup>：与一些人的做法相反，他不是期待“即将取得的、不断向前和向上的进步，直到人类达到难以言传的最终归宿，”而是“在‘回顾’以往一百年人类进步中”，为“日后一千年人类的发展找到更坚实的基础。”在附录中他谈到进步即将来临。“我们的子孙一定能看到它。我们虽已成年，但只要有信心并努力工作，我们也是能看到的。”赫茨卡并不打算勾画一幅绝对井井有条的社会轮廓，而是描绘出一幅相对说来是好的图景，一幅最符合当时条件的图景，一幅唯一的可为人们理解和可达到的图景。<sup>②</sup>它以进化论的法则为依据，而进化论的原则是他一贯遵循的。威尔斯是现代人，他能够认识到试图刻画出一个永恒的完美国家是愚蠢的行为。他认为社会的改造必须建立在人类本性的现实基础上，所以他明确指出：在他的乌托邦里的人基本上和我们所了解的人是一模一样的。<sup>③</sup>所有新事物都是由当前事物发展而成，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所下的决心和运用想象力上程度有所不同。

这些预测并不象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乌托邦思想那么富于幻想。他们也不会按对当前在起作用的某些有利因素的计算结果而对未来作异想天开的奇想。所以我们探讨主要是对其典型特点作

---

① 前言，第 5 页。

② 同上，第 9 页。

③ 《回顾》，第 9 页。

一次简要的概述。

## 一、贝拉米的《回顾》

这篇著作在19世纪90年代曾风行一时，引出一批书来讨论它陈述的种种制度和原则。它是从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经过认真的经济分析的产物，对当代经济进退两难的窘境进行了独创性的、全面的论述。贝拉米的某些思想与赫茨卡的思想并非没有相似之处。

在本书的开篇，作者虚构的叙述者朱利恩·韦斯特先生谈到19世纪80年代末期的某些社会弊端和不足之处。例如，社会的财富积累和集中在一些家族的手中，由于投资的结果财富不断增加，以及代代相传，对这些都进行了批评。至于利息，这是自古以来法典的制订者和预言家力图予以废除或压缩到最小限度的，他却认为利息是“那些占有或继承财富的人开办工厂时对所生产的产品不断征收的一种税”<sup>①</sup>。

社会划分为阶级，特别是富人和穷人。他把这样的社会秩序比作一辆马车，富人坐车，群众拉车。当路面极为坎坷不平时，“车上的乘客便对拉车人发出呼唤，鼓励他们耐心，指出他们命运多舛有希望在另一个世界得到补偿；而另一些人则尽力为跛子和伤员提供药膏和搽剂。”<sup>②</sup>可是，经常会发生突变，把那些坐在车上的人翻到车下，当拉车人，而另一些人则坐上了车。这种情况是普遍的、不断发生的。

罢工和劳工纷争经常造成混乱的局面。。除非找到解决的办法，这种混乱终将毁灭人类。当代人认为，和所有巨大的运动一样，

---

① 《回顾》，第9页。

② 同上书，第10、11页。

人类的历史也是周而复始的。社会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会又坠入混乱的深渊。认为社会可以沿着正确的路线不断向前发展的想法只不过是幻想。

贝拉米的观点和这种观点不同。他使波士顿的韦斯特先生于1887年的纪念英雄节在催眠术作用下开始沉睡，在113年之后的2000年9月10日，被一些人在他以前通常由于失眠而在那里酣睡的地窖里发现并唤醒了。现在这地方已是花园中古屋的一部分废墟。他发现许多深刻的变化，表明社会情况有了好转。

韦斯特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美丽的城市”中。不象旧波士顿那样，它不再烟雾迷漫、肮脏而简陋不堪，因为在这个新时代里“没有比用剩余财富将城市美化更受人欢迎的了。”所有的人都可以获得同样的享受。更为令人惊讶的是，这是一座没有政客、不造谣生事、无腐化堕落现象的城市。人的本性没有变化，但人的行为动机随着人的生活条件变化而发生了变化<sup>①</sup>。

在那座城市里，不存在什么劳工问题。资本的集中和联合必然导致国家对工业的控制。当人们通过迅速的进步变得成熟时，他们就接管各种暴虐的垄断企业和集中的资本。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可能有别的结局。社会必须做到的一切就是：一旦社会进化的倾向业已明确无误，便要认清那种倾向并采取与之合作的态度。

因此，国家便承担了资本的责任。这就是将政府的职能扩大到管理人民经济利益的领域。同样，劳力也是由国家加以组织的，从而使以前认为不可能解决的劳工问题得到了真正的解决。一旦国家成为唯一的雇主，所有的公民都可以凭他们的公民权利，按工

---

<sup>①</sup> 例如，他说：“目前……社会是这样一种结构，不论一个官员或任何人怎样行为不当，他也不可能利用职权去谋取私利。就算他坏透了，他也不可能腐化。因为不存在腐败的诱因。社会制度不再给不诚实的行为提供诱因。”第61页。

业的需要而成为雇佣劳动者。这样做并无任何强制的感觉，因为人们认为这是完全自然而又合情合理的。事实上，那种确实需要强制执行劳动的人是受到鄙视的。为了生存必须劳动；不劳动就是自杀。

国家建立了一个为工业服务的固定体制。每个人积极参加劳动的时间为 24 年，从 21 岁停止受教育时起迄至 45 岁为止。从 45 岁至 55 岁，即于解职之后，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突然需要大量劳力时，每个公民仍有响应特殊号召的义务。

也许有人会问，在数以千百计的不同行当和职业中如何将工人加以划分呢？贝拉米的回答是：产业大军是按每个人的脑力和体力的天赋原则组织起来的，然后决定他担负哪种工作对国家最有利并对他本人最感到满意。家长和教师应从幼年时期就注意孩子们的爱好，极其耐心地培养这些长处，因为使公民了解并学会工业的基础技能乃是国家的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职责。

依靠使各行各业都具有同等吸引力的做法来保持每一个行业的劳工的供求平衡。这就要按不同行业的劳动强度来规定出不同的工时。此外，工人们对工作可以有第二和第三种选择。所以，倘若由于发明进步和需求的变化，工人们已不可能再从事他们的第一种工作时，他们还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普通工人，包括所有的新工人，在允许自由选择职业以前，必须参加普通的劳动小组。在此期间，青年工人学习养成遵纪守法、服从上级、忠于职守的习惯。在此期间，他们还要决定他们将成为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倘若他们决定成为脑力劳动者，他们就会获得各种受教育的机会，以使自己能够胜任他们将从事的技艺工作和职业。经过普通劳动后，他们就去当学徒，时间长短因职业而异。最后，他们便成为该项工作的合格成员。但是，还要根据他们当学徒期间技术的熟练程度，分配到以金属徽章来区分的三种工作部门。

那些在智力或体力上有严重欠缺的人，不能与主体工人编在一起的人，就另行成立一种为病残人开办的组织。对其成员要提供适合他们体力的轻工作。但是，他们可以得到跟其他人同样的收入。这是因为他们都是人，不能因健康、体力和智力方面的差异而受到不同的待遇。

在那里不存在旧日的工资。每个工人的所得主要建立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所有的人分有相同的份额。这就要求所有的工人都尽到他们最大的能力。“所有尽最大努力干活的人，都能干同样的活。”一个天资较高的人，如不尽其全力干活，尽管他可能比天资差的人尽全力所干的活多，但他会被认为是个不大称职的人，死后还欠下他的伙伴一笔债。<sup>①</sup>一个能劳动而坚持拒绝劳动的人，就会受到单身禁闭，靠面包和水度日，直到他承认错误，开始工作为止。<sup>②</sup>既然工作不再意味着为自己个人服务而是为国家服务，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热情便激励着工人们去工作，就象以往激励过战士一样。<sup>③</sup>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对社会所作的贡献。但是，还另有一种意义更为重大的奖励。那就是全国最高的荣誉。这荣誉比总统职位还高，要具有良知和忠于职守的美德才可获得。它就是红色绸带。它由人民投票决定奖给那些对整个一代人做出伟大贡献的人。尽管朝气蓬勃的青年人都想带上这红绸带，可是每次只有少数几个人才能佩带。

国家的首脑就是工业部门的首脑，称为总统。他是从主管公共活动 10 个部门的前任领导人中选出的。这些领导人均从各行会首领中选出。这些人也都是经过不同阶段由所有在某一特定行会(行会按不同行当区分)中任过职而离退的人员中选出的。

---

① 《回顾》，第 94 页。

② 同上书，第 128 页。

③ 同上书，第 97 页。

当然，国际之间是和平相处的，因为不想有“国际间的丝毫误解，不会逮捕千百万别国的公民，使他们遭到屠杀和迫害，象泼水一样挥霍他们的财物。”<sup>①</sup>这种完美的和睦关系也简化了国际贸易。各国之间的商务往来由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每个国家有一个对外交换局掌管和支配其本国的贸易。一种简单的记账系统就可以很好地调节它们之间的商业往来，以主要商品作为结账的手段。由于各国都应用同样的基础进行贸易，就不用货币了，也不设关税。各国相互提供货物，其价格与供给国内公民的物价相同。另一个问题是移民出入境的问题。这问题的处理办法是入境国向出境国补偿该移民的生活和教育费用。

贝拉米关于进行产品分配的方案是独特的。那里不再设商店和银行，因为生产和分配已不再由私人掌握，商店和银行的作用也就消失了<sup>②</sup>。他天真地声称，既然没有货币，银行也就没用了。既然国家是一切物品的唯一生产者，个人之间也就没有必要为了得到所需物品而进行交换了。一切取之于唯一来源——国库，从别的地方是得不到什么东西的。

每年年初，在公家账本上给每个公民记下他在该国年产量中应有份额并发给他一张信用卡。公民持此卡便可在设在每一个居民区的仓库领取他所想要的任何东西。这样做就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使信贷成为个人的事，因而是不可转让的。随之也就解决了贫穷的问题，因为国家对每个公民一生的教养和舒适的生活提供了保证。

每个居住区都设有中心商店，一个富丽堂皇的建筑。但这只是个样品货店，没有店员将商品用欺骗手段硬售给顾客。人们只

<sup>①</sup> 《回顾》，第 59 页。

<sup>②</sup> 他说：“当无数不同的个人生产对生活舒适所必须的各种产品时，就有必要进行个人之间不断的交换，以便人们可以得到各自所需的物品。这些交换就造成商业，货币就是它们的媒介物。”第 86—87 页。

是在这里选择和订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然后这些订单被传送到庞大的中心仓库，<sup>①</sup> 再通过管道系统把货物分配到城市的每个角落。这一切都完成得十分迅速。商品到达目的地要比亲自去买要快得多。商品的价格取决于生产、运输该商品付出的劳动量和商品稀缺的程度<sup>②</sup>。这一价格要从每个消费者的信用账上扣除掉。每个仓库所需商品种类和数量是以每年所作消费统计为基础进行准备的。<sup>③</sup>

既然土地属于公有，商业由国家管理，又没有货币，也就不存在什么继承权的问题了。并不防止继承，也不鼓励继承。什么东西也不具有货币价值，所以积攒珍贵物品和个人手中的动产便成了累赘，因为这些东西都不能出卖，也不能用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何况人们还要用他们的信用卡去租房子来储存这些东西哩。

家务劳动则完全是社会的事情。洗衣有公共洗衣房，收费低廉。制作或缝补衣服由公共商店负责。烹调也在公共炉灶上做，并在巨大的公共餐厅里用餐。这是一种由餐厅、娱乐宫、图书馆和社会活动场所组成的综合体。每一个家庭在这个大建筑里都设有各自装饰得幽雅的餐厅。饭菜要提前一天预订。服务员是些从事一般性劳动的青年，可以分配做各种无须特殊技能的工作，但没有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卑贱的，因为在这个时代里人们愿意从事各种服务性工作，并不对哪一种工作视为具有社会地位。一旦人们由于特殊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如进行大扫除、整修房屋、家人患病，便可向工业劳动队申请帮助，并向国家交付一定的费用。一个有趣的特点是，在天气不好时，为了预防天气给人们的社会活动带

---

① 他描写某一大仓库时写道：“它象一个庞大的工厂，不断有火车和轮船向它输送货物，而在另一端则将各种货物按各种计量单位包装好，送给顾客来满足五千万人不计其数的个人需求。”

② 同上书，第 185 页。

③ 同上书，第 181—183 页。

来任何影响，所有的人行道都覆盖好了。贝拉米借他书中的一位人物之口说：“个人主义时代与和睦相处时代的区别可以从这样一件事中看出，在19世纪时，天一下雨，波士顿的人便撑起30万把伞，可是到了20世纪，他们却在所有人的头上撑起一把伞。”<sup>①</sup>

由于没有犯罪行为，监狱也就不复存在。他说：“在你们那时代，就犯罪这词的广泛意义包括各种各样的不端行为而言，罪行的大部分来自私人占有的不均。个人的需求诱使穷人犯罪，富人犯罪则由于贪图更大的利润或者极想保存以前所得的财产。不论是直接或间接地占有金钱的欲望；这在当时认为都是好事，却成为犯罪的动机，这就是这个大毒瘤的主要根源。法庭和警察机器不可能完全防止它去窒息你们的文明。”<sup>②</sup>一旦国家没收了所有的财产，这种现象就会消失。至于较少量的袭击个人的暴力犯罪行为则与任何谋利的思想无关。这些行为正如他所说的，完全是隔代遗传的结果，是低能或别的退化现象所造成的，而这些人可在医院中得到治疗。新时代唯一的犯罪现象系因祖辈遗传所致。也没有什么法律与立法，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法律都是涉及到界定和保护私有财产以及买主和卖主关系的。也没有什么律师，因为不存在混淆真理而只有去寻找真理的动机。

对所有的人施以大规模的高等教育，而不是小规模地教育那些少数选民。这种新型教育不象旧教育那样使人不能适应体力劳动。教育的目的乃是提高一般人的水平。他们认为，倘若不能对所有的人进行教育，他们倒宁愿挑选天性最粗野而又最迟钝的人，而不挑选最聪明的人，因为前一类人不能没有教育，而那些天资聪颖的人则可无须求助于教育。这种教育制度还包括体育教育。这种多形式的教育，其目的在于使所有的公民都能愉快地生活，使各社

① 《回顾》，第152页。

② 同上书，第200—201页。



区免于受与那些粗鲁、野蛮的公民共同生活之苦，最后，还要为下一代培养出一批品质高尚、有教养的父母。

妇女和男人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sup>①</sup>妇女和男子一样也是产业大军的成员，只有在尽做母亲的职责时才离开这支大军。这就使得大多数妇女在其一生的某一段时期可为工业服务5年、10年或15年，而没有孩子的妇女则服全役。她们做最适合于自己的职业。妇女的工作时间要比男子的工作时间短得多。如有需要，可为她们提供最精心安排的休息设施。除了尽母亲的责任使姑娘和妇女们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外，她们都想在自己的一生中干一番事业。妇女产业大军的组织与男子相同。妇女的总管在总统内阁中占有席位。妇女和男人完全一样，领有信用卡，因为“维持我们全体人民生活的必需品都是一样的。”“妻子不依赖丈夫，子女也不依赖父母。”

既然妇女在经济上是独立的，那就只存在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sup>②</sup>金钱和地位不再能凌驾于个人品德之上。因此，人的天赋，如智力和习性、美貌、智慧、口才、善心、慷慨、温柔、和蔼以及勇敢等素质便能传给后代。这样，就可以把人类生来崇敬的气质保留下来，而把所厌恶的东西抛弃掉。

那也是一个全面机械化的时代。任何人只需花少量的钱，就可以在自己家中通过电话线路收听并享受从音乐中心发出的音乐。这样就能使所有的人都可以享受音乐，而不是象从前那样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通过电话也可听到讲道。电的使用遍及各地。

那也是一个生活的各方面都处于进步的时代。人类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水平，在他们面前展现无限美好的远景，促使他们意气风发。这样一种景象即使是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也难以望其项

---

① 《回顾》，第256页。

② 同上书，第267页。

背的。接踵而来的便是机械发明、科学发现、艺术、音乐和文学繁荣的时代。和平、友好、富足和安逸带来了新的黄金时代。人们不再造成巨大的浪费，也不再重犯旧时代那种弥天大错。

对此我们不加评论也不作分析，因为书中对旧秩序所作的天真幼稚、目光短浅的、错误而不分青红皂白的概括性论断，读者是一目了然的。我们也没有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贝拉米某些值得称道的对新制度所作的预测，以及大约在三十年后业已付诸实现的很多变化。我们也未指出他大部分预测的正确性和可能性。因为读者已经看到了这些。我们只是勾画出这个国家的大致轮廓，尽管这不过是梦想，但它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却为期不远了。

## 二、赫茨卡的《自由之乡》

《自由之乡——社会的理想境界》一书的作者西奥多·赫茨卡博士是一位颇有名望的维也纳经济学家。他是19世纪最后10年中颇为活跃的曼彻斯特学派代表人物；该学派与当时的历史学派是不同的。他之所以成为杰出的作家和政论家，部分原因是由于他赢得了各种荣誉，他当编辑时所写的大量文章和他所出版的各种书籍。1872年他担任《新自由报》的经济编辑。1874年他和另一些人共同创立了“奥地利国家经济学家协会”。1880年他出版了《商业和社会政治的法则》。1886年出版了《社会发展规律》。他在各个时期所发表的文章使他成为货币问题的权威。1889年他创办了《国家和国民经济》周刊，担任编辑直到他去世。1890年他出版了《自由之乡——社会的理想境界》。

这部著作的问世立刻在欧洲大陆经济和社会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其意义之重大远远超出贝拉米的《回顾》在美洲的影响。1891年由于大量的需求，这部书被译成多种语言，并由阿瑟·兰

塞姆译成英文，我们将以这个译本为依据。然而，具有更加伟大意义的是，这部书的出版在奥地利和俄国掀起了要将此书付诸实践的決心。约有数以千计由各阶层组成的协会在大小城镇中组织起来，提出种种办法，着手建立书中提出的聚居地。中央委员会组织起来了，在英属东非肯尼亚山和海岸之间划出一片相当大的地域供协会使用。1893年确实着手兴建起来了。可是，由于困难太大，这项计划终于失败。

在“自由之乡”中，我们看到这位经济学家关于消除当时经济和社会制度种种缺陷的意图，从中还可看到具有独创性的先进思想，涉及生产、市场销售、银行、公共服务、消费和福利等部门。这些想法以独特的形式与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结合起来。在序言中赫茨卡声称，随着文化艺术和科学的长足发展和对无限的大自然力量的征服，“适量的劳动应为每个出生的人创造出取之不尽的财富”——“但是，所有这些辉煌的成就迄今仍不能减轻人类的灾难。”“事实上，随着财富生产中技艺的不断提高反而带来了毁灭和苦难。”这本身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按财富生产的增长率而变得更富有呢？”他把这困难主要归罪于他所说的“生产过剩”。①

由于完全有可能调整生产，他认为在建立一个自由社会制度的道路上不存在真正的障碍。他反复强调这不是幻想而是易于实现的；事实上人类进化的趋势也是朝着那个方向发展的。在这部著作中，他探讨了自由之乡的一些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都是建立

---

① 他说，例如，“我们并不按照我们现有的生产能力可能为我们去生产财富，而只按我们的需要生产那么多的东西罢了。这个所谓需要并不取决于我们的生产能力，而取决于我们的消费能力”。见序第18页。还有，“我认为资本主义并不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妨碍财富的增长是由于它为了市场而刺激生产，而是由于它妨碍人们消费剩余的产品，利息尽管并非不公道，但在公平的经济情况下，利息就会成为多余而毫无目的性可言了”。《自由之乡——社会的理想境界》序第11页。

在事实的坚实基础之上的。他说，它和过去和现在的其他社会预测不同，在于书里所描述的“不是那些没有人知道的、神秘的人类的力量与特点，而是那些完全立于牢固的基础之上的。我描写的情景（赤道非洲）并非幻想中的仙境，而是为现代地理学所熟知的我们地球的一部分，我不过是象发现新大陆的人和开拓者一样如实地加以描述罢了。出现在我的叙述中的人物并不具有超人性的特征和美德，而是一些具有同我们一样的灵魂和肉体的人；而激励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则既不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也不是普遍的博爱主义，而是一种普通而平凡自我利益。我的《自由之乡》中的一切都极为真实，通篇只有一个虚构的情节，那就是要找到为数足够的具有一般智力和体力的人，他们乐于采取可使他们从经济剥削制度的奴役中解脱出来的步骤并使自己步入享有社会平等和自由的制度。只要让这一设想实现——即使不会完全准确地象我所描述那样，但迟早是会成为现实的——对此我毫不怀疑——那么，“自由之乡”将会成为现实，人类的解放也会得以实现。奴役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掌握大自然的力量——即正如现代自然科学的创始人\*在他的《新大西岛》一书中所预言的作为人类苦难的终结——现在事实上已经为人们所取得了。妨碍我们享用业已获得的成果，妨碍我们充分利用人类伟大的智慧和才能所取得的发明创造的，不是什么别的因素而正是使旧法律与制度继续发生作用的旧习惯的惰性；尽管造成这些旧法律和旧制度的条件早已消逝。”赫茨卡就是这样以叙述的形式向我们描绘了一个他认为可以实现的真实社会生活图画。

这部书以独特而颇具现实性的风格开篇。“国际自由协会”——正如它的名称所表明的那样，是一个为促进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国际性组织——发出通告遍及欧洲和美洲，其目的在于为一个

\* 按指弗朗西斯·培根，见本书第4章第3节。——译者

较合理而又合乎自然的国家制订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在海牙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们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全部准备工作只要再化几天时间便可就绪。预定将聚居地设在中非马萨兰，位于基尔马扎罗和肯尼亚之间。在海牙组织了一个先遣团，向蒙巴萨进发。备有人员、物资、乘骑的车马、给养和弹药的考查队全集中在那里。队伍开始向内地进发，经过大约 8 周的时间最后到达目的地。赫茨卡对这次旅行的描述生动而又真实。读起来象斯坦利的探险记，表明他深知该地区的地形、居民和动植物等各类事物的情况。

这些先遣队员在一个有如露天剧场那样的巨大狭谷中建立第一个聚居地。他们将它命名为“伊甸谷”。随着人口的增长，他们便把伊甸谷作为基地，由此派出一个小考查队到附近的地方去。他们发现这里各种原材料丰富，包括各种木材、金属、鱼类和野生动物。这些种类繁多的自然资源很快就被利用起来，伊甸谷便建成为繁荣的聚居点。但这个新社会和经济秩序是怎样形成体系并使之相互协调的呢？

这完全是根据五项基本法则。在赫茨卡的方案中任何其他事物都不过是对这些法则加以较详尽的表达而已。这些法则是：

1. “‘自由之乡’的所有居民对全境的土地和由全体公民所积累的生产手段都拥有平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2. 丧失工作能力的妇女、儿童、老人和男人有权享受足够的、相当于全体人民平均水平的生活资料。
3. 不能阻拦任何人去实现其本人的自由意愿，只要他不侵犯他人的权利。
4. 公共事务的管理须经‘自由之乡’所有 20 岁以上公民来决定，不分性别地在有关国家一切事务中都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5. 立法权和执法权应分配到各部门。用这种方法,所有选举人将为主要的公共事务部门选出代表。这些代表将分别发布他们的决定并监督各有关部门管委会的行动。”<sup>①</sup>

与大多数乌托邦思想不同,赫茨卡的乌托邦思想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之上的。“自由之乡”的整个目标就是尽量设法排除一切妨碍以明智的个人利益为指导思想、自由实现个人意愿的一切障碍。<sup>②</sup>在经济领域中,任何想要以公益精神或道德精神来取代个人利益思想的尝试,都会立刻或最终遭到可鄙的失败。<sup>③</sup>因此,这个社会的目的应是尽量少采用阻碍和命令的方法去干涉个人的事务,而应采用引导和教育的方法。<sup>④</sup>除与自利的原则相结合之外,赫茨卡也要树立经济上的正义与自由。这就使得他的完美国度不同于其他理想的国家,区别在于他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人人都穷的世界,而在于建立共同富裕的世界。他说:“这种大家都一样穷的世界只能导致文明的停滞。艺术和科学这两个人类进步的动力本来是表示物质丰盛与多余时间的,但是,假如没有人占有比满足自己的自然本能所需的更多东西的话,科学与艺术就不能存在,更谈不上发展了。”<sup>⑤</sup>经济平等权只是在最近才有可能实现,在文明的早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那时人类的劳动还不能充分为全体人类生产足够的物质财富,因此平等便意味着所有的人都穷。但这种相互关系中基本之点就是每个人都享受其本行的劳动成果。<sup>⑥</sup>

他并不主张废除私有财产,还要推广私有制,因为这是促进劳动的最好刺激素,不可能为别的东西所代替。在经济上树立正义

---

① 《自由之乡——社会的理想境界》,第137页。

② 同上书,第104页。

③ 同上书,第368页。

④ 同上书,第106页。

⑤ 同上书,第353页。

⑥ 同上书,第355页。

将使私人财产成为与工业剥削制度下大不相同的因素。这样，在使自利起到充分作用的情况下，所有的人都得到他们所作努力的全部利益，生产力就会最大而最有利可图。<sup>①</sup>结果就会产生真正的共产主义，因为这样做将使各种经济利益达到真正的团结一致。

在这个社会阶段，经济上的公道最好由各工业部门组织起来的合作协会加以培育推行。它们是由一些对某一特定工作感兴趣的人组成的联合股份公司。<sup>②</sup>任何人都可免费加入这个组织。自由协会可无息提供不受限制的资本，条件是在一定时期内从生产过程中陆续偿还，时期的长短视计划投资的性质而定。每一个成员的工作贡献由他的工作时数来衡量。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大会，在这个会上所有的成员都拥有平等的选举权。业务管理由一定人数和任期的理事会掌握；理事会由大会选举并可由大会罢免。协会的纯利润在年终对企业进行计算，并于偿还资本和上缴自由之乡共和国的税收后加以分配。每个成员都有权利要求分得一份与其工作贡献相当的纯利润。每个成员都有迁徙和签订合同的绝对自由。所有领取工资的人都按机械式劳动的“时间当量”付酬。在这个组织里没有剥削者。资本可以说是属于全体成员，也可以说是不属于任何人。盈利与亏损平均分担。协会的每一个人都为这同一目的而工作，因为到最后所有的人都得到同等的利益。当然这要取决于他们自己、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愿望。此外，对于报酬的分配是这样安排的，即不让任何一个家庭的所得低于维持非常舒适生活的必要水平。这样，大多数家庭都有盈余。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银行的保险部门要照顾意外事故。这个制度的各个方面都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其基本原则是：“没有任何不可

---

① 赫茨卡承认，人们对于经济公道路线的认识要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过程，但他毫不怀疑地认为，只要国家对人民进行教育，这样的施教是可以被接受的。

② 然而，并不禁止个体生产者参加该组织。

告人的秘密”。

正如贝拉米书中所说，有各种不同的协会，它们负责满足某些国内的需求。例如，某一协会负责清扫某一地区，包括街道、草坪和房屋。另一协会负责为各家提供饭食；又一协会则负责准备马匹、车辆和以弹簧为动力的无马车辆。

为了纠正由于自然原因而产生的供求关系之间的混乱状态，他们把劳动力从一个工业部门经常自行流动到另一工业部门，以避免发生失业问题。生产过剩这个在剥削制度下工人们的最大祸根，在这里便不起作用了，因为每一种产品都必须找到买主。<sup>①</sup>

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商品交易都在许多大厅里和仓库里进行。这一工作由公社统一管理。公共库房为每一个做买卖的人提供很大的方便，尽管他们也可以在别的地方进行这种活动。“储藏和调剂货物并不取费，因为在一个人人都按生产的比例进行消费的国家里，无论对消费者还是对生产者征收最小数量的税都是无关紧要的。记账手续的简化为国家增加了纯收入。”<sup>②</sup>

政府工作也别具一格。政府机构是一个由12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担任自由之乡公共管理机构的12个部门之一的领导。<sup>③</sup>这12个行政官员都由各部门的代表机构产生。无论是教育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统计委员会还是卫生委员会，代表机构的成员都由20岁以上的选民选举产生，目的是选出对各种特定职务称职的专门人员。值得注意的是，选民不受性别上的歧视。下述情况也值得注意，即在别的国家吞噬全部预算90%的法院、警察、军事、财政等部门，在自由之乡则不耗一文。原因很

① 《自由之乡——社会的理想境界》，第267页。

② 同上书，第107页。

③ 这十二部门是：1. 总统府或全面管理机构；2. 保养；3. 教育；4. 艺术与科学；5. 统计；6. 道路与交通；7. 邮电；8. 外交；9. 仓库；10. 中央银行；11. 公共建设；12. 卫生与司法部。



简单，这里无须设立这些部门。通过银行从每个人的信用账上扣除的款额便可满足各项公共开支。这些税收恰好同每个人的纯收入成比例；“而且由于在自由之乡除劳动外无任何收入来源，因而可以准确地知道从劳动中所得的收入，所以在分配税收方面并不存在什么困难。”

推行免费和普及教育。教育按柏拉图式的体制分等级，循序渐进。不同之处在于教育面向所有的人。智育和体育受到同样的重视。16岁以前男女学生受同样的教育，尽管男生偏重于体育，女生偏重于音乐。16岁时，女孩或者在家接受培训，或者在一些受过高等教育、有才能的妇女指导下学习，或者进师范学院，在那里接受教育，准备当教师或护士。男孩从16岁到22岁都接受军事训练，同时也上工业或商业技术学校。在自由之乡里，各种科学在各个地区都得到广泛的培育与实际应用。他们学习并创造音乐与美术。大歌剧院和音乐学院到处林立。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使自由之乡成为一个拥有受过极好教养的人民的国家。

我们业已注意到赫茨卡曾提出男女完全平等的思想。他把这个思想建立在他所感觉到的男女之间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但是，他在让妇女从事各种职业的同时，却认为最适合妇女的工作乃是教育儿童、护理体弱多病的人。就妇女的处境而论，最好是结婚。和贝拉米的想法一样，他认为既然妇女由国家扶养，那么婚配就是纯洁的爱情的结晶，而不是“为了生活而出卖肉体。”

不道德的行为和给社会造成的严重后果不应受到惩罚，而应用另一种办法来保护社会。此外，改造不轨的人乃是行之有效的最好保护方法。要用限制酒类消费的办法来预防腐化堕落的蔓延。偶然犯罪的人被认为是心理上和道德上不正常的人，应由医务与治安部门来处理。

我们已经简要地论述了赫茨卡理想境界的某些基本原则与制

度。我们看到，他的理论乃是以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与经济进展为基础的，也正是当时情况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它却是一种符合于新的、更高水平的道德思想发展而产生的进化过程，并试图使经济制度适应社会正义的基本原则。赫茨卡认为，这一境界是会实现的。他认为，人们漫不经心、无所作为的作风一旦消散，某种宏大的、普遍合乎理性的力量一旦突破目前这个时代早已过时而又根深蒂固的陈规陋习和自私自利的思想，他的理想境界就会实现。

### 三、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

这部著作是一位有声望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富于想象力的作家的作品。但它并不是靠幻想编造出来的、与日常平凡的生活绝缘的、全新的创作，而是依据现实材料用自己的想象力创作出来的作品。它保持与现实世界的连续性。思想进步的人可以从作品中看到这个好的一面，而无身处异域或所述内容与现实毫无联系之感。

和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别的近代预言一样，这个乌托邦和以往所有乌托邦不同之处在于它描绘的是一个世界性的乌托邦，而非局限于地球上某一小块孤立区域或某一奇特星球上的乌托邦。这部书联系实际，因此可以向读者陈述各种不同的气候、种族和不同类型的文化的情况。与赫茨卡的理论相同之处在于它承认现实的人性、其改善的可能性及其改造上的障碍。此外，在这部著作中，威尔斯把大自然看成是一种不受驾驭而难以制服的力量。<sup>①</sup>但是，

---

<sup>①</sup> “我们要在一个到处都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与人为敌的病痛、猛兽和害虫的世界上创建我们的乌托邦。而我们所要对付的人也和我们一样，有同样的激情、同样的反复无常的情绪和欲望。”《现代乌托邦》，第7、8页。

他确实表现了与古代乌托邦思想家相同之处：他渴望从古老的陈规陋习、法律束缚和财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尤其是由于他热爱人类自由的观点，他对人类自我解脱的能力、抵制过去支配一切的思想以及回避、创新、努力和克服困难的意志怀有不熄的信念<sup>①</sup>。因而它是一部解决当前人类进步这个大问题的匠心独运的著作。

威尔斯将他的乌托邦建立在自由的必要性这一极为明确的概念之上。他认为这一概念曾为早期乌托邦思想家所忽视。他的自由观就是要充分发挥个性，即“生存的主观性的胜利，例如在创新活动中，生存者是主观性的胜利，而子孙后代则是客观性的胜利，”<sup>②</sup>但是这种情况也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让国家除掉象败家子那样对社会有害的自由，以维护别人的自由。这样就使我们获得最大限度的自我表现。这种较大的自由并不是依靠把所有的个性都塑成某种共同的模式，而是靠扩大和加强公众的慈爱思想普遍提高思维能力，改进作风。这种自由是出自文化教养和相互照顾的自由，而不是牺牲强者的利益。在认识个性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威尔斯的思想与那些古老的乌托邦思想家还有另一点不同之处。古老的乌托邦思想家接受统一行动的想法并强调共产主义。既然威尔斯的自由是如此多变而具有很大的相对性，那就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而只有质量上的、暂时的调整。威尔斯还想在行动自由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之间起调解作用。这样一种作法，与其说是为了过孑然一身的生活，倒不如说是为了在众多的人群中找几个相互之间性情上合得来的人相处为宜。这种隐居生活同样适用于各种私人公寓和家庭。旅行作为扩大所有的人之间的关系并使人们的个性更具有灵活性而受到鼓励。威尔斯在他的设想中还提出式样精巧的火车、轮船和飞机，使经常性流动成为可能。既然在

① 《现代乌托邦》，第9页。

② 同上书，第32页。

乌托邦中也有矿区、烟尘四布的高炉冶炼和各种不雅观的景象，运输设施就可使一些家庭住到尽可能远离这些情况的地区。于是，培根的萨洛蒙之家便会变成现实；人类将不断进行实验，汇集知识，使自己能完全战胜距离和不堪入目的景象。

与自由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事是维持生活和进行工作。对二者而言，必须具备的附属品就是金钱。与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威尔斯认为，倘若能正确使用金钱，那么，在文明生活中，金钱便是一种既美好而又必须的东西。“金钱是整个社会机体之水。它既起分配作用又起收受作用，使事物得以成长和聚集、运动和回复。它使人类对自由的需求和相互依靠的特性协调起来。还有什么手段能赋予人类以如此宏大的自由而又如此强有力的要求人们作出努力的诱导力量呢？”<sup>①</sup>劳动信贷或从中心商店要求提供各种商品的做法，可以比金钱更能使人们作出自我努力来满足他们不合乎道德规范的欲望。但是，威尔斯并没有用金子作为价值标准，因为基于多种原因，金子的价值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这就使得投机因素渗入一切类型的商业活动之中。他于是想用一种可销售的生产能量作为价值标准。这种生产力将按照能量的总估计量进行计算。这种生产能量的票面价值在各个地区按时公布，记录在册，并以物理单位标明。在一个象他所说的那个拥有流动人口量很大的国家，各地区生产能量的票面价值将不断趋于一致，因为就业机会将不断移入生产能量便宜的地区。

所有的自然能资源（如煤、水力等）以及所有严格的自然产品将不可转让地交由当地政府管理。它们可以运用这些资源去发电，得到广泛使用，它的价值则以物理能量单位计算。

在现代乌托邦中将没有个人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因为二者

---

<sup>①</sup> 《现代乌托邦》，第73页。（按原文缺注——译者）

都是无稽之谈；合理的道路大抵合乎这两者之间。<sup>①</sup>这个“世界国”将以全世界唯一的地主身分出现，由地方政府以封建地主的方式管理各地区的土地。国家或它的下属机构掌握所有的粮食资源和能量资源，并且通过佃户、农户和代理人发展这些资源，使能量用于生活。由国家或下属部门维持秩序；提供廉价而有效的司法管理；维持道路、低廉而快速的运输网；负担并保证每个婴儿健康诞生，茁壮成长为新的一代，保持公共卫生；为研究工作提供补助金，进行教育工作等等。

对于财产问题，威尔斯也采取一种非乌托邦式的立场。财产对自由而言是必要的；实际上一个人占有财产的多少很可以表明他的自由的状态。合法的财产应包括个人的劳动、技艺、远见与毅力所创造的价值。但国家将对个人取得财产的权力加以限制，以免他的自由会削弱他人的自由。个人的财产将包括所有可以延伸并表达每个人的个性所涉及的一切东西——衣着、首饰、工具、书籍等等，他用自己的钱购买的所有的东西，也许还包括他私人占有和使用的房屋、家具、用来保证教育与照顾他自己和别人的未成年子女的经费。上述这一切权利都可以传给下一代。人们也可以在商业活动、各种合同、政府的特许、土地租赁和工厂中占有股份。但在他去世后，这些东西要收归国有。他还可以对他所捐赠款项的细则不时进行修改。

除了最近的乌托邦之外，威尔斯的乌托邦和所有其他的乌托邦不尽相同。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机械把人们从辛苦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这一措施将最终免除劳动阶级所负重担。那时他们将从所处的奴役和卑贱地位中解脱出来。完善的机械化将在各方面改善和简化乌托邦人的生活。机械也不会不雅观和俗不可耐，它精巧、效率高，式样又好。

---

<sup>①</sup> 《现代乌托邦》，第 87 页。

威尔斯在论述“现代乌托邦的失败”的章节中开诚布公地谈到了他与以前那些乌托邦的根本分歧。旧式乌托邦里住着漂亮、正直，在思想意识和道德上适应时代的公民。威尔斯却在他的乌托邦中以现实世界来塑造他的居民。因此，除了别的事情之外，他就面临着如何对待先天性残废、白痴、酒鬼、思想乖戾、不可救药、灰心丧志的人以及思想迟钝的呆子等任务。这些人将受到监护并收容进从事消除这些缺点的部门。反之，对天资特异的人必须得到优厚的待遇。因为大自然以强凌弱的无情法则将由现代人的方法和手段取而代之。至于破旧的房屋，不舒适的服装，质量低劣、数量不足的食物等问题，乌托邦国家将把不舒适、不卫生的房屋全部加以废弃并销毁。对于那些衣衫褴褛或不整洁、食不果腹、营养不良的公民，国家将给他们安排工作。如果他们没钱就给以贷款让他们谋生，或如有必要，可雇为劳动后备军。这样一种公益劳动对个人劳动是一种刺激因素。劳动将是繁重的，但不是残酷或使人致残的。

对于有犯罪倾向的人，初犯和所有在 25 岁以下的罪犯将计划在远离城市地区的教养所进行告诫性和补救性的教育。除所有体残、畸形和患有不治之症的婴儿须处死外，在乌托邦将废除极刑。<sup>①</sup> 威尔斯也不想设立监狱，因为“没有人会那么聪明、善良而低贱，足以为监狱配备应有的管理人员。”<sup>②</sup> “毫无疑问，岛屿将被用来隔离这些人——只让同性的人住在一个岛上——以此来防止国家再受这种人口增长的危害；并设武装岗哨以防止犯人造船或让船只登陆。精神失常的人可以得到照顾和治疗，其他不适合这个社会生活的人，如酒鬼、吸毒者和各种罪犯，将在各自的岛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从事生产与贸易；因为，固然“这些人必须予以隔离，但

① 《现代乌托邦》，第 143 页。

② 同上书，第 144 页。

又何必折磨他们呢？”<sup>①</sup>

在乌托邦不必担心失业，原因如次。首先，所有乌托邦人都能合理地按照乌托邦路线很好接受教育。除某些不可救药的低能儿外，那里将没有文盲，也没有不能学习新知识而只靠经验进行简单劳动的人。那里的人都是多才多艺的。其次，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劳动力的交流，向各方报告经济需求的变动情况，并将劳动者由过剩地区向短缺地区转移。如果劳力过剩是世界性的，世界组织就要么减少劳动日，以此吸收过剩的劳力，要么就充分挖掘其本身永久性特殊工程的潜力，付给最低的工资，允许工程随着劳力的增减而加快或放慢工程进度。无论使用哪一种方法，都能保证每个公民丰衣足食。

另一个与社会进步有关而意义极为重大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提高人民的素质？”威尔斯并不完全靠推行竞争性的选择法，因为那样做的代价太大。他要防止在不受约束的自然力量影响下出生的婴儿，在这个世界上遭受苦难与失败。<sup>②</sup>威尔斯不象柏拉图那样，主张由国家抚育，因为在他的国家里个性对生活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而个性的最高和最重要的表现则在于为繁殖后代而选择配偶。反之，国家只推行几项简单的概括性条例。国家应要求婴儿的父母具有一定的最低限度效能：他们在世上能独立工作并具有偿付能力；必须达到某一定年龄；体格要发育到一定程度；无任何传染病和任何犯罪行为，或业已赎罪。<sup>③</sup>倘若个人犯了法，国家将采取异常明确而严厉的措施以防止任何类似现象的再次发生。养育得好的新生婴儿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得到较好的照看，因此儿童几乎没有夭折的。这些孩子的母亲，无论她们丈夫的工资

① 《现代乌托邦》，第 147 页。

② 合乎科学的文明的理想在于防止……弱婴的诞生。第 181 页。

③ 同上书，第 184 页。

如何，都有要求维持生活的合法权利，国家也因为她们当母亲而付予工资，倘若儿童的体力和智力超过一般水平，工资还会增加。这笔母亲工资可使已婚妇女或儿童不参加工业生产。这笔工资还可以树立健全的、为整个社会服务的养育儿童的风尚。

此外，在乌托邦，为了获得好的出生环境和好的家庭条件，性的结合决不应随便，不应放荡不羁，实际上在所有成年人中也不是普遍的，这是必要的。因此，建立了极为明确的婚姻法。婚姻法强调了上面提到的条件，如健康情况、无传染病、具有获得最低水平以上收入的能力。此外，还规定了最低的年龄：限制女的为 21 岁，男的为 26 或 27 岁。威尔斯还认为男女双方都应详细了解对方的情况。为了防止仓促成婚，在政府批准之前必须给双方以充分的时间仔细考虑这件事。既然结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因此，倘若一对夫妇在三、四、五年内没有孩子，那就有理由允许终止婚配。但是，那些有孩子的婚姻必须继续下去，因为大家都需要有一个家庭，同时为了给孩子以适当的教养，必须加以个别照看。孩子们必须在富有同情心的亲族中抚养成人，因为大规模的、无视个性的育儿方法从来是不成功的。

在“乌托邦印象”一章中，我们看到许多五光十色的想法。其中有机械装备完美的四方形院子；有由雇佣工人公会和雇主共同拟订的工作条例的工厂；有关于乌托邦居民的奋斗精神和没有胖子、秃顶、驼背、头发灰白的人的讨论。人们的服装宽松适度。他们不饲养家畜，因为它们肮脏并带有细菌。有一小时能运行一百英里的火车，车上备有图书馆、沙发、睡椅、阅报室、卧室、浴室，等等；还有学者们对艺术、建筑与学术的看法。所有这些都好象真有其事，并且独具一格。

在他对政府工作的讨论中涉及到“武士”<sup>①</sup>。他申言他已越来

<sup>①</sup> 此名取自著名的古代日本在思想上与伦理上处于上层地位的集团。



越清楚地看到选举办法的弱点。因此，他想出了一个志愿的贵族阶层，与柏拉图的卫士相同的“武士”阶级。<sup>①</sup>这个具有形形色色人物的阶级，是由较健康、无疾病、效率高、二十五岁以上有头脑的成年男女志愿者组成的。他们按照一项共同规则生活。这项规则的“目标是，排除愚钝和卑劣之徒，约束自我冲动的行为与感情，培养合乎道德的习惯，使一个人处于困难、疲惫和受到诱惑的情况下能以自持，使所有怀有善良愿望的人能积极合作。总之，就是要使所有“武士”经常保持身心健康，处于高效率状态。”<sup>②</sup>这些人业已通过乌托邦教育制度的各种淘汰性考试，目的在于挑选出一班意志坚定、有自制能力和听从指挥的人。禁止他们做某些事情：可能滋生非社会性活动的商品交易；从事沉湎于阿谀奉承而头脑发昏、虚张声势、哗众取宠的活动；参加游戏或观看别人嬉戏；喝酒、吸毒、吸烟、雇用仆役和参加具有戏剧性的宗教活动，等等。也有许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将培训、约束他们，使他们身心保持健康并开阔他们的眼界。女“武士”结婚后，如果她们要留在组织之内保持婚姻生活，就必须生儿育女。所有的武士，不论男女，每年要不带书，不带武器、笔、纸和钱，到某个荒原僻野去连续呆上七天，不同人类交往，主要是摆脱日常生活琐事、纷争和所爱的事物，在旷野中进行自我反省，思索一下广阔的外界空间和永恒的事物，探求上帝的真谛。

但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使用这些“武士”呢？实际上所有的政治权力都交付给他们。他们不但是仅有的行政管理者、律师、开业医生和各种各样的官员，而且还是仅有的选举人。所有学院的主任教师和训导主任、法官、一定范围之外的劳动雇佣者以及在公共事务中起主要作用的执行部门的人，都是从他们当中挑选出来

---

① 《现代乌托邦》，第 259 页。

② 同上书，第 279—280 页。

的。威尔斯的乌托邦是一个由律己的、有社会头脑的和为人们公认的专家们所统治的世界！

威尔斯在关于“种族”的讨论中，对人们以等级的偏见相看待的行径感到遗憾。原因是由于这种行为形成一种虚假的、过分相互对比的偏见，造成拉帮结伙的倾向和不必要的自高自大。这些要不得的思想集中表现为民族问题、以自我为中心的宗教问题、帝国主义与种族问题等等。他尤其关注那些他认为完全是虚构的种族问题。他认为，所谓的优越的民族不过是指那些目前在政治上占优势的人们罢了。这帮人不屑与不占优势的人通婚，认为后者在处理人类的事务方面不配拥有发言权。他感到这纯粹是胡说，因为世界上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纯粹的人种。我们的所做所为乃是采取一些非常武断的理想作为模式，并且只想到这个模式。体格和心理上的差异是否必然使得不同的民族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在“世界之国”中相处呢？在同一种族中我们不也可以找到同样巨大的差别吗？不过，他在承认人类学迄今尚未作出最后的论断之后，感到并没有根本不相容的地方，而是还有让所有的种族建立世界伙伴关系的余地。混血儿之所以处于困境，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私生子，因而取消了接受正规教育和在父系或母系的种族中获得提高的权利。从来没有发现过完全低劣的种族。威尔斯希望把全世界的文化、政治和种族融入一个世界国家里，以此作为一切为文明化而奋斗的目标。现在世界上推行的各种做法汇在一起也不能指望人类获得长远的进步。

在最后一章中，威尔斯又回到了当今这个疲惫不堪、粗制滥造、支离破碎而令人不满的世界。他以灵巧的语言描绘出与之形成对比的多种举足可达的境界，指出只要人类努力争取是可以达到的。他看到了他周围可用于建造那个乌托邦的一切材料，只是这些材料还处于粗糙而未经提炼的状态。对于接触先进的社会、

政治和经济思想的人们来说，对威尔斯的观点很熟悉的，因为这些观点是建立在这些思想之上的。威尔斯仅仅是描绘了一个国家，在那里最优秀的思想家所向往的一切正在起作用。实际上，在好些情况下，他所描述的情况，比起某些高级研究机构或在我们当中业已进行的理论研究还要完美得多。我们这个世界与乌托邦的不同之处主要是在于，我们还有点欠发达，秩序也有点混乱。但决没有理由因此而悲观。变化是无止境的。今天的污垢和弊病正在不知不觉但肯定要为别的东西所取代；而未来则必将按那些现在看来还不明显而又难以捉摸的启蒙精神加以重建。使得这一本应向前推进的运动不能起步的主要障碍是那些缺乏想象力和志气的人，他们精神不振、自尊心不强，多愁善感，心地狭隘。这就使得他们不能将视线超出缠绕着他们的眼前的利益。

对这些新近的、颇具特色的预言加以探讨之后，我们可以肯定得出结论：作这些预测的著作家是在探讨当今的大问题，这些问题乃是当代事态沿着不同路线向前取得进展的结果，其中有思想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问题。固然，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多少带有幻想的性质，但大多是以经过证实的具有潜在可能性为基础的，并依靠正常的、逐步演进的方法，以求其实现。我们认为，倘若这些预言是幻想的话，那么，这些幻想家毕竟是脚踏实地的人。

## 第二篇

# 社会乌托邦：分析与评论

## 第七章 乌托邦思想家及乌托邦

倘若我们对各个时代的人从他们所持的社会观点加以衡量，便可将他们分为三类。每一个类型都有其明显的关于民族福利的哲学。这些集团中的一个或另一个集团的相对优势地位，取决于各种社会力量和条件；而一个或另一个集团的崛起，可以使社会停滞或发展，使之具有保守或进步的特征。这三种集团的区别在于他们的观点是强调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第一个集团是由那些回顾和怀念过去的人组成的。他们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倘若为形势所迫必须重整自己的思想，他们就会感到坐立不安，然后就急于想回到旧的时代，因为只有那样他们才能清醒过来，享受那种给予他们内心平静的自在生活。他们认为当今的世界浸透了罪恶。他们和西塞罗一道高喊“啊，时代！啊，社会风气！”未来是捉摸不定的，社会充满危险。只有经受过考验的过去，才能提供安全的方法和措施。过去是理想的世界。这些人津津乐道“美好的往日”，总是害怕变革，以免碰上他们从未经历过的情景。再者，当这些人看到现实的一些弊病而对现实表示不满时，他们便说：只有回到现已失色但仍具有迷人光泽的旧日生活，社会才能得以自救。因此他们提出反对意见，这种意见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为社会改革作出贡献，但他们所提的解决办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动而无效的。因为他们认识不到：有一些力量是社会控制不了的，并且在不断变化；制度、习俗和教义越是陈旧，就越是不合时宜。<sup>①</sup>

<sup>①</sup> 罗斯，《社会心理学》，1908年版，第203—4页。

第二个集团由崇拜现实世界的庞大队伍所组成。这些人的大多数采取这种态度是不自觉的。他们总是赞扬并维护现有的制度和风俗。和第一个集团不同，他们完全鄙视旧事物：古代的法典、习俗、礼仪甚至制度都是过去的古董，都是当今人类活动的绊脚石。当前的思想、制度和活动才是理想的、最完美的，而且是最高尚、最完善的东西。过去的东西——啊，就让它去吧，将来——我们等着吧，但是，现在，让我们及时行乐吧！

第三个集团系由那些向前看、寄希望于将来更完善社会的人所组成。这类人的代表人物乃是各个时代的崭新、更加美好而又未经过考验的社会秩序的预言家。多数人的思想只不过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条件的精神交织物的一部分。他们被极为错综复杂的利益、习俗、传统和先入之见死死地捆绑在最廉价的平庸事物之中。他们的思想早已无可挽回地与形成他们当时整个社会的精神融为一体。他们不能逃脱这些束缚，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是被捆住了。然而，历史上不时总会有一些天才、先知、新思想的宣扬者、真理的预言者、极其热情的理论家，他们是超越时代的人，独树一帜的杰出先锋。他们认识到有可能创造人类更美好的幸福，便要求扫除当前社会和道德的弊病，与他们的时代决裂，摒弃旧的传统与宗教、政治偏见，清除那些阻挠他们前进、使他们不得自由的种种遗产，摆脱“现行的”陈词滥调，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宣讲一些为群众所难以理解的东西，重新创造一个世界。他们是反对派，持不同政见的人、叛逆者、偶像的破坏者。他们总是扮演社会反对派的角色，人数虽少，但思想狂热，是一些令人不安的激进派。他们不甘心在乱世中灭亡，或保持消极的态度。幻想、预见、有眼光、空想——不管它是什么——使他们设想出某种可能的景象，并以预言者的姿态向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加以宣讲。

这些人当中的一些人，在以往长达三千年之久的时期里，靠他

们自己个人力量的支持,向旧世界的统治挑战,对千年的历史文化提出非议,谴责所有的教义和信条,并以其极丰富的思想材料和强烈的同情心,臆造出那些美好的新世界,即社会乌托邦——一种在所有可供选择的各种社会结构中最为人们所误解的社会结构。这些乌托邦思想家对未来的希望表明,他们的社会是天国、圣岛、乌托邦、伟大的国度或其他社会的预言。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争取美好未来的战士,不畏惧社会变革的人。首先,他们是极富于献身精神的人。尽管这样的人为数甚微,但他们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影响;但这一点却不为大多数人所认识。

对这一类大大受到忽视的著作家的特点有必要作进一步详尽的阐释。首先,他们内心充满一种近似神授的不满情绪,可以引导人们献身于更伟大的事业。这种精神使有思想的人受到启示,激励发明家,赋予憎恨不公者以胆略,向许多人提出一种更加纯真的社会秩序。全人类,至少人类的大多数,都期望人人遵守道德和秩序,伟大的道德和国家制度便是这些事实的明证。但是这些制度的弱点是,它们趋于僵化,变得停滞、颓废和腐化,受到各种非社会或反社会因素之累。这些制度并不根据人们不断变化的需要而及时改变。乌托邦思想家是属于那些充满活力的少数人。他们背叛了这些僵化了的、是非颠倒的制度和习俗。他们设想出经过改进和完善了的制度和理想的社会。他们的乐观精神反对黑暗的宿命论,而宿命论则使人们把自己视为命运的玩物,使他们认为自己病入膏肓,只好逆来顺受。他们周围的世界使他们充满了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促使他们憧憬在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美好的世界。

乌托邦思想家自然也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评论家。他们感到当时社会的各方面情况都不妙,往往以尖锐讽刺的方式来宣扬未来的幸福理想。这一理想使当时的社会弊端与腐朽状况昭然若揭,从而表明现实社会与未来可能建立的社会之间的巨大差距。他

们按各自的个性，以尖刻的语言或温和的对比手法，揭露暴政的可悲影响、社会风纪松弛的弊端、极度愚昧无知的恶果以及压迫他们同时代人的结局，并将自己的理想蓝图视为救世良药。他们谴责周围的一切，认为都是可悲的，因为他们的幸福观就是谴责这一切的。但是，任何一个时代也从无一人赞同这些持批评态度的预言家所作的评论和指责，也无人注意他们所预言的内容。人们将他们看作是无事生非的肇事者或招灾惹祸的揭短人。正如另一位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所说，预言者在自己的国家和同时代人当中是不光彩的角色，<sup>①</sup>各个时代他们都被讥之为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或斥之为异端分子和激进分子。只有经过多少世代后，人们才接受他们的意见，尊敬他们，并给予他们以应有的重视和地位。

乌托邦思想家在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都毫无例外把表现为思想上富于独创性和建设性想象力的人。他们所设想的美景需要富于想象的天赋才能。这种天赋与创作歌曲和小说的灵感或与诗人和画家的魅力是如出一辙的，然而却又是真正社会巨匠所特有的建设才能。乌托邦思想家站了起来高喊：“社会一定会变成这个样子”，并给我们描绘出未来某一时代或某一地方的图景：那里没有诽谤和犯罪行为、没有仇恨和战争，没有可避免的痛苦和不幸，没有不公道和迫害；那里会充满公正、友爱、和平、富裕和幸福。这些乌托邦思想家都站在未来的土地上，向人类展示摆在他们面前的美好生活。这些乌托邦思想家都有同样的伟大灵感和高度热情，对所抱的理想深信不移，并对推动世界的改进抱有强烈的愿望。在阅读他们留下的著述时，读者首先看到的只不过是些近似理想主义者或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究所作稀奇古怪的幻想罢了，但很快就会感到这些思想家内心深处的痛苦及蕴藏的强烈同情心；了解到他们力图把人们从目光短浅或苦难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迫切心情；以

<sup>①</sup> 《马太福音》13:67，《马可福音》8:4。



及为了实现他们长时以来苦苦追求美好的未来而精心设计的新方案。他们是面对着一片荒野却看到了一座乐园的人。

这些乌托邦思想家还具有值得称颂的信念。这指的是对才智所抱的信念，即在社会尚未发展到某一阶段之前就预见到它并坚信它会到来；以及对个人品格所抱的信念，即在看得见的有利因素尚未出现之前就朝着一项预定的目标挺进。据说，华兹华绥\*有一次看着自己的孩子说：“这就是希望——这就是永无休止的革新。”乌托邦思想家同样向我们展示了未来世界的远景。他们坚信未来是无休止的革新。

尽管所有的人都受他们时代的局限而难以自拔，但天才确能使他们自己高出时代一筹。他们受益于先于他们谢世的天才，继承了往昔的精华。但他们把这笔遗产放利，从而获得比一般人更大更快的收益。他们构成一种使徒般的传统，使他们非凡的知识代代相传。诚然，天才也只能靠手头占有的资料进行工作，他必须使用同时代流行的语言和思想方法，也只能超过同时代人有限的几步。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成为天才。他们向深处迈出一两步，便在所继承的遗产中发掘出新的含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乌托邦思想家既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又是超越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既是人类中罕见的一种人，又是起到特殊作用而有别于他人的人；既是进化的产物，又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既是置身于社会之中又是在社会之外的人；他们感到社会的潮流，却又受世俗苦痛的支配。他们是人们期望的人，又是独特的人。

在各式各样的乌托邦思想家当中，正如在各时代的思想家当中一样，有两种思想占居统治地位——两种似乎相互排斥的思想<sup>①</sup>。一种思想随着世界上的知识日益扩大而得到不断的加强并越

\* 华兹华绥(1770—1850)，英国消极浪漫主义诗人，湖畔派的代表。——译者

① 我的这种思想部分受益于本杰明·乔伊特所译柏拉图，《理想国》序言，第163页。

来越清楚了。另一种思想虽已不断衰落，但仍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一线希望。第一种理想是，人类的未来寓于当今这个世界；另一种理想则认为，个人的未来寓于今后的另一个世界。一个要表明就在这个世俗生活中实现人类的至善境界，另一个则由于看到在现世不可能实现其目标而寄希望于来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二者在生活中都是强有力的动力，过去拥有现在也还拥有各自的信徒，而乌托邦思想家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在这两种代表性思想之间一直存在并仍然存在着对立情绪，没有共同的立场。一派认为他们的理想是大公无私而又富于人道的，而认为另一派的理想本质上是自私的，并且带有含糊不清的先验性质。另一派则认为他们的思想才是“真正天启的思想”，而另一派的思想则是唯物主义的、世俗的。然而，两派在很多方面有共同之处。二者都希望有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和完美的社会状况。它们生来就具有相同的心理和思想感情；它们的愿望与动机都是一致的，只是具体的目标有所不同，这乃是次要的问题。一旦人们学会把对自己的希望或对世界未来的希望寄托于最终的命运，所有的分歧便消失了。它们的目标相同，二者将自己的特点与最终目的融合为原则上相同的东西。这样，人们就可以按照自己个人的特性和气质采取两种看法中的任何一种，作为他们的生活准则。于是，人们都怀有愿为现世和看不见的来世而工作的同样大的信念和同样不确定的先决条件。因此，我们也可以相信，有时会有人挺身而出为后代人谋幸福。总之，这就是这一类人的突出特点。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杰作。

本书大部分在于详细探讨各种有代表性的乌托邦特性，因而有必要在此作某些总的评论，以弥补上述分析之不足。

人们对乌托邦的流行的看法实际上是一致的、明确而又广泛的，正如现时以多种不同语言从各方面下的定义所表明的那

样<sup>①</sup>。乌托邦思想家梦寐以求和描写的这些新世界,在任何时候都被视为徒劳无益的空想、无稽之谈、甚至是病态的猜测,一种为一些人所发出的胡言乱语,这种人除了大放厥词倒是些正常的人。但是,在我们这个新时代,必须对他们作出不同的、正确的评价。

我们逐渐认识到,文明发展的进程多少总是生生不息的巨大物质与精神力量的综合结果。其中某些力量正日益变得清晰可辨。在这些力量中精神力量起作用的因素乃是那些巨大的、循环重复的运动或按节奏起伏、一浪接一浪的、结集在一起不满于现状的浪潮,它们先是横扫世界的一方,然后又横扫另一方。之所以有一联串的浪潮,乃是由于宇宙并不是静止的这一事实。一切事物都在运动、更替并多少总是迅速而不停地变化着,人和制度也不总是一成不变的。而社会却未经常得到重新调整,反而遭到延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阻碍。一度认为是适宜的法律和制度再也不适宜了。把社会连结在一起的纽带已经绷紧甚至断裂了。一向因袭下来的习俗不是妨碍变革就是不起作用,变成制造不满情绪的压制工具。因此,社会理想家们受他们周围不安定因素的刺激,便半自动地去探索社会引力的新中心。由于人们不能即时获得达到和谐而满意的解决办法,幻想便将那种重建他们所期望的世界的

---

① “任何理想而臻于完美境界的地方或国家。”《韦氏标准词典》

\*任何理想的完美的步调、国度或情况;因而是指任何幻想的地区或任何描述这种情况的书。”《芬克与华格纳尔氏标准词典》

“一种对理想政府的幻念”《普通法语词典》

“乌托邦……乃是对另一些世界所描绘的理想图景,无法用科学的方法证明它们的存在或予以实现的可能性。我们只有相信它们而已。”安德烈亚斯·沃伊特著《社会乌托邦》,第1页。

“乌托邦是文学幻想的产物。其用意在于向人类指明改善政治、道德与社会状况的方法。”肖曼,《法国的乌托邦主义者及其妇人之见》,第7页。

想法呈现在他们面前。<sup>①</sup> 这种想法便是乌托邦，这就是那些波涛上翻滚着的浪花。它们表达了最美好最崇高的思想，他们时代的自然产物。事实上，大多数的乌托邦都站在它们时代的前列，表达了时代的深切希望，代表着他那个时代最先进思想的精华。这表现在绝大多数的乌托邦作者和他们时代的政治与宗教界激进分子共同怀有的思想见解。他们的思想可以比作一面凸透镜。它吸引并捕捉了他们那个时代最卓越的思想，又以集中了的力量反射回去。

这些乌托邦是一种告示，提出在社会生活中引进新的因素，新的工作方法，号召推行新型的教育，要求采取人们愿意适应的新的生活方式。然而，甚至这些与一般意见相反的惊人发明与创造，也并非是个人的才能或天才的成果。<sup>②</sup> 正如鲍德温所说，“对一个人说来，不利用他周围环境的现实资料去创造新社会事物，就如同不运用自己的记忆和过去构思的资料而考虑任何问题一样是不可能的。”<sup>③</sup> 在所有的个人天才背后，都有更伟大、更有创造性、更加强有力的与生活的源泉联系得更紧密的东西，有可以说明乌托邦思想家之所以能创作的东西，这就是集体的智慧，尽管这种智慧可能是不成熟的而且大部分是处于沉睡状态中的。但是，即使乌托邦表达了社会想象力方面的先进思想，却不能否定我们前面谈到有关

---

① 有人认为，同时近代的乌托邦也佐证了这一意见，在社会周而复始的变化某一时刻也会产生乌托邦。“当人们的思想进程达到了某一点，并使需求显得过时的时候，他们的精神生活就又开始膨胀起来，以致越过眼前现实的范畴，幻想便以某种社会经验为依据建立起一种理想的世界。在那里，远非经济需求所能满足的的欲望就可以得到满足。”

海登，《社会的意志》，第13页。不过，本书第一篇的分析表明，这一看法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适用于乌托邦。

② 例如，史密斯，《新大西国》的编辑（剑桥1900年版）告诉我们，培根之所以提议倡建伟大的研究院，亦即萨洛蒙之家，部分原因可能是受到罗马于1603年建立的林齐学院（这是一所致力于研讨物理与数学的机构）和埃德蒙·博尔顿的影响。后者于1616年曾倡议建立“詹姆斯国王学院，或称荣誉殿”。该书序21页。

③ 《社会的与伦理的阐释》，第180页。

思想家的独具一格的特点。象所有的发明家一样，乌托邦思想家也是各异其趣的。他们尊崇当时只有少数人感受到的前进精神，把这种精神发展成为某种具体的而又可以理解的东西，而不让它浪费掉而化为感情上的泡影，尽管它是行不通的。他们的才能同他们值得颂扬的形式主义决裂，证明他们业已从他们时代的枷锁下解脱了出来。他们巧妙地提出一个目标，乃是他们那个时代优秀思想的结晶。这些乌托邦摄入了那个时代的精华，而创作本身也是巧夺天工而又独具特色的。大多数人都采取惯常的方法运用现有的资料，而乌托邦思想家却采取新的方法使用这些资料。可是，这种经过重组的计划却非常先进，致使大众难以理解。乌托邦思想家大声说出了当时悄悄谈论而只受到少数人注意的话。这些声音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时代，因而人们把他们的思想看作是幻想并以“空想家”相称。从当时尚未觉醒的广大群众和目光短浅的个人的观点看问题，乌托邦不过是空想国，乌托邦思想家不过是“梦想家”。这就是公众对任何一个头脑完全清醒并走在他的同胞前面约一百年的人所作的描绘。这是给少数几个眼光超出眼前事物的人所起的称号。但是这些先驱者宣讲的思想在一代人、一个或五个世纪的时间之内将逐渐渗透到广大群众中去。到那时，群众就会乐于接受这些思想。

并非所有的乌托邦都已付诸实现，但是，正如任何一种改良方案的情况一样，其中有许多乌托邦业已实现了。这些乌托邦之所以没有全部实现，乃是因为在产生一种理想之后需要整整一个世纪才能予以实现，而且与此同时，社会条件也起了变化。此外，在产生这些思想的时代，社会还没有提出任何把他们的思想付诸实践的方法。即使有了方法，人民一般也不会表示同意。而在另一些时代，乌托邦却已成为了现实。因此我们发现乌托邦并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基础，但是每一种乌托邦都有其历史背景和为之而奋斗的、新发

展起来的理想主义。倘若某一时期所有的人都有类似乌托邦思想家那种先见之明、近似现实主义的思想和对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理想主义深入理解的能力,那么,这个世界就绝对不会有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词“乌托邦”了。各种乌托邦只不过只具有相对的意义罢了。

乌托邦之所以遭到同时代人嘲笑的另一个原因,无疑是出于我们所业已承认的事实,即所有的伟大发明最初都是粗糙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生硬而难以采纳的。比较稳健而不辞劳苦的人会把它改造成为较好地符合社会实际要求的东西。<sup>①</sup>

第三个原因可能是领袖们和统治阶级往往认为使社会生活尽可能保持稳定符合他们的私利。因此,他们常常通过对社会机构的控制来干扰能引起变化的社会机制,或运用宣传手段使任何明显批判和指责他们的事物变得声名狼藉。

第四个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习惯于认为要达到乌托邦所描述的目的是毫无希望的。<sup>②</sup>这种思想也引起了科学家和乌托邦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的共鸣。在他所著《新工具》中写道:“迄至目前为止,科学进步和开展新工作的最大障碍……在于人们抱有绝望的情绪以及认为事都可能办不成的想法。……因此,倘若谁相信或承诺得多一些,他们就认为这准是出自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之口。”各个时代所需要的是坚定的克制精神和要去干的决心。随着我们一点一滴地学会去做,又不失去信心,我们就可以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那时我们便可以大规模地实现沃德所说的话:“环境改造动物;人改造环境。”<sup>③</sup>这乃是真正文明的开始,即人有意识地去控制人类和自然。

① 鲍德温同上书,第188页。

② 麦考利,“米德尔塞克斯的一亩地比乌托邦的一个领地要强”,见《随笔》,蒙塔古版,第2卷,第213页。

③ 沃德,《纯社会学》,第16页。

## 第八章 乌托邦思想和各种思想 与理想所起的作用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注意到,各种不同的乌托邦的根本之点在于阐述作者用以实现完美的社会理想的方法。这种渴求理想的精神表现为明确的建议或起推动作用的行动,我们称之为“乌托邦思想”,意为人类自觉的意志在指明社会发展的趋向,或社会为了适应某一理想的要求而不知不觉形成一致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在力图实现几乎不可能达到的理想生活。因为我们知道,令人鼓舞的理想具有一种潜力,它能最终推动人们把理想变成现实,尽管是不知不觉的。这些理想唤起人们的希望,鼓励人们采取行动。在本章中我们要对乌托邦的种种理想加以分析,并对个人和社会进步过程中的实际步骤加以考察,这些进步和发展乃是思想和理想发生效用的结果。让我们首先把乌托邦作为对幻想和理想主义的推动力加以研究。

乌托邦思想家在构思其理想世界时,事实上是在创造比他们当时所知道的要美好得多的世界,因为早在75年以前他们的乌托邦就是最重要的社会理想主义的象征与传播者。这是一种以新的引人入胜的方式把新的真理传播给人类的做法。<sup>①</sup>托马斯·卡莱尔在他所著《衣裳哲学》<sup>②</sup>一书中反映了这种思想,他写道:“在许多颜色瑰丽的事物或简单的标志中,最平凡的真理得到了新的强

---

① 然而,某些作家,尤其是那些19世纪后半期的作家,确曾把他们的幻想称作乌托邦,内容荒诞狂妄,为人们所厌弃。

② 金氏版本,第199页。

调而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就是这样，幻想以其神秘的仙境迷惑了感官的王国，并与之融为一体。”

大多数乌托邦思想家以其空想的方案所具有奇异特点激起了人们的幻想。我们知道幻想乃是社会改革的前提。每一项改善社会生活的伟大方案必须首先在人们的思想中形成一个大致的轮廓。思维形象总是先于物质器械在起作用。但是，思维起着更为奇特的作用，因为通过抓住公众的想象力，可以创造出供人效法的中心，并以新的思想和理想注入集体道德。它们还把人们的思想引向精神解放，有助于解开紧握着过去的僵死之手，鼓励人们大胆探索并追求更加美好和永远美好的事物的精神，使人们超越现实世界的限制，向往社会实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停滞不前并保证社会的进步。它们诱使人们的思想去尊崇乌托邦思想家培根所喜爱的格言：一艘船越过世界的尽头，驶向未知的大海，船上悬挂着几个字：“超越极限。”由于大多数乌托邦思想家代表着他们那个时代社会问题的最先进思想，所以一个时代继一个时代接踵而至的乌托邦总是作为不断向后退的目标（有如大人诱导幼儿学走路——译注）引导人们向前向上。他们和其他某些社会分子一起，都是一些伟大的鼓动者和促进者，指引并诱导社会走向完美的目标。<sup>①</sup>即使乌托邦的所有细节都能彻底加以实施，也许没有一个乌托邦是完全切实可行的。但是它却以种种设想提供了进行

<sup>①</sup> 斯帕戈与阿纳，《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第199页，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的问题时写道，“他们通过批判现存的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提出了一个具有自发性的明确的理想。人们往往总是只接受各种事物而不提出问题，以为任何现存的事物都是正确的并将永远如此。乌托邦思想家对这种保守思想提出了挑战，并推动千百万男女走向进步，否则他们是决不会向前挪动一步的。他们提出的计划有时是不可行的，有时认真实行了反而造成比它们的作者要加以弥补的情况更糟的局面，这都无关紧要。保守主义的惰性和冷酷无情的社会发展力量使他们的设想难以为人们接受。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人类无视这些倡导一种较好的社会制度的先知们所强烈反对的弊病。因此即使我们谈论梦想家如莫尔或歌文的‘失败’，我们还是必须承认我们所取得的进步大部分是直接受到他们的启示所致。他们的功绩在于他们未曾想到的其他方面。”



实验的意志；这些新的设想经过考验之后还可使人类树立更新理想。

象对待所有的思想和理想一样，我们必须将乌托邦的根源追溯到某一个人的思想，因为所有新生事物的发源过程莫不如此。那些改变了现代生活的思想和机械的发明，无不出自富于天才的个人。这些天才人物往往性情孤独，被人忽视，几乎是一些默默无闻的思想家，他们也许甚至从未想到他们怎么会迄今“仍然象持有王节的君主，在坟墓中统治着我们。”<sup>①</sup> 这些思想和理想是一个人内心的设想、回忆和建设性幻想的混合物，是与当时的现实和早期的思想形成鲜明对比的结果。它们都是出自一些聪敏过人而富于远见的人物。在这些时期里，数以千计的对当时社会不满的人们当中，只有社会发明家才具有既看到旧社会的弊端又看到新的补救办法那样一种清醒的头脑；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所要达到的目的和要经历的道路。他们提出了一项崭新的社会调整计划。他们这些人如同所有讲求实效的理想主义者一样，从现有形势的实际详细情况出发，头脑中形成了新奇的综合，从而认为人类很有可能找到新的出路。这是一种发现的过程，一种超越于单纯模仿和吸收当时社会传统习惯而取得成就的过程。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一种由现有材料塑造而更富于生气和处于变革中的东西。

尽管这些思想出自个人，但一经产生，就会传播开去，其中一些思想还同社会上流行的思想融为一体。可以说，这些思想已成为公共的财富，成为人们经常借鉴的社会遗产的一部分，因为这些遗产是世代相传的，并在此过程中又为每一世代的人及时加以修正。谁能说他们不和真实的事件或显赫人物本人的行为一样，确

---

<sup>①</sup> 温德特说：“甚至自然界的原始民族也不见得完全不受单个人物的影响。即使这些单个人物本身为人遗忘之后，他们所遗留的影响仍或多或少不断地起作用。”见《群众心理学原理》，1916年版，第514页。

实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并起着同样的作用呢？<sup>①</sup> 我们已逐渐认识到，人类的生活与行为如同受到杰出人物模范行为的影响那样，也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谁又能说因为有耶稣、拿破仑、林肯在世上活过，世界就一直不变呢？谁又能说由于他们把自己一生的精神传给后人，以后世世代代就不发生变化呢？社会梦想家也同样没有白活。由于为我们描绘了一座美丽城市或一个新生社会的幻景，这位梦想家就预示人类有实现这个幻想社会的可能性。<sup>②</sup> 不论是伟大人物一生留下的遗教，还是梦想家的理想，都没有可能立即付诸实施；然而，却从这些人身上迸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能把个人提高到社会与职业的日常习惯之上，并最终鼓舞各个集团和民族。许多梦想家的事业充满了一种向前闯的精神，它能把现实中的某些因素变成理想，最后又将理想变为现实。这是一种滋生乐观主义的乐观精神，一种将自身转变为实践的決心。

但是我们绝不可忽视这一事实：接受这些理想要经历漫长的过程。理想主义者的思想可能是伟大的，但也同每项改革方案一样，在社会信仰和习俗上争得一席之地以前必须使其能为人们所接受而奋斗，而且并非全都能为人们采纳。在一定时间内，可能在最终接受它之前的一个时代之内，将受到批评性的议论，引起各种赞同和反对的意见。倘若在几十年、一百年或几百年之后，赞成的意见终于压倒了反对的意见，理想主义者的思想便成为这个集团普遍意见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就打下新社会方针或制度的基础。这些思想最终发展成为引起社会变革的行动。<sup>③</sup> 因此，鲍德

---

① “思想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它们比任何别的办法或权力更能保护我们不受邪恶势力的侵犯，更能引导我们走向我们要到达的目的。”柏顿，《宗教之社会基础》，纽约1911年版，第49页。

② “道德的进化几乎完全取决于想象力的不断解放。”斯塔克，《不同社会中的家庭》，第272页。

③ 尽管在下一章将详加论述，我们觉得在这里值得提一下：乌托邦思想家的大部分思想都为后代接受并予以实现。

温<sup>①</sup>说：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们对这些思想加以概括、讨论和提炼，在形式和内容方面使之可以应用，然后最终成为公认的和为社会所选定的思想。但这种接受先是由此然后才及彼的。尽管最初这种新思想遭到强烈的反对，但却含有一种为多数人所不知道的微妙性质，而受到少数人的推崇。必须承认，首先受到某种理想和富于建设性思想的影响和推动而采取行动的人，并不是墨守成规、目光短浅、思想上的走卒，也不是好好先生，软弱无能、情绪冷漠的个人。种种理想使人类受益的新光辉首先照耀着伟大的“精神人物”，那些身居社会之中而具有超越精神和道德的先知。然后从这些顶峰人物反射到人民大众身上。正是这些伟大的理想接受者把信息传播给广大的群众。

思想的传播与接受的方式主要是人们不断接受启发进行无意识的模仿；在一般情况下不大能作出选择。正如俗语所说，哪里有思想流行，哪里人们就受到感染，而对这些思想从何而来则往往毫无感觉。然而，多数人在吸收这些思想之前，思想上是有斗争的。对某些人来说斗争是缓慢的，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是比较迅速的，这是因为要求人们采纳并遵循这种思想的社会压力基本上是人们所感觉不到的。普通人主要并不受其理性所支配；他们多半靠他们的感官和本能行事。人不能也不单靠思想生活。人只是构成其时代精神实质的各种思想、回忆和感情、以个人为单位的储存器罢了。人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他和他的时代一样，也呼吸着他那个时代的新思想和新精神。就意识形态而言，生活是一个不断展现的过程，是一条永无休止地接受新思想的不断高涨的小溪，而随着这条小溪漂流的人是难免要弄湿的。他很可能极力反对，不让自己的观点和生活去附和某种理想，但也不由自主，不知不觉地投入新的

---

① 《个人与社会》，第 152、153 页。

生活方式，因为别人也已经这样做了。<sup>①</sup>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完全是由社会塑造的。就算他是一个个人，他毕竟是他所处社会的个体。他们接受了这些思想却并不懂得其含义。

随着社会需求的发展，有采取新思想的必要。然而，社会最终并完全接受新思想，多发生于危机或困难时期，例如在国家发生深刻的宗教、政治或经济变化时期。因此，随着社会的分化与发展，新的措施与机构就会占居上风。于是，社会便对其积累起来的未经运用过的思想加以检验，并把那些提供最大好处的思想掌握起来。倘若这种思想或理想确实有效，那就会保存下来，并逐渐成为民族的遗产；就会付诸实践，并最终成为牢固的社会制度。当然，有可能由于改革者的思想太先进了，社会要经过好几个世纪之后才会达到他所要求的目的；但是，倘若改革者的设想在原则上是合理的，社会是会赶上来的。<sup>②</sup>

因此谁能说理想是不能实现的呢？既然乌托邦思想家的思想与理想都如上述，谁能说乌托邦思想家的设想不能实现，他们的乌托邦思想是不起作用的呢？说到底，问题是否在断定实现我们的理想的时间上弄错了呢？人们既然发现了昔日的理想，难道就没有发现其周围有许多理想业已实现了吗？难道任何一个生活在20世纪的人，亲眼目睹不断发生的种种奇迹和千百年来理想正在付诸实现，还会说一切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吗？否！我们梦想家毕竟可能就是预言家！正如威尔斯在他的《现代乌托邦》一书中所

---

① 莫尼斯，《十位都铎政治家》，伦敦1906年版，第56页，多少从不同的角度写道，“加那哈德先生并不是对英国人有实用意义的模范，他注意从拉曼查骑士的经历中汲取教训。但是加那哈德先生的看法是值得每个英国公民深思的。每个公民可以从中汲取不少对自己品德修养的实际教益。将公认的理想贬低为不切实际的作法，只能表明对理想的意义与作用毫无认识。”

② 许多伟大的领导人深知，有价值的思想往往过于新颖，他们大多在将新思想付诸实施之前耐心等待时机成熟时再说，或设法在群众中激发支持他们的观点的思想。

说，梦想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当你和我做梦时，梦幻可能就是现实。说实在的，谁能否认我们当今的科学、对各种事物的观察和所作的种种事业，不是每天都在使昔日空想家所想象的东西成为现实么？我们祖先的乌托邦现在业已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了。昨天认为荒谬绝伦的东西，已是今天的真理和现实。另一个时代会感到我们的乌托邦思想是不适宜的，甚至是不真实的。

因此，这样一种研究也教育了我们，社会的思想和理想确实可以作为奋斗的目标，并有助于进行社会控制。作为目标，它们乃是比较全面的社会组织的基础。它们赋予人们以希望并激发人们的勇气，因而给生活带来活力；人们在吸收了这些思想或理想之后，就能上升到社会生活的更高而又更美好的阶段。社会所取得的进步，大多是渗入到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新思想所产生的结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文艺复兴运动，它彻底改革了中世纪社会。什么东西引人注目并赢得人心，社会便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和形式。社会改革确实基本上表达了渗入到绝大多数人民心中的新思想。哈珀<sup>①</sup>先生在谈到对此持反对的意见时曾说：“正是由于理想主义树立了一个完全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人类才日益趋于完美。而反对者却以为，只要将之说成是空想就可一举抹杀了这种主张。空想这个贬义词用起来是轻而易举的，但一般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用它。”幸而历史上发生了伟大的运动，例如废除奴隶制，可以证明一度毫无疑问地被视为空想的思想，在社会进化中却业已付诸实现——这不仅使那些一直坚信它能够实现的人感到满意，而且对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亦复如此。由于乌托邦具有间接启发人们思想的威力，它唤醒人民并最终导致行动，而不引起许多人的反抗——这是一个显著的特点。作为对社会起控制作用的新思想，它们也起到有益的作用；这是因为它们以更新、更高的形式出现和最美

<sup>①</sup> 《社会理想》，第 282 页。

好的未来协调一致。由于这些新思想出自极为优秀的个人并经过筛选，一般比现存的控制形式要优越得多，明确得多，广泛灵活得多，倾向于消除严酷的外来指令，而采取以开明的态度为基础的控制措施。

对乌托邦和理想的研究还教导我们，不要嘲笑梦想家和满怀希望的改革家。即使某些人坚持与当今世界有抵触的理想，我们也不可贸然地责备、蔑视或迫害他们，因为他们并不一定就是受骗、狂妄、反常的人；他们可能有我们这帮人看不到的稀世的珍品。我们应当象对待为超出日常世事而做出的一切努力一样，对这些努力深表同情，以使用未来的眼光评判现实，用人类生活中极其豁达的胸怀去评判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命运。新思想未必荒诞不经，它可能在事态发展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终有一日，这个进程会赶上新思想的。

作为个人，我们在处境良好时，有时会形成种种想法。这些由个人提出的愿望（按照上述分析，这就是所谓的理想）通过相互作用而不断筛选的过程，在集体思想中形成一种集体的愿望，我们称之为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的特点一般远不如由个人敏锐地想出的理想那么明晰。尽管社会理想所起的作用不同，它却是促使人们采取行动的强有力因素。在它的背后隐藏着社会情绪。这种共同的社会理想就是社会臻于完美的理想。普通群众和乌托邦思想家不一样，他们没有走得那么远，试图去分析完美的境界或找出决定它的各种因素，也不去寻求达到这种境界的方法，正如他们不能分析或界定完美无缺的美和真理一样。可是，他们一心向往并为达到这个最终目标而作出各种努力。但一般的思想却总是处于抱着一种朴素希望的状态。这种希望的出现乃是社会意识形成的标志，即表明社会认识到其自身的存在，并认识到它必须具有的命运。因此，完美的理想并不与时代的现实趋势相矛盾，反而唤起人

们对现实受忽视的一面的注意。完美的理想是有远大前程的。它将人类提高到真正应有的地位，并为其实实现提出最高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这个为大家所期待的乌托邦思想，在我们再次被迫陷入饥谨、妒忌、偏见以及日常困扰着我们的习俗以前，必须借助于加强并加速那些为了美好事物时而发生的各种运动，借助于那些不时发生而暂时完全显露出来的不同的社会气质。这种理想主义是一条光芒四射的光线，它贯穿于世世代代的混乱、愚昧、粗俗与武断之中。这证明所有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向往乌托邦。这就使得人们不难接受乌托邦思想了。

理想本身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即使我们拿不出证据表明理想总有一天会实现，但纯粹理想的本身对我们也是有价值的。柏拉图早已有些想法：一个人一旦找到了一个正义和幸福居上风，而生活又达到前所未有的丰富和更高水平的理想国家的形象，那么抱有这种理想就不是徒劳无益的了；因为这时人们不仅受他目睹的事物所支配，也受他想象中值得向往的东西所支配。他在谈到他的《理想国》时说：“任何愿认真思考，并在思考时自我克制的人，都会认为天上可能有一个‘理想国’的样板；而他是不会介意在哪里或就在这里到底有没有理想国的。他只是对这个理想国尽到责任，而不是别的什么。”心中有了理想，就可以揭开社会变革无边进程的序幕。

原则和理想总是伴随着我们，并作为我们用以评价现实状况的准则。这便是理想的伟大作用。即使这些理想不能实现，也能使我们了解现实，有助于我们理解真理的内在特征。这些理想给我们制定了一个准则；我们可据以弄清现存制度和状况的缺陷、反常现象和变态以及人们的行为应力求遵循完美的标准。将现实和理想相比较，差异便显而易见。指南星并不因永远不能达到而失去其指南的作用。理想是目标，也是向导。因此，现实和理想虽有

很大差距，但我们知道，除非有一个崇高的理想树立在它的面前，现实是不会有长足进步的。正如乔治·赫伯特所说：

“向天空瞄准的人，  
比向树梢瞄准的人射得高得多。”<sup>①</sup>

乌托邦思想家和乌托邦思想，不论其类型如何，都是具备这种性质的理想。这是在方法和准则上都特别有效的理想。<sup>②</sup>乌托邦思想家为这个世界塑造了灵魂。乐观主义不让人们以偏见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乌托邦思想家就是以乐观的精神抗拒恶劣的哲学犬儒主义和那种难以捉摸的抵消社会运动的社会绝望情绪。他们克服了利己主义的和盲目的自私观念，高举社会协作的理想旗帜，从而使人类的能力得以无限提高和扩大。他们赞扬高尚而又合理的要求和胸襟开阔而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动机。他们感到有为人类的福利而奋斗的责任；他们是为了人类而对人施加影响的人。他们描绘出一幅社会和谐的前景，实际上就是要实现个人的最高价值并通过社会实现他作出最真诚的效劳。这确实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

回顾以往，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明主要是通过物质和精神生活领域中的发明创造而建立起来的，它是思想家和理想家的产物，几乎全是智慧的结晶。这就使我们坚信，乌托邦也许实际上永远不会出现，乌托邦思想家也可能为人们所遗忘，可是他们的理想却具有经久不衰的因素，从而得以传之于万世。乌托邦思想家的理想是不会完全消逝的！

<sup>①</sup> 见巴克所引《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政治思想》，第160页。

<sup>②</sup> “在这方面，幻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家——尽管不切实际，不适当当时的社会环境，却有点象圣者那样，相信真有天国。他们有助于缓和现实世界所给予人们的苦难并为未来的较为优越的政治秩序创造条件”。W. 詹姆士：《各种宗教经历》，伦敦1908年版，第360页。



这样说也许是合乎真实情况的：即使乌托邦思想从无人阐述过，即使乌托邦并不曾具有诱人的魅力，世界的进程也会由于其他许多不断起作用的进步因素象以往那样向前推进。但是，这些乌托邦思想家的出现，无疑有助于按以上分析过的方式加速并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并沿着下一章将予以专门阐述的路线向前迈进。

## 第九章 乌托邦思想对 文明的贡献

理想的價值不在于新穎，而在于對社會進步具有促進力。某些理想可以肯定是最寶貴的，那就是賦予世界以高尚生活的思想、具有強大社會動機的和能在有效的社會制度中體現其精神的思想。我們可以在大多數烏托邦中找到這種卓有成效的理想。奧古斯丁·孔德說過：“任何烏托邦都不會狂妄到連一點無可辯駁的好處也不提。”<sup>①</sup>我們只要環顧一下周圍的生活狀況，就不得不深信他這話道出了一個深刻的真理。烏托邦思想成為現實是到處可見的。烏托邦思想家和他們的烏托邦思想在形成他們身后的社會進步中起了極大的作用。在本章中我們將對某些具有較深遠意義而目前尚流行的烏托邦理想作扼要的說明，並對烏托邦思想中較為突出的因素對社會進步的關係加以探討。這樣，我們便可以估量出烏托邦思想變為現實的具體驗證了。當然，各種思想和理想並不恰恰總是按思想家所想象的方式而付諸實施的。社會在實際應用這些思想時，多少作了某些改變，但其核心卻清晰可辨。此外，我們不能說烏托邦是唯一起促進作用的力量，也不能說烏托邦的創始者都是絕無僅有的先知和哲人，因為，正如我們業已指明的，他們是各自的時代的前進運動的一部分。但誰也不能否認，他們在所引述的事例中處於非常強有力的地位。讓我們開始對他們進行分析。

先知和耶穌的烏托邦思想逐步在人們的道德和精神生活中占

<sup>①</sup> 《實證哲學》，馬蒂諾版，第2卷，第26頁。

据统治地位。其它的理想没有能够做到这一步。美满的社会生活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其基本原则也逐渐以此为基础。大约在两千年以前,特别强调个人的耶稣乌托邦思想就已引起人们注意要以个人品行端正作为美满社会生活的基础。他认为,只要个人循规蹈矩,有德行,重新做人,世界就会朝着公道与安宁的方向前进。这种强调个人品德与力量,这种认识到解决老问题的办法,这种通过精心自我修养而献身于同胞的精神,乃是历史上具有奇迹般效应的思想,并正在深入和渗透到全世界生活的最深处。但是,重要之处并不是耶稣乌托邦思想的内容,而是它的精神。这是一种不断引导人们向前的精神。他的乌托邦思想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原则,一种永远奔流不息、不断变化着的思想。正如保罗使耶稣的精神适应他的时代一样,各个时代的杰出思想家也学会了使他们的思想适应于他们的时代。这是每一个时代所具有的伟大的再创造精神。实现了的理想总还是落后于理想,其原因在于理想具有微妙的特征。因为,不论在什么时代,理想总是有效的上诉法庭。基督教精神凭借其力量,无疑是各个时代精神进化的促进因素。

先知所宣扬的救世主式国家,天启录信徒在大变乱时期所建立的时代,以及耶稣的天国,都具有大胆进取、异想天开和绝世超凡的风格;每一个理想国都在人们心中培植了人类解放、社会和平、未来的正义与博爱的美好希望,并力图使人们在亚述人、波斯人和罗马人等异族统治下所带来无穷的內部衰败和巨大痛苦中依然保持这种精神。同样,这些希望一直是各个时期不同集团人的理想与启示——一个永放光芒的目标。

莫尔的乌托邦<sup>①</sup>不仅对后来的一连串的乌托邦而且对社会改革的整个趋势都是一种激励。毫无疑问,诸如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不完整的《新大西岛》、霍布的《利维坦》、哈林顿的《大

<sup>①</sup> 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巨大影响前已述及,见论《理想国》的一章。

洋国》以及菲尔默的《论国王的天赋权力》等著作都无不受其影响，莫尔倡导普遍义务教育，提出一种迄今尚未过时的思想。对他的同时代人而言，他的刑罚学观点和为宗教自由所作辩护是十分荒谬的，但他对犯罪的解释及其补救办法则同我们先进的现代政策是一致的，他提倡的宗教信仰自由在他辞世时看来是一种空想，却业已为世代代的人所享有。斯卡德小姐谈到莫尔的工业方案时说：“倘若他设想的社会赖以建立的工业体系仍局限于乌托邦，那么，那个共和国与目前英国之间的联系至少比他那个时代要频繁。人们倾向于认为，甚至我们的某些经济学家有时也会去逛一逛那个梦幻之乡。至于梦想家——罗斯金、贝拉米、莫里斯、豪厄尔斯——他们已经在那里呆的时间够长了，足以带回内容丰富的汇报。这些报告在细节上和希斯拉德的报告有所不同。”<sup>①</sup>莫尔还是短工作日的倡导者。在这方面，他至今仍然站在无数改革家的前列。实行短工作日可以使人们有机会去提高文化，并废除繁重而卑劣的劳役。莫尔的许多理想仍然代表人们对社会寄予的高度希望。韦尔斯先生告诉我们，《乌托邦》也对英国的恤贫法<sup>②</sup>起到影响。它是一部高瞻远瞩的杰作。它使人们不得不注意，使有头脑的人深思。它在19世纪末成为某种进步运动的有力手段，清除了恤贫法中所提及的英国社会的大量弊病。《乌托邦》曾三次由拉丁文译为英文，也译成许多其它的文字。这就足以表明人们披阅这部书以探求其思想的热切程度。

人们普遍认为，欧文的乌托邦思想乃是上一世纪某些重大社会改革和新创社会制度的促进因素。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指出，欧文通过他发表关于工业在新机制之下与劳动有关的人道主义思想并借助强烈的宣传鼓动，对第一个劳动法的通过具有极大的影

<sup>①</sup> 斯卡德：《英国文学中的社会理想》，波士顿1898年版，第80页。

<sup>②</sup> 《史纲》，第2章，第211页。

响,这就是1819年的《英国工厂法》。正如韦尔斯所说,“这是限制雇主愚蠢而不可容忍地利用工人的贫困处境来剥削工人所作的第一次尝试。”<sup>①</sup>由罗奇代尔先驱者们所发起的在贫民中创办各种消费合作社,就是欧文在新拉纳克所作实验之后的直接产物。欧文自己是这种工会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并亲自制定了在全国建立工联的最初计划。欧文是一个利用各种办法,通过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给他那一时代和以后世代留下深远影响的人。

据此,我们可以对每一种乌托邦和乌托邦思想家继续加以讨论,但没有这个必要;还是让我们研究一下乌托邦思想家对文明业已作出的各种特殊贡献吧。

首先,乌托邦思想家帮助后世子孙避免社会性灾难。他们亲眼目睹日益累积起来的社会贫困和失调现象所造成的恶果,于是通过乌托邦思想提出解决那些难题的办法,以表明如何避免革命及其它社会灾难的发生。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主张社会健康、安全和各阶级和平共处这样一种社会制度的宣告者。他们提出一种历史哲学——一种可以使人们从过去世代所犯错误中受益的想法。

人们发现在乌托邦思想家中有一种值得赞扬的大无畏精神。他们承认社会弊端的存在。这一点很少有人做到。他们又进一步敢于提出改革的建议,敢于描绘出一个业已实施这种变革的国家的图景。大多数人对这种做法仍抱止步不前的态度。我们害怕承担打乱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后难以预测的风险。我们情愿忍受已知的种种弊端,而不愿与之搏斗。乌托邦思想家却愿提议使用未试用过的力量。他们是勇于冒险的人,由于他们敢想敢干,便做出了大量的工作,无声无息而又合情合理地完成了必要的变

---

<sup>①</sup> 《史纲》,第2章,第404页。

## 革。<sup>①</sup>

好几百年以前，乌托邦思想家就发现了人类价值的新准则。他们反对目前仍然极为流行的主观个人主义的价值准则，并树立起社会之善和社会整体发展的观念。他们探求一种基于兄弟般合作的统一协调的社会组织。<sup>②</sup>远在希伯莱先知者的时代，他们就承认社会自我和个人自我。他们看到全社会的相互依存和团结的必要性。只是最近人们才普遍认识到这种团结的重要性。他们的思想和理想是用来制约社会，而不仅是用来制约个人的。他们提倡团结合作，反对个人独断专行、自私自利和贪得无厌。他们的乌托邦预测的是社会的命运而不是个人的命运。只要乌托邦精神和内容为群众所掌握，那么，他们的乌托邦就过去是而现在仍然是行之有效的。他们之中倘若有一些人如耶稣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那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的进步有赖于具有较优秀气质的男人和女人，品质最优者也就会更具社会性。当然，乌托邦总是由一些理想的社会化了的个人组成的。我们今天不论身处何方，都从某些乌托邦思想家那里汲取了统一社会的观念。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勉强地运用了他们的思想；而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则以较为广泛而不大固定的方式运用了他们的思想，以之作为他们的基本政策和努力的基础。

乌托邦思想家尤其是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在鉴别各种社会规律时也预料到会有其他思想家问世。因为，总的说来，新近的反思成果之一乃是：存在一种明显的始终不移的规律，而不论其是物理性的还是社会性的。他们不断探索人的和社会的反应与行为的通则，并以之作为他们改革社会的基础。

---

① “社会改革家的首要任务在于对这种疑虑进行抗争，因为这种疑虑可以麻痹社会理论并使倡导社会进行深远变革的事业成为轻率之举。”亨利·琼斯，《社会改革家的有效信念》，伦敦 1910 年版，14 页。

② 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者。

傅立叶正是运用这种方法得出关于本能说的观点。这个观点只是最近才在社会心理学领域里受到重视。他在为对人类的行为作出解释而进行探索时，得出了“激情”这一观念。他所谓的“激情”实际上就是“本能”。他是当今“本能主义者”的先驱，他们将人类这些长期以来演变成求生存的部分素质的天赋视为人类行为的推动因素。<sup>①</sup>尽管他不曾明确表达这一思想，但他心中抱有这种想法却是显而易见的。在他极力反对智力教育和文明的影响时，他逐渐意识到人类本能的自动反应的重要性。他认为违反人的本能乃是一种干扰人类幸福的事情；它是一种勉为其难的强制措施，一种对自身的束缚。因此，他向往“自然”的生活——一种能使人类及其环境和谐一致的生活。他抓住格雷厄姆·华莱士<sup>②</sup>称之为“文明人类的杰出任务”——使社会生活适应人的本性。

这使他成为科学管理和现代劳务管理的先驱。他认识到单调乏味、令人疲劳的劳动的弊病，认为工业系统中确有某些东西使每个工人感到厌烦和不快。他认为工作应适应个人的特定情况，应努力使圆钉进入圆孔，方钉进入方孔，这样工作才能令人满意。因此，他通过这种手段试图提高工人的积极性、工作效率和社会生产力。他利用工人爱好工艺和相互竞争的本能并通过满足工人们的要求

托

① 麦克杜格尔：《社会心理学》，波士顿 1909 年版，第 44 页。——“我们可以说……本能是人类所有活动的直接或间接主要推动力；由于某种本能的欲望或冲动力（或由本能演变而来的某种习惯）所推动，每一连串的思想，不论其从表面上看来是如何冷漠无情，却受之驱使并走向最终目标，人类的每一肉体活动也为之启动而保持下去。本能的冲动决定所有活动的目的，并为所有持久的心理活动提供动力；所有复杂、最发达头脑的思维机器只不过是达到了这些目标的一种手段，只不过是出于这种冲动为了满足其要求的工具，而欢乐与痛苦则不过帮助它们寻求适当的手段罢了。”

“要是我们把这种具有强烈冲动力的本能习性消除掉，那么，这个机体就不会有任何活动能力了；它就会躺下不动，就象一个去掉发条的钟，灭了火的蒸气机。这种冲动乃是形成与维持所有个人与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正是在本能中，我们面对着生活、思想与意志的中心奥秘。”

② 《伟大的社会》，第 68 页。

并

以赢得好感，这种做法现已认为是绝对必要的。就在最近，赫茨卡和威尔斯还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来建立理想的社会国家概念。

乌托邦思想家也是适应主义者，因为他们曾试图使社会生活适应某一时代，或者更进一步旨在创造出适应各个时代的完美社会生活。他们的目标是：社会的自我维护、自我扩张和自我完善。使人类适当地适应环境或使环境适应人类，乌托邦思想家便可达到集体的完满生活。然而，除少数例外，他们都受到缺乏对人和**社会基本特性的认识的限制**，并缺乏改变环境的手段。即使他们确有改变环境的想法，也不过是表面文章。然而，他们确曾断定某些适应措施是可取的，并成为他们进行工作的设想。这些措施有的得到验证，有的则经过纠正，有的则遭到否弃。本章只谈那些得到验证和纠正的问题。

宿命论和自由意志一向是在社会思想家当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否也提到乌托邦思想家的面前呢？这是毫无疑问的。某些怀有道德-宗教思想的乌托邦思想家，尤其是先知和耶稣，曾宣讲个人和整个社会的自由意志论。据此，个人本身就能使自己获得新生。他并不受经历或环境的束缚，而是一个具有自由道德的人，自己命运的主人。这同样也适用于整个社会。社会集团能任意改变它的生活。这也是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人发扬自由意志的结果。另一方面，那些信奉天启的人却是地地道道的宿命论者。他们认为，人不论好坏，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有等待老天采取下一步行动。

但在早期的现代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家中，我们碰到另一种观点。当涉及个人问题时，他们是宿命论者。尽管他们都渴望自由表达个人的意志，但他们都坚持认为，环境的因素，不论是物质性的还是社会的，总是压制着个人，使个人成为听其摆布的玩物。他们承认，个人本身是人类意志的奴仆。但这种意志是由社会所



决定的。他们看到，我们所谓的“社会环境”比任何别的东西更紧密地缠裹着人的个性。它渗透到人类生活中的思想最深处，并对其产生比物质环境更为重大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个人的实际道德品质绝大部分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他们把个人本身看作是社会的产物，正如琼·保罗所说的那样：——“没有人外出散步而不把对他具有永久性的影响带回家的。”因此，他们坚持认为，坏的环境是对社会改良的一种障碍，而好的环境即使不是绝对重要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重建社会环境的要旨在于提供有利的环境，从而使人类灵魂达到更加美好、更加崇高的境地。世俗的乌托邦思想家几乎都曾反复陈述过这种思想。正如我们前已指出，傅立叶特别主张人类及其所处环境必须和谐一致。我们只是在培根的《新大西岛》中看到令人瞩目的关于试图控制与安排物质环境的论述。读者可以回想其有关形式。

另一方面，就社会进行的种种活动而言，自由意志论也是适用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意志。个人的行为和思想除天性外几乎全都为其物质和精神环境所决定，但社会的行为和思想却不然，其特点为：活动的自由和在人的坚强意志支配下可按新的真理有意识加以重建的易变性。这正是乌托邦思想家想要做的，因为他们对他们所处时代那种任意的、不自觉的而又停滞不前的状况不满。他们渴望把人类的成果用于切实可行的人类进步的计划中去。这种心情在希伯莱先知的著作中，在耶稣、奥古斯丁、莫尔、康帕内拉、哈林顿和现代的乌托邦思想家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对眼前的境况悲观失望，而对未来社会的可能发展却持乐观态度。他们预见到未来的世界是合理的，自动的，并具有明确的意向。但他们并不想使人类立即摆脱它面临的现状或半命定的状态。然而，他们倒是抱有这样的想法，即期待理想终将导致社会的采纳并使之变为事实，而不是由个人零零落落地来完成这种变革。他们感兴

趣的是社会的进步而不是个人的福利和个人的作用。应当特别注意乌托邦思想家和乌托邦思想所持这种把社会意识置于首位的观点。一般人对未来持放任自流的态度，他们则代之以由社会理想和社会理想家对社会进行局部控制的做法。

乌托邦思想家认为，社会靠自己的自由意志是可以重建其指导和管理方法的。这乃是乌托邦另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方面。这些新的方法虽然在实现社会统一方面所起的作用尽管不及以往习俗那么有效，却具有明显的潜在力量。它们能造成一种使未来优于过去的形势。它们提出了一种向前看并为未来作好准备的管理方法。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里，向后看的思想一旦日益成为腐朽的象征或者代表某种不光彩的态度，这种情况就更引人注目了。

从先知者起，所有的乌托邦思想家都认识到人有超越其自身的能力。在人类的共同意志中，他们看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一旦沿着更好的路线前进，就会决定人类的进程。他们坚信，只要人类具有这样做的意志，就能获得幸福并达到更加完美的境界。他们认为，社会进步是事在人为，是人的意旨和计划的结果。他们都认识到发展更高的道德和精神的必要性，并且以罕见的乐观精神感到这是可以做到的。他们全都希望创造出一种人类可以达到的真正道德与精神境界的环境。这就是当今最富于建设性思想的精华。

他们的乌托邦思想都显示出这样的精神，即只要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就没有我们做不了的事情。他们充满了托德所说的“改革的意志”<sup>①</sup>。但是，它必须还是一种既考虑到改革的目的又考虑改革的方法的意志。几乎所有的乌托邦思想家都认为社会应对环境负责，尤其应对精神环境负责。他们相信个人犯错误是由不健全的社会遗产和环境所造成的。但他们也看到，倘若具备了适

<sup>①</sup> 《社会进步论》，第 506 页。

当的环境,即使比较平庸的人也可以改造成为合格的社会一分子。因此,他们要求仔细组织并利用我们在前几章探求乌托邦思想因素中业已指出的种种方法。乌托邦思想家先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好几百年就认识到,不仅个人对社会犯了罪,而且社会对个人也犯了罪。他们想通过审慎安排的、具有一定目的机构,把这种有害的侵犯行为变成一种互利而具有建设性的力量。

柏拉图、莫尔、康帕内拉和后来的培根都是现代优生运动的先驱。<sup>①</sup>由于他们当时受到缺乏遗传学说的限制,又只怀有强烈的社会理想,他们便把生育这种高级的自然冲动视为神圣的职责,要在科学知识的指导下进行。人类未来的利益要求只应让体格健康并具有英勇无畏精神和意气风发的人生育子女。柏拉图和康帕内拉甚至提倡由长者或“大师”或医生在护士长协助下主持婚配。这些乌托邦思想家认为健康的体格和精神是人类臻于完美的必要基础。他们认为文明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育,认为要建一座高楼必须基础稳固。他们模糊地抱有这样一种自动进化的观念——与自然选择相反,进行以合格的父母为基础的人类选择——以之作为改进人种从而使社会迅速前进的措施。这种人种改良的光辉思想迄今才开始激发人们采取行动。可是,象上述大多数其它因素一样,这也是乌托邦思想家的创见。

柏拉图以后的乌托邦思想家,几乎毫无例外地倡导男女平等。在他们看来,社会不应妨碍并按旧习奴役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因而失去她们出色的劳务。他们不仅把妇女看作是男人的伙伴,而且在宗教、政治、公民权利上与男人平等的人,允许她们享有作出成绩的同等机会,以便为社会的进步作出她们的贡献。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还认识到不同性别之间深刻的生理差异,并给予妇女以

---

<sup>①</sup> 柏拉图的理论乃是社会或生物哲学史上首次全面设计的优生学,但在柏拉图以前约 200 年,另一希腊人梯奥格尼斯已清楚地认识到将优生学应用于人类的原则。

适当的照顾。在这些方面，乌托邦思想家也早已预料到我们今天的进步分子现在才开始认识到的东西。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别的乌托邦思想家的著作也稍有涉及,尤其是在莫尔的著作中),我们看到首倡的预防医学。他鼓励体育锻炼,注意身体,因为这样做便无须求助于医术以防止疾病。由此他认为,医生的首要目的不是治病,而是建立一套锻炼规划并推荐可防止疾病的食谱。他预见到预防胜于治疗,并建立了一种直到最近才被采纳的医学准则。莫尔提倡消除城市拥挤现象,进行体育活动,关闭一切滋生恶习与疾病的场所,以及他极其强调的普遍保持健康等主张,也倾向于以预防措施取代医药。可以说,乌托邦思想家的各种优生学计划也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另一个广为宣扬的开明措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这在近来人们才开始采用。早期的现代乌托邦思想家,尤其是莫尔和哈林顿,在宗教专制主义和强求一致行动的时代,就敢于提倡;只要不是明显反社会的,人们就都有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他们当中大多数的人都崇拜理智,摒弃虚假的信仰和无用的形式,而允许宗教的自然力量发出光芒。这样,他们便捍卫了道德的基础。他们预见到,在人们遭受几百年宗教法庭的镇压、迫害、逐出教会、顽固偏执的摧残之后,人们只是在最近才建立起可行的办法。

与此相类似的情况便是某种形式的社会宗教的思想。我们在乌托邦思想家中,尤其在圣西门和卡贝那里,可以看到这样的思想。他们看到教条化的和濒于夭折的宗教所表现出来的唱高调作风与空洞无物的说教——这样,宗教已逐渐成为形式、仪式和信条。他们看到宗教必须重新改造,使之具有人性并对人类有所助益,成为对社会行为具有推动力的社会力量和激励因素,以鼓舞人们无所畏惧地面对未来;而不是一种障碍和社会麻醉剂,使人卑躬屈膝、畏缩不前的东西。他们强调兄弟情谊和社会伦理,追求的是

全民幸福而不是全民一致。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对现代思想所起的影响。

财产社会化学说现已在某种程度上毫无疑问被认为也是来源于一些乌托邦思想家，他们曾对此略加着重阐明过。他们几乎全都是社会-经济哲学的拥护者，主张赋予国家以掌握土地和大部分其它形式财产的至高无上主权。他们坚持这一点，因为乌托邦国家是一个旨在谋求共同利益的友好合作整体。这种乌托邦思想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目前流行把财产权解释为只寓于国家的说法。今天就绝对意义上而言，我们认为个人对什么也不能占有。财产、遗产以及所得税、警察权、土地征用权，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一个人挣的钱和拥有的财产都不是他自己的。国家通常（固然不总是）对征收的财产给以补偿，但这种做法并不能否定这条原则。在战时，食物、粮食、衣物、工业等等都由国家管制。在遭到灾难时，可依法征收任何东西。倘若出于公众的要求将某物挪作公用，国家可以不承认私有财产权。财产的根本之点在于国家的良好愿望。乌托邦思想家首先提出这一思想并使之成为现行的实在思想。

乌托邦思想家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们承认社会制度的实用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乌托邦思想家都承认这一点。对先知和耶稣来说，乌托邦思想是个人的主观想法。然而，倒是世俗的作家其中包括奥古斯丁看出拯救的办法可能是而且事实上也必然是客观的或制度上的措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经高度精心组织的体系的阻力，并使新的拯救学说得以向公之于众并付诸实施。他们意识到需要一些特定机构来塑造一种社会意向，从而使社会改革得以实现。

乌托邦思想家所提的最重要的机构和最强有力的乌托邦措施就是教育。他们认为，有可能通过这种办法把那些难以对付、不事

生产、自私自利、逃避责任、剥削他人、罪孽深重、思想别扭的人改造成正直的人、合作者、好公民、伟大的人类团结友爱的成员，或者按怀有伦理-宗教思想的乌托邦思想家的想法就是使这些人改造成伟大神权国家的成员。他们的哲学乃是一种建设性的乐观主义，认为人的思想是可以按正确的方向加以改造的。在先知者当中，我们首先注意到对教育人民作出的认真努力，从柏拉图的著作那里我们看到实现“善”的理念乃是以由真正公道所激发的正确国家为终极条件。因此，要实现这一点，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耶稣的作用就是为了灌输社会化的伦理观。早期的近代乌托邦思想家都着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培根甚至要建立一种广泛的教育体系；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同样把教育作为他们重建社会方案的组成部分。

在乌托邦思想家看来，教育乃是社会用以实现其目标的主要手段。他们所重视的教育类型并不是重复性的、死记硬背的、迂腐的因而不是不进步的，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能起作用并具有社会性质的文化。它切实可行而能适应生活——这种教育培养人的洞察力、身体的耐力、处理家庭事务的能力，遵守社会纪律的技巧和能力。他们的教育制度在维护他们所描述的完美社会方面是积极的因素。这些乌托邦思想家，正如后来的大多数社会思想家一样，也看到教育是对社会进行控制和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极为有效的手段，因为教育能培养人们的自我克制和遵守纪律的精神，因为它对人们的行为举止提出奖惩的办法。他们把教育看作是将新的思想与理想灌输给群众的手段，从而使之成为一种信念，进而导致新的社会活动。乌托邦思想家看到在使人们进行最恰当的日常劳务和指导如何过好家庭生活方面，教育起着有效的作用。他们把教育看作是一种使人们履行公民义务和参加公共事务的方法。从他们讨论教育的精神来看，他们认为教育是一种可用以创立完善的社会单位的方法。教育不仅是使人们能适应环境的机构，也是

使环境适应人们的物质、社会和精神需求的机构，它是一种能把进步的道德思想和社会义务、政府和法律概念树立在人们的心上并决定其发展的手段。它是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各种思想、准则、价值、思维和行为习惯的有效手段，甚至间接控制劳作的进程。教育是最典型的乌托邦措施。

在近代社会哲学家中，有一位持这种观点的杰出人物。按照沃德的看法，社会的进步并不完全象斯宾塞和一些科学社会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完全取决于进化；因为进化可以通过思想与意志的作用来控制 and 加快。只要为所有的人提供充分受教育的机会，社会便可开发人类的潜在能力，从而使完美的境界得以实现。在坚持这一原则上，沃德获得了乌托邦思想家不曾有过的支持，因为他所处时代已具有世界性的出版业、由国家推行的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图书馆等等，并从中得到鼓励。这些全都是以往乌托邦思想家想都不敢想的奇迹。

旨在增进知识和人类福利的乌托邦式机构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弗朗西斯·培根的《萨洛蒙之家》，即本书前面提到过的“研究院”。当时，他曾暗自思量，如果他能成为剑桥和牛津的某个基金会会长，他就会试图建立这样的学院。这一研究思想并未写进他那最伟大的著作《新工具论》。这部书体现了他的科学方法，却对他的时代和 17 世纪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只是到了 18 世纪才有人阅读并加以讨论。他把建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想法写进他未完成的乌托邦式的《新大西岛》，其中含有许多类似《新工具论》的思想。他写这本书的直接目的，无疑是要促使詹姆斯国王在英国建立“萨洛蒙之家”。詹姆斯尽管极力把他自己装扮成“萨洛蒙第二”，但他对大法官提出学术改革主张几乎或根本不感兴趣。培根没有完成这项工作，甚至未能发表他那未完成的著作，便着手其他事物，这就表明他并不执意希望立即产生什么结果。

但是这种光辉的、有价值的思想是不能不为世人瞩目的。培根去世不久,这种思想原则上在英国开始实施,并最终传播到许多欧洲国家。尼科尔斯教授<sup>①</sup>写道:“我们承认(1645年)在伦敦建立的‘哲学学院’,并在(1662年)王朝复辟后扩大为‘皇家学会’,这应归功于《新大西岛》中所预先提出的‘萨洛蒙之家’方案”。该学会创建人之一沃利斯把培根的名字与伽利略并列,赞为他们的先师。斯普拉特说:“这是一个以培根的渊博才智为之设计和以克拉伦顿的深谋远虑而建立的机构”。博伊尔认为皇家学院之所以能够建立是“由于那伟大的自然主义者……我们伟大的沃如兰姆”。刚才提到的托马斯·斯普拉特博士是罗彻斯特主教,也是该学会的第一位历史学家。他在《皇家学会史》(1667)<sup>②</sup>一书中写道:“我只提及一个伟大的人。他完全意料到这个现已建立起来的机构的全部情况。这个人就是培根勋爵。”<sup>③</sup>约瑟夫·格兰维尔在《科学的怀疑哲学》一书中说:“《新大西岛》中的‘萨洛蒙之家’是皇家学会的预制方案”。皇家学会第一任秘书亨利·奥尔登伯格(约1615—1677),把搜集科学资料的新热忱说成是“由卓越的沃如兰姆勋爵的特殊关怀与指导下开始的事业。”<sup>④</sup>

因此,通过《新大西岛》,培根为皇家学会提供了一个样板,后来终于发展成为英国研究学会,从而使他卓越的影响在他身后的世代中处于稳固的地位。

但是,他的影响却远远超越了他自己的祖国疆界,并在大多数科学团体的创建中起了积极的作用。M. C. 亚当斯<sup>⑤</sup>先生说:

---

① 《弗朗西斯·培根,他的一生与哲学》,第2卷,第236页。

② 第35页。

③ 汤姆士·坦尼逊在他所著《培根》一书(第264页)也说了相同的话。

④ 全由史密斯引述,他是《新大西洋》主编。皮特出版社系列,剑桥1900年,前言第28—32页。

⑤ 《培根的哲学》,1890年,第343页,史密斯引述,见所提著作。



“甚至在迦利略自己的国家意大利，马塞格里伯爵于1714年在波伦那也建立了一个研究院。方坦尼里说，人们认为他们从中看到了培根的《新大西岛》的业绩。这个机构于1806年不得不重建时，又一次‘得到这个伟大的英国人，这个伟大的英国大法官，这个直率的、社会的坚实哲学台柱的赞助。’因此，培根确有一种令人欢欣的富有成效的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他表明各国政府和私人都有兴趣使这一思想付诸实现。”

《新大西岛》不仅导致皇家学会和国外类似的科学院的建立，它也是鼓励人们合作编辑法国《百科全书》那部巨著的原因之一，在这部巨著里18世纪的专家学者搜集了截至当时为止人类的全部科学成果，并利用它作为反对教会和国家的陈规陋习的武器。当狄德罗谈到他和百科全书的编辑同仁共同创作的“人类知识之树”一书并谈到指导他们从事这一巨大任务的一套想法时，他在《发起书》<sup>①</sup>中写道：“倘若我们获得成功，我们应将大部分功劳归于培根大法官。他在既无科学也无艺术的时代，抛出了一项编纂科学与艺术百科词典的方案。这位非凡的天才在还不可能写出一部已知事物的历史时，却写出了一部关于必须学习什么的历史。”

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培根的《新大西岛》是所有现代研究和人类福利的基础。<sup>②</sup>可见，培根的乌托邦思想历久不衰。诚然，作为

① 《狄德罗全集》(1876年版)，第13卷，第133页，见同上书，史密斯引语。

② 史密斯于该书前言第26—28页写道：

“看来现代科学在许多方面都的确实现了培根的预测。我们的科学远征队与驻外使领馆的汇报完成了由《新大西岛》派出的‘使团’的使命，使我们了解到外国的情况。我们的观象台取代了为研究大气层而建立的高塔。我们极其关注用瀑布作为动力的问题。培根说‘在卫生部我们检验空气……用以治疗各种疾病。’斯佩丁先生则告诉我们，曾作过一些这样的实验，并在治疗肺结核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方法是吸入氧化的空气。现代医学中一些伟大的成果都是按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倡议的用外科手术与药物治疗的方法对动物进行试验而获得的。我们正在按培根所推荐的办法，系统运用杂交来培植新动物和植物的新品种。斯佩丁先生告诉我们，当圣希莱尔由于建议对‘畸形动物’进行研究而受到攻击时，他就提出培根的权威性论点为自己辩护。人们按照培

一个科学家他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他的最伟大的贡献却在于他所提倡的归纳法和实验方法对未来的科学研究所给予的推动力量。正如他本人所说，他打响了召集其他能人智者之铃。<sup>①</sup>

乌托邦思想家很想加以社会改革的另一个机构就是**国家**。自柏拉图以来，他们多数人都把国家奉为至高无上的机构，尽管他们在赋予国家的权力方面程度上有所不同。就其承认或拥护国家而言，它是由人民为了自身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一个社会机构。例如，柏拉图所构想的国家并不是一个统治和纠察的机构，而是具有道德观念的众人组成的一个社团，由抱有共同目的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所有的人则各司其职责。对所有的这些人来说，国家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即一种固定的机构，其目的在于将个人置于种种影响的环境之中，使他获得最大的幸福并使他成为最有用的人；国家也就是给个人提供自由和平等的手段。一些乌托邦思想家，尤其是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强调国家是一种为人民提供适当环境的手段。即使他们大多数人是生活在崇拜国家、政府由少数人独裁的时代，但所有的乌托邦思想家都把国家视为工具而不是目的。民主运动促使我们象乌托邦思想家一样对国家持相同的态度。我们象

---

根这位哲学家的理想发明或改进了望远镜、显微镜、麦克风、传话筒。正如埃利斯先生所指出，对于气味的模仿是近代化学的一项成就：‘菠萝油和杏仁油可仿真菠萝与杏仁的香味，这两种东西的原料……都来自污物。’培根文章中有一段话似乎提到速射机枪。我们可以说，‘我们能在空中作某种程度的飞行……我们有能在水下行驶的船只……我们以人的肢体模仿动物的动作等等。’我们不仅在欧洲各实验室里拥有庞大的研究人员队伍，我们还有各种学会来搜集和讨论各种研究成果，还出版了成果已得到公认的学报。我们的伟大发明家和王公、将领、政治家一样，有权利在公共场所由人民为他们树立雕像。最后，所有科学研究成果——尤其是当它们对群众利益产生直接影响时——往往正式付印。某一政府部门发表天气预报等等，另一部门则向人民提供关于预防人或动物瘟疫的必需措施。培根正是在这许多方面预见到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尽管不能说培根本人发明了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

① 李著：《十六世纪的伟大英国人》，纽约1904年版，第250页。

乌托邦思想家一样深信，社会福利和进步大多取决于国家的性质和管理方法。

谈到我们最受注意的政治乌托邦即哈林顿的《大洋国》——它几乎完全是在谈论一个开明的国家机器——情况时，我们就看到了乌托邦思想变为现实的光辉范例。德怀特大约于三十年前<sup>①</sup>就在他的著作中探索形成美国政治制度和思想的哈林顿思想影响。据说，约翰·亚当斯对哈林顿的《大洋国》非常熟悉，并且正如他的著作所表明的那样，很受哈林顿的教导的影响。麻省宪法中关于“法律王国”和轮流执政的原则直接取自《大洋国》。无记名投票写进了纽约州的第一部宪法；这在哈林顿提出这个想法后一百年就实现了。1872年这种想法终于在英国得以胜利实现。当把这种想法用于议会与地方性选举时，人们采取了极严密的措施来维护哈林顿的秘密投票的基本要点。美国总统杰斐逊起草美国独立宣言时念念不忘地沿用《大洋国》中的一句话：“对自由人民行使的全部正当权力应出自他们的同意。”事实上，他就是引用哈林顿的这些话来维护“政府的正当权力出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概念。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家都向往并最后采纳哈林顿的独特思想。

乌托邦思想家是新思想的源泉，正如许多重要作家所证实的那样，可能也是**现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哲学以及以之作为基础的有关运动之奠基人**。<sup>②</sup>莫尔的《乌托邦》，在一定程度上连同柏拉图的《理想国》，已成为所有社会主义者寻求其许多基本原理的源泉。事实上，一位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曾经说过，“现代社会主义始于《乌托邦》。”<sup>③</sup>首先，正如我们反复指出的那样，乌托邦思

① 德怀特：《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一文，载《政治学季刊》第2卷，第1—44页。

② 例如，可查阅格思里所著《法国大革命前之社会主义》；考茨基著《新社会主义的先驱》；牟克勒著《十九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史》；斯帕戈与阿尔勒合著《社会主义诸要素》；恩格斯著《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

③ 考茨基同上书，第466页。

想家是对现有秩序的抗议者，他们点燃了骚动的火焰。随着十六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弊病开始尖锐化，莫尔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不公道、不平等和苦难的制度。倘若任其维持下去，即使采取某些缓和措施，也没有希望使社会获得改善。因此，莫尔及其追随者彻底谴责财产私有制，认为私有制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从而提出将财产社会化的思想，使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并加以控制。当今有关财产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从他们的理论中推演出来的。莫尔及其大多数追随者直至路易·勃朗，都希望国家能绝对控制生产，以便消除剥削、经济上的浪费和以私人企业为基础而不时出现的社会混乱现象。这都有助于增进社会福利。此外，“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者都从此以解决这些问题为己任，即人口和婚姻问题、劳动时间问题、使用货币问题、可能要下降的生产率问题；对这些问题加以正视，并以崭新的独创性和宽厚的同情心予以研讨。这就使得‘托马斯·莫尔的宝书’和柏拉图早期的梦想成为所有社会主义的不朽思想。”<sup>①</sup>最后，1835年左右，罗伯特·欧文给这个运动起了个名字，称之为“社会主义”。当然，他所致力社会主义不是民主性质的，而是慈善性质的。

对社会学本身进行研究，可能大部分是受乌托邦思想家的影响。圣西门在《新基督教》中奠定了社会的集体状态原则。这是一种新的博爱主义，这些原则是空想的和理想的人道主义，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此外，由于他的乌托邦思想，他发展了一种观察和试验集体社会状态的想法。这些想法对圣西门的信徒和“社会学”一词的发明者奥古斯特·孔德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孔德不满足于圣西门的分析，便在他所著《实证的哲学》一书中提出一项社会分析和组织的更佳规划，大体上勾划出社会学的轮廓。<sup>②</sup>总之，可以说，

① 斯克尔顿著：《社会主义，一篇评论分析文》，第7页。

② 傅加德斯著：《社会思想史》，洛杉矶1922年版，第210—211页。

这些乌托邦思想家由于他们认识到有必要把社会作为对象加以研究，由于他们对社会现象有所认识，由于他们对社会进程作了一些分析，以及由于他们力图设法为人类创造一个可生活于其中的美好世界，他们对待社会学已大体上接近我们当今对社会学所采取的态度。然而，只有后来那些提倡不断变化论或进化论的人，诸如黑格尔、马克思、达尔文、赫胥黎和斯宾塞，才将这一学科置于实用的基础之上，使之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sup>①</sup>他们对事物的起源与发展抱有各自的想法，对具有某一定目的的社会进化过程富有真知卓见，从而为后人所借鉴。

我们可以继续探讨由个别乌托邦思想家所提出的各种思想与理想，如莫尔和培根关于家庭重要性的观念，或如圣西门强调专家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工具，专家们的影响是广泛的。我们也可以长篇大论地探讨圣西门式教会的广泛组织和传教士，傅立叶派的信徒、欧文主义者、美国的伊卡运动或勃朗对基尔特社会主义与法国工团主义的影响，<sup>②</sup>以补充在以上篇幅中所倡导的东西。但无此必要。阐述乌托邦思想并非徒劳无益，它早晚会以某种形式成为事实。什么东西也不会全部烟消云散。

---

① 此事将于下一章详加讨论。

② 该思想认为各种有组织的行会会最后替代国家。

## 第十章 乌托邦思想家观点的局限性

虽然乌托邦思想家的许多思想和理想超越了他们的时代，甚至超越了以后的时代，虽然乌托邦思想家都是些天才和发明家，在许多方面走在他们时代的前列，但他们毕竟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也具有所有人对社会看法的局限性。任何人，不论他多么伟大，都不能预见未来社会的整个变化。诚然，某些变化是可以预测到的，否则对历史的研究就全然无益。但社会是不断变化的社会力量的玩物。这些力量有时加速运行，有时却停滞不前，起着阻碍的作用。没有任何人能掌握所有的知识，因为知识是逐渐展现的。经过几千年或几百年之后，由于我们对社会更加了解，又有更健全的社会哲学，我们今天才能看清乌托邦思想家改革方案中他们所意识不到的弱点和局限性。本章的目的就是对此加以评述。

乌托邦思想家，从一个侧面来说，未能认识到社会进步必须具有可靠物质基础的必要性。道德-宗教性的乌托邦思想家的设想完全是唯心的——全然远离现实世界。早期的现代乌托邦思想家也同样看不到整个社会集团在经济上应具有足够的力量这一点。只有空想社会主义者才对这一真理开始有所认识，就连他们也忽略了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是由于工业革命，才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我们现在看到，社会的生产力量越大，物质方面的生活设施越充足，文化娱乐的时间就越多，在社会和精神方面的投资就越大，想方设法使社会进步的手段也会日趋完善。没有一个古老的乌托邦思想家想到过这方面的问题。只有几个空想社会主义者领悟到它的重要性。只是在最近，人们无疑是在受到上一

世纪巨大的经济发展激励之后，才认识到组织得好、效率高的经济制度对所有其他社会活动是多么重要。

柏拉图、莫尔、培根、康帕内拉的优生学思想不仅具有无比说服力，他们还是唯一能够稍稍理解个人肉体和精神状况的重要性并认识到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人的父母状况的人。简言之，大多数乌托邦思想家都不认识遗传的重要性，他们看不到个人是社会完善的物质基础。

乌托邦思想家不可能对人的本性有正确的认识。因此，他们往往误入歧途。首先，他们认为人类原本是完美无缺的，生下来就是天使，正如卢梭所说，人由于缺乏教育，或由于不健全而恶劣的管理制度，或由于过去的愚昧无知，才受到社会环境的腐蚀的。简言之，人生而受环境的支配。但是，正如罗斯教授所说<sup>①</sup>：“认为人的缺陷是由社会的缺陷造成，并认为只要我们按照正确的路线管理社会，这些人的缺陷就会消失，这种想法是再愚蠢不过了。”清除有害的影响和罪恶的制度并不能使人成为圣人。尽管这些乌托邦思想家勇于对此进行探索，但他们仍旧压根儿不理解人的特性，也可悲地误解了其它事物。任何使社会臻于完美的运动，其基本要点在于对人性进行控制。例如，必须把经过几百年发展起来的人身上的种种习性考虑在内，因为这些习性并没有被埋葬，数百年以后还会跳出来捣乱。

除傅立叶之外，别的乌托邦思想家都不认识人的本性在社会生活中或由这些本性发展起来的社会力量的重要性。他们只考虑人应当是什么样子和应当需要什么。但人却有着强有力的内在特性、倾向性，或癖好。这些都是经过漫长的阶段慢慢地演化而成的，从而使个人得以生存。这些基本的社会力量不断地指导着人的行为，帮助他去做各种事情和塑造各种制度。这是不能忽视的，

<sup>①</sup> 《社会学原理》，第4页。

因为它们都是绝对基本而实际上不可改变的东西。他们并不正视人类社会这个最重大的问题，即按照社会的利益对人的本性进行合理的控制，驾驭这些本能的冲动，使之与文明的努力相一致。这些乌托邦思想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

由于他们处于这种沉重无知之状态，他们有许多改革方案还是未予实现的好。否则，他们肯定会压制、扼杀这些天性，从而束缚人民的生活。我们不能压制人的天性。任何有意或无意这样做的改革运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当然，我们可以把人的倾向性重新加以引导或使之升华，但绝不可置之不顾。在乌托邦思想家的一些设想中，由于上述原因注定要失败的有：提倡财物公有时，他们否定了根深蒂固的自私本性。近来的一些社会试验表明，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并可造成社会性灾难。他们轻率地取消私人财产也是错误的。我们知道，私人财产乃是诱导人们去做出个人努力和取得成就的最大而又最自然的力量。否定了它，你的计划就会成为泡影。一个普通人在他所承担的工作中必然涉及到自己的利害关系。我们所灌输的任何理想也没有比这更具有吸引力的了。财产所有权不但能满足个人占有财产的本性，也能满足做父母的本性和自尊的本性。鼓励并发展它就能使社会得到满足，压制它就会造成灾难。

柏拉图和康帕内拉提倡妇女公有，这毫无疑问是与西方人根深蒂固的一夫一妻意识相矛盾，并会成为产生妒忌之心的不断源泉。柏拉图和康帕内拉的生育方案中对父母本能的压制，是与我们所看到的人性背道而驰的。有许多乌托邦设想提出过兵营式生活，这就否定了所有的人都有想过私人生活的欲望。要求人人穿着同样的服饰，也是与个人爱打扮和个人突出的自然要求背道而驰的。人们都不愿按照一个模式生活，想使他们绝对遵循一种呆板的生活准则是办不到的，因为每个人的遗传因素显然与众不同。



个人与个人之间在能力方面总是有差别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遗传决定的。人的个性和特点部分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使个人接受某种思想态度并按某些方式控制自己的感情，但主要还是由遗传所造成而且是不可改变的，即先天遗传的产物。在许多情况下，乌托邦思想家对社会持一种过于人为的看法。他们在树立其理想的社会秩序时，一点也不考虑践踏人们的自然感情和压制自然欲望和冲动带来的后果。他们并不象我们现在这样用我们较丰富的知识来看待这些问题。

乌托邦思想家不认识生活乃是永恒的斗争并且也许将永远如此。让我们听一听威尔斯通过他的《现代乌托邦》一书所说的话吧。这部书基本上把可以想象得到的社会进步情景作了合乎情理的讨论。他说：“旧的乌托邦——柏拉图和康帕内拉的生育计划除外——忽视了个人嗜好中的再生性竞争这一生活上的根本要点，而基本上只谈生活上的偶发事件。人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自然选择便因而据以发挥作用，这也就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不可调和的复杂情况的根源。旧乌托邦思想家将这种情况摞置一旁，闭口不谈。现实的世界是由一片混乱的意外事件和难以估量的力量所形成的，人生活在其中要么生存要么失败。现代的乌托邦和早先的乌托邦不同，不敢装作要改变上述情况。现代乌托邦可能给这种斗争带来某种秩序，使之合乎人道，但人必然还是处于要么生存要么失败的状态。”<sup>①</sup>“在生活中必然有某种竞争，以决定把谁推向一边，谁却可得势并繁衍下去。”<sup>②</sup>“不管我们怎样做，人始终是一种竞争性的动物。尽管道德和学术训练可以变更和扩大他对成就的观念，使他们在修养上有所提高、有所安慰，使他们坚强起来，但没有哪一种乌托邦能使他完全摆脱为争取地位的高

① 威尔斯，《现代乌托邦》，第135页。

② 同上书，第137页。

低、荣辱而进行斗争的烦恼。他生活在成功与失败之中，就象他不可避免地要生活在时间和空间里一样。”<sup>①</sup>

这种种困难可能出自乌托邦思想家的另一种局限性，即他们所持全社会的观点。他们过于只从总体的角度看待人类。除少数几个乌托邦思想家外，他们不懂得，必须把一群人既作为集体又作为单个的人来看待，而且个人的特性与团体的特性是大不相同的。总之，他们不认识，社会改革要成功必须从个人开始。亨利·琼斯先生描写成功的改革者时说：“他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内心生活。这种内心生活在他自己看来是极为真实而重要的，社会对他来说不是一个泛指词，而是一系列的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性格。它具有富于同情心的想象力，能从内心深处体验到这些人的经历。”<sup>②</sup>我们并不是在批评旧乌托邦思想家的一般社会观点，或批评他们对社会意志这个观念所作的贡献。我们只是认为，为了提出一项可行的乌托邦计划，他们应当多考虑一下个人。

为了说明乌托邦思想家未能充分掌握他们当时周围生活的意义，可以说在所提改革方案中他们未能从现实情况出发。这部分是由于受社会经验太少的限制，部分是由于想象力太丰富而产生的副作用。他们让现实和未来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仅凭道德热情并不能使改革前进一步，除非他们能提出与当前社会进程相衔接的改革方法。人们必须以现实情况为起点，逐步添砖加瓦。倘若他们发现情况好，就使它更好；倘若情况糟，就把它消除掉或加以改善。人类永远不能超越现有的条件。向乌托邦前进的运动要求人们抱有一种思想，不是目前就可达到的想象中最好的世界，而是最有可能实现的世界。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精力集中于合乎科学的而实际可行的工作。必须在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去寻找提高社会的

<sup>①</sup> 威尔斯，《现代乌托邦》，第137页。

<sup>②</sup> 《社会改革者的有效信念》，伦敦1910年版，第7页。

支点。你要宣传并用以作为改革基础的思想，决不可与当时流行的思想相去过远，也不要让你想要达到的目的和眼前的情况相差太大。

假如要对某些乌托邦思想家进行批评<sup>①</sup>，还可以说他们不谙如何利用抗争精神去进行改革。他们只是模糊地懂得指引社会前进的种种可能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提出的理想，而不是措施。他们的弱点在于只是让理想处于理想的阶段，而不设法去采取行动。作为理想主义者他们是伟大的，但如果他们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鼓动者，那他们就更伟大了。要取得迅速的效果必须使宣传与行动紧随理想之后。另外，某些乌托邦思想家使他们的完美的国家过于远离尘世，这就使得人们怀疑他们怎么会产生这样大的力量。他们的设想缺乏赢得追随者的必要吸引力，从而给社会指出一定的方向。

除了最近出现的大多数模拟的乌托邦思想家之外，乌托邦思想家都错误地把他们的理想国想象为“没有比这再好的了，”认为这就是对社会设想的至理名言，对社会作出努力的最终目标。他们认为没有什么进步事业能比他们所设计的国家更先进的了。我们发现早在柏拉图时期就萌发这种错误，因为他把他的国家描绘成为一种不可动摇、不会改变的、以最崇高正义为基础的秩序，一个不仅无须改进，而且不可能进一步改进的国家。大多数其他乌托邦思想家也同样有这种错误的想法。今天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与实际生活不相符合。这就不可挽回地否定了美满的、持久的人类幸福，因为人的本性是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的。看来，乌托邦思想家象是忘却了或是根本从来没有认识到，只有那些期望并追求更加美好事物的人才能找到幸福。

他们把乌托邦说成是可以行得通的社会制度也是错误的。尤

<sup>①</sup> 不是指那些先知、耶稣和空想社会主义者。

其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可以预先精确地制定出一套具有完整秩序的社会、政治和工业方面的方案——可以由他们同时代人付诸实现的方案。诚然，他们曾设法解决最令人烦恼的社会问题，并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体制，这是应当受到无比赞扬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这些值得赞扬的努力中，他们却走向可笑的极端，甚至对每件偶发性的事都规定了僵硬的细则，而且一丝不漏。他们把人的本性改变成为一种可靠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不留下一点自然发展的余地。这些设计者竟然凭空想象出一种人们长期追求的社会秩序。<sup>①</sup> 他们受到这个思想的支配：人类有可以达到并维持一种社会清静无为的状态。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是：乌托邦思想家，正如其他许多社会理想主义者一样，关于可能实现完美的社会状态的想法是错误的。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想法，即认为社会运动是朝着某种绝对形式的社会，一种固定的、永不变化的社会状态发展。但是，正如赫胥黎所说，“进化论并不鼓励人们对一千年以后的事态作出预测。”<sup>②</sup> 完美的社会只是一种虚构的理想，总是随着我们的前进而向后退却。人类的完美境界是永远也不能达到的；唯一可能的只是努力向前而已。无论人类进化到什么程度，即使是朝一定的方向进化，能将我们引导到多么进步的境界，我们始终只不过是向乌托邦走去而已。乌托邦永远是某种未来的事物。正如诺多主张的那样：“所有已知的事实都使人们得出一个与神奇的梦想大相径庭的道理，即认为存有某种永恒的、有规律性的、永远周而复始的运动是错误的，也认为世界正走向某一目标的想法是荒谬的。”<sup>③</sup> 历史证明，社会总是朝着某种尚未变为现实的事物或甚至尚未为人们所

---

① 斯克尔顿所著同上书，第 83 页。

② 《进化与伦理》，第 85 页。

③ 《对历史的阐释》，第 328 页。

理解的事物运动着。没有什么东西是持久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精确的、肯定的，社会生活或社会思想的现有状态并不是最终状态。在我们所有已知的事物范围内，没有什么东西是始终保持不变的东西。我们的理想或者说社会完美无缺的思想，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美好的想法而已。一切都在变化中。

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乃是社会进步——永无休止地变化着的人类演进过程。毫无疑问，克罗-马尼翁人\*曾抱有一种社会完善的理想，而这种理想和今天的理想是多么不同啊！想到社会的进步，我们也应该考虑到人们在未来还要生活的数千年。因此，我们不敢限定通过人类活动而表现出来的自然生命力可能达到的高度。<sup>①</sup> 社会理想主义者应具有批判而灵活的思想，并应认识到他的理想只是暂时的，明天就会有缺陷，后天准是没用的东西。我们要为之奋斗的是社会进步，而不是社会完善，是持续不断的变化，而不是停滞不前的存在。

然而，这种批判性的观点丝毫不应削弱我们对社会所作的努力，或削弱具有建设性的社会机构所起的作用。这种观点并不把暂时“好”或“最好”的东西作为目的，只是把人类在最好的情况下认为最好的东西作为目标。在目前，我们追求我们认为是“最好”的东西，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最好的东西立即会发生变化。同时我们必须允许，在事实上也必须鼓励经常修正和改善各种社会理想。我们所向往的是一种使人类子孙后代实现至善的社会秩序。

由于以上所述以及我们还要谈到的其它东西的局限性，乌托邦思想在上一个世纪逐渐消亡。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前的乌托邦思想家并没有肯定能实现他们所抱希望的把握。他们的国家是十全

\* 克罗-马尼翁，古代法国的猿人。——译者

<sup>①</sup> “我看不出人类的聪明才智和意志，依靠健全的探讨原则和有组织的共同努力，在比人类历史还要长的时期内，可以改变人类生存条件的限度。”赫胥黎著同上书，第36页。

十美的,毫无变化和发展的,并且远离现世。尽管他们怀有重建世界的光辉思想,但他们却缺乏对他们的观点提供具有实际基础的先例。因此他们是某种理想社会组织的编造者。他们希望这种社会能得以实现,但又感觉到可能性不大。这种象柏拉图所提存在于天国的理想国的思想已在本书以上各章节里谈到。莫尔也很幽默地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据说,希斯拉德把乌托邦的确切方位告诉了莫尔和彼得·贾尔斯,但贾尔斯的一封信使莫尔想起,原来就在这个时候,不幸让一个仆人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同时还有一位同伴由于在船上受凉而大声咳嗽,使他们未能听到,于是这个秘密便随希斯拉德一同消失,致使乌托邦的方位至今无人知晓。在乌托邦思想家看来,社会是个难以驾驭的野兽。它脾气乖戾,多病,具有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生下来就是畸形怪状,灵魂丑恶,它的种种机构也是不健全的。但他们却想不出办法来把他们所见所闻的一切事物改造得好一些。由于要达到目的的理想是不可能的,他们才选择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乌托邦形式。他们很难将这些臆想的完美国家视为可能实现的事物;因此,他们便将它们看作是奇特的、无实际的幻想,因为社会是不可能凭有意识的、武断的设想而立即加以改造的。

另一方面,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是卢梭的门生,深受法国革命精神的感染。在他们看来,只要人们有决心去做,就没有什么实现不了的东西。法国革命戏剧性地表明,只要人们有足够的决心,事情就可以办成。因此,尽管我们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幻想家,但他们却认为他们自己是实际的,并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还认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们的设想强加给他们同时代的人。<sup>①</sup>

---

<sup>①</sup> 斯克尔顿在谈到乌托邦思想家和他们的同时代人不可避免的目光短浅和固定的看法时写道:“它领导人们为未来作出计划,就建立新的社会机构提出意见,按照精心设计的方案建造,一分不差,每一机构的前后左右与高度都预先准备好。没有社会成长

这两种想法虽然很自然,但今天必须将之视为弱点,因为它们既不科学也不真实。当时提出的各种建议旨在按合理的方式重建整个社会结构,这不过是那个时代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的想法的必然结果。乌托邦无疑是虚幻的思想产物,因为思想和历史尚未学会携手来预测未来的社会。由于他们缺乏历史的观点,他们对社会运动便缺乏知识,也不懂得如何去引导社会运动。随着历史理论的兴起和发展的思想即进化思想的逐步成长,原来意义上的乌托邦想法就不再出现了。因为再没有必要提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国家,也没有必要给不完美的社会强加上一个完美的社会了。这种变化开始于黑格尔主义,并因遵循进化路线的马克思、斯宾塞和达尔文著作的问世而变得明确了。在黑格尔以前,历史只对孤立的现象作出解释,而几乎完全否认全面的历史观。当然,在黑格尔以前是有历史理论的。按照基督教的理论,亦即宗教性的理论,认为发展是按预先想好的计划进行的。这种计划出自上帝的意志,即一种由上帝决定给人类走的道路。我们可以在天启录者和奥古斯丁的著述中找到一些证据。赫德把作为解释历史的基础的宗教发展论改换成为自然主义的人类延续论。但是,即使如此,它仍然是一种宿命论。在其它较为不太明确的历史资料中,例如在维哥的著作中,有人认为甚至在黑格尔以前就已朦胧地认识到,整个人类的存在是一个统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历史书主题的具体事实只不过是一些偶发事件;但是这种朦胧的认识还没有深刻到足以影响社会思想的程度,没有达到赋予人们以希望的地步。

---

与发展的概念,即一经找到了自然的理想制度,就要尽量照它的样子去做。没有比从卡贝摘下的引语(《伊加利亚旅行记》,第64页)更能说明他们那个时期的预先武断的想法或偏见和我们这些达尔文之后时期的思想差别了:“既然社会机构并不是由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创造出来使之成为全面的、相互关联的结构,而是经过长期世代相传点滴积累而成,它怎样会免于邪恶呢?”对乌托邦思想家说来,这是实在的、严肃的评论,而对20世纪的人说来这却是纯粹的讽刺。”同上书,第73页。

它只不过是一种正在酝酿中的原则。

这些模糊不清的概念，最后在黑格尔著名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和其他 19 世纪哲学家著作中就终于具体加以说明了。历史并非某种预定的表述，而是历史生活本身内在规律的产物。<sup>①</sup> 历史是人类精神周期的展现，在不同的时代里自身的重复，一种固有的自我发展。<sup>②</sup> 黑格尔历史学派几乎只关注历史的精神和道德力量，把历史视为人类意志的冲突、胜利、失败和相互调整。<sup>③</sup> 这种具有持续性和流动性的思想一旦与社会思想结合，便产生出人类进步的思想。这种进化的理想主义一经传播开来，社会理想主义便不再是富于想象的人所构思出来的充满光怪陆离的东西了。其主要论点必须与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相吻合，否则便是毫无用处的。例如，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一经同黑格尔主义融为一体，那么，这些学说就不再是“空想的”而是“科学的”了。早在 1848 年卡尔·马克思著作中所提到的黑格尔进化观点，乃是社会理论的转折点。

现在，由于我们接受了进化的思想，可以将类似的上述理想编出一个浪漫故事，但并不显得荒唐可笑。因为我们有了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这样的事或许是可能的，甚至是很有可能的。看来，将来的每一代人都将有自己的社会理想。这些社会理想会更确切、完整，更现实——有越来越好的工作计划，而不是幻想。但是，

---

① “此时人们已将历史视为一种完全自我依靠的思想发展现象。在这一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必是从前一阶段按严格的逻辑推理的结果。”参见冯德：《群众心理学基础》，纽约 1916 年版，第 520 页。

② 黑格尔把历史观中的形而上学抽出来并赋以自然发展的坚实基础。“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引自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23 页。

③ 正、反、合。



这样一来，乌托邦思想家对已经认识到历史发展的人就毫无吸引力了。今天我们回顾过去，可以看出乌托邦和乌托邦思想家是如何促进和帮助人们重新引导社会运动的；这是因为我们已习惯于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但我们的先人是做不到的。当今的所谓乌托邦已经不是我们在本书大部分章节中所描述和分析的那些乌托邦了，它们不过是一些论述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最杰出的现代思想汇编。在许多情况下，不过是试图将目前已在进行的运动推进一两步而已。它们是科学的，而且是以已经实现或能够实现的事实作为依据的，是根据现有情况的自然秩序或顺序制定的，也遵循因果规律，并适当考虑到人与物两方面的自然局限性。

另一件事也对乌托邦的消逝起了极大的作用。尽管各种乌托邦本身是思想进步在加速进行过程中的产物，然而除培根和近来的摹拟的乌托邦思想家之外，其他的乌托邦思想家都不曾预见到人类在知识上取得的惊人进步。这种史无前例的学术活动，包括物理学取得的光辉进展，对人类事务的认识以及在过去大约一个世纪里机械发明的进展，使人类对社会进步的观念发生了彻底的革命。由于人洞察到人类有意识和潜意识隐藏着的情况，由于人类学会了利用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并且近年来目睹产生的化学和机械方面的精巧发明，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元素，因此人们并没有被迫将他们的理想国家建立在遥远的岛屿或星球上。不，更美好的东西就在前头。人类朝这方向所作的努力将在几年或几十年就能使之成为可能。知识的巨大发展及由之而来的机械发展，在我们中间已产生了一种我们自己有能力去征服困难的新信念。我们在十多年内看到了世界上两个最伟大国家的政治命运颠倒了过来，我们看到人类征服了天空和海底，我们已经能用无线电把信息送过海洋，在数百海里以外就可以听音乐会，我们已经看到诸如麻疯和破伤风之类可怕的疾病得到治疗，我们看到妖魔般地制造

死亡和破坏（同样的智慧可用于建设性用途）的机器的巨大进步，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在托马斯·莫尔那个时代或许是一项具有革命性发明的东西，在当今的日报上只占有极小的篇幅。期望业已成为人所共持的态度。

由于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进化原则并认为人类可以控制各种力量，由于机器将人类的生产力扩大了上千倍，由于我们能左右人们的思想并指挥社会前进，乌托邦式哲学关于社会的完美无缺的刻板观念便消失了。但是，我们无须对此感到惋惜；因为我们仍然有责任提高我们对上述乌托邦思想的优点的认识。乌托邦思想的精神依然在起作用，只是现在以这个有效的进化原理作为武器罢了。现在我们能研制出一种变革社会的技术。我们相信这种技术到时可能越来越纠正人的缺点并弥补其弱点。我们已经向我们自己表明，我们在生活上已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当然，每个人仍将有所种种局限性，生活仍将是不断调整的过程，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越是能科学地掌握物质和社会环境，这些调整也就会不那么激烈、不那么令人不快了，而有秩序的、逐步前进的过程就会大大加快。<sup>①</sup>

尽管这些乌托邦思想家有这些弱点和局限性，我们也不可过于小看他们。我们不能要求五百年或一千年前的人能有我们现在所具有的社会知识。虽然他们是凭空幻想，他们的某些理想不切合实际，他们自己为实现这些理想所作的努力几乎等于零，然而他们的功绩是值得称道的。即使他们的确自以为完美无缺，他

---

<sup>①</sup> “现代的乌托邦不应是静止的而应是能动的。不要塑造一个永久性的国家，而应塑造一个处于充满希望的阶段的国家，并由此导向一长串逐步上升的阶段。如今我们并不抗拒或克服各种巨大的事物潮流，而是漂浮在它之上。我们现在并不营造堡垒，而是建造国家的船舶。为了对公民们作好有秩序的安排，使也能享受本人和子孙都永远享有可靠的平等的幸福生活，我们必须设法达成一项灵活的共同协议。按照这项协议，可以由不断更新的人物共同来最有效地促进全面的发展。”威尔斯著《现代乌托邦》，第5页。

们的著作却一直是一种力量，在一处起了推动作用，在另一处树立了一个暂时的奋斗目标，还提出了无数未来的可能远景。因此，倘若我们能仔细加以考察，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在各方面的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已是模糊不清，有时也是难以辨认的，但无论如何还是历历在目。考虑到他们所遭遇到的种种困难，我们便会对他们的思想弱点和局限性竟然如此微不足道而感到惊异。作为思想家，他们确实是伟大的。他们的某些理想可能是虚幻的，是一种无根据的乐观主义产物，他们的某些思想也可能只适用于他们自己的时代，但是，他们却在谱写人类历史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可以断言，乌托邦不会真正得以实现，因为它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乌托邦始终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国度。乌托邦的作者看到他的原则实现时，他也辨认不出来，正如作为后代的我们当乌托邦得以实现时也认不清这些原则一样。乌托邦毕竟不是一个社会国家，而是一个想象的国家。

## 编 后 记

本书是一部研究乌托邦思想史的专著。作者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作者对乌托邦思想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及其对文明所作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对这一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作了剖析。

参加本书的翻译工作的,有

张兆麟 第一章至第四章第一、二节;

杨廉著 第四章第三节至第六节;

张豫婉 第五章至第六章;

吴学文 第七章至第十章。

何 汗 初校、整理、抄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8年10月